

文化报道：姜文电影，寻找什么

三联
耳关

生活周刊

® 2015.10.5
2015年第40期
www.lifeweek.com.cn

时光凝固的国度 古巴行



856



40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2元



《时代》2015.9.21

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电子邮件能取代感谢信吗？剧作家迪莉亚·艾弗伦认为可以。“我不管你是用电子邮件还是用感谢信来表达同情，关键在于要诚挚、同情、敏感、真正地感激。更费劲不等于更有感情。”你想拥有何种超能力？斯蒂芬·金说：“X光视力？你会看到肮脏的东西。心灵控制？太诱人了——绝对权力绝对会腐败。像超人一样飞？但如果没有超级力量和不会受伤的能力的话，我会被国土安全部派出的战斗机击落。最好的选择应该是超级速度。”



《新科学家》2015.9.14

防止衰老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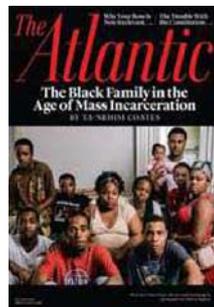
科学家可能已经发现了使我们又长寿又保持健康的办法，到时候一下子就可以预防所有跟衰老有关的疾病。这一手段的关键在于瞄准老化的细胞。年轻的器官中的细胞会分裂，取代其受损的邻近细胞。但每一个细胞只能分裂有限的次数，之后它们可能不会死掉，而是进入了衰老状态，会引发炎症，破坏健康的细胞。几乎所有跟衰老有关的疾病都跟发炎有关，如老年痴呆症、高血压、癌症等。科学家在尝试用各种药物来杀死这样的细胞。



《焦点》2015.9.17

默克尔的倒台

难民的总理，还是德国人的总理？这是默克尔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德国先前的慷慨接纳，还是最近突然关闭边境的措施，都得罪了各方势力，欧洲各国在难民问题上的不一致态度，加深了欧盟经济危机带给政治的伤痕，使德国以往在欧洲政治一体化上的外交努力付之东流。现在难民仍未停止进入德国的努力，越来越大的压力最后会使默克尔如同她的数位前任一样，有过辉煌的政绩，最后在失败中黯然下台。



《大西洋月刊》2015.10

大关押时代的黑人家庭

1965年，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发布了一份名为《黑人家庭：需要国家为之采取行动》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城市黑人家庭多未婚母亲、依赖福利生活以及家庭结构等问题使其身陷贫困“怪圈”。今天，美国在押犯人的数量占世界总数的25%。1/3的20岁到40岁男性黑人高中肄业者在押。在押人数的攀升与犯罪率不成比例，它是司法政策的结果。而犯罪记录的负面效应正在摧毁黑人家庭的经济和未来。



《福布斯》2015.9.28

泡沫中的男孩

8个月前，29岁的前对冲基金经理维韦克·拉马斯旺米的Axovant公司以500万美元从葛兰素史克公司手中买下了一种试验性的阿尔茨海默症药物。6月，他融资3.15亿美元，成为美国生物科技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开募股。但质疑很快到来：葛兰素史克为何在前期投资巨大的情况下放弃该药？包括拉马斯旺米母亲和兄弟在内只有10名员工的Axovant是否应当拥有超高市值？此后，Axovant股票垂直下跌。9月初，其价格只剩下募资时的12%。

P32

时光凝固的国度
古巴行



- 40 古巴，一种独特的民族独立史
- 60 切·格瓦拉，热血与冷血
- 78 从革命到“解冻”的古巴
- 84 古巴三宝



P92



P110



P128

2015年第40期 总第856期 2015年10月5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社会

- 92 调查：近访凉山：慈善的理想与现实
- 102 人物：须一瓜，她的小说与别人的电影

经济

- 90 市场分析：央企违约破产的示范效应

文化

- 110 文化：姜文电影，寻找一种观影关系
- 120 话题：阿加莎作品中的爱情与人性
- 124 音乐：许巍，用音乐记录自己
- 128 医学：老年痴呆症：老龄化社会的瘟疫
- 138 时尚：对海洋的两种态度
- 146 思想：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 148 书评：西蒙·沙马的力量
- 150 书与人：王志和他的《西行三万里》

专栏

- 18 邢海洋：负利率时代的房地产
- 142 张斌：向《领导》学习
- 144 宋晓军：美国空军的一家之言

- 2 环球要刊速览
- 10 读者来信
- 12 天下
- 20 理财与消费
- 22 好消息·坏消息
- 23 声音
- 24 生活圆桌
- 28 好东西
- 152 个人问题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舒可文 Shu Kewen 苗炜 Miao Wei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阎琦 Yan Qi 吴琪 Wu Qi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曾焱 Zeng Yan 王恺 Wang Kai 陈晓 Chen Xiao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王星 Wang Xing

朱步冲 Zhu Buchong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魏一平 Wei Yiping

蒲实 Pu Shi 庄山 Zhuang Shan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翔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杨璐 Yang Lu 何潇 He Xiao

徐菁菁 Xu Jingjing 黑麦 Hei Mai 陆晶靖 Lu Jingjing 程磊 Cheng Lei

记者 Reporter

李东然 Li Dongran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阿润 A Ru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邢宇 Xing Yu

龚融 Gong Rong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尤帆 You Fan

艾江涛 Ai Jiangt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设计总监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徐睿洽 Xu Ruihan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发行事业部 Circulation

荣誉总监 Honorary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大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Southern China

雍江 Yong Jiang

北京区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Beijing China

周旭 Zhou Xu

发行拓展经理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品牌经理 Brand Manager

肖丽媛 Xiao Liyuan

客户经理 Sales Accoun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渠道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Marketing Channel

于硕 Yu Shuo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付新林 Fu Xinlin

李卫红 Li Weihong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潘姮 Pan Heng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产品部 Products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张莉 Zhang Li 袁媛 Yuan Yuan 连子君 Lian Zijun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罗启宏 Amy Luo 陈陌陌 Chen Moyang 孟佳 Meng Jia

内容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王晶 Wang Jing 薛芃 Xue Peng 祝童 Zhu To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技术部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www.lifeweek.com.c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韩雅丽 Han Yal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编采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广州办事处地址：

广州市海联路6-8号银珠商务中心405室

邮编：510230

电话/传真：(020) 34283562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2.00 \$6.00 港币 16.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 (025) 83327129
-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347099
-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 长春：中外书刊音像经销有限公司 (0431) 82708592
-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 南昌：沧海书店 (0791) 8592810
-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 郑州：大河书报刊销售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017749
-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楼兰酒业
- 3 · 如依家
- 5 · 力度形象
- 7 · 海天一舍
- 19 · 童颜面具
- 59 · 一汽大众
- 77 · 人民日报
- 101 · 国家旅游局
- 108~109 · 野生救援
- 127 · 周刊征订
- 143 · 周刊20年
- 145 · 书店广告
- 封三 · 暇步士
- 封底 · 欧米茄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SL 到 10655111，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8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No.855

中西风物：文明的交融

有关文明的交流，亨廷顿说：“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文明的历史而不是国家的历史，文明的历史意义比国家的意义更大。”他划文明交流史为“遭遇时期”、“冲击时期”和“相互作用时期”。因为“一带一路”战略，有机会重新梳理文明的交流，尤其是处在“相互作用时期”的今日，中国既处于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又遭遇复杂国际环境，如何强大自己，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文明交流史自有裨益。

北京 张晓月

暗箱操作的换届选举

小杨是杨柳青十八街村民，自从今年开春到现在，他们村委会一套班子成员因私吞挪用征地补偿款一事被人实名举报，有的村官被罢免，有的在接受调查，有的已被拘役服刑。恰巧，现在的村委会正面临换届选举。小杨不满地说：“上届的村委会选举就存在暗箱操作等极不规范的行为，那些候选党员，全都挖空心思找关系拉选票，挨家挨户找本家族亲戚、邻居、要好的朋友帮忙投选。今年这次换届选举跟上届不一样了，原村委会发生了这一系列的变故后，谁还敢明目张胆地拉选票？所以这次候选的党员全都由公开转入暗地里拉选票。当然得有一定的回报，先是自己最亲近的家族人员、亲朋好友，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现金或是吃上一顿大餐，再由他们四处拉拢选民，谁投了选票就把谁的名字记录下来，事成之后当选者一定好好酬谢这些选民。你看，候选者不敢出头露面拉选票了，背地里想办法就把这事给解决了，这哪是公开透明

的选举啊？”

村民委员会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选举方式为选举监督与选民监督。可现实是，候选者明里暗里动用关系利用手段为自己拉选票，其称不称职、有无工作能力还当另论。小杨还说：“被选中的村官当然是花费不少的费用，上任之后他们会想方设法从集体的资产里捞回来。如果有谁不识时务、不合节拍，早晚被淘汰出局。去年就因为老村长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而被排挤下来，气愤难当的老村长实名举报村委会私吞挪用征地补偿款，结果竟被人恶意打击报复。直到现在，上届的村委会一套班子成员中那些暂没查出问题的村官，依然在候选之列，这次的换届选举他们仍有可能被选中。

天津 刘希亮

城市越大，民工越小

“五一”回老家的时候，在村里碰见在外打工的小学同学山子。他打工的城市我小时候就去过的，参加工作出差后又去过几次，感觉那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

漂亮了，我们聊起了那座城市。

我对山子说：“现在你工作的××市可比过去好多了。”可他纠正我说：“不是工作，是打工而已。我倒情愿它没有变大变漂亮。”我感到很意外，问他：“城市变大变漂亮不是件好事吗？再说你都在那里生活快5年了。”山子叹了口气说：“再生活5年，那城市也还是别人的城市，我们也就是在那里打工挣钱而已。城市变得越大越漂亮，我们这些做民工的就越被人家瞧不起。”山子抽了一口烟，接着说：“就说上次吧，我们几百上千个民工辛辛苦苦干了近两年，盖起来十几栋居民楼，成了一个小区。等楼卖完了，小区居民也搬进去了，结果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有事去小区找人的时候，保安却死活不让我们进，说是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当时我们连把楼给拆了的心都有了。”我知道山子说的都是实情，现在很多城里人见了民工就像见了贼一样，他们根本想不到自己住的楼是民工盖的，自己走的路是民工修的。

在山子的眼里，我也可能也已经算是个城里人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好沉默着不说话。山子又开了口：“过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破一些，我们去一些小饭店、小吃铺吃饭还没有什么。结果去年政府改造小街小巷后，把那些小饭店、小吃铺都拆除了，盖起了豪华的餐厅、高档的饭店，我们再去吃饭，服务员就不让我们进了，说是衣冠不整者不准入内，怕影响其他客人吃饭。我们都是靠自己双手劳动挣饭吃的人，不过是穿得没城里人体面，就成了闲杂人等，成了衣冠不整的人？好像我们这些打工的就只能去街边的小吃摊一样。你说说，城市变大变漂亮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眼看着山子越说越气，我却找不出什么适当的话来安慰他。为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些民工背井离乡，付出了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是生命，但他们却在我们这些所谓城里人冷漠的目光里，永远走不进城。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劳动才让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但大了、漂亮了的城市却把

民工们映衬得更加小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伤疤，受到伤害的正是这些城市的建设者们。

我想，判断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除了看它的城市建设、市民素质，这个城市对待民工的态度，也应该成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广东罗定 小文

发烧的乡镇旅游

前不久，参加了一次省级重点城镇试点座谈会，其中一位镇领导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是一所位置偏远、经济相对落后的山区小镇，因为有一条保存较为完好的古街，被多家部门列入“历史文化街区”、“传统古村落”、“旅游特色名镇”等。借此，从县到乡的各级政府部门认为大打旅游牌的时机已到，短短几年时间内，对小镇进行了大手笔规划，通过民间借贷和政府举债，先后投入10多亿元，全面翻新镇里的基础设施和配套项目，先后修建了仿古城墙、博物馆、游客中心等。然而，旅游业的发展，并没有实现他们最初的期望值，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一些后续项目进入负债和停工的恶性循环，不得不打报告四处“化缘”，请求追加投资。

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几个去过该镇的局外人帮他们把了脉：即使该镇彻底改头换面，还是吸引不了多少游客。首先是当地大交通格局没有改变，游客需要长距离驱车到一个名

气并不太响的小镇旅游，肯定不太现实；其次是该镇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品牌价值，镇里只有一条古街，且原住民多数已搬迁到县城，如今街道里住的大多是现代商人，已经失去原生态优势；再次是该镇一次性申报一个国家级5A景区和两个4A景区，外加一项“申遗”计划，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规模过于宏大超前。更重要的是，因为缺钱，从已竣工的部分项目来看，不是偷工减料，就是“半拉子”工程，留下很多质量及安全隐患。

在其他的几个旅游镇中，也存在诸如此类大兴土木、盲目超前大打旅游牌的情况。其中有一边界小镇，为开发一温泉项目，举债6个亿，建设了景区大道、宾馆和停车场，但它们的价值明显被高估。在该镇周边城市，已有多个温泉项目，它们的效益多数不太理想。虽然近些年，国家对搞特色旅游的乡镇有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但对庞大的工程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过度超前的建设规模，不仅无法带来理想的经济效益，更有背上巨额债务的风险。同时，在乡镇基础及公益设施普遍欠完善的情况下，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改善民生和服务，无疑更有意义，也可为时机成熟时扩展乡镇旅游打下基础。

我以为，优质旅游资源，七分天然，三分打造，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发展乡镇旅游，一定要审时度势，准确定位，量力而行，切不可为

了争取国家有限的配套经费，过度包装和超前建设。

湖南 一读者

周折

同事老杨下岗后在私企打工，月收入2200元，每月交700多元的社保，再加上给上大学儿子的生活费，日子过得挺紧巴。一次原同事来玩，见他家境窘迫，心生怜悯，便问：“你办了‘四零五零’没有？”老杨茫然地摇头。同事点拨道：“这是市府给予低收入群体的一项养老金补助，一个季度有近千元，可以拿三年啦！”同事接着把如何在社区提出申请，需要哪些资料等对他耐心指点。老杨为此请了几天假。挨了一阵，终于批下来。不久，专用存折上的首款到账。这不是“释放改革的红利”，惠及百姓的好事嘛，为啥不宣传到位，却让相关群体口口相传呢？

本以为一次性办妥了，可三个月后他拿着存折去邮局，再没此“进项”。咋回事呢？老杨只好硬着头皮跟老板请假，到社区探询。窗口操办的是位胖姐，正专心致志地看报。老杨畏畏缩缩地说了，胖姐恋恋不舍地把目光从报纸上挪开，板着脸：“谁说申请批下来就‘一劳永逸’啦？有报酬就得付出努力。以后每季度末把资料交全，才能继续划账。”他小心翼翼地问具体要哪些材

料，胖姐一边嘀咕“你们这些人就是麻烦”，一边拿起笔在纸上龙飞凤舞地写起来。这时，旁边的电话响了，接后，胖姐只有不停“嗯嗯嗯”的份，说有急事马上去处理，她挎起小坤包，急匆匆地走了。

老杨只好再跟老板请一上午的假，第二天从上班时等到中午，没见那胖姐的身影。老杨在私企几乎没有双休，再说社区公休也不上班呀！密集请假老板会不爽，还要扣工资。老杨趁在外面送货的空隙到社区碰运气，见那胖姐在班上总在忙，不是上网看“资料”，就是打电话谈工作。轮到老杨，挤牙膏似的透露零星信息。为此，老杨跑了五六趟，人家还是说资料不全。无奈之下，老杨只好请教原同事，这才把要求彻底搞清楚。每一次要的资料大同小异，光复印费就得七八元，还有误工费，自己的收入本来就不高，老杨有些心疼。不过，花“小钱”赚来“大钱”，以后自己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可以帮身边同类型的人，老杨心里略感宽慰。

前不久，社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向居民征求意见。老杨也不客气，以自己的亲历提了一条意见。我们希望把工作流程和要求打印出来贴在墙上显眼位置，使群众“按图索骥”，少费周折、少跑路。

武汉 刘兵

本期截稿时间：9月24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美国 | 喷火战机乐队演唱会

9月21日，加利福尼亚英格尔伍德市论坛体育馆内，喷火战机乐队世界巡演演唱会上，歌手大卫·格罗尔在演唱。

英国 | 霓虹形态

9月22日，伦敦白立方画廊，参观者在观看威尔士艺术家塞里斯·怀恩·埃文斯的作品“霓虹形态”。该作品由悬挂着的霓虹灯组成，将展示到11月15日。

澳大利亚 | 冲浪

9月23日，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的中央海岸，一位冲浪爱好者准备下水冲浪。前一天气象部门发布警告说，因为寒流来袭，将会出现危险的风浪。中央海岸位于悉尼北部，从悉尼驱车一个小时即可到达，它是澳大利亚冲浪文化的发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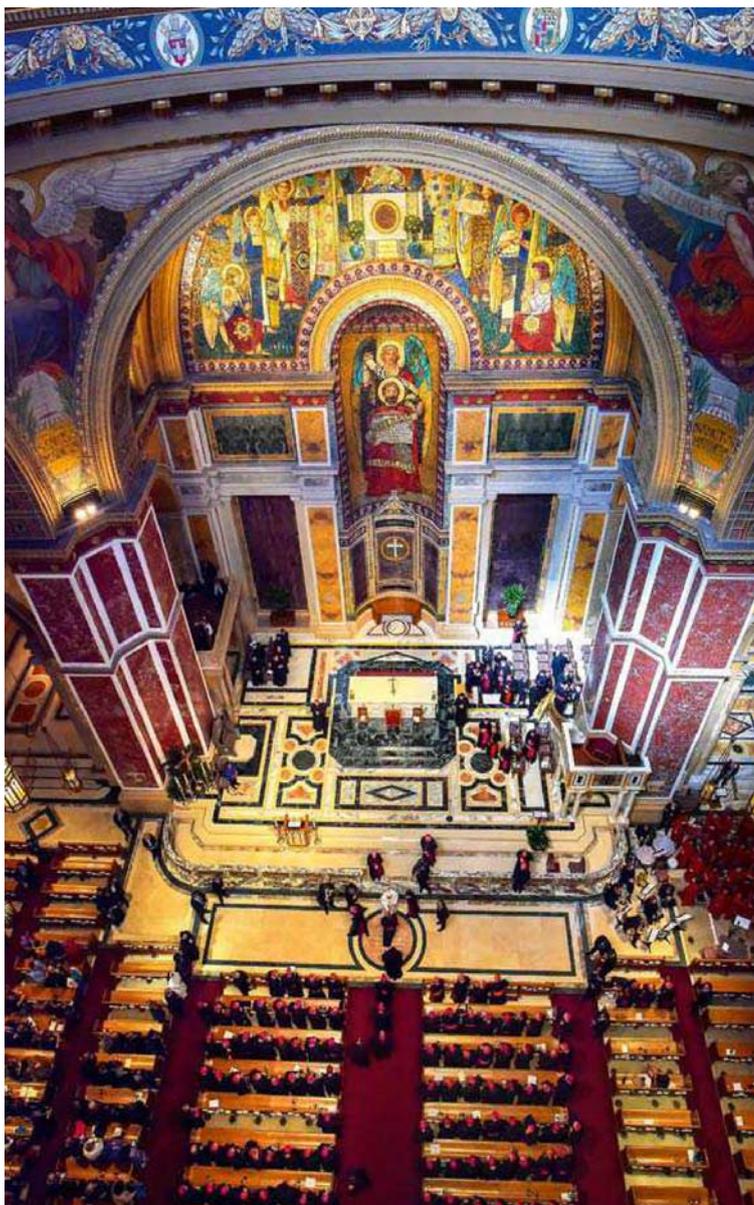






印度 | 洪水

9月23日，阿萨姆邦布拉马普特拉河左岸城市高哈蒂，季风降雨引发洪水。一名妇女抱着女儿站在受淹的房子前，等待出去收集饮用水的丈夫归来。



美国 | 教皇访美

9月22日，教皇方济各结束在古巴的访问后，开始为期6天的首次美国之行。23日前往华盛顿圣马太大教堂，参加正午弥撒。

印度 | 古尔邦节

(左页上图) 9月22日，穆斯林传统节日古尔邦节（也称宰牲节）到来前夕，新德里贾玛清真寺前，商人在出售山羊。

英国 | 橄榄球世界杯

(左页下图) 9月23日，2015英式橄榄球世界杯苏格兰队与日本队的比赛中，苏格兰队汤米·西摩遭到日本队五郎丸步的拦截。

负利率时代的房地产

文 / 邢海洋

时隔 22 个月之后，随着 8 月 CPI 升至 2%，人民币再次踏入负利率。过去 20 多年来，中国经历过 4 次负利率，每个时期楼市表现都呈现大幅上涨。本次负利率开局，一线城市却有停涨迹象，高库存与高房价之下，房地产虽保值，却难像此前的 4 次，有 12.8% 到 60% 的涨幅。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8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显示，8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综合平均从上月下降 0.4% 转为上涨 1.7%，为自 2014 年 9 月份以来首次转正。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城市达到 35 个，这也是时隔 16 个月后，再次出现房价上涨城市达到半数的情况。房价回升并不让市场感到意外，年初以来，一线城市房地产交易持续改善，深圳出现了关外楼市的抢购潮，北京则因市政府的动迁计划搅热了通州区楼市，还带动了三河、大厂等毗邻区县以更大的幅度蹿升。但作为房地产整体，却并未出现齐涨，即便是 8 月份，三线城市仍同比全线下跌。

深圳无疑是本轮房地产上涨的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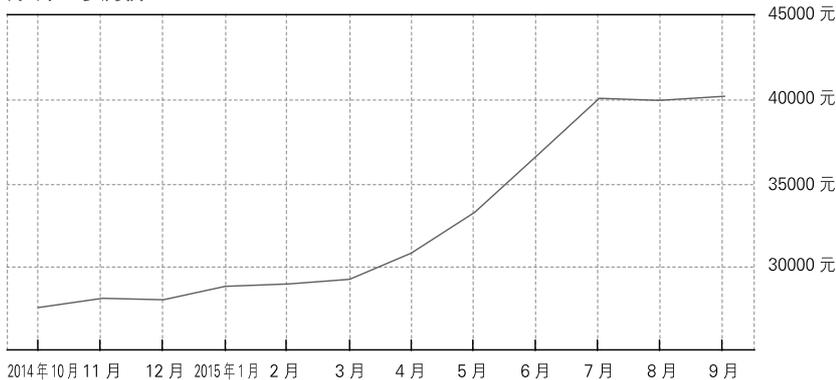
头，同比涨幅高达 31.8%。但在经历第二季度的火爆后，7、8 月份深圳楼市交易开始深幅回调。8 月份，深圳商品住宅成交金额和面积环比分别下降 18% 和 22%，降幅分别较上月扩大 13 个百分点和 8 个百分点；成交量明显萎缩，成交价格却继续快增 5%，至 37163 万 / 平方米高位。为抑制房地产过热，深圳实施了上调首付比例等措施，控制住了成交却不能按住房价。深圳房价快速上涨，放在全国这一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上，愈发显示出本轮房价上涨局部爆发的特点。深圳人口年轻，平均年龄仅 30 岁左右，而限购政策在“北上广深”中最宽松；另一方面，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激励下，加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深圳迅速成为互联网之都、创业之都，出现了一批富裕群体。根据 CRIC 监测数据，7、8 月深圳虽整体楼市萎缩，但豪宅成交维持历史高位，尤其是价位在 1000 万到 2000 万元之间的低端豪宅成交量超过了行情火爆的 5、6 月份。深圳的楼市，充分印证了本轮房地产的推动力量，更多的是人口的流动和财富分配的因素。

即便是深圳的豪宅市场，仍体现了短期内财富重新分配的特征。低端豪宅受追捧，中端豪宅却并无起色，而高端市场，那些价位超 4000 万元的也放量。深圳作为证券交易所的驻地，持续了两年有余的“中小创”的热炒势必使部分股市投资者身价大涨，而很多大户炒股的第一目标就是住别墅。股市下跌，这部分股民的上岸也在情理之中。而顶级豪宅方面，作为一个后起城市，深圳的崛起来自草根阶层的创造，即使豪宅也远没有“北上广”那样的天价。如今深圳以创新之都的声誉蜕变为顶级城市，豪宅的价值洼地迅速被后起的财富填满了。

而全国范围内，利率一路走低，商品房价格却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庞大的库存。2012 年 3 月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还只有 30122 万平方米，截止到 2014 年末即增加到 62169 万平方米。2015 年市场虽回暖，库存仍在上升，截至 8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66324 万平方米，依然处于上升通道。唯一的亮点是，住宅库存终于下降了。通常，经济不景气，大城市是最容易就业的地方，人口的流动于是进一步向大城市聚集，推高那里的居住成本。今年来，一线城市以远高于全国的水平消化着库存。8 月份，一线城市库存出现了近 19 个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北京的消化周期已小于 12 个月，深圳的消化周期仅 7.34 个月。库存水平整体偏紧，即使需求端萎缩，供给端更快的下降仍将使房价的牛市跑上最后一程。

近 7 万亿平方米的庞大库存，足够全国消化两年。而负利率周期绝不会超过商品房去库存周期。此负利率，非此前的 4 次负利率。■

深圳二手房价



BB MASK



童颜面具™

近红外光 美容面具 创导者

引领护肤新概念

太空科技, 韩国制造。每天17分钟, 有益近红外光能量准确送达肌肤深处, 解锁童颜“肌”密, 迎接肌肤第二次新生。



招募全国微商总代理
咨询热线: 400-160-5000
BBMASKCHINA.COM





栏目插图 | 范薇

员工被套榜

曾被看作福利，去年以来，员工持股计划在上市公司中风行。截至9月16日，A股总计有341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员工持股计划。可惜天不遂人意，已实施持股计划的90家上市公司中，包括万达信息、中来股份、鼎龙股份、武汉凡谷、雏鹰农牧、龙净环保、隆鑫通用、通鼎互联等60家上市公司股价跌破了员工持股价格，较员工持股价格缩水超30%的公司有28家。员工损失最大的要算鼎龙股份和万达信息，平均每人亏损额分别为40万元和33万元。

公募过山车

6月到9月，A股市场连续遭遇了两轮调整。6月15日至9月15日，上证指数自高点5174点下滑至3005点，累计跌幅达到41.92%。其间526只偏股混合型基金的净值平均下跌43.86%，同期仅有9只基金跌幅小于26%。截至6月30日，这526只基金今年平均净值增长率为52.11%，其中有12只基金的净值增长率超过100%。但截至9月17日，这些基金的平均净值增长率又下滑至13.53%，年内收益率超过100%的基金只剩下1只。公募基金座次排名也因此发生大洗牌。

最重罚单

证监会处罚青岛东海恒信7.3亿元，乃有史以来最重罚单，原因是操控上证180ETF。东海恒信自述主要投资品种为ETF，主攻期现套利、量化阿尔法、程序化交易等，在过去的几年中变化惊人，从驻扎4平方米大户室到了此后2000多平方米的自有办公室。其管理着30亿元基金，2015年1月至5月间的成交额近6000亿元，显然是“超高频交易”。股灾之时，上千股票停牌，给高频基金提供套利机会。不过东海恒信的罪名是，在自有账户之间进行180ETF交易，影响交易量和价格。



猪肉、鸡蛋与玉米

在畜禽养殖行业，玉米号称饲料之王，以养殖成本核算，其占比甚至达到70%~80%。通常，玉米价格下跌会拖累猪肉和鸡蛋等养殖品价格。但今年三者却出现了严重背离：玉米持续下跌，猪肉大涨之后，鸡蛋价格也开始大幅上扬。原因是：在玉米临储政策退出的预期下，玉米现货价格已经逐渐失去支撑；进口玉米、进口谷物及新季玉米的上市，更加重玉米现货的压力。而猪肉仍受到猪周期的制约，8月全国生猪存栏量同比降幅约10.5%，维持2008年12月以来的低位水平。鸡蛋则是季节性因素，炎热天气产蛋率低。



口服心不服

私募大佬叶飞涉嫌操纵信威集团、晋西车轴等 5 只股票价格，被没收违法所得 663.8 万元，并处以 1991 万元罚款。2007 年叶飞曾获得中国股民民间高手大赛第一名，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叶飞操盘的阳光私募基金倚天雅莉 3 号，今年以来收益率高达 268%，对比老牌劲旅泽熙投资旗下的泽熙 3 期今年以来的收益率是 186.43%，泽熙 1 号为 125.41%。对操纵指控，叶飞口服心不服，他在微信朋友圈回应：我坚决不举报工商银行等一大批股票在股灾期间拉涨停的事情，并且支持证监会的正常工作。

即期交易手续费

因近期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增长量较高，有数家银行于 9 月 17 日晚间收到央行通知，要求调高人民币即期购售汇平盘交易手续费率至 0.3%。而多数银行人民币即期购售业务平盘交易手续费为 0.0002% ~ 0.0003%。央行此举带有“惩罚性”意味，被上调手续费的几家银行均是近期在银行间市场交易规模较大、且人民币跨境业务真实性存瑕疵的银行。此前，央行陆续推出调整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政策等多项措施，令离岸人民币供给下降，使离岸人民币定价向在岸靠拢，以挤压人民币套利空间。

GDP 平减指数

据凯投宏观 (Capital Economics) 估计，由于计算方法上的一个问题，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被高估了一到两个百分点。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它意味着包括印度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可能在无意间高估了经济增长数据。问题的核心是 GDP 平减指数，该指数被用于将对名义 GDP 的估计，转换为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 GDP 数据。在计算 GDP 平减指数的过程中，应将进口商品的价格排除在外。中国的平减指数没有扣除进口价格的变化，其平减指数紧跟 PPI，从而在大宗商品暴跌时对实际 GDP 形成高估。



油价跌到 20 美元?

6 月到 9 月，A 股市场连续遭遇了两轮调整。6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上证指数自高点 5174 点下滑至 3005 点，累计跌幅达到 41.92%。其间 526 只偏股混合型基金的净值平均下跌 43.86%，同期仅有 9 只基金跌幅小于 26%。截至 6 月 30 日，这 526 只基金今年平均净值增长率为 52.11%，其中有 12 只基金的净值增长率超过 100%。但截至 9 月 17 日，这些基金的平均净值增长率又下滑至 13.53%，年内收益率超过 100% 的基金仅剩下 1 只。公募基金座次排名也因此发生大洗牌。



广告攻心计

一直以来，广告商只能通过抽样调查评估宣传促销的实际效果，但这种方法却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费用不菲。一家美国公司 Affectiva 结合人脸分析技术，研发出了一款可以在观众观看广告时对其情绪反应进行实时分析的软件。针对 1223 名志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人脸上关键情绪表达点——嘴、眉毛和鼻尖——的肌肉纹理和颜色变化能够泄露大量情绪信息，计算机可以基于这些信息做出判断，观众是否因广告而感觉快乐、惊讶或困惑，并进而预测出未来购买广告商品的可能性。

好消息



不近视的绝招

一项针对 2000 名中国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每天临近放学时增加 40 分钟的户外运动时间，3 年后可以将孩子患上近视的风险降低 23%。发表于《美国医学联合会杂志》上的论文指出，经常性地接触户外明亮光线可能有益于眼球的正常发育，抑制近视生成机制。



亲近自然

不想为抑郁、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所苦？尽可能多地回归自然或许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发表于《心理学前沿》的最新研究综述指出，亲近自然可以帮助人体从“非战即逃”的紧张模式转换到放松模式，从而增强自身免疫系统的防护功能。

坏消息



谁偷走了花的芬芳

空气污染的城市里，连鲜花也会丧失芬芳。发表于最新一期《新植物学家》杂志上的研究结果显示，当空气中的臭氧污染物浓度达到十亿分之一百二十时，黑芥花释放出的有机芳香分子比无臭氧污染时可降低 17% 到 31%。臭氧污染物主要来自汽车尾气和化石燃料。



除菌何须牛刀

标榜含有杀菌成分的清洁产品真的可以保护我们免遭病菌的侵害吗？答案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根据一项韩国最新研究，这种保护作用并不比最传统、最廉价的香皂更强。研究者指出，大多数人洗手时间不到 30 秒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日化品中低剂量的杀菌成分根本不足以发挥作用。



(保井口 摄影)



真爱的目的不是幸福，不是田园诗般的浪漫，不是在盛开的椴树下，在沐浴着微醺灯光、散发着惬意香气的家门前手牵手地散步……这是生活，但不是爱情。爱是一道燃烧得更加颓丧，也更加危险的火焰。

——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对我来说，只有我在银幕上看到的那些才拥有一个世界的特质：饱满、必要、连贯。而银幕以外只是一些含有杂质的成分的堆积，这些成分就好像是随意地摆放在一起，我觉得自己生活中的物质都没有固定的形状。

——卡尔维诺

行走时最重要的因素永远只有一个：天空的广度和风景的亮度。

——弗里德里克·格鲁，《行走，一堂哲学课》，书中还说：行走的奥妙

之一：对风景的缓慢靠拢，让我们与它更为亲近。这和有规律的碰面会增加友谊是一个道理。这样看来，如果我们每天都面对一座山峰，每天都在不同的光线下欣赏它的壮美，那么它的棱角一定会变得更加分明、清晰。

人活一辈子，万事如意，不经历任何精神苦闷，确实是一种缺失，对造化仅仅是一知半解。

——塞涅卡，《论幸福生活》

美国的科学家常常骄傲以至嚣张，而美国的科学又十分成功。美国科学家的骄傲与他们的成功是关联的，在极度竞争的行业中君子们是要吃亏的。

——杨振宁

《生日快乐歌》不再有版权有什么好快乐的？应该禁止所有的餐厅和公共场所播放这首歌。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说。9月22日，美国一家地区法院做出判决，认定华纳音乐版权有限公司对于《生日快乐歌》的版权要求不合法，这首有120年历史的著名歌曲可供免费使用。

数字

8岁

男性的心脏平均比他们的生理年龄要老8岁。女性的心脏平均比她们的生理年龄老5岁。美国有6900万成年人的心脏年龄比他们的生理年龄老5岁以上。

44秒

9月23日，日本105岁老人宫崎秀吉以44秒22完成男子100米比赛，创造了世界业余田径比赛105~109岁组男子百米纪录。法新社报道说：“宫崎秀吉出生于1910年，那一年日本吞并朝鲜，‘泰坦尼克号’还在建造之中。”

1万

法国14岁少年艾里奥特·萨雷凭借其发明的园艺机器人，获得了谷歌科学挑战赛奖。这个机器人拥有一条机械臂，可抓住水壶、在土里挖洞或浇灌植物，甚至可以在已部署相关装置的温室里自行移动。而使用者仅需通过智能手机进行远距离操作。由于这项发明，艾里奥特得到了1万美元奖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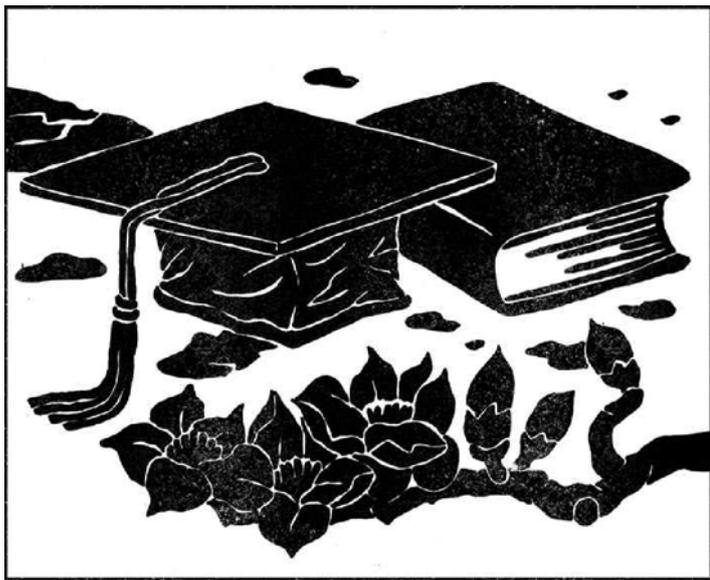
11升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欧洲地区健康状况报告指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的过早死亡人数近年来不断减少，但是肥胖、吸烟和饮酒的人数仍然非常惊人。欧洲地区约有59%的民众不是超重就是肥胖，大约30%的人在吸烟，而且平均每人每年饮用11升酒精。

爱不可及

文 / 喵小鱼

图 / 谢驭飞



四年前，头一次来到潮州，正好遇上秋天，滨江长廊上的木棉花全开了，连绵地烧在江边。老杨是潮州本地人，吃喝玩乐什么都在行。我们太投契，总是凑在一块玩，形影不离。她每次走滨江长廊，都会捡几朵落地的木棉回来煮汤。

木棉花汤的煮法，是先烫出一层陈水，过冷槽，再拌上些猪骨和鱼，细火慢熬一个多小时。老杨总是忘记第一个步骤，所以煮出来的汤，颜色非常复杂。老杨不服输，回家请教隔壁的神厨老阿姨，回来后就把汤煮成茶。木棉花茶，听起来挺诱人的。老杨大功告成时，我喝第一口，说好喝。喝第二口，依然说好喝。然后死活不肯喝第三口。其他人，轻轻抿了一小口，统统喝得魂飞魄散。老杨总是忘记第一个步骤。

我们住的宿舍，很小很窄，挤了四个人。我们入住的第一年，为了修葺宿舍的门和窗，经常跑宿管部和维修部。维权深似海，宿舍的门缝掉落了四块砖头，维修师傅平静地说：“掉砖而已嘛，门还能用。”第二年，有个男生跑上我们宿舍，教我们练跆拳道。老杨练了没几天，就扬言要赤脚踢烂那四块砖头。其实，楼下的医务部比维权部更黑，医生治病就像兽医打针一样随便，任谁踢伤了腿，也没人来救你，所以那四块砖头一直完好无损。

除了维权，我们还矢志不渝干过一件事，那就是到处找吃的。潮州的小吃实在太多，而且越好吃的就越隐秘。我们搭着三轮车，踏遍市区的

大街小巷，默契十足地会吃到扶墙走。

吃得多自然就长肉多。我们胖了一圈后，对S码衣服有种疯狂的执著。有时实在挤不进去，我们互相安慰说：“衣服也不是特好看，有什么好执著的？”老杨说：“好看的衣服都是做给瘦子穿的，设计师的业界良心何在？”某一个午后，老杨率先想通了，要减肥。跳减肥操跳了一个月，跑步跑了一个星期，练瑜伽练了半年，陪她一起减肥的人都瘦了，唯独她屹立不倒，逛街吃饭都会挡住别人的4G信号。她在电话里向我哭诉：“小妹，所有人都上岸了，只有我瘦不下来。”我说：“你没听说过吗，胖是福气。”

在我的记忆里，最后一次回母校，是半年前的毕业典礼。我们穿着学士服，到处拍照。很多人特意化了浓妆，把岁月掩饰一通。远远看去，人与景美好如初；不再遥远时，却见脂粉簌簌往下掉，蹭白了学士服的领子。拍大合照的时候，老杨故意凑过来，说她最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和她搭着三轮车，去市区买腊味饭、粿条和香卷。

为了筹资建校，学校每年都会接送一批校友回韩师走走。那些世故的人，那些发福的人，那些精明的人，路过我们的生活，羡慕极了。他们爬上很高的人生，看到拥挤的风景，然后下来。有的还不想下来，把风景多看了几眼，以为已经懂得了它们。其实呀，别追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再体味到的生活。正如飞逝的青春，爱不可及。☑

乡村骑士

文 / 卡尔
图 / 谢驭飞



K 已经是 40 多岁的人了，但依旧是个单身汉。听村里人说，K 读书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女孩，却一直没敢表白，后来那女孩嫁人了，K 因此受了刺激，对爱情彻底绝望，从此决定孤独终生。K 的父母早已双亡，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孑然一身，不过 K 养了一匹马，这在当地算是件稀罕事。那匹马很温顺，不怕生，且奔跑速度极快，让人感觉马上就要飞起来。那时村里的路还没有修起来，要不然骑着这匹马在马路上狂奔，免不了要发生意外。

K 农闲时会骑着这匹马来回穿梭在方圆十几个村子里，算起来已有好几年了。当然，这倒不是为了炫耀什么，用 K 自己的话说，他骑马四处转悠主要是因为无聊。他既不想整天待在家里看什么肥皂剧，也不想跟村里其他人一样用打扑克来消磨时光，他有自己的追求。

刚开始有人说 K 特立独行，他连忙纠正道：“只能说我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仅此而已。”话刚落，就有人调侃 K：“精神追求？什么意思？难道整天骑匹马瞎转悠就叫精神追求了？我看是吃饱了撑的！人家肯定是把你当神经病了。”K 听了这话并不生气，只是不慌不忙地说：“我转悠，但不是瞎转悠。生活本无趣，我只是让它变得有趣一些。我一边骑着马一边看风景，累了就倒在阴凉处睡上一觉，多好！”那些人听了摇摇头，还说 K 病得不轻，K 只是笑着，骑着马向远处慢悠悠地走去。

不过事实证明 K 确实不是瞎转悠，很长一段

时间，他帮村民抓过小偷，救过落水的孩子，还骑马送孩子们上学。村民们渐渐对 K 刮目相看，而 K 也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守护一方平安的使命。K 说自己是个义务巡逻兵。有人说不如叫乡村骑士，富有浪漫气息。K 连说好，而且 K 也觉得自己像个骑士，虽然没有盔甲和剑戟。之后 K 巡逻的时候逐渐延长，以前太阳落山 K 就回家，现在到很晚才回家。村里人发现 K 愈加憔悴，希望他注意身体，他只是说没事，还挺得住。

但 K 终究还是没有挺过去，医生说 he 得了很严重的病，时日无多。K 并没有号啕大哭或者埋怨什么。他想得很开，他说生之无常，全世界的人都会有这么一天，只不过有快有慢。K 说自己这一生过得还算充实，虽说不上轰轰烈烈，但也无怨无悔。K 还有一个小遗憾，就是自己死后，无人继承巡逻的任务。大家听完都很伤感，但不知要说些什么，只是安慰 K 说人活着总会有遗憾。

K 去世的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持续不断的惊雷让人心惊肉跳。K 养的那匹马整夜嘶鸣不已，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到了第二天居然挣脱缰绳不知所终，村里人找了十几个村子都没有找到，众人纷纷感到诧异，但又不知这诧异从何而来。K 死后，村里人怀念起他来，有人说有 K 在，村里就多一份安全感。现在 K 不在了，整天都要担惊受怕的。这些话 K 注定是听不到了，人们只记得这世上曾经存在着一个自称乡村骑士的义务巡逻兵。也许，这对 K 而言已经够了。✍

低调的朋友

文 / 德琨若鱼

图 / 谢驭飞



“我要死掉了啦。”她用和小品演员蔡明一样的音频说着，自言自语地重复一下：“真的要死掉了。”像乒乓球弹到桌上后再掉下来反复几次，势能减弱后无力地滚到一边去。

各位，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每次考试前，总有人唉声叹气，“都没有复习好，怎么办哪？”然后你窃以为自己还算把书浏览了一遍；等到考完后，那个人又嘟囔着：“完蛋了，完蛋了……”你又听得很真切，心里难免得到安慰，自己也有几道题没做呢。但是，谜底揭晓了，那个人考得很好，把你甩了几条马路，不能望其项背。没有人欺骗你，你却有着上当的感觉。

长大了，打算不再上当了，但是还会听到：“我们家那位，哎，一言难尽……”“我儿子的成绩一般啦……”和这么低调的人相处是容易的，所谓平易近人，这样的开场白往往会引起共鸣，而你，会掏心窝子地回应对方：我们家的那位真的如此这般那样。人家是提纲挈领地喊了句口号，你就翔实地举例证明自己也是如此，结果，回家盘点一下：自己婆婆长媳妇短地全告诉对方了，对方家有什么事呀？啥也没讲。再见面，难免气短，糗事都告诉人家了，好像屁股没有遮住的感觉。不能再拎不清了。耳旁又传来：“股票跌这么惨，真的要跳楼去了。”也沉浸在悲痛中的你突然不难过了：“我只是亏掉了打算换房的钱，还剩二分之一。大不了不换房了，总不至于去跳楼。”

那位娇滴滴说着要“死掉了啦”的是一个五十出头的妇人，打扮精致。她说她五天来只大解了两次。“再去努力一下。”她进厕所了。我不等她了，先吃早饭吧，嘴里塞得满满的吃得正香，她哀叹一声出来了：“只出来了一点点……”心知意会的我差点喷了。中午吃西餐，一份松糕鞋底厚、面积有两个手机大的牛排，她风卷残云地消灭了，餐后点心倒是剩了一半：“太甜了。”她又捂着胃，说胃不舒服，右手摁在腹部画圈揉着，这是在给大肠加油。邻桌的绅士男凑过头来安慰她：“要紧吗？呀，都没吃完啊，你胃口太小了。”顺带看了眼我面前连配菜都不剩的光锃锃的盘子，真怕他寒暄一句：“你这还没上菜吗？”饭后有人提议去奢侈品店逛逛，没人反对，她用只有我听得到的声音嘟囔着：“我都不用奢侈品的，都不懂的。”买不起奢侈品的我找到伴侣了，立马消除了自卑心态，去看看又何妨。但侧脸看她时，她的眼镜脚金灿灿地刻着“Gucci”。走得有些累了，她从小坤包里掏出药片，塞进嘴里，赏了我一粒：西洋参含片。“每天都要吃的，今天忘记了。”

她的电话响了，一位朋友晚上要来看她，约好22点钟到某酒吧坐坐。她挂了电话，呻吟了一声：“我真的要累死掉了。”分贝只够我听到，因为她必须要说，这是她的口头禅，并不是真的虚弱。我搞明白了。☑

S先生的裸辞生活

文 / 孙维伟

图 / 谢驭飞



莫文蔚在《阴天》里唱道：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其实工作生活也是如此。毕业后上了三年班的S先生也遇到了自己职业生涯上的困惑，岗位、上司、薪水、前景，种种因素纠结起来全都是S先生对现状的不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活在当下”，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这些话，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想到自己的生活早已走偏，S先生终于鼓起了勇气辞掉了自己稳定的工作。交上辞职报告后，一向冷面示人的上司突然开始嘘寒问暖起来：是不是有什么困难？以后要常回来看看啊。S先生也非常配合地表达了自己的恋恋不舍，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告别了公司。

离职第二天S先生就买机票开始了自己因数次请假都未获批而搁置已久的旅行，在旅行过程中和毕业后因距离原因而只能互相点赞的朋友同学们叙旧，在家陪伴家人喝茶打麻将。仿佛又有寒暑假，感觉幸福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就这样幸福地过了一个多月，父母每天慈祥的目光中开始多了一些嫌弃，S先生也识趣地开始在网上海投起简历来。

刚开始投简历S先生就接到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面试过程也极为迅速，面试完不久公司就抛出了橄榄枝，顺利过程超过了S先生的想象，S先生顿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刚好又接到了一家更理想公司的面试机会，S先生决定再找找。

谁知随后的剧情就开始发生了转折，面试了多家公司要么被无情拒绝，要么面试后消息石沉大海，面试机会也是时有时无。两个多月，S先生都在焦急的等待里或是信心的打击中度过。就这样从冬天找到春天，春天找到了夏天，在这个过程中S先生也见识到了各种形形色色的HR，有高冷的扑克脸型，有特能聊的段子手型，有的对面试者的隐私津津乐道，还有的在一边面试时还一边不忘在炒股。后来熟悉各种HR的面试套路，对HR各种问题也能从容应付的S先生已经感觉是自己在面试HR而不是HR在面试自己。在这期间有一家高大上的公司给了S先生一个面试机会，但S先生却完全不符合该公司职位的招聘要求。一直到坐在位于陆家嘴的该公司豪华写字楼里面面试时S先生还感到了困惑和不真实，直到无意看到当天其余几位面试者资料后，发现只有其中一个人符合所列的招聘要求时，S先生才恍然大悟，感叹自己太天真。

就在S先生在等待和奔波中已经变得累觉不爱时，总算有一家靠谱的公司给了职位，S先生也立即不再挑剔，收拾收拾赶紧上班去了，给自己的裸辞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现在S先生又过上了每日忙碌期盼假期的生活，一切仿佛转了一个圈回到了原点。S先生却也不再抱怨，虽然还是希望命运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生转折，但是S先生真的再也不想裸辞了。✎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Vans China Designer 合作系列

Vans 携手三位国内独立设计师上官喆、Kim 和杜暘共同推出秋季合作系列 Slip-On。上官喆在这款 Slip-On 上采用最简单的英文字母印花，将个人品牌 SANKUANZ 以全印花方式呈现在鞋面上。Kim 本次设计的灵感则来自于个人品牌 KKtP 2015 春夏季中的大理石纹印花双层球鞋。杜暘的设计则是以自己的宠物猫为图案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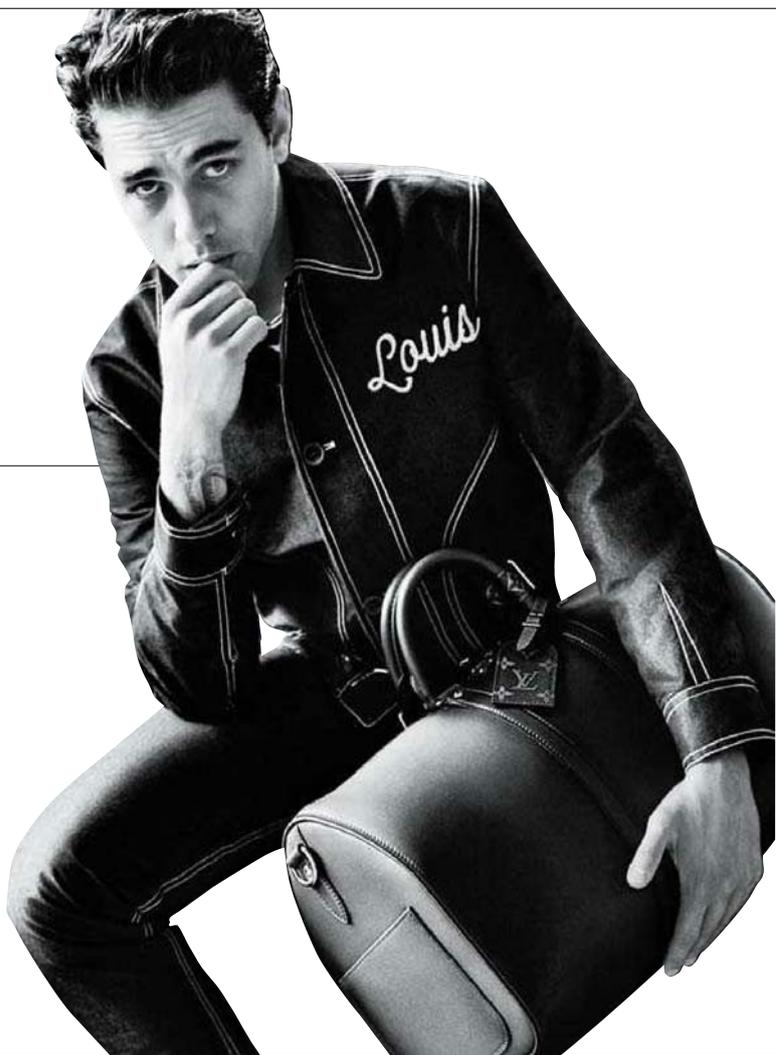
路易威登 Ombré “阴影” 男士皮具系列

单色调的自然皮革，柔软而诱人的手感，少许氧化光泽。配色分为冷暖两种不同的色调组，冷色调包括深蓝与卡其色，暖色调包括暖棕色、沥青灰与酒红色。皮具系列囊括 Keepall 旅行袋、PDV 公文包、Lockit 大手袋三款经典包款，以及全新推出的 Cartable 学院风手提公事包。包款上的行李吊牌与钥匙挂件则以 Monogram 印花帆布材质作为点缀，主题广告代言人为加拿大演员哈维尔·多兰。



FOVE 眼球跟踪 VR 头盔

拥有 5.8 英寸屏幕，面板分辨率为 2560×1440。头盔的眼睛位置嵌入了两个红外线摄像头，这两个摄像头放置在眼镜镜片下，通过巧妙的角度调节，并不会对用户在使用中的视线范围产生影响，但同时又能跟踪用户的瞳孔活动。



Roberto Cavalli 2015 秋冬眼镜系列

RC902S 醋酸太阳镜宽阔轮廓诠释了 Roberto Cavalli 的经典风格，动物雕刻图案强化了镜框的视觉张力，带有品牌标识的精致金属饰牌在铰链位置显得格外醒目。延续 60 年代风格的 RC908S 则流露着十足的复古魅力，几何轮廓与宽阔镜面相辅相成，而优雅的金属装饰则显露出 Roberto Cavalli 的经典蛇形图案。



Under Armour Curry 2 篮球鞋

Curry 2 是为 NBA 新科常规赛 MVP 史蒂芬·库里量身打造，并运用了 Under Armour 最引以为傲的科技，紧贴脚踝的 Speedform 带来极佳的包裹感，全掌的 Charged Cushioning 能吸收缓冲，也保证了库里场上的加速和变向，鞋底不同方向的底纹尽可能地保证了场上的掌控力。

松下 Lumix DMC-GF7 微单相机

采用的 1600 万像素 4/3 型 Live MOS 感光元件和维纳斯图像处理器。“脸部自拍”和“好友自拍”是松下 GF7 这次着力打造的卖点。把相机的屏幕翻转到 180° 时，只要被拍者挥动的手遮住脸部（脸部自拍）或感应到脸部相互在靠近时（好友自拍），相机就会进行自动的快速抓拍，并搭载了三级柔肤和两级瘦脸功能。



华硕 ZenBook U305FA

这款全球最轻薄的 13.3 英寸笔记本电脑，拥有令人惊叹的 12.3 毫米纤薄体型和 1.2 千克机身重量，最高支持分辨率为 3200×1800 的 QHD 超高清显示屏（选配），达到了 72% 的色域覆盖、300 流明高亮度和 770 : 1 的高对比度，搭载全新 Intel 酷睿 M-5Y71 处理器，以及 8GB 大内存，高达 512GB 的 SSD 高速固态硬盘，拥有最高长达 10 小时超长续航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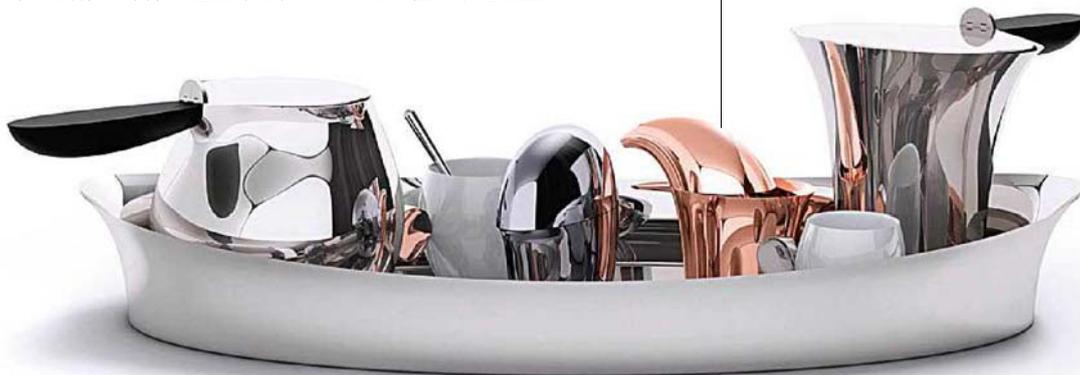
搪瓷储存罐

Mini Modern 品牌复古风格的搪瓷储存罐，上面印制着阳光照耀下家的温馨图案，搭配原色榉木密封盖。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青苔色、橘色、暗蓝色等色彩设计，适合各种风格的厨房。



茶与咖啡

荷兰设计师阿尔多·巴克为法国银器公司 Puiforcat 设计的茶和咖啡用具，其中包括乌木手柄的纯银茶壶和咖啡壶、灰色钉糖罐和玫瑰金色奶罐以及两个瓷杯。整个系列在 Puiforcat 的巴黎工坊手工制作，每件的造型都有所不同，组合在一个托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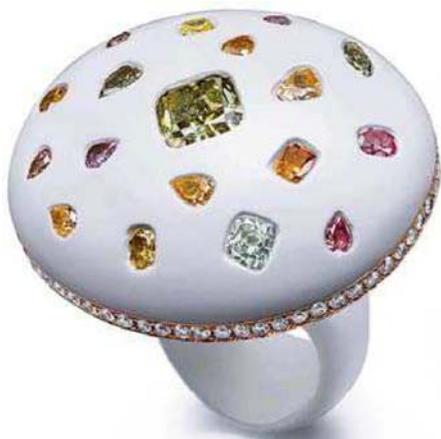


滑板拉杆箱

三合一的“Olaf”（奥拉夫）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同时是背包、带脚轮的拉杆箱和滑板车。固定在滑板后部的单轮以及箱包下面的两个前轮成为折叠式滑板车平台，允许你带着行李滑过机场地面。不能滑行的时候，滑板车可以折叠起来变成拉杆箱，箱子也可以完全从滑板车上分离出来。

海滩戒指

Suzanne Syz 的“海滩”戒指，如同布满卵石的白色沙滩，在标新立异与美感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它以白色搪瓷为主要材质，被一圈镶白色钻石的玫瑰金环绕，白色拱顶上则不规则地镶嵌了粉红色、黄色和绿色等彩色钻石。



十二月椅

Nakari 品牌的“十二月”椅，橡木框架搭配同色调的真皮，形成一把明显带有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舒适安乐椅。它的设计核心——椅子框架是事先组装好的，依靠螺钉和胶粘把椅腿和靠背结构固定在一起。



雨云吊灯

出自意大利 Bocci 的“57 吊灯”，细胞一般不同寻常的造型来自不同寻常的制作过程。首先在玻璃基质内预留不同尺寸和配置的空隙，然后注入空气，得到类似雨云的形状，可以单个使用，也可以多个悬挂形成一片“乌云”。

黄铜香炉

出自 Apparatus 工作室的黄铜香炉，一个多功能的烛台和扩香器，搭配根据一天内不同时间设计的六种不同熏香。移去质地细腻的瓷器圆顶之后，它就变成了烛台或者存放物品的黄铜器皿。



时光凝固的国度 古巴行



走在古巴哈瓦那街头的大学预科生。自 1959 年革命胜利以来，古巴政府一直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





哈瓦那极负盛名的葛佩莉亚冰淇淋店门前总是排起长龙

古巴是加勒比海中的一座岛屿，虽然总面积不算大，人口也不多，但却发生过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作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古巴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即将消失，再不去看看恐怕就迟了。

文 / 袁越

冰淇淋的故事

不知是什么原因，今年夏天的哈瓦那天气格外炎热，稍微一动就一身汗。一个周日的中午，我在第23街和L街交界处发现了一个街心公园，公园入口处一左一右排了两条长队。我好奇地走过去一探究竟，在一个西语指示牌上看到了Coppelia这个词。我立刻想起在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频道的旅游节目上看到过这个字眼，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葛佩莉亚冰淇淋店所在地，这家店生产的冰淇淋据说是全古巴最好吃的，难怪有这么多人排队。

我口渴难耐，看到右边的队伍沿

着树荫一字排开，看上去不到50米长，我想无论如何半小时以内总能吃得上，便决定去排队。据我观察，排队的全都是古巴本地人，年龄、性别、肤色、职业各异，什么样的都有。站在我前面的是一群中学生，衣着打扮相当时髦，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乍一看和海峡对岸的美国小孩没有任何差别，但这群古巴孩子当中有黑有白，肤色好像完全不是问题，这一点要比美国的同龄人好一些。

20分钟过去了，我仍然站在原地，一步也没动。好在我站在树荫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仔细观察一下古巴老百姓。来古巴之前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还停留在女排的“黑珍珠”时代，



来到古巴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的居民至少有一半是白人，其余的也大多数是混血，纯黑的古巴人并不算多。更令我惊讶的是，我曾经以为古巴可能和上世纪中国的60年代差不多，是个干净整洁但却古板老派的地方，没想到哈瓦那的主要街道相当繁华热闹，老百姓的穿着打扮也五颜六色，一点



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的卡瓦尼亚要塞仍保持每晚9点整鸣炮闭城仪式，要塞内卖纪念品的小摊为招徕观看仪式的游客而延长营业时间

也不寒酸。我尤其注意观察过往行人脚上穿的鞋子，因为根据我以往的经验，热带贫穷地区的人最不重视鞋子，经常是身上衣服看着还不错，脚上却穿着一双破烂的拖鞋，没想到古巴人的鞋子大都非常干净整洁，看上去生活过得很有体面。

不过，除此之外，哈瓦那的落后

还是相当明显的，美国对古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制裁还是给这个国家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最先注意到的当然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古董车，这些车大都是美国40至50年代生产的老爷车，间或也可以看到苏联车，但也都是60至70年代的产品，它们无一例外都被重新漆过，颜色五花八门，

很像是老电影里的场景又复活了。只不过这些车的动力系统都很陈旧了，一边走一边喷黑烟，而且据说大部分车子的底盘都不太结实，稍微遇到颠簸就会断为两截，所以这些老爷车只敢在城里跑，而且不敢开得太快。

这样的古董车之所以至今还在街上跑，正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使得



古巴街头可见的美产汽车大都是“古董”级轿车

古巴人买不起新车，只能尽可能地延长老车的使用寿命。不过，也正是因为美国的制裁，把古巴变成全世界最顶尖的二手车改造市场，无论多老的车都能起死回生，无论多么稀有的零部件都能够在这里被找到，或者被生产出来。

漂亮的老爷车满街跑是古巴独有的风景，但这个风景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消失。随着美国经济制裁力度的减弱，以及包括欧洲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伸出援手，哈瓦那的大街上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生产的二手车了，甚至偶尔还能看到几辆全新的高档汽车，以及美国都不是很常见的大马力摩托车，看来古巴的经济改革确实已经见到了一些变化。

又过了20分钟，我仍然站在原地

没动。一同排队的古巴人似乎没有人有怨言，大家仍然有说有笑，仿佛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难道说这家店的冰淇淋有这么大的魅力，竟然能让大家在周日中午的太阳底下等这么长时间？我越来越好奇，决定继续排下去。

这座街心公园位于哈瓦那新区最热闹的地段，旁边就是著名的自由哈瓦那（Habana Libre）宾馆，这座外形相当现代的25层大楼建于1958年，是哈瓦那的地标。整个哈瓦那像这样高度的建筑物不超过10座，其余的要么是建于殖民地时期的西班牙风格的老房子，要么是建于苏联时期的火柴盒式的公寓楼，几乎看不到任何新建筑。事实上，我在哈瓦那逗留期间没有看到过一台吊车，只看到过一个脚手架，还是为了修复一幢老殖民地建筑而搭建的。当然也许是我走的地方

还不够多，但哈瓦那确实在建筑方面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这是不会有错的。

自由哈瓦那是涉外宾馆，很多针对外国人的服务只能在这里找到，比如出租车和旅行社，以及互联网服务。我注意到有很多人坐在23街和L街交叉口处的马路牙子上玩电脑，经人提醒才知道这个街口是哈瓦那仅有的几个Wi-Fi热点之一，普通古巴人可以在这里上网。公共互联网是古巴刚刚出现的新鲜事物，这种公共热点是今年7月才刚开通的新服务，此前互联网是只有少数高级官员和科研人员才能享有的特权，普通古巴人是无福享受的。新开的Wi-Fi公共热点虽然没有什么禁忌，“脸书”、“推特”什么的都能上，但是收费昂贵，每小时约合2美元，对于平均月收入只有50美元左

右的古巴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我注意到有很多人在用网络视频功能和别人聊天，我猜他们都是一些有外汇收入的人，正在用 Wi-Fi 和给他们寄钱的国外亲友通话。

又过了 10 分钟，队伍仍然没有向前移动的迹象，我终于忍不住了，走到队伍前面询问是否排错了队。一个古巴人告诉我没有排错，周末来吃冰淇淋的人实在太多，等几个小时是常事。如果不想等的话，旁边有个专门招待外国游客的门市部，不用排队。我走过去一看，那里果然有个小卖部，只是价格有点贵。我点了个冰淇淋双球，收了我 2.75 比索的外汇券，大约相当于人民币 17.3 元。冰淇淋确实很好吃，但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惊艳，只能说是用料比较足而已。

没吃到“正宗”冰淇淋我很不甘心，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再一次来到葛佩莉亚冰淇淋店门口排队。虽然那天是周一，但门口仍然有 30 多人在排队等待。好在这次只等了 20 多分钟便进入了公园里面，没想到公园里还有一个队，又等了大约 10 分钟，这才得以进到店里。这是一幢二层小楼，店堂布置得像个餐厅。我挑了一张没人的桌子坐下，立刻有服务员端上一杯冰水。水的味道略有异样，感觉就是自来水。旅游书上都说不要喝古巴的自来水，但古巴人都这么喝，貌似也没事。当地人告诉我，古巴的自来水还是比较干净的，只是味道不敢恭维而已。

我一边喝着冰水一边吹着风扇，身上的热气逐渐散去。旁边桌上坐着一家人，拿着菜单热烈地讨论该点什么。我拿过菜单一看，上面只列着几款冰淇淋而已，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我突然明白了，之所以要排那么长时间的队，原因在于古巴人把这家店当成了餐厅，把冰淇淋当成了正餐！我后来得知，葛佩莉亚冰淇淋店是哈瓦那的一块金字招牌，对于大部分来自

外省的古巴人来说，来这家店吃一次冰淇淋就相当于一次朝圣。年纪大一点的中国人对这种行为一定不会陌生，上世纪 80 年代来北京旅游的外地人也都会去全聚德吃一次烤鸭，无论排多久的队都心甘情愿，至于那烤鸭的味道到底怎样，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呆坐了一刻钟之后，服务员这才再次光顾我的桌子。我点了一份冰淇淋双球，味道和昨天吃到的几乎一模一样，但只需 5 比索，约合人民币 1.3 元，不到昨天价格的十分之一，确实挺便宜的。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角度想，昨天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其时间成本也就相当于 16 元人民币而已，起码对我而言太不值了。这样的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而且故事的主角竟然是冰淇淋，说明大部分古巴人既没钱又悠闲，两者缺一不可。全世界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国家屈指可数，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古巴。

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古巴正处在剧变的前夜。

剧变前夜的古巴

表面上看，现在的古巴和 80 年代的中国非常相似。区别在于，中国的改革开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其动力来自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古巴的变革则是从 1990 年苏东剧变开始的，在此之前，古巴是一个几乎完全依靠苏联的援助才存活下来的小岛国，苏联的解体让古巴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支柱，它不得不做出改变，否则将无法生存下去。

1959 年以前的古巴并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卡斯特罗革命的胜利也并不是老百姓吃不饱饭、忍无可忍起来造反的结果，而是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特征。古巴是最早被西班牙殖民的加勒比海岛之一，但却是最晚脱离西班牙帝国统治的拉丁美洲国家，古巴的独立战争进行了很长的时间，战况

也相当惨烈，虽然古巴人民最终获得了胜利，但他们却眼看着美国窃取了胜利果实，成为古巴新的宗主国。20 世纪的前 60 年里，古巴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实际上它就是美国的殖民地。

革命胜利之前的卡斯特罗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之所以选择暴力革命，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赶走美国人，建立一个属于古巴人的古巴。革命成功之后，美国立刻开动国家机器，千方百计要夺回对古巴的实际控制权。一开始是武装干涉，移民美国的古巴人冲在了最前面。这招没有成功，便改为贸易制裁，试图用经济手段逼古巴就范。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卡斯特罗选择了当时唯一能和美国抗衡的苏联，并加入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选择是成功的。古巴没有被美国这个躺在身边的巨无霸吞噬，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对于苏联的依赖使得古巴再一次成为超级大国实际上的殖民地。古巴在经济上变成了苏联的蔗糖供应国，以及苏联工业产品的倾销地，在政治上变成了苏联应对“冷战”的一枚棋子，苏联所采取的很多涉及古巴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根本没有经过卡斯特的同意。

苏联的解体结束了这一切。作为全球唯一一个先后被西班牙、英国、美国 and 苏联这四大帝国控制过的国家，古巴终于摆脱了老大哥们的束缚，长大成人了。此刻的古巴人终于意识到，独立自主的日子并不一定好过，长时间的贸易禁运使得古巴脱离了世界经济体系，变成了全球化的局外人，而计划经济的固有弊端使得古巴国内的生产力停滞不前，一直在吃老本。于是，古巴在 1990 年开始了艰难的改革。首先是屈服于黑市经济的压力，将美元合法化。其次是屈服于个体经济的压力，逐步向私人开放了服务行业。第三就是建立农业合作社，取代了旧的

国有农场。第四就是改变了原有的以制糖业为主的单一经济模式，改为重点发展旅游业，试图以此作为古巴新的经济支柱。今天的古巴几乎对任何国家的游客都敞开大门，中国游客只需要带一本有效护照就可以来古巴玩。古巴政府花大力气建设了好几个半封闭式的海滨度假村，希望那些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游客一下飞机就被拉进专为他们准备的涉外旅馆，不用和普通古巴人发生任何接触，自然也就不会给古巴老百姓带来“精神污染”。所以说，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为了享受相对廉价的加勒比海滩和阳光，那么古巴是个很好的选择，但如果你是一名对人文历史感兴趣的背包客，古巴并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地方。这个国家的公共交通设施非常落后，旅馆业也不够发达，懂英语的导游奇缺，好在哈瓦那有不少旅行社推出了专门针对外国游客的旅游路线，我尝试了几次，效果还不错。

不方便不等于不好玩。事实上，我在哈瓦那市中心暴走了好几天，特意去参观了那些普通游客不会去的普通居民区，在小巷子里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全程经历过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次古巴之旅让我寻回了很多儿时的记忆，光凭这一点便已值回票价了。比如，我在哈瓦那找到了中国70年代才有的那种副食品商店，柜台里面只陈列着寥寥几种生活必需品，顾客凭本购买。我还去逛了几家针对古巴人的百货商店，不但商品种类极少，而且价格昂贵，一套带卡座的老式组合音响要价600美元，一台42英寸杂牌平板电视被当作镇店之宝摆放在商店入口处，售价高达2000美元。

我还看到中国80年代风格的菜市场，农民们把自家地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运到菜市场里摆摊销售。因为缺乏化肥，以及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古巴菜市场里卖的蔬菜普遍个头偏小，



2013年12月10日，奥巴马和劳尔·卡斯特罗出席曼德拉的追悼会时相互致意

而且品相极不统一，和现在中国菜市场里出售的那种大农场生产出来的外形整齐漂亮的蔬菜差别很大。

虽然品种老旧，卖相也不好，但这类商店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价格极为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古巴人工资那么低却还能生活得不错的原因。

事实上，卡斯特罗革命的宗旨就是要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吃穿住行和医疗教育一律由国家按需分配，其余的一切个人需求都属于享乐的范畴，价格立刻就上去了。老一辈中国人对这种模式应该不会陌生，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年代，这种模式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事实上，即使在今天，能够满足大部分国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国家也并不多，这就是为什么古巴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2014年的排名是第44位，在西半球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智利，排名第四。要知道，这个指数是按照一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等诸多方面进行打分的，反映的是一个国家老百姓的整体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

作为一个旅游者，我的最切身的体会就是这个国家既安全又卫生，深夜一个人在大街上行走也不用担心，这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比美国的一些大城市都要好。

说到美国，这是和古巴距离最近的国家，两国之间的恩怨情仇延续了100多年，双方结下了数不清的梁子。美国毫无疑问要比古巴强大得多，但古巴人也足够倔强，坚决不向美国屈服。这才是最近这100多年里古巴外交政策的主旋律，其余的都是这一宗旨的衍生品。

美古关系的新篇章

2014年底，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分别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宣布将就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问题展开磋商，此举意味着美古关系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停滞后迎来了最大的转折。2015年4月，奥巴马宣布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中去掉，为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扫清了障碍。同年7月20日，两国大使馆分别在对方首都挂

牌开张，标志着美古两国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尚未结束，还必须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才能取消。

如此巨大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不少国外媒体认为这是梵蒂冈新任教皇方济各的功劳，但英国《卫报》发文指出，方济各虽然立下大功，但真正的源头还不是他，而是一次成功的人工授精。

事情还要从2013年说起，那年2月，美国参议员帕特里克·里赫（Patrick Leahy）访问古巴，古巴间谍杰拉尔·赫尔南德兹（Gerardo Hernandez）44岁的妻子找到里赫，请求他批准自己去美国监狱访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她想生一个孩子，再拖下去的话恐怕就生不出来了。

这个赫尔南德兹是著名的“古巴五人组”中的一员，这五人是古巴政府派到美国的间谍，1998年被美国抓获。美国法庭以间谍罪和杀人罪判处五人无期徒刑，这个赫尔南德兹当时已经在美国监狱里服刑17年，他的古巴妻子也已等了他17年。

里赫被这件事感动了，回国后给美国国务院打电话，询问美国外交部是否可以帮这个忙。经过一番考量，美国外交部居然同意帮忙。虽然最终还是没批准古巴间谍的妻子去美国监狱探访丈夫，但却同意让美国监狱设法取得了赫尔南德兹的冷冻精子，并运到巴拿马，在巴拿马一家医院实施了人工授精。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二次终于成功地让他的妻子怀了孕（后来孩子也安全地生下来了）。

可以想象，这样复杂的事情没有双方政府官员的协助是不可能办成的。当时双方的大使馆虽然早已撤销，但古巴一直在华盛顿保留了一个办事处。虽然这个办事处多年来一直惨淡经营（据说美国政府不允许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拥有美国银行账号，这些人只能通过其他方式从古巴运现金过来支付自

己在美国的生活费），但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办事处的努力下，美古两国最终完成了这次奇妙的人工授精，两国政府也终于在“冷战”了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发生了正面接触。

人工授精事件结束后，美国和古巴政府决定抓住这一机会在第三国举行秘密会议，商量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最终两国决定派代表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会面，双方一共开了7次秘密会议，与会双方都抱着非常务实的态度参与谈判，其结果就是2013年底奥巴马和劳尔·卡斯特罗在参加曼德拉葬礼时相互握手致意，这也是两国元首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直接对话。

此后才是教皇方济各和奥巴马于2014年3月在梵蒂冈的那次会面，两人确实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了古巴问题，方济各告诉奥巴马，历史证明制裁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相互交流才能达到目的。

梵蒂冈会面之后，双方又经过一系列磋商，最终古巴同意释放已被关押5年的阿兰·格罗斯（Alan Gross），此人原是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一名雇员，因为向古巴犹太人社区偷运卫星电话和电脑设备而于2011年被捕。美国方面也同时释放了“古巴五人组”剩下的三名成员。就在双方交换间谍的同一天，也就是2014年12月17日，两位总统分别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宣布恢复外交关系。

虽然美古关系的解冻表面上是因为一次成功的人工授精，但真正原因是美国终于意识到经济制裁是打不垮古巴人的，甚至有可能反而让古巴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结果更加糟糕。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古巴移民成分发生了变化，第一代古巴移民大都是一些厌恶卡斯特罗的人，他们离开古巴纯属政治原因，这些人对于上世纪的美古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甚至可以说直接导致了美古关系的恶化。如今这一代移民大都已经去世，而1980年开始的第二波移民潮，以及21世纪以来的第三波移民潮主要都是因为经济原因，新一代古巴移民没有了老一辈对卡斯特罗政权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这一点间接促成了美古关系的解冻。

同样地，古巴这边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古巴不必再担心被大国吞并，基于民族主义的治国理念也不再适用了，公有制对于经济发展的限制效应便凸显了出来。另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温饱不再是个大问题了，古巴民众高层次的需求便被释放了出来。举个例子，我曾经参观过一所古巴公共图书馆，惊讶地发现里面陈列的书竟然全都是出版于上个世纪的革命书籍，纸张早已发黄，内容可想而知。古巴也许是全世界文盲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古巴人虽然学会了认字，却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书可看，这才是今天的古巴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

要想真正解决这个矛盾，不改革是不可能的。

治理古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老卡斯特罗明年就将年满90岁了，他早在2008年便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弟弟劳尔，但劳尔也仅比哥哥小5岁而已，他也已经宣布到2018年任期结束后退休，不再寻求连任。事实上，现在的古巴政府中真正做事的大都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官员，这批人没有经历过革命，接受的是全新的教育，他们是政治改革的动力来源。普通古巴民众也并不仇恨美国人，民间的冲突是不存在的。无论从哪方面看，改革都势在必行。

不管古巴将来的改革是突然发生还是徐徐渐进，这一趋势已无法避免。但现在的古巴仍然能看到过去的影子，可以让我们反思一下自己今天的生活。■



古巴，一种独特的民族独立史

地理、历史与杰出人物，构成了古巴的道路选择。细看下来，它是一连串传奇故事。

文 / 袁越



1961年4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口聚集大量民众，抗议美国入侵古巴



1511年西班牙入侵古巴，酋长阿图伊中枪被俘，并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空降哈瓦那

2015年8月初的一个早晨，我乘坐墨西哥航空公司的一架小飞机从坎昆起飞，向东飞去，飞机还没达到巡航高度就开始下降了，我都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脚下的加勒比海。这片海域曾经是欧洲列强比拼实力的战场，很多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但其实这只是很小的一片水域，对于飞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一眨眼就飞过去了。

从地图上看，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半岛就像是两只胳膊，把墨西哥湾抱在怀中，只在东南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却又被古巴岛挡住了去路。古巴岛是加勒比地区面积最大的岛，距离尤卡坦半岛的直线距离是210公里，距离佛罗里达南部的基韦斯特岛（Key West）的直线距离更是只有不到150公里，美国人要想从东海岸驾船进入墨西哥湾，无论走哪条航线都必须从古巴人的门前经过。

加勒比海上岛屿众多，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南美原住民以这些海岛为跳板，一步步从南美大陆跳到了古巴岛上。岛上最早的一批居民被称为瓜纳阿塔贝伊斯人（Guanahatabeyes），文明程度较低，主要靠打鱼为生，最终被泰诺人（Tainos）取代，后者发展出了较为高级的农业文明，把前者当作了奴隶，哥伦布首次登上古巴岛时遇到的主要是泰诺人。

哥伦布是在1492年10月27日发现古巴岛的，他在岛上找不到黄金，遂改去了东边的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意为“西班牙”），亦即今天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所在地。最终西班牙殖民者看中了距离欧洲大陆更近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在岛上建立了第一个

美洲定居点。原来生活在该岛的泰诺人大部分被杀，一小部分驾船逃到古巴岛，把西班牙人入侵的消息带到了岛上，于是古巴岛上的泰诺人做好了迎敌的准备。

1511年，一小队西班牙士兵在迪亚戈·贝拉斯克斯(Diego Velasquez)的率领下入侵古巴岛，岛上的泰诺人在酋长阿图伊(Hatuey)的带领下奋起反抗，最终被武器精良的西班牙人击败，阿图伊中枪被俘。西班牙人将阿图伊绑在火刑柱上，点火前一位方济各会传教士劝他改信基督教，宣称只有这样死后才能上天堂，否则就要下地狱，忍受无尽的苦楚。阿图伊略加思考后反问这位传教士，基督徒死后是否都会进天堂，当他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选择下地狱，因为他不想再看到这些残忍的畜生。

说完这句话后，阿图伊便被西班牙人放火烧死了。今天的阿图伊成为古巴印第安原住民的形象代表，他的名字则被那些当初烧死他的人的后代用作了啤酒和雪茄烟的商标。

阿图伊的遭遇只是西班牙殖民者占领美洲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同时也是古巴岛血腥历史的缩影。这个国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种族歧视，也就是白人对印第安原住民和黑人的暴力迫害，这一点几乎贯穿了整个古巴历史，直到1959年才总算告一段落。卡斯特罗上台后古巴倒向了苏联，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标签一直贴到现在。

一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何塞·马蒂国际机场。我一下飞机就开始下意识地寻找“熟悉”的痕迹，结果一抬头就发现机场的墙壁全都被涂成了红色，而且不是那种体现热带风情的鲜艳的红色，而是略微发暗的颜色。除此之外，机场的内部装饰相当单调，缺乏变化，唯一的亮点就是两幅广告，一幅是烟草

广告，另一幅是朗姆酒广告，全都是以外国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非生活必需品。

走出机场，一股热浪迎面扑来，那无所不在的湿热空气让人无处躲藏。机场附近没有公共交通，要想进城只能打车，上车前必须先换钱，但整个机场却只有一家银行，而且居然建在机场外面，我不得不在热浪中排队等候。

古巴的货币单位叫作比索(Peso)，古巴人自己用的比索颜色寡淡，被中国留学生称为“土比”。古巴政府专门给外国人印了一种颜色鲜艳的比索，称之为“红比”。红比类似于中国80年代使用过的兑换券，理论上和美元是1:1的关系。但古巴政府为了和美国斗气，规定用美元换红比要交15%的手续费，其他外币币种则无需缴纳这笔费用。我这次专门换了些欧元带在身上，躲过了这一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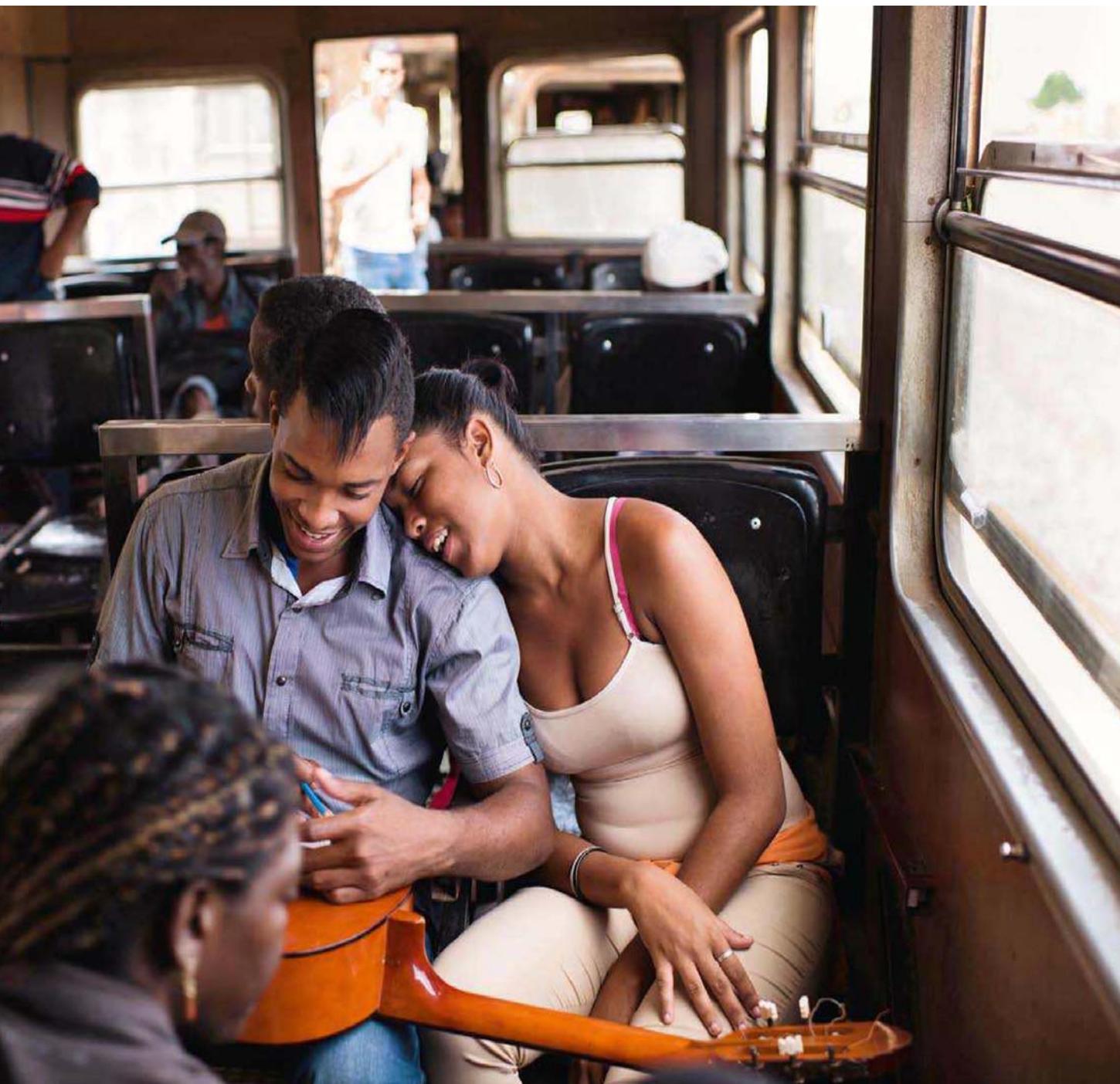
本以为会在机场外看到很多老爷车，但机场出租车大都是新车，我略感失望。不过一出机场，路上的老爷车立刻多了起来。这些车大都是40至50年代生产的老古董，以前只在博物馆或者电影里才能见到，美国大街上偶尔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但都是在特殊节日或者场合开出来展览的，从里到外都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子。古巴这些古董车之所以一直在路上开，是因为古巴人别无选择。大街上的这些老爷车大都只剩下一个外壳，里面的引擎和传动系统早就换过好几茬了。古巴人很爱美，几乎每辆车都被漆成了各种鲜艳的颜色，喜欢街拍的摄影师们一定爱死古巴了。不过因为古巴民间缺乏电喷设备，颜料大都是手工刷上去的，表面粗糙，颗粒感很明显，不能细看。

从机场到市区的这段公路质量还不错，沿途绿树成荫，地上基本看不到垃圾，视觉效果非常舒服，就是显得有些冷清，不但路上行驶的车辆少，



而且路边基本上看不到广告牌，就连商店也很少见，自然也就看不到多少行人。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车子进入了哈瓦那市区。就像全世界大部分海滨城市一样，哈瓦那基本上是以老港口为中心，沿着海岸线向两边延展。游客最常去的有三个区：老城区(Habana



一对古巴恋人乘坐电车前往哈瓦那

Vieja) 是以港口为中心的旅游区，保存了大量殖民地早期的老建筑，其中不少都被改装成了高档旅馆，是外国游客扎堆的地方；老城区的西侧是中心区 (Centro Habana)，原本是资本家的乐园，有大量建于 18 至 19 世纪的办公楼和公寓楼，如今这里是古巴工人阶级的住宅区，是近距离观察古

巴普通老百姓的好去处；再往西走就进入了维达多区 (Vedado)，原本是资本家们为了躲开市中心而修建的高档住宅小区，到处是独门独院的小别墅，从房屋设计到街区的布局都和美国非常相像，如今这里也变成了普通古巴人的住宅区，但要比拥挤的中心区安静许多。

大部分西方游客都不会住在哈瓦那，而是一下飞机便直奔海滩度假村晒太阳去了。出公差的外国人则大都会选择住在老城区或者维达多区的高档旅馆里，这里服务很好，但价格也非常贵。像我这样的对历史文化更感兴趣的背包客则大都会选择住在家庭旅馆里，这是古巴的新生事物，但只

有少数具备一定条件的家庭才有资格接待外国游客，这样的房子门前会有一个类似“工”字的标记，表明它们通过了古巴政府的资格认证。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正在古巴读博士的研究生，住进了他的家里。他在维达多区租了一间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公寓，月租金250美元。这房子位于一幢旧式别墅内，一看就是被改装过的，原本高大宽敞的起居室被分隔成了多个单元，一下子拥挤了很多。房间里空调、冰箱、水、电、煤气、抽水马桶等基本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但却经常停水，我有好几天都没法洗澡，只能用存在水缸里的水简单冲一下。

古巴为什么会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答案必须从历史中去寻找，而古巴的历史，是从哈瓦那的老城区开始的。

西班牙帝国的明珠

从我住的地方到老城区大约有5公里远，最省钱的办法自然是坐公共汽车。哈瓦那的公共汽车大都是中国产的宇通大巴车，虽然高峰时间人挤人，但坐一次只需1土比，几乎相当于免费，不过哈瓦那的公交系统线路太过复杂，司机也从来都不报站名，对于像我这样不懂西班牙语的游客来说很不方便，一不小心就会坐错车。挂牌的正规出租车倒是有，但一来大街上很不常见，往往只能去外国人住的宾馆门前才能叫得到，二来价格非常贵，不太合算。

那么，当地人如果不想挤车的话会怎么办呢？答案是去街边拦一辆共用“的士”，西班牙语称之为Taxis Colectivos。这是一种刚刚在古巴出现不久的私营出租车，通常是那种上世纪40至50年代产的美式老爷车，招手即停，坐满为止。坐一次大约需要10土比，介于普通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之间。我给了司机1红比，他很熟

练地找了我14土比。原来古巴的外币兑换券实际上已经和本国货币完全通用了，普通人也可以用红比，外国人也可以用土比，只要按照24：1的比例换算就行了。

唯一的缺点是，这种车只跑固定的线路，上车前必须先问清楚。好在我时间充裕，只要是往东去的车都可以坐，感觉差不多到了就下车，再找个人问问路，很快就进入了老城区的地界。

南美洲有很多保护得非常好的殖民地时期的古城，哈瓦那老城绝对算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座西班牙风格的老城自从古巴解放后便没有维修过，也没有被挪作他用，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但也正因为如此，老城里的大部分建筑都因年久失修而摇摇欲坠，有几幢损坏严重的房子几近废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82年就将哈瓦那老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因为“冷战”的原因一拖再拖，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拨出专款，对这一地区的古建筑进行系统的修复。如今游客们看到的房子大都是修复后的结果，有些建筑物外面还贴着修复前的照片，简直惨不忍睹。

今天的哈瓦那老城完整地保留了当年的格局，5座主要的广场以及周边建筑基本维持原样，街道也仍然是石子路，几乎不用改装就可以用来拍古装电影了。古城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要是在一般南美城市一定会挤满了小商小贩，以及各种小偷、骗子和掮客，但古巴政府显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我看到了一个相当有秩序的旅游景观，游客可以放心地在城里乱逛而不用担心被偷被抢，就连老城的那些饭馆和酒吧的服务生也都相当专业，当然价格也不菲，恍惚间我觉得自己身在西班牙。

历史书上说，哈瓦那建于1515年，距今正好500周年，但今天的哈瓦那却没有举行任何庆祝仪式，因为最早

的哈瓦那城建在古巴的南部海岸，直到1519年才搬到了今天这个地方。搬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个天然良港，港湾的主体部分一直深入到内陆，通过一条狭长的水道和加勒比海相连，绝对的易守难攻。

虽然守着这么一个天赐的宝贝，但早期的西班牙殖民者却一直无动于衷，没有好好加以利用，因为最早来到美洲的都是一些强盗，他们只对黄金感兴趣。可惜古巴岛不产黄金，岛上仅剩的一点金子挖了几年便挖没了，于是古巴的第一任总督贝拉斯克斯下令从西班牙运来了耕牛、种子和农具，开始发展农牧业。

这当然是最合乎情理的选择，如果西班牙殖民者一直这么做下去的话，今天的古巴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故事了。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不合情理的，总会有少数人不走寻常路，最终凭借一己之力改写了历史进程。古巴虽然只是一座岛屿，但却出过好几个世界闻名的叛逆者，其中一位名叫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是个出身于西班牙名门望族的法律系肄业生，1505年他被派往美洲，在征服古巴的战斗中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和胆识，被贝拉斯克斯任命为圣地亚哥市的市长。他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对贝拉斯克斯转向农业的政策不以为然。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到那里（美洲）是为了发财的，而不仅是像一个农民那样去种地。”

1519年3月，科尔特斯率领一小队西班牙士兵在尤卡坦半岛登陆，长途奔袭至传说中的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今墨西哥城），采用各种欺骗手段囚禁了阿兹特克国王，统治了这个中北美洲最强大的帝国。阿兹特克帝国盛产黄金和白银，科尔特斯终于如愿以偿地发了大财。消息传到西班牙后，原本定居在加勒比海岛上的西班牙殖民者纷纷放下手中的农具，乘船登上美洲大陆抢夺黄金，



1519年，西班牙冒险家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后焚烧舰船以断士兵后退之心，最终攻陷特诺奇蒂特兰古城

此事标志着西班牙帝国征服美洲大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作为这场运动的发源地，古巴并没有享受到任何好处，反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移民中转站。来自西班牙本土的移民们只在古巴做短暂停留便起身前往美洲大陆，导致古巴岛上大片农田被废弃，绝大部分城镇也人去楼空。据统计，到1544年时整个古巴岛只剩下不到7000人，其中只有660名西班牙殖民者，其余都是印第安原住民和黑人奴隶。这种萧条的状况直到16世纪下半段才有了好转，原因在于西班牙人发现了一条从古巴出发、途经巴哈马群岛返回欧洲的新航道。

原来，加勒比海域的海水较浅，暗礁密布，一直是航海家的噩梦。殖民者在墨西哥抢来的金银如果想要运

回欧洲的话，以前不得不绕道而行，这条新航线的发现为欧美之间的航运交通节省了不少时间。另外，欧洲航海家们终于掌握了大西洋海风的运行规律，意识到从北非出发向西航行的船只可以借助强劲的海风快速抵达古巴南部沿岸的圣地亚哥，而从古巴北岸出发的船只则可以借助北大西洋盛行的西风穿过巴哈马群岛向东返航。

作为返航途中最重要的中转站，哈瓦那咸鱼翻身，开始了爆发性的增长。但是，停留在哈瓦那港口的商船吸引了海盗们的注意力，这些海盗大都来自英、法、荷等北方国家，他们抢劫西班牙商船不光是为了钱，也有宗教的原因，加勒比海在这段时间里成为北方新教列强和南欧天主教帝国之间的角斗场。好莱坞曾经拍过好几

部关于加勒比海盗的电影，描述的就是这段时期发生的故事。

哈瓦那老城最著名的古迹——雷尔弗埃查城堡（Castillo de la Real Fuerza）就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这座城堡位于古城的中心，紧挨着狭窄的航道，任何船只要想进入哈瓦那港口都必须先过这一关。城堡的围墙有6米厚，围墙外面还有一道护城河，看上去坚不可摧。但实际上这座城堡见证了西班牙人的无能，它的位置距离出海口太远了，敌舰完全可以在不和城堡守军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攻占哈瓦那，法国海盗雅克·德索雷（Jacques de Sores）就是这么做的。这个德索雷曾经被誉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盗”，他率领的舰队在1555年洗劫了哈瓦那，将雷尔弗埃查



在田地里收甘蔗的古巴农民（摄于1959年）

城堡尽数焚毁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堡是西班牙王室拨款重修的，西班牙人意识到古巴岛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必须全力保卫。

因为西班牙人拼尽全力保卫古巴，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海盗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都没能得手。法国人转而向东，占领了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部，也就是今天的海地。英国人则转而向南，占领了古巴岛南边的牙买加。于是今天的海地人讲法语，牙买加人则说英语。最终西班牙王室和英法两国达成协议，西班牙承认了英法两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换来了几十年的相对太平。

好景不长，野心勃勃的英国人绝不会满足于小小的牙买加，他们另有打算。

英国人的短暂殖民

哈瓦那位于北纬 23° 线上，大致相当于中国广州，8 月的哈瓦那正值盛夏，天气炎热而又潮湿，我在太阳底下走了一会儿便口渴难耐，到处找水喝。哈瓦那老城里的老店倒是不少，但大都只卖果汁、啤酒或者碳酸饮料，很少有卖瓶装水的，即使有的话价格也往往贵得离谱。当地人告诉我，普通古巴人没有喝瓶装水的习惯，觉得不合算。我后来在居民区里发现了几家专为古巴人服务的小店，居然有卖散装果汁的，顾客自己带着塑料瓶，让服务员用漏斗把冰镇果汁灌进去。我买了一杯尝了尝，发觉这就是兑了点果汁的糖水，味道很一般，但价格比瓶装水便宜多了，好像古巴的糖不要钱似的。于是我也入乡随俗，渴了就喝这种冰镇果汁，一天之内喝下去十几杯，确实很解渴，而且到了晚上我一点也不饿，连晚饭钱都省下了。

还别说，古巴的糖真的很便宜，因为这是个靠甘蔗支撑起来的国家。

高峰时期全古巴有 45% 的可耕地都用来种甘蔗，制糖业从 16 世纪开始就是古巴最重要的经济命脉。

甘蔗并不是南美特产，最初是西班牙航海家带过来的。甘蔗对阳光和水的要求极高，加勒比地区的气候和降水条件都很适合，于是很快就在古巴岛流行开来。不过，甘蔗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农作物，古巴岛上的原住民大批死于欧洲人带去的传染病，劳动力极度短缺，殖民者只能从非洲贩运奴隶来古巴种甘蔗。

被贩运到古巴的黑奴大都来自西非，人数很快就超过了居住在古巴的西班牙人。据统计，到 1886 年奴隶制被废除时为止，一共有大约 100 万黑奴被贩运到了古巴，黑人实际上成了 19 世纪古巴人数最多的族群。

西班牙人对待不听话的黑奴当然是非常残酷的，但对待一般黑奴的态度则要比北美奴隶主缓和得多，古巴政府允许黑奴因为各种原因而获得自由，也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甚至允许他们自由结社（比如组织同乡会），因此古巴黑奴从一开始就对古巴有很高的认同度，这一点和美国黑人有着天壤之别。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古巴黑奴很快便把古巴视为自己的故乡。当年法国海盗德索雷入侵哈瓦那时，古巴黑奴（还包括印第安原住民）一直和西班牙殖民者并肩战斗，共同保卫自己的家园，这件事说明古巴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有着和其他殖民地不同的特征，这一特征最终导致古巴走上了一条和其他加勒比海岛不同的道路。

可惜的是，尽管古巴黑奴和印第安原住民都愿意为奴隶主卖命，但实力不济的西班牙殖民者还是在和北列强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古巴也逐渐变成了英法等国眼中的一块肥肉。18 世纪中期，大英帝国的势力达到顶峰，英国人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1741 年，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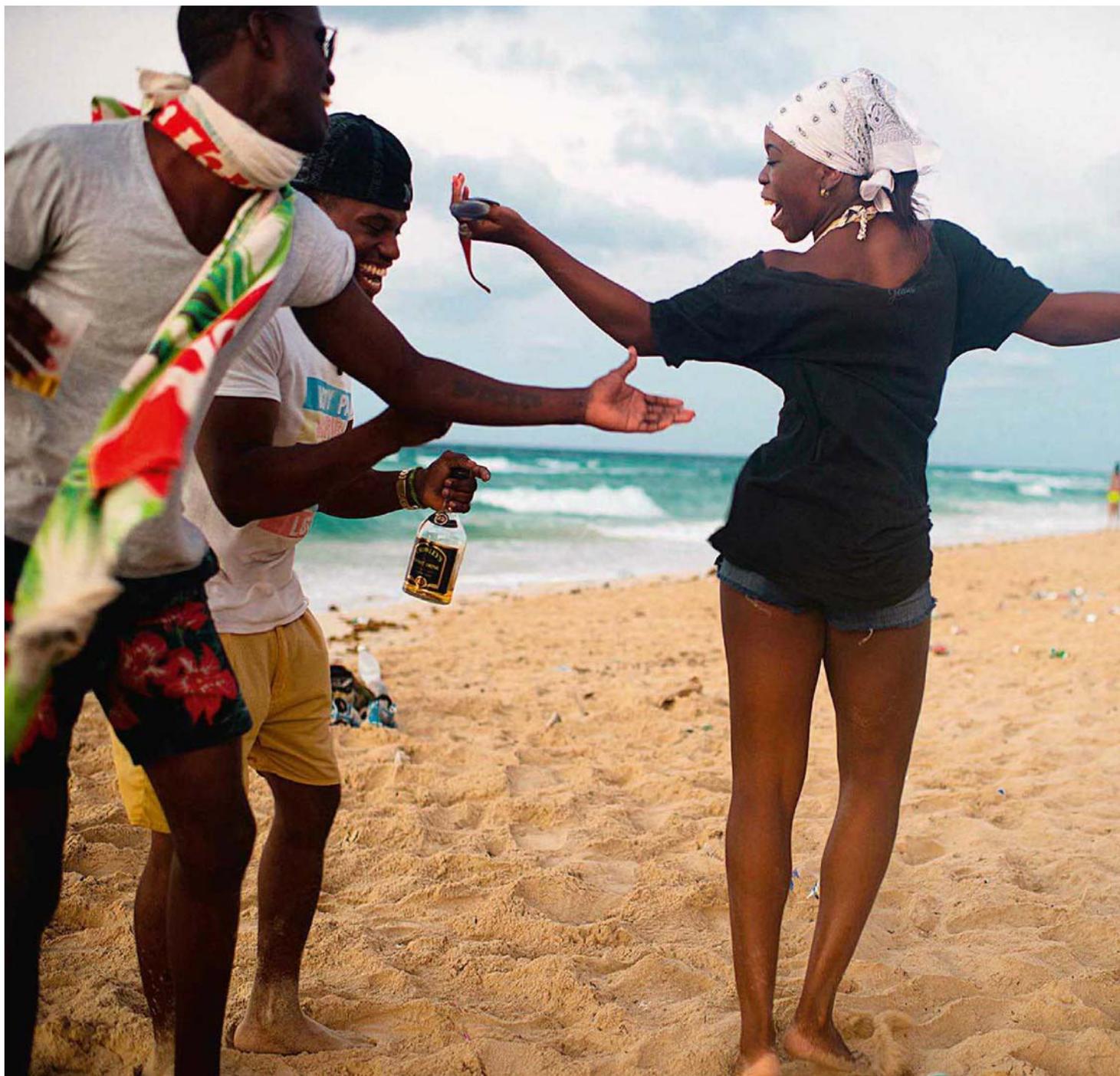
农（Edward Vernon）攻占了关塔那摩（Guantanamo），但很快就被一支由多种肤色的古巴士兵组成的自卫队击败，不得不退了回去。20 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最终于 1762 年 8 月攻占了哈瓦那。

英国人的胜利固然源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也和古巴岛特殊的地形有点关系。古巴岛是加勒比地区最大的海岛，总面积约为 11 万平方公里，单从这个数字来看已经不能算是个小岛了，尤其对于古代那种落后的科技发展水平而言，如此大面积的领土是很难被有效管理的，军事防御就更成问题了。如今很多人认为一座岛理属于同一个国家，这个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很多看似不大的岛都没有统一到一个政府名下，古巴旁边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就被分成了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古巴岛状如一把长条形的钥匙（所以有人称之为“墨西哥湾的钥匙”），东西方向的长度约为 1250 公里，但南北方向的宽度却仅为 100 公里左右，这样一种形状使得古巴岛具有和自身面积不相称的漫长的海岸线，非常容易遭到来自海上的攻击。

就拿关塔那摩来说，这是位于古巴最东端的一块飞地，和古巴岛的主体部分之间隔着一座高山。这里距离哈瓦那有将近 1000 公里的距离，两者之间也缺乏高质量的道路，哈瓦那的官员们根本管不到这里，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属于“三不管”地带。最终这块飞地被美国抢了去，至今没有归还。

正是因为古巴岛太难防守了，以及一些其他原因，英国人只在哈瓦那待了 10 个月就决定退出。1763 年 2 月，英法西三国签订了《巴黎和约》，英国同意把古巴还给西班牙，但西班牙必须用佛罗里达作为交换。当时大英帝国已经占领了北美的东北部地区，获得佛罗里达就相当于把整个北美（加



古巴圣玛利亚海滩上玩乐的年轻人

拿大除外) 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巴黎和约》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铺平了道路，也为古巴的未来埋下了伏笔。古巴好不容易摆脱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却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强大的邻居。

《巴黎和约》还改变了西班牙对待古巴的态度。重新获得古巴后，西班牙

统治者更加意识到这个岛国的重要性，决心尽一切可能使之变得更加强大。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的主持下，古巴开始了政治和经济改革，原有的土地分配政策、税收体系和教育制度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古巴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加勒比明珠。

但是，天算不如人算。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很快波及到了加勒比地区，作为这一地区唯一的法国殖民地，海地受到了直接的冲击。1791年，海地的黑奴在宗主国大革命精神的鼓舞下爆发了武装起义，赶走了白人奴隶主，成为继美国之后西半球第二个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同时也是有史



以来第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共和国。在这场战斗中，大约有 2000 多名白人奴隶主被杀死，3 万名法国农场主被迫逃到了古巴岛上。

这件事震惊了欧洲，西班牙人突然意识到黑奴们已经具备了反抗的意识，说不定会效仿海地的同胞，把古巴岛的白人殖民者赶出去。于是，来

自马德里的统治者一方面加强了对黑奴的戒备，另一方面则修改法律，通过授予土地和减免税收的方式鼓励西班牙人移民到古巴去，最终在人数上超过黑人。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目的算是达到了。根据古巴政府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古巴这 1150 万人口当中有 64% 是白人，26.6% 是黑白混血，9.3% 是纯的黑人，剩下的 0.1% 则是中国劳工的后裔。据我这几天的观察，古巴白人的比例似乎没有这么高，我猜是因为一些混血程度较轻的人被划到白人阵营里去了。不过古巴确实是加勒比地区白人比例最高的国家，如果仅凭街上行人的肤色或者衣着来判断，哈瓦那和马德里基本上没有差别。

另外，古巴同时也是我去过的美洲国家里种族差异最小的国家，我很难根据对方的衣着打扮或者所从事的工作类型来判断他的种族，或者根据肤色判断他的职业，不过这很可能是因为我对古巴还不够了解而已。

古巴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达到目前这种状况，当年这个国家的种族歧视也是相当严重的。前文说过，最早的古巴奴隶主对待黑奴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开明的，但海地革命之后这种相对和谐的气氛便消失了。仅举一例：古巴是拉丁美洲国家当中最晚废除奴隶制的国家，直到 1886 年才正式废除了这一制度。南美洲只有巴西比古巴晚，1888 年才废除。相比之下，加勒比海其他国家大都在 1834 至 1848 年间废除了奴隶制。美国虽然种族歧视现象比古巴严重得多，也早在 1863 年便废除了奴隶制。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古巴白人对宗主国的忠诚度是拉丁美洲国家当中最高的，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古巴独立的话，黑人有可能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就要背井离乡了。西班牙国王投桃报李，给移民古巴的西班牙人提供了很多便利。再加上蔗糖产业的兴旺为古巴的上层精英带来了巨额财富，他们

更加不愿意独立了。事实上，只有少数处于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被放逐的异议人士才会积极地要求摆脱西班牙统治，这批人虽然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却在古巴遇到了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更大的阻力，这就是为什么古巴的独立运动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双方都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对方达到目的，甚至不惜诉诸暴力的原因。这种在独立战争期间形成的暴力传统后来几乎每 10 年就重现一次，古巴在 1878、1879、1895、1906、1912、1933 和 1956 年爆发了各种形式的暴力抵抗运动，真正获得独立的时间比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都要晚。古巴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和古巴人民对于民族独立的不懈追求有着直接的关系。

艰难的独立之路

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特别喜欢广场，几乎每个城市的中心都有一座。广场中心通常都会安放一座人像雕塑，纪念对这个国家或者这座城市贡献最大的人。南美洲南部诸国（包括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等）纪念的是何塞·圣马丁（Jose San Martin），南美洲北部诸国（包括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等）纪念的是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两人并称为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南北双雄”。但古巴有自己的偶像，他的名字叫作何塞·马蒂（Jose Marti），哈瓦那机场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与前两位不同的是，马蒂既不是古巴独立运动的发起人，也不是最终的胜利者，而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精神的自由派诗人，这一点是古巴独立运动区别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一项很重要的特质。

与邻国海地一样，古巴的独立运动起源于宗主国西班牙发生的一场革命。1868 年 9 月 18 日，马德里爆发了“光荣革命”事件，革命者驱逐了西班牙

女王伊莎贝拉。1个月后，古巴的一位律师兼农场主卡洛斯·塞斯佩德斯（Carlos Cespedes）发动了古巴独立运动，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这场运动点燃了埋藏在人们心里的独立之火，从此起义军的枪声便此起彼伏，一直没有断过。

马蒂就是从这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鼓动者。他于1853年1月28日出生于哈瓦那，父亲是响应政府号召从西班牙移民到古巴的一名炮兵中士。1868年的那场革命激励了还在上中学的马蒂，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祖国自由报》，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好几篇煽动性极强的社论。革命失败后，古巴当局把当时年仅16岁的马蒂关进了监狱，只是因为他的身体出了问题，这才不得不将他流放到了西班牙。马蒂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律时接触到很多欧洲思想家的著作，尤其是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e）对他影响最大。克劳斯非常注重教育，现在的古巴之所以在教育领域投入了巨大的

人力物力，和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学成后马蒂回到美洲大陆，最终定居美国，并在纽约生活了将近15年，没想到这段生活却把他培养成为坚定的反美人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知道这个怪兽（美国），因为我曾经生活在它的兽穴中，我的武器只有大卫的弹弓。”

马蒂之所以讨厌美国，一个原因是当时美国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马蒂是一位坚定的种族平等支持者，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古巴革命者。另一个原因是马蒂坚决反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虽然很羡慕美国的物质文明，但他认为这是建立在剥削少数民族的基础上的经济繁荣，古巴绝不能学。但是，与此同时他却又多次尖锐地批评马克思，觉得马克思那套理论同样也是行不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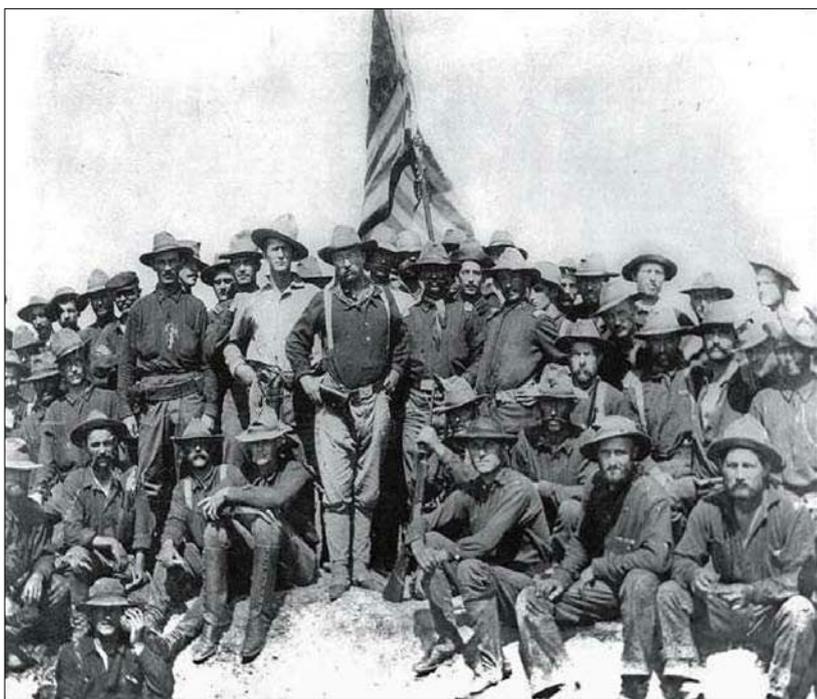
不过，马蒂之所以如此反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美国对古巴不怀好意，一心想将古巴据为己有。当时有很多古巴精英希望独立后的古巴和美国结盟，甚至干脆并入美利坚合

众国，马蒂对这个想法深恶痛绝，认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美国兼并。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任何民族的双手都必须是自由的，因为只有遵循自己的特性和个性，一个国家才能不受拘束地发展。”同样，马蒂对待美国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古巴后来的外交政策，反美一直是古巴革命者的核心议题。

1892年，马蒂和几个志同道合之人在纽约成立了古巴革命党，准备用武力推翻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3年之后，马蒂率领一支部队在一个偏僻的古巴小渔村登陆，正式开始了游击战。1895年5月19日，游击队遭到了政府军的伏击，马蒂勇敢地冲在最前面，不幸中弹牺牲，年仅42岁。不少人指责他只会写字，不会打仗，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但据当时参加战斗的人回忆，马蒂很可能是故意这么做的，为的是以死明志。他人生得十分矮小，身高只有1.5米，喜欢留八字胡，平时总是穿着一套黑色西装，系白色领带，这些外表特征人所共知，在战场上很容易辨认。那天他不但穿着自己标志性的服装，还故意骑了一匹白马，更是等于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事实上，他在出发去古巴前曾经撰写了一份革命党宣言，其中有“胜利或者牺牲”这样的字句，表明他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后来卡斯特罗从这句标语中得到启发，写下了“为祖国毋宁死”的口号，成为他一生中说过最有名的一句话。

马蒂对美帝国主义的担忧在他死后没几年就应验了。1898年2月15日，一艘停靠在哈瓦那港口的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爆炸，当场炸死了258名美国水手。美国政府立即指责西班牙政府一手制造这场惨案，后者则坚称这是一次意外事故，反过来指责美国为了寻找战争借口，故意制造了这起惨案。双方谈判了两个月，谁也不肯让步。于是美国在1898年4月25日



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美国陆军上校西奥多·罗斯福与他的莽骑兵团合影



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海滨大道

对西班牙宣战，并迅速派出军队攻击西班牙帝国在全球的很多殖民地，包括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显然美国人打算把古巴解放战争扩大为美西战争，借此机会一举摧毁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

1898年7月1日，美军的一支莽骑兵团（Rough Riders）在古巴的圣地亚哥市登陆，随即向古巴政府军发起攻击。羸弱的西班牙军队远不是装备精良的美军的对手，后者只用了3周的时间就把政府军彻底击垮，完成了对这个已有400多年历史的西班牙帝国的最后一击。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这支莽骑兵团的副总指挥名叫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是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美西战争结束后他作为战斗英雄回到美国，

受到热烈追捧，几年后便当上了美国总统，并且在这个位置上干了8年。

如果马蒂还活着，一定会反对美国的介入，但马蒂已死，大部分古巴义军领导人都对美军表示欢迎，毕竟美国人帮他们打赢了这场已经持续了30年的古巴独立战争。美西战争结束后，西班牙把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和古巴都割让给了美国，美国正式成为古巴新的宗主国。但年轻的美国从未有过统治外国的经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段时间美国国会为古巴问题争吵了无数回，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美国统治者只能从自身的经历中寻找经验，把他们所熟悉的那套运作方式运用到古巴人民身上。

于是，古巴全盘移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运作模式，迅速在1900年组织了第一次民主选举，并召开制宪会

议，仿照美国的模式制定宪法。1902年，第一部古巴宪法获得通过，美国旋即宣布撤军，将古巴交给了新成立的古巴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埃斯特拉达·帕尔玛（Estrada Palma）。

这一切看似合情合理，但在今天的古巴历史课本里则完全是另一种说法。首先，1900年那次总统选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选举，古巴的白人精英们害怕古巴会成为下一个海地，规定只有20岁以上、能读能写、拥有250美元以上财产的古巴男子才有选举资格，这就等于剥夺了广大妇女和黑人的选举权。最终参与投票的选民总数只有大约10万人，只占古巴人口总数的5%，所以卡斯特罗政府一直把帕尔玛政府称为独裁政府，在1902年成立的古巴共和国名称前面加了个“伪”字。



切·格瓦拉深受古巴民众爱戴，他的肖像随处可见，也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

如果说上述缺点属于时代局限的话，那么美国人强行附加在古巴宪法中的《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 则被视为是对古巴人民的侮辱。这项修正案一共有 7 条，后人谈论最多的是第 7 条，这则条款给予美国人在古巴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的权力，其结果就是美军在关塔那摩建立了海军基地。这个基地最终因为其关押了中东战俘而闻名于世，但实际上它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保障了美国船只从美国东海岸的港口驶向巴拿马地峡（之后不久便成为运河）的航道，这就是为什么当《普拉特修正案》于 1934 年 5 月 29 日被废除后，美国仍然拒绝交出这个基地的原因。

但是，《普拉特修正案》最关键的其实是第三条，这一条给予美国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干涉古巴内政的权力。

当年投赞成票的古巴政治家认为一个受限制的独立总要比美国继续占领古巴好得多，但历史证明这一条相当于把古巴变成了美国的一个隐性的殖民地，使得古巴政府每当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很自然地要求美国出兵干涉，借助美军的力量来解决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府应该自己解决的问题。两国关系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笼罩在《普拉特修正案》的阴影之下，双方的敌对情绪最终导致了 1959 年卡斯特罗的上台。

独裁者还是实干家

马雷贡 (Malecon) 大道是哈瓦那最宽敞的大街，其地位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它沿海而建，把哈瓦那的三个最主要的街区连接在一起。大道

两侧随时可见各种名人雕像和纪念碑，全都保护得非常好，只有一个纪念碑例外，虽然它位于马雷贡大道的正中央，周围还有一圈护栏围着，但护栏内到处是参观者随意丢弃的垃圾，背阴处甚至变成了流浪汉的临时居所。这就是为了纪念“缅因号”爆炸事件中死亡的 258 名美国水手而建立的纪念碑，古巴革命后愤怒的群众把这座碑毁坏了，原本安放在顶部的铁制雄鹰被砸烂，只剩下两根石柱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这座纪念碑之所以没有被彻底拆除，完全是因为卡斯特罗政府在上面刻了一行新字：纪念“缅因号”爆炸事件的死难者，他们死于美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古巴岛的野心。

有趣的是，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就建在纪念碑西侧不到 400 米远的地方，那是一幢 8 层楼高的玻璃建筑，外表

没有任何装饰物，也没有悬挂任何旗子或者标记物，外人绝对猜不出这楼是干吗的。大楼前有块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面立着一堆旗杆，但旗杆之间距离非常小，像是一片无人管理的森林。原来这就是著名的黑旗广场，当年美国人在使馆楼的外墙上安装了一块大屏幕电视，整天播放“反革命”宣传视频，卡斯特罗一气之下，在大楼前安置了138根插满黑旗的旗杆，挡住了大屏幕，这样一来从马雷贡大道上通过的车辆和行人就看不到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宣传了。

记得我当初读到这个故事时还以为是为瞎编的，因为我不能想象两个有头有脸的大国之间竟然会像小孩打架一样搞这种无聊游戏。但当我真的看到这个黑旗广场时，便意识到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并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而是有很多微妙之处。

今天的人对于美军当年扶持亲美傀儡政权，再用《普拉特修正案》给自己干涉古巴内政留后路的做法相当不齿，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刚独立的古巴和其他那些前殖民地国家一样，头几年也是矛盾不断，暴力冲突频发。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的突然撤出让原本被外来殖民者压制的本土力量看到了机会，各个利益集团开始钩心斗角，相互倾轧，而作为各个利益集团代言人的政治家们更是尔虞我诈，每个人都想通过贿赂等手段拉拢选民为自己投票。他们一旦上了台便开始大肆贪污腐败，选举失败的一方也绝不会善罢甘休，而是立即开动自己掌握的宣传机器，指责对方卑鄙无耻。台上的人自然不喜欢听这个，新闻管制是他们所能想到的让敌人闭嘴的最有效的方式。台下的人一看翻身无望，便转移到深山老林之中打游击，毕竟这是古巴政治家们最熟悉的抗争方式，他们的前辈们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一旦游击队得势，掌权者控制不住局面

了便会立即去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而美国也有求必应，立即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古巴，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据统计，美国于1906～1909、1912、1917～1923年先后对古巴实施了3次武装干预，其中有两次长达3年以上，为古巴政权维持稳定局面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美国政府之所以这么做当然不只是为了维护古巴人民的利益，它有自己的目的。古巴独立后大批美国商人去古巴做生意，使得美国迅速跃升为古巴最大的贸易伙伴。到了上世纪20年代时美国公司已经控制了2/3的古巴农田和绝大部分矿产资源，他们最需要和平稳定的古巴。当然了，这也是大部分古巴老百姓的愿望，他们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党派斗争，希望古巴社会能安定下来，好好发展经济，于是古巴人在1925年把自由党的格拉尔多·马查多(Gerardo Machado)选为古巴新一任总统，希望这个商人出身的政治家能为古巴带来一些改变。

马查多上台后恰逢世界糖价暴跌，国家财政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于是他采取了很多极端措施，比如动用国家财政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横贯古巴全境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就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的，至今仍然是唯一的一条连接古巴东西两端的公路。他还主持修建了古巴议会大厦，整体设计完全模仿美国国会山，两者看起来简直一模一样。

不过，马查多骨子里是个自由市场的拥趸，他开放了古巴的旅游业，利用外资建造了一批高档酒店和度假村，打算把古巴变成美国富人的度假胜地。当年建造的古巴国宾馆至今仍然是古巴最豪华的高级饭店，各国元首和影视明星们都会选择住在这里。距此不远的地方还建了一座五星级的希尔顿酒店，但古巴革命胜利后被政府收回，改名为自由哈瓦那酒店，价

格比国宾馆稍微便宜一些，是普通外国游客的首选。如今这两幢建筑都变成了哈瓦那的地标，外国游客需要的很多服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我刚到哈瓦那的第一天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只能跑到自由哈瓦那酒店附设的24小时餐厅里吃了来古巴后的第一顿饭，记得我要了一份汉堡薯条外加一杯果汁，要价10.75红比。后来我才知道，同样的东西在古巴人自己开的饭馆只需要1/3的价格，只是就餐环境差点而已。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必然招致另一部分人的不满。对于古巴这样人口成分复杂、发展极不均衡的国家来说，这种矛盾就更为突出。马查多的新政让很多没有尝到甜头的古巴人心怀不满，一时间罢工抗议之声此起彼伏。为了应付来自各方的压力，马查多采取了铁腕统治，一边修改宪法限制反对派的权利，一边采用各种手段限制新闻自由，甚至还指示手下人暗杀了几位左派异见人士。一位古巴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给马查多起了个外号，称他为“热带的墨索里尼”。其实像马查多这样的总统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都能找到，几乎所有刚当选的总统都野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但很快就都变成了独裁者，这几乎成了南美的常态。

最终把马查多赶下台的是一位军人，名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他同样是拉丁美洲国家最常见的一类政治家：出身低微但野心勃勃，因打仗勇敢当上军官，再因善耍手腕而掌握兵权，又因能说会道而取得民心，最终看准时机发动政变，一举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

巴蒂斯塔是古巴第一位混血儿总统，据他自己说他身上流着非洲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血，从这点来看古巴比美国先进了70年。1933年时的巴蒂斯塔还只是个没什么

名气的陆军中层士官，但他非常聪明，先用革命为诱饵骗取了一群教授和大学生的信任，让他们加入自己的叛军队伍，以此来赢得古巴民众的信任和支 持。革命胜利后他立刻把这些知识分子一脚踢开，跑去和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资本家和美国政客拉关系，顺利地当上了古巴军队的最高统帅。

古巴从 1933 至 1940 年间一共换了 7 任总统，但手握军权的巴蒂斯塔才是古巴真正的最高领导人。1940 年他眼看时机成熟，这才亲自出来参加竞选，毫无争议地当选为古巴的新一任总统。上任后他立即召开制宪会议修改宪法，赋予工人 8 小时工作制的权利，规定每年必须有一个月带薪假期，并增加了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制度。新宪法还扩大了选民的范围，贫穷的黑人和广大妇女终于有了投票权。因为这部新宪法，以及其他一些明显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措施，让巴蒂斯塔得到了古巴民众的普遍支持，他的个人威望和权力都达到了顶峰。

与此同时，巴蒂斯塔却私下里和美国黑手党拉上了关系。最早发现古巴潜力的是臭名昭著的艾尔·卡彭（Al Capone），他为了躲避美国的禁酒令来古巴发展，很快就发现古巴是个赚黑钱的好地方。这个岛和美国距离近，法律形同虚设，官员很容易被贿赂，也是偷税漏税的天堂。在他的带领下，大批黑手党进入古巴，那段时间古巴成了嗜酒美国人的好去处。巴蒂斯塔则更进一步，默许黑手党在古巴开始赌场和妓院，甚至半公开地贩毒，把哈瓦那变成了一个加勒比海上的拉斯维加斯、黄赌毒俱全的美国富翁的天堂。今天的哈瓦那中心区还能依稀看到当年灯红酒绿的样子，只不过那些富丽堂皇的夜总会和赌场如今却变成了古巴工人阶级的公寓，美国富人们下榻的高档酒店被分隔成很多小房间，每间住着一户人家。原本宽敞明亮的交际舞厅则被改装成了汽车修理厂房，

仓皇出逃的富人们没有带走的豪华汽车在这里不断地延续着生命。

美国黑手党的介入虽然加重了贪污腐败，加大了贫富差距，但毕竟吸引了大批美国人前来消费，普通古巴人间接地从中收益，这就是为什么独裁的巴蒂斯塔在第一届任期内受到了古巴老百姓的普遍欢迎的原因。但是巴蒂斯塔的所作所为遭到了两类人的强烈抵制：一类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反对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希望建立一个全民分享财富的共产主义社会；另一类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厌恶美国对古巴的颐指气使，甚至讨厌那些财大气粗的美国游客。正是在这两类人的反对下，巴蒂斯塔亲手挑选的接班人没能顺利地当选下一届古巴总统。他一看情况不对，立刻逃往美国，在迈阿密躲了几年。多亏美国黑手党投桃报李，暗中出钱出人帮助他发动了军事政变，这才重新夺回了总统宝座。

此后的巴蒂斯塔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修改法律，取消了总统选举，用各种卑劣手段清除政府内的异己分子，彻底变成了一个独裁者。这次政变让很多反对他的人丢掉了幻想，纷纷效仿前辈拿起步枪，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自然就是后来叱咤风云几十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他是第二代西班牙移民，父亲是一位来自西班牙北方的农民，靠在古巴种甘蔗发了财，因此卡斯特罗和他的几个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后来的革命打下了基础。

年轻时的卡斯特罗是一名狂热的爱国青年，一心要实现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未竟的事业。1953 年 7 月 26 日，26 岁的卡斯特罗率领一群游击队员攻打蒙达卡兵营，试图从军火库中获取武器。但就像马蒂一样，这群热血青年对于战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准备不足，这次行动以惨败告终。唯

一不同的是卡斯特罗没有被当场杀死，而是逃进了兵营北边的马埃斯特拉山（Sierra Maestra）里。几天后一名乡村卫队的黑人中尉抓住了他，这名黑人军官同情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没有把他直接送到兵营，而是将他送到了警察局。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行为改变了古巴历史，因为兵营里的士兵肯定立即就把卡斯特罗处决了，但警察局却不得不走法律程序，这就给卡斯特罗一个求生的机会。卡斯特罗不但抓住这个机会活了下来，而且还利用这次机会让自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

原来，卡斯特罗口才极佳，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知识也不缺，因此他要求自己为自己辩护，并利用这次机会在法庭上公开阐述了自己的施政方针，包括还政于民、分田到户、打击腐败和保障就业等很多改革措施，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他甚至想办法把自己的演讲记录整理成书在古巴出版，在书的最后一页他写道：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这份辞藻华丽的辩护书完全是为历史准备的，法官没有被它打动，判了卡斯特罗 15 年监禁。两年后巴蒂斯塔实行大赦，居然把卡斯特罗放出来了！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卡斯特罗之所以没有像马蒂那样早死，和古巴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有着很大的关系。

出狱后卡斯特罗立即动身前往墨西哥，准备在那里养精蓄锐，招兵买马，伺机反攻古巴。正是在墨西哥逗留期间，卡斯特罗认识了一位对他本人乃至古巴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阿根廷人，他的名字叫作切·格瓦拉（Che Guevara）。

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大学学的是医学，但他从小就不安分，22 岁那年决定中断学业，和好友骑着一辆老式摩托车纵贯了整个美洲大陆。一个从小娇生惯养但却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热血青年这么早出来看世界，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丑陋



2015年7月20日，参加美古两国教育交换项目的美国人士在哈瓦那观光

的地方，格瓦拉也不例外。这趟旅行还没结束，格瓦拉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狂热的革命者，而且他最想革的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命，因为他把南美洲大陆上发生的一切罪恶都归咎到了富裕而又强大的美国头上。

后来有人将他俩的这段经历拍成了一部电影，取名《摩托日记》，电影中的格瓦拉由著名的墨西哥帅哥演员盖尔·加西亚·伯纳尔（Gael Garcia Bernal）扮演。但看过格瓦拉照片的人都会同意，真人比演员要好看无数倍，这种情况恐怕是电影史上的第一次。

换句话说，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那次墨西哥相会可以理解成是一位百年不遇的演讲奇才遇见了一位千年不遇的美男子。前者有人脉，有胆识，有武装；后者有魅力，有知识，有视野。

最终两人强强联手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古巴。

古巴革命

1956年12月2日，一艘载有82人的摩托艇“格拉玛号”（Granma）在远离哈瓦那的古巴东海岸登陆，船上除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外，还有卡斯特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这群革命者几乎照搬了马蒂当年的做法，但因为缺乏作战经验，刚上岸即遭到伏击，只有十几个人活了下来，躲进了马埃斯特拉山区的密林之中。在此后的两年里巴蒂斯塔多次派正规军前往镇压，但始终奈何不了他们。最终游击队逼近哈瓦那，巴蒂斯塔在1958年的最后一天举家出逃，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卡斯特的成功并不能完全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来解释，虽然他得到了很多古巴乡村民众的支持，但因为游击队中所有的骨干成员全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而他要推翻的巴蒂斯塔则是个出身贫寒的混血儿，所以很多黑人民众心存芥蒂，并没有公开支持卡斯特罗。

卡斯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知人善任。他重用了两位优秀的指挥官，在后来的战斗中被证明价值连城。其中一位是格瓦拉，他不但极富魅力，而且精通医术，再加上他特别能吃苦，打仗时总是身先士卒，因此深得士兵的爱戴。另一位名叫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也是一位智勇双全的猛将。作为卡斯特的左膀右臂，革命胜利后两人都当上了高官，但却都没

能善终。格瓦拉死于玻利维亚的游击战，西恩富戈斯则死于一次飞机事故。今天的哈瓦那解放广场上有两座巨型浮雕，刻画的正是这两位古巴革命的烈士。

卡斯特罗最终获胜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态度。他虽然反美，但却深知美国的实力不容小觑。于是他邀请了美国著名的左派报纸《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和他一起打游击，利用这位记者手中的笔把游击队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美国政府一直搞不清游击队到底想干什么，甚至连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都被他骗了，认为卡斯特罗是自己人。事实上，巴蒂斯塔之所以在局势尚未明了的情况下就仓皇出逃，原因就是美国决定不再支持他了。

著名的古巴历史研究者、英国记者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认为，巴蒂斯塔虽然确实是一个独裁者，但他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是为了对付城市恐怖主义和游击战争的，人民最终倒向卡斯特罗的重要原因在于后者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如果巴蒂斯塔的军队能再坚持几年，甚至如果他不是如此一败涂地的话，古巴公众的看法就会倾向于他了。换句话说，他认为人们通常会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古巴也不例外。

古巴革命的胜利受到了来自全世界左派阵营的欢迎，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马里奥·略萨、保罗·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在内的一大批左派作家要么撰文支持，要么专程来访。美国也有一大批左派作家对这个邻国发生的一切表示欢迎，一批古巴支持者于1960年在纽约成立了“古巴公平竞争委员会”（Fair Play for Cuba Committee），美国著名作家威廉·威廉姆斯、艾伦·金斯堡、诺曼·梅勒和劳伦斯·弗林盖提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美国政府一开始是支持卡斯特罗



1962年，一艘美军驱逐舰迫使一艘载有导弹的苏联货船驶出古巴海域

的。也许是受了中情局的误导，美国人认为卡斯特罗的上台将有助于加速拉丁美洲的民主进程，没想到卡斯特罗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土地改革，规定只有古巴人才能拥有古巴的土地，于是所有的美国农场主不得不放弃了他们在古巴的甘蔗园，所得到的经济补偿却是微不足道的。不过，这个决定与其说是源于意识形态之争，不如说是古巴民族主义对抗美帝国主义的结果。很多资料表明，卡斯特罗在革命胜利的初期并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是在思想倾向上偏左而已。他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最想做的是把古巴从美国人的掌控中夺回来，建立一个古巴人自己的古巴。

但是，这个政策损害了美国商人的利益，美国政府当然不干了，对待卡斯特罗的态度立即来了个180°大转弯。1960年4月14日，大约1400名古巴流亡者在中情局的暗中帮助下在古巴南部的猪湾登陆，试图用武力推翻卡斯特罗的政权。结果这批乌合之众在几天内就被卡斯特罗的军队彻底消灭了，美国政府成了国际社会的笑柄。

很多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决定推翻古巴政权的想法一开始也不是因为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而是纯粹因为经济原因，但“猪湾事件”使得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卡斯特罗丢掉了对美国政府仅存的一点幻想，开始设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他深知美国的实力比古巴强太多了，如果美国政府真心要用武力颠覆古巴政权，他绝对无力抵抗，于是他别无选择地倒向了苏联，希望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能够帮助他保住革命成果。这个想法与格瓦拉倒是不谋而合，后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从来没有动摇过。

但是，苏联却另有打算。赫鲁晓夫很高兴在西半球找到了一位盟友，决心利用古巴这枚棋子和美国对抗。当时卡斯特罗希望和苏联签订一个《苏古军事条约》，他认为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约就足以让美国人不敢轻举妄动了，但是苏联方面执意要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卡斯特罗虽然勉强答应了，但他内心清楚，这样做等于把古巴变成了苏联的军事基地，或者更准确地说，

古巴从美国的殖民地变成了苏联的殖民地。但他那时已经没有选择了，只能照办。

没想到导弹基地刚一开工，美国的高空侦察机便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它。美国政府立刻提出强烈抗议，并决定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很多人都以为美苏两国马上就要互扔原子弹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好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没有彻底失去理智，最终双方和解，苏联撤出了导弹。问题是，就和当初苏联决定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一样，赫鲁晓夫自始至终都没有和卡斯特罗商量，这让卡斯特罗感到羞辱，但他根本不敢发作，因为古巴的经济命脉也已经完全掌握在了苏联人手里。

在夹缝中生存

古巴是个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哈瓦那的天主教墓地建在维达多区，我专程跑去参观，惊讶地发现这块墓地的面积大得惊人，逛了半天都没有逛完。后来查了资料才得知，这座中北美洲最大的陵墓建于19世纪末期，总的规划面积高达5平方公里，保证在未来100年里新增加的棺材都能装得下。

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哈瓦那的光辉历史。事实上，哈瓦那曾经是南美洲最富有的城市，卡斯特罗继承的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国家，他并不需要在废墟上重建古巴。资料显示，上世纪50年代古巴的人均GDP高居拉丁美洲第二位，仅次于依靠石油而发家的委内瑞拉，和当时的意大利相当。古巴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排在全世界第8位，农民的平均年收入高于不少欧洲国家。古巴的城市化、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和平均寿命等硬指标早在当年便已高居世界前列，是公认的拉丁美洲五强之一。

旧古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不

均衡，贫富差距过大。卡斯特罗当然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么做的结果必然导致富人的不满，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律师和工程师等专业人才，这些人选择了出走。据统计，古巴革命胜利之后的4年时间里，有25万名医生、律师、工程师和管理人员逃离古巴，他们大都去了美国。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两国之间的航班被迫停止，那些想要离开古巴的人只能坐船偷渡，许多人被淹死。面对这场人道危机，卡斯特罗却宣布了一项新政策：任何人如果想要离开古巴都可以不受约束地这么做。这项新政策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潮，更多的古巴人被淹死，最终还是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了《美国—古巴调节案》，由美国政府出钱增开了3000多次免费航班，将26万古巴移民送至美国并出钱安置。

此后卡斯特罗又数次故技重施，把非法移民当作和美国政府斗争的武器。他甚至在1980年时把大批古巴囚犯送上了前往美国的偷渡船，搞得美国狼狈不堪，并间接导致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在竞选时败给了里根。这么做的结果是：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万的古巴人移民去了美国，占古巴总人口的1/10。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其中有很多人都是高级技术人才，这些人留在古巴的个人财产被充公。哈瓦那中心区和维达多区的大部分公寓和别墅都是在那个时期被老百姓抢占的。

卡斯特罗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和美国较劲，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清除异己，因为富裕的人当中反对他的比例很高，这么做相当于把反对派都清理干净了。但是，这个做法也有一个明显的坏处。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革命胜利后不久来古巴考察，回去后写了一本书盛赞卡斯特罗，但他在书的结尾处警告说，这场革命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留住建设国家所需的人

才。他的这个判断事后被证明非常正确，人才的匮乏是古巴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美国政府的单方面经济制裁只能排在第二位。

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任命格拉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两年后又把工业部长的重担放在了他的肩上。格拉本人不是一个经济专家，习惯于从政治的角度想问题。他认为工业化是发展国家经济的基础，经济多样化是古巴摆脱殖民统治的必要条件，但古巴根本不具备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人才也极度匮乏，卡斯特罗很快就否决了格拉的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决定在苏联的支持下集中发展制糖业。为了留住古巴这个小兄弟，苏联也慷慨地和卡斯特罗签署了协议，答应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金额购买古巴生产的糖，条件是其中一部分款项用苏联产品支付。

就这样，古巴重新回到了殖民时代的单一经济模式。整个70年代古巴外汇收入的3/4来自蔗糖出口，高峰时期甘蔗种植面积达到国内可耕地面积的45%。因为古巴蔗糖在苏联卖出了高价，1970至1988年间古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是4.1%，整个拉丁美洲的平均值还不足1.2%。如果仅从这几个数字上看，古巴革命应该算是成功了，但实际上古巴的这种经济模式严重依赖苏联，后者成了古巴真正意义上的宗主国。为了独立，古巴的革命者绕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原点。

不用说，格拉对这一状况是很不满意的。眼看自己的革命理想就要付诸东流，他决定离开古巴，去其他国家继续搞革命。他先是去了非洲的刚果，帮助刚果游击队闹革命，但因为言语不通、水土不服等原因，革命进行得很不成功。他很快吸取了教训，回到自己熟悉的南美，去玻利维亚打游击，却因村民的出卖而被捕，很快就被玻利维亚政府军处决了。英年早逝让格拉成为全世界革命者共同的

偶像，他的那张凝望远方的照片出现在无数人的T恤衫上。不过，据我观察，格瓦拉头像在哈瓦那大街上出现的频率还不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多，原因在于阿根廷首都到处都是卖纪念品的小贩。换句话说，格瓦拉形象的存在感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关，和老百姓对格瓦拉的热爱程度关系不大。

为了纪念这位开国元老，古巴政府在位于古巴岛正中间的圣塔克拉拉市（Santa Clara）为格瓦拉建造了一座陵墓，内设一座小型博物馆，展出了不少他当年用过的东西。我专程去那里参观了一下，游客确实不少，但大都是外国人。一位来自西班牙的游客对我说，他并不认同格瓦拉的做法，只是觉得这个人坚持理想的精神很迷人。

美国政府当然不认同这个判断。事实上，当年抓捕格瓦拉的行动正是在一位中情局特工的指挥下实施的，枪毙格瓦拉的命令也是美国人下的，他们把格瓦拉视为恐怖分子，是全人类的公敌。当然了，美国人最想干掉的人还得说是卡斯特罗，尤其是美国总统肯尼迪，他和卡斯特罗斗了很多次，对卡斯特罗产生了“个人仇恨”。中情局在肯尼迪的授意下启动了一项“猫鼬行动”，试图在古巴制造混乱，继而推翻政府。大部分行动都是由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实施的，内容包括在古巴繁华街道上的百货公司安放炸弹，以及破坏古巴制糖厂等等。中情局还试图暗杀卡斯特罗，尝试过几百种方式，结果都被他逃过去了。走投无路的中情局甚至尝试过给卡斯特罗服用致幻剂LSD，试图让他在公开场合出丑，结果仍然没有成功。最后反倒是肯尼迪自己被“古巴公平竞争委员会”的一位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的成员在拉达斯枪杀了。

如果说这些做法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那么1976年那次针对古巴民航

的袭击简直和恐怖分子没有任何区别了，就连最仇恨卡斯特罗的人恐怕也很难认同。那年的10月6日，载有古巴击剑队的一架古巴民航班机从委内瑞拉起飞返回古巴，一枚安放在厕所内的炸弹在空中爆炸，所有73名乘客全部被炸死。这是“9·11”事件之前北美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很多证据显示这是在中情局的暗中帮助下由美国的古巴流亡者负责实施的，直接负责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古巴流亡者组织首领奥兰多·波什（Orlando Bosch）。波什后来被当时担任中情局局长的老布什保了下来，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就这样，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在苏联和美国这两座大山的夹缝中有惊无险地过了30年，直到1990年苏联这座大山垮掉为止。戈尔巴乔夫单方面中断了苏古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古巴几乎在一夜间就回到了解放前。

统计显示，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对古巴的粮食供应达到了其所需总额的63%，机械设备供应达到了80%。古巴所有出口商品当中有63%的蔗糖、95%的柑橘和73%的镍是被苏联买走的，而且价格相当优惠。比如，1990年古巴出口到苏联的蔗糖是按照每吨602美元的优惠价格被苏联买走的，当年的国际市场糖价为每吨277美元。到1992年时国际市场糖价跌到了每吨200美元，古巴不得不以此价格出售本国农产品，这使得古巴的蔗糖出口收入从1990年的43亿美元跌到1992年的12亿美元。如此大幅度的下跌对于古巴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古巴国内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机械部件、化肥农药和动物饲料等几乎都是用蔗糖换回来的。

根据古巴官方公布的数据，古巴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90至1993的这4年里分别下降了2.9%、10%、11.6%和14.9%，进口总量下降了70%。因为

缺油，古巴的街道上重新出现了四轮马车，以及中国政府赠送的100多万辆自行车，取代了原来的汽车和大卡车。古巴农村则重新请出了耕牛，代替原来的3万辆苏制拖拉机。

有个小插曲很有意思。苏东剧变时苏联已经向古巴提供了最后一批米格29战斗机，其中的6架已经运到了古巴。几年后俄罗斯政府询问古巴政府是否愿意再买几架，劳尔·卡斯特罗问了问价格，得到的回答是2000万美元，劳尔立即答复说：“要不我们把已经购买的6架飞机再卖回给你们吧。”

那段时间有不少外国旁观者预言古巴将会像东欧的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改变颜色，但他们不只误读了古巴领导人的决心，也误读了古巴人民的态度。为了应对危机，卡斯特罗宣布古巴进入了“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除了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被保留下来，古巴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时中断汽油供应，在部分地区暂停水电供应，恢复了粮食和衣物的配给制度，依赖外国进口原材料的工厂大量关闭，成千上万名工人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古巴政府决定不再把蔗糖作为创汇的主要产品，而是转向了旅游业，并在这一领域率先进行了改革，聘请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管理人员对古巴的旅游行业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力求符合西方消费者的口味。为了防止这股资本主义风潮影响到其他领域，古巴将国际和国内的旅游业严格区分开，外国人如果不是特意去找的话，完全可以和普通古巴人有任何接触。

这些应急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再加上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和中国等友好国家在石油、汽车和农产品等方面对古巴的慷慨援助，把古巴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今天的古巴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恢复了元气，但起码已经走上了正轨，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智臻成就 辉映人生

2015款迈腾 智汇领先科技，一路尊享臻迹

众多科技配置，带您逐步领略豪华真谛。从脚部感应开启、自适应巡航再到泊车辅助，让旅途摆脱平庸束缚，创造属于您的自由驰骋；又有防眩目后视镜与车道保持功能，让您不论是面对后车过强灯光，又或者坚持脚下的路时，皆能自信彰显，从容向前。不仅如此，真正的豪华更是不争一时锋芒的气度，当对向车辆接近，MDFS动态灯光将自动调暗大灯，仿佛晨光无需强势，却足以指引未来；另有变道辅助，疲劳提醒等功能，关注您的每一步，守护安心畅行。

MAGOTAN | 迈腾



登捷智·汇100
领略科技升华



Das Auto.



切·格瓦拉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时利用空闲学习打棒球（摄于1958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左）和切·格瓦拉及他的女儿在一起（摄于1963年）

切·格瓦拉，热血与冷血

古巴革命成功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切·格瓦拉看上去更孤独了；于是，他去为自己的人生创造出一段传奇。迄今，传奇仍在。

记者 徐菁菁

告别古巴

1966年1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为38岁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举办了一场告别宴会。宴会上的切和那张世界闻名的肖像照上的英武样貌完全不同。为了以秘密身份赴玻利维亚领导武装游击队，切在嘴里含着一块假体，这样显得胖一些。古巴情报部门的面容专家一根根连根拔掉他的头发，使发际线后移，让他看上去有50多岁。几天前，切穿着西服，戴着帽子出现。卡斯特罗把他作为一个外国朋友介绍给几名古巴部长，竟没人认出他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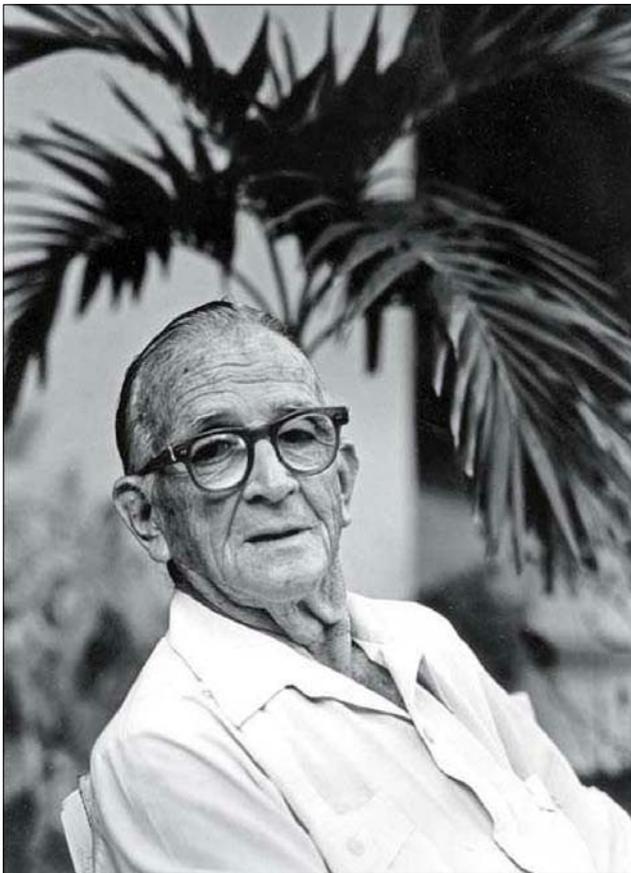
告别晚宴上，卡斯特罗几乎在不断地说话，

回忆他们过去并肩战斗过的时光。最后，切跳了起来，他意识到已近凌晨，是时候出发去机场了。卡斯特罗短暂地拥抱了他，然后两个人都向后站了站，把手臂搭在对方的肩膀上。这个姿势维持了很长时间。终于，切坐进汽车，对司机说：“见鬼的，开车！”车开走了，卡斯特罗从人群里走开，独自在一边垂头坐了很久。人们想知道他是否在哭，但没人敢靠近他。黎明时分，他们听到卡斯特罗叫了一声，他的手指向天空，天上飞过的是切乘坐的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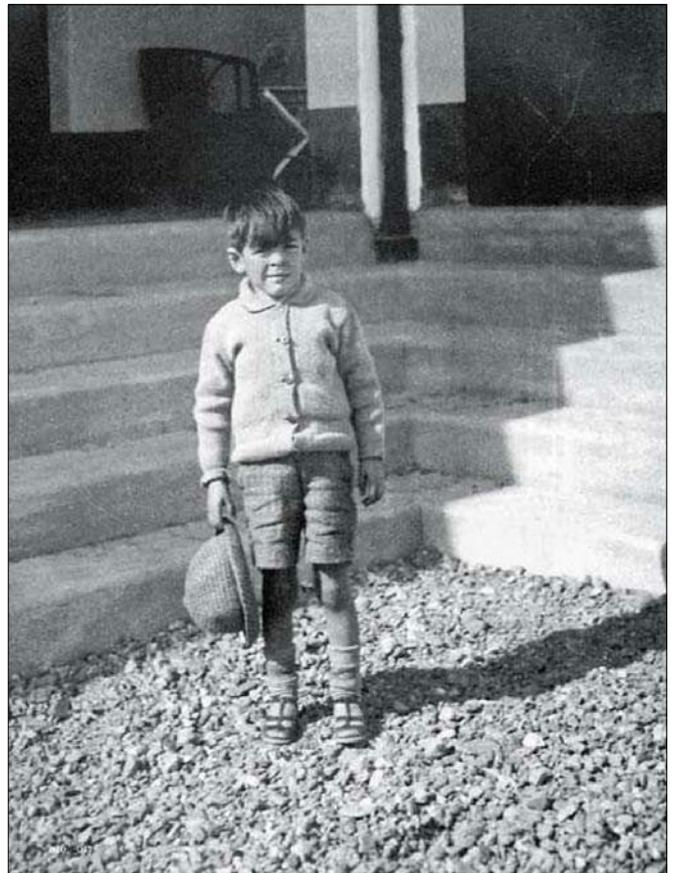
美洲国家组织特派员、乌拉圭商人拉蒙·梅纳·冈萨雷斯——切怀揣着这样的身份证件最后一次离开古巴。事实上，在切的内心里，他早已



切·格瓦拉和他的第二任妻子阿莱伊达及孩子们在哈瓦那家中（摄于1966年）



切·格瓦拉的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摄于1983年）



切·格瓦拉6岁时的留影（摄于1934年）

经完成告别。几天前，“拉蒙”叔叔在切的家里和孩子们一起吃了顿饭。“拉蒙”坐在桌子的顶头，那正是爸爸的位置。他对孩子们说：他最近见过他们的父亲，转达他对孩子们的爱。在他离开后，7岁的女儿问妈妈：“那个老头儿爱上我了吗？”

早在1964年夏天，切就决定回到革命战场上去。那个时候，非洲大陆上，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切把眼光投向了刚果。在他看来，那里幅员辽阔，为游击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非洲战争的性质是反对殖民政权的，因此广获人民的支持；而且苏联人并不那么关心非洲，不会像在拉美那样限制古巴游击队的手脚。

在哈瓦那，国家工业部部长、国家银行行长、司令官切·格瓦拉有计划地逐步淡出公众的视线。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65年3月15日的哈瓦那机场，那时，他刚从非洲访问归来。切只跟个别他信任的人道了别。他从办公室的书房里挑了一些书，写了题词，给他最亲近的几个朋友。他把书留在书架上，没有告诉任何人，等着他们自己发现这些告别礼物。

他做好了不再归来的准备。他给卡斯特罗的一封信，既是告别、遗嘱，也是为古巴准备的免责声明。他写道：“我正式辞去我在党内的领导职务，我的部长职务，我的司令职位，我放弃古巴公民的身份。我和古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了。”他回想过去的人生：“相信我为巩固革命胜利所做的工作足够忠诚、足够尽心尽力。”他写下了对古巴的情感：“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悲喜交加。我把一个建设者最诚挚的期望留在这里，我把我最亲爱的人留在这里，我把我的人民留在这里。我心底里的一部分为此而伤痛。……如果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在另一块天空下度过的，我最后想到的将是我的人民……”

切给父母留下了一封告别信，给

妻子阿莱伊达一卷录音带，里面是他朗诵的他最喜欢的情诗。一天，他和阿莱伊达、保姆索菲娅一起吃午饭，切问索菲娅那些在革命中牺牲的古巴人的遗孀怎么生活。索菲娅告诉他，大多数人都再婚了。切于是转向阿莱伊达，指着他的咖啡杯说：“如果是那样，你给我上的这杯咖啡，希望能上给另外一个人。”他还给5个孩子留下一封信，要阿莱伊达在他死后读给孩子们听：“你们要记住，革命是最重要的，而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单个的人来说，无足轻重。”

1965年4月24日凌晨，切和13个古巴游击队员踏上了刚果的土地。他知道这将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在两个月前的访非途中，切和革命者们初次见面。古巴大使馆把革命领袖们同时召集过来，50多人代表10多个国家的运动组织，每个组织内部又有两种或以上的声音。他们的共识仅限于要求古巴给予经济支持，让非洲战士在古巴培训。切指出，真正的游击战士是在战场上而不是军事学院里铸就的，应该在刚果东部建立一个据点。然而在场的人反应冷淡。切意识到，非洲还没有找到“真正的革命方向”。

在开罗，总统纳赛尔曾警告切，亲自带领古巴远征军不会有好结果。尽管如此，切并没能充分预估他将面临的障碍。到达刚果后，他仔细观察当地的指挥官，当提到让古巴人领导决策和参与斗争时，他说“我看不出他们中有人认可这个提议”。切到起义军的诊所帮忙，士兵中感染性病的病例数量令他吃惊，只有少数几个伤员是从前线送来的，而且都是因为意外受伤。“几乎没人对枪炮有哪怕一点概念。他们在玩枪的时候射伤自己，或者因为粗心大意射伤自己。”他甚至无法和士兵交流——大部分人只会说部落语言或者斯瓦希里语。起义军还普遍相信巫术，认为一种叫“达瓦”的药剂能让人刀枪不入。

阵地上，只有少数人看上去装备良好，许多人消极怠工，指挥官们常常喝得烂醉如泥。和切的游击战经验完全不同，武装队伍占据固定的位置，不训练、不侦察、不收集情报，而且逼迫当地农民给他们提供食物，使得农民通常都很害怕起义军。在行军中，士兵们除了自己的武器、弹药和毯子，其他什么都不带。切要求他们增加额外负重，比如食物，最初他们拒绝，说“我不是卡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改口揶揄：“我们不是古巴人。”6月，在进攻本德拉堡军事要塞和水电厂的战争中，战斗开始前就有三分之一的人逃跑了。

切和他的古巴士兵们饱受痢疾和热带传染病的困扰。痢疾药的副作用使人衰弱、没精神、没胃口。他埋怨药物激发了古巴人“最初的悲观情绪”，他自己也受了影响。有一次，他发烧到不省人事。还有一次，他在24个小时里跑了30趟厕所，以至他自言：“直到我跑得无力再发扬我的科学精神。”

8月时，切对刚果革命的前景已经失望。他向古巴士兵坦陈：起义军的领袖没有到前线来，自己不投入战斗，士兵们没有纪律意识和牺牲精神。“让这样的部队赢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更糟的是，后方，革命的领导人正忙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前线，卢旺达的图西族人和刚果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最低点。刚果起义军的重要合作伙伴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被推翻了。11月，坦桑尼亚宣布不再向刚果全国解放组织提供援助。1965年11月22日，切绝望地离开刚果。3天后，刚果军队司令约瑟夫·蒙博托推翻了政府。独裁统治在刚果持续了30年。革命真的结束了。切·格瓦拉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在卡斯特罗目送的那架飞机上，切怀着怎样的心情？刚果战败之后，他谢绝了卡斯特罗让他重回古巴的邀请，他需要在熟悉的拉美土地上成功

实践自己的“游击中心论”。长久以来，他的目标并未动摇：带动整个拉美的游击运动，将革命的旗帜安插在整個美洲大陆。为什么选择玻利维亚？切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

1967年10月8日晚上，阿莱伊达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她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强烈感觉：她的丈夫正处在危急之中。第二天下午，卡斯特罗派来的人到她家时，发现她已经守候在门口了。

过去10个月，切跨越国界的革命理想主义在民族和主权国家的现实面前遭遇重创。1966年12月，为了争取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支持，切秘密会见玻共第一书记蒙赫。双方在政治、军事领导权问题上互不相让。蒙赫预言：“当人民知道这支游击队是由一个外国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就会翻脸，不再支持你们。你们尽可以英雄地死去，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成功。”

一语成讖。切的部队途经的村庄，几乎所有人都跑光了。农民到处散布游击队的行踪，各个村的村长总是提前向政府军报告消息。在这场斗争中，切忽略了动员民众最基本的前提——政府的“合法性”。玻利维亚政府发起“市民行动”，修路、进行反游击战宣传、给农民送土地、在乡村地区分发学校用品，指责切的队伍是“卡斯特罗共产主义”特工，号召全国公民以爱国热情抗击外来入侵者。事实上，武装革命在拉美范围内正普遍落入低潮。一方面，各国的武装革命领袖陆续被捕或牺牲；另一方面，秘鲁政府和玻利维亚政府已经实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委内瑞拉的执政党也已吸收农民参加政府机构。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的文件显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拉美农村游击队总人数不超过1000人。这些国家的情况都不能跟20世纪50年代的古巴相提并论。

在最后的岁月里，切和他的部队几乎每天都在转移，寻找或者躲避政

府军。游击队员们不断被捕或者牺牲。他失去了和古巴联络的渠道，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他们总是长途跋涉，忍受酷热、寒风、大雨，到处寻找食物和水。切通过一台收音机听哈瓦那电台，那是他了解外面的唯一途径。但不久，这台收音机也在转移中丢失了。6月底，他开始犯哮喘，但没有药物。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只有尽可能地骑骡子或马。一次，腹泻和呕吐让他失去了意识，队员们用担架抬了他一天，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全身都是粪便。

10月7日，切写下了自己在玻利维亚的最后一篇日记。这天早上，他难得享受了一阵“轻松悠闲”的“田园生活”。下午，他开始担心农户会泄露游击队的行踪。他研究了政府军发布的关于游击队踪迹的战报，怀疑它是“为了转移视线”。切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阿莱伊达从睡梦中惊醒时，被捆绑的切正躺在拉伊格村校舍的地板上，农民保长诺加斯的出卖让队伍全军覆没。

在处决切之前，中情局特工罗德里格斯问切有什么话要带给家人。切说：“告诉卡斯特罗他很快就会看到美洲革命的胜利。……告诉我妻子，要改嫁，要过得幸福。”

切的起点

哈瓦那往东南277公里，第六大城市圣克拉拉正位于古巴这个狭长岛屿的中端腹地，是比亚克拉拉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今天圣克拉拉的标志是城西的革命广场。广场边是1988年12月圣克拉拉市在解放30周年前夕落成的切·格瓦拉纪念馆，一尊高6.8米，重20吨的切·格瓦拉铜像屹立在那儿。他眺望古巴以南的拉美地区，身穿橄榄绿军装，右手握着一支步枪，受伤的左臂用纱布吊在脖子上。铜像边有两个钢筋混



土筑成的花圃，较高的那个花圃壁上刻着切离开古巴去非洲前写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

1967年10月，切的遗体被放在玻利维亚巴耶格兰德镇一家医院的洗衣房里。士兵、当地人、摄影师和记者排着队来参观，医院里的修女、护士和镇上的妇女觉得切的样子很像基督，偷偷剪下他的头发保留起来。那以后，切就失踪了。

1995年11月，退休的玻利维亚



切·格瓦拉（左一）带领游击队员在刚果的一处丛林里宿营（摄于1965年）

将军马里奥·巴加斯·萨里纳斯向美国作家乔恩·李·安德森吐露了秘密，切的尸体埋在巴耶格兰德外的飞机跑道附近。两年后，古巴和阿根廷的刑侦队伍终于在飞机跑道下一个2米深的坑里发现了切的骸骨。1997年10月，在离开古巴30年后，切回到哈瓦那，并最终被安葬在圣克拉拉的纪念馆中。卡斯特罗在他的墓前点上了长明火，陪伴切的是1967年10月前后在玻利维亚牺牲的29名战友的骨灰盒。

萨里纳斯们认为，一个无处寻觅的墓冢能够终结切·格瓦拉的神话。但事实上，正是悲壮的死亡让切从他的时代中解脱出来。1968年，巴黎的学生们高举着那张著名的格瓦拉肖像，口中呼喊着“切！切！切！”的口号走上街头。从那以后，切与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角色分道扬镳，那张带着文气的战士的脸与它背后的反叛、孤独、浪漫与永不妥协被物化成了20世纪全球最著名的文化图腾之一。

在今天的古巴，你很难在街头找到和卡斯特罗的形象有关的东西，但切占据着博物馆、书摊、海报、建筑外墙和纪念品商店。他无处不在，仿佛从未离去。

“切之城”圣克拉拉市的中心是比达尔广场，那儿有一座19世纪独立战争英雄莱昂西奥·比达尔的纪念碑。广场周围环绕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建筑，在自由圣克拉拉饭店的大门上，细心的游客能够发现一些弹痕。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卡斯特罗给切下达了命令——准备进攻哈瓦那。交通和通信枢纽圣克拉拉是哈瓦那的最后屏障。切一共有340名战士可供调遣。12月28日，切的队伍在黎明时分进入圣克拉拉大学。阿莱伊达的朋友洛丽塔·罗塞尔负责迎接他们。初见到游击队员的“脏乱”形象，她和父亲都吃惊极了，而切的年轻和威信更令她惊讶。一名游击队员问洛丽塔城里有多少政府军，她心惊胆战地说大概有5000人，谁料对方点点头：“很好，有我们的头儿在，不成问题。”

圣克拉拉之战成为古巴革命的决定性战役。这是切作为革命军事领袖的加冕。攻下圣克拉拉时，切只有30岁。而4年前，他还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质彬彬的医学博士埃内斯托·格瓦拉，以从事麻风病研究为人生目标。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出生于阿根廷一个上流社会家庭，母亲塞莉娅·德拉·塞尔纳拥有纯粹的西班牙贵族血统，她的祖父是富有的地主，父亲是知名法律教授、医生和外



埃内斯托和母亲一样喜欢诗歌，还自己写诗，在后来的游击战争中，他还常常翻看智利诗人帕勃洛·聂鲁达的作品。

交官。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来自一户没落贵族。小埃内斯托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他出生时，父母正在阿根廷米奥内斯省经营一片200公顷的马黛茶园。依照这样的社会背景，埃内斯托似乎应当顺遂地沿着医学道路一直走下去，但实际上，正是特殊的家庭氛围使得他的人生注定不会循规蹈矩。

切曾多次回忆母亲塞莉娅对他的影响。这位贵族小姐年幼时父母就过世了，7个兄弟姐妹由一位亲戚带大。既无严厉的管教，也没有经济和生活

上的负担，塞莉娅无拘无束地成长为一个先锋女性。22岁时，在家族的强烈反对下，她冒着丧失遗产继承权的危险，怀着3个月的身孕逃到一个姐姐家里，逼迫家族接受她和埃内斯托·林奇的婚姻，并站上法庭争取到了部分遗产。在埃内斯托的童年记忆中，母亲永远是对抗旧秩序的那个人。在他们生活的圈子里，她创造了很多女性的“第一”，开车、穿长裤、抽烟。

塞莉娅热衷于冒险，怀孕6个月的时候，她还在巴拉那河里游泳。有一次她差点被湍急的河水卷走，幸好两名伐木工发现了她，扔给她一条藤蔓。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塞莉娅不会拘束和过分保护自己的孩子。小埃内斯托2岁时患上了严重的慢性哮喘，为了儿子的康复，一家人搬到环绕着农田和乡村的温泉小城阿尔塔格拉西亚，在那儿住了11年。塞莉娅不顾丈夫的反对，鼓励埃内斯托进行户外运动。埃内斯托和当地的一帮孩子玩到一起，骑自行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他不断考验自己的身体极限，踢足球，打乒乓球，学习骑马、

射击，到山峦酒店或者当地河坝里游泳，到山上远足。有时候，儿子会因为呼吸困难倒下，被朋友们带回家，但是塞莉娅从不阻止他再次做同样的事情。

由于哮喘，埃内斯托直到9岁才进入学校。塞莉娅一直承担着儿子早期的教育工作，她热衷阅读，这个趣味也嫁接到了儿子身上。埃内斯托很快占据了父母有数千册藏书的大书房，那里有包括俄国经典作家作品在内的文学书籍，有历史、哲学和心理学著作，甚至还有马克思、克鲁泡特金和列宁

的书。埃内斯托和母亲一样不仅喜欢诗歌，还自己写诗，在后来的游击战争中，他还常常在闲暇时翻看智利诗人帕勃洛·聂鲁达的作品。

埃内斯托从弗洛伊德看到杰克·伦敦，从聂鲁达读到法朗士，他甚至阅读了《资本论》的缩略本，虽然当时“一点都没懂”。17岁时，他对哲学萌发了浓厚的兴趣。他的第一本哲学手写笔记有165页，精心按照字母排序，并按照页码、主题和作者制作了索引。笔记里的词条包括爱情、永生、公正、信念、死亡、上帝、自恋和道德等等，在后来的10年，他一共编写了7本笔记。

10岁时，埃内斯托第一次对政治产生兴趣。为了向西班牙共和国总理内格林致敬，他给家里的小狗取名为内格林那。他还根据战况在地图上用小旗子标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党军队和法西斯军队的位置。这是因为林奇夫妇从来回避时代，相反，他们以强烈的政治热情拥抱正在极速变化的世界。埃内斯托记得，他的家庭“对所有有反对派思想的人开放。我父母的朋友中间有来自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的侨民，其中包括胡安·冈萨雷斯·阿吉拉尔博士。他是我们的邻居，前共和党政府副总理。我和我母亲一起用自己的汽车将他的子女们送到科尔多瓦市上中学。父母亲千方百计支持西班牙共和党救国委员会。胡拉多将军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小时候，我经常津津有味地听他讲内战时期的变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父亲林奇加入亲同盟国的“阿根廷行动党”，他在省内游历，在公开会议上发言，他和同事们还调查了活跃在科尔多瓦的纳粹地下网络。庇隆统治时期，林奇夫妇又加入反对专制的地下战斗组织，当着埃内斯托的面，在自己家里制造炸弹，在游行示威时保护自己不受警察的袭击。埃内斯托曾亲眼目睹，



好莱坞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剧照

母亲塞莉娅英勇地在庇隆将军信徒聚会的广场上讲话，批判他的虚伪承诺。

但是林奇夫妇并没有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加诸到孩子们身上，在这个家里，一切争论都是被允许的。阿莱伊达记得，60年代，塞莉娅到哈瓦那探望儿子一家时，她可以和切连续聊上几个小时。他们为一切问题“争吵”，从拉美政治到对世界名人的看法。“有时听到他们讲话，你会以为世纪末日要到了，其实那只不过是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

埃内斯托15岁时，邻居德洛丽丝·莫亚诺就发现这一家人非常特别，他们的房子到处都是书和杂志，家里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有人饿了就开饭。孩子们可以骑着自行车从街上进

到家里，一直穿过客厅，骑到后院离去。林奇一家异常直率。在他们的客厅里，客人一旦夸大其词、卖弄学问或者装腔作势，就会遭到无情的奚落。而埃内斯托是最具威胁性的一个。在学校，亲纳粹的历史老师歪曲历史，他是课上唯一敢于站起来指出其错误的学生。当右翼学生向支持同盟国的学生发起攻击，亮出刀子时，埃内斯托挥舞着书包，冲向暴徒。

但在阿根廷的政治风云中，年轻的埃内斯托只是一个旁观者。他对政治只是泛泛地关心。他后来说：“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没什么社会见解，也没参加过阿根廷的政治斗争和学生运动。”他对街头政治一直都很怀疑。1943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埃内

斯托的橄榄球教练艾尔伯托·格拉纳问他是否会参加游行，反对新政权的教育和言论政策。埃内斯托回答说，要是有把左轮手枪，他就去。游行起不到效果，学生们会“被警棍打得屁股开花”。

成为切

2004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切在其中被扮成了小说《在路上》的凯鲁亚克，浑身散发着波西米亚式的时尚气质。影片的制片人保罗·韦伯斯特说：“切很自然地融入了50和60年代的到处流浪的生活方式，有披头士引发的那种四处活动和冒险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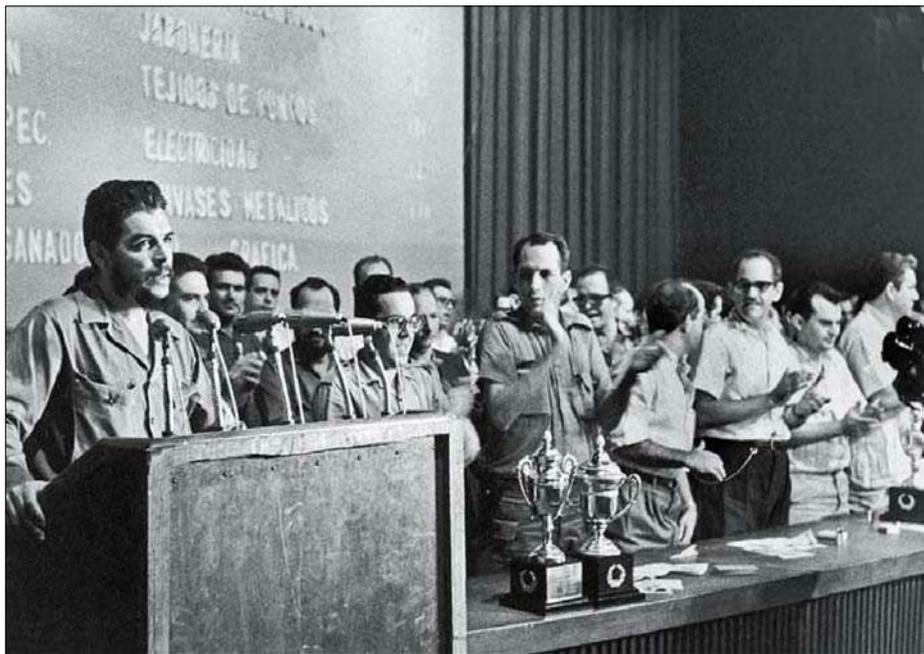
整个拉丁美洲正进入政治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1949年，22岁的埃内斯托·格瓦拉和朋友骑一辆“诺顿500”摩托车开始冒险之旅。他先是走遍了整个阿根廷，继而在不久后的第二次旅行中探索了拉美诸国。旅行中有许多荒唐事。他们在太平洋港口城市瓦尔迪维亚，以“麻风病专家”的身份拜访当地报纸，天真的报纸对他们的旅程大书特书。在小城劳塔罗，埃内斯托邀请已婚女人当着其丈夫的面跳舞，被愤怒的人们追着逃出舞会。

但在年轻人的荒唐之余，埃内斯托形成了自己对拉美世界的认知。这是他第一次跨越舶来的欧洲文化，深入阿根廷和拉美的内陆地区。他目睹拥有土地的大家族成为政治寡头，拥有无限的财富和特权，他们之下是穷困潦倒的印第安人和平民阶层。

在家里，塞莉娅的开放精神为埃内斯托打开了社会的大门。她常开车送别人的孩子上下学，自掏腰包在学校开创了“每日一杯奶”的活动，确保穷人的孩子也能保证营养。她结识各种肤色的人，从不考虑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林奇家，埃内斯托的朋友碰到过做擦鞋匠的游历画家、流浪的厄瓜多尔诗人和大学教授，他们有时会借宿一个月之久。但埃内斯托从未有机会深入接触过拉美沉默的大多数。

而这次冒险正是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完成的。在旅途中，埃内斯托的钱包见底，他只能沿途“行乞”，搭帐篷露宿，或者在别人家的车库、厨房、谷仓里支起帆布床。他们甚至常常光顾警察局，与各色罪犯一起在牢房里吃住。

他作为一名患有哮喘、心脏也不好的年轻女仆看病，忍受她房间里弥漫的臭味，和她家人的刻薄言语，对贫困的无情产生了最直观的感受：“在那里，一些人能想到的最遥远的未来就是明天，在这些人最后的日子，人们看到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人民生活



1961年，时任古巴工业部部长的切·格瓦拉发表演讲，呼吁民众为国家的生产建设做出努力

的悲剧；在那些绝望的眼睛里，总是有顺从的歉意，绝望地乞求着业已消失的慰藉，就像他们的身体很快就会消失在我们周围无穷的困难中一样。这种建立在荒谬的等级意识上的东西还会持续多久，我没办法回答，不过到了管理者少花点时间宣传他们的执政热情的时候了。”

在智利，埃内斯托专程去看了由美国矿业巨头经营的丘基卡马塔铜矿。在路上，在寸草不生的沙漠山区，他碰到一对夫妇。丈夫是曾因罢工入狱的矿工，他的同伴在被捕后都失踪了。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因此找不到工作。夫妇两人将孩子寄养在邻居家里，到深山里条件恶劣但无人过问政治的硫磺矿打工。埃内斯托在日记里用很长篇幅写到这次遭遇：“我们在一支蜡烛的烛光下……这个工人穷困的外表发出一种神秘和悲剧的气息……夫妇俩在沙漠寒冷的夜里冻得身体僵直，互相抱着对方。他们是世界上所有底层人民活生生的写照。他们甚至没有一条破毯子可盖，于是我们给了他们一条，我们用剩下的其他毯子把自己尽可能裹得结结实实。那是我觉得最冷

的时刻之一，不过在这个时刻，我也感受到了对这个陌生人的更多兄弟情谊。”

此后的丘基卡马塔之旅变成了一次政治体验。埃内斯托轻蔑地称铜矿的美国管理者为“金发碧眼，只求效率、傲慢无礼的主子”。他在日记里用一个章节专门描写了铜矿的生产过程和它对智利的重要性。他评论说，丘基卡马塔四周富含矿藏的群山同样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他拍摄了大量照片。“最触目惊心的当属矿区坟场。坟场里只掩埋了少部分死者的尸骨，而绝大多数死于硅肺、矿井塌方以及矿山里的恶劣气候条件的矿工，根本无人收尸。”

在秘鲁的安第斯山区，这个白皮肤的年轻人第一次跻身在印第安人当中。他在拥挤的卡车里旅行，车上的印第安人身上长着虱子，发出臭味。他发现火车上为印第安人准备的脏兮兮的三等车厢，可以与阿根廷的运牛车厢相比。在库斯科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埃内斯托待了几个小时，了解印加古迹和它的文明。他鄙视那些坐在舒服大巴上造访马丘比丘的美国游



1965年，切·格瓦拉和古巴游击队员在刚果靠近利奥波德维尔（今称金沙萨）的丛林中收听无线电广播

客，对美洲本土“被征服的民族”萌生了深切的感情。

在秘鲁首都利马，埃内斯托拜访了麻风病专家雨果·佩斯，对他产生了特殊的共鸣。佩斯是秘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何塞·玛利亚特吉的追随者，相信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农民阶级被剥夺了公民权，他们是潜在的革命力量。埃内斯托正在寻找一种能够指导他的社会思想，佩斯的出现恰逢其时。10年后，切·格瓦拉把他的第一本书《游击战》送给佩斯时在献词中写道：“致雨果·佩斯博士：他可能不知道，是他让我对人生和社会的态度产生了重大转变，我的冒险精神依旧，不过我的目标更加符合美洲的要求了。”

1952年，埃内斯托回到阿根廷完成自己的医学博士学位。他回顾刚刚完成的这次旅行：“‘我’不是我了；至少我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旅行在他身上留下一生的印记。24岁生日时，埃内斯托第一次宣布自己是一个“拉美人”：“……我们坚信……（拉丁）美洲分化成了虚幻、不确定的多个国家，这完全是假象。……为了让我自

己摆脱狭隘的地方主义，我为秘鲁干杯，为团结的美洲干杯。”

但是，当时的埃内斯托还未决心做一名革命战士。1953年，他拿到博士学位，决定和朋友卡利萨到委内瑞拉的皮萨尼诊所从事医学研究工作。7月7日，他穿着弟弟罗伯托赠送的军装，登上了远行的火车。母亲塞莉娅从站台望着自己的儿子，突然意识到他的未来和命运，她抓住罗伯托未婚妻玛蒂尔德的手，绝望地说：“我的儿子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正如母亲冥冥之中预料的那样，美洲的政治前途对埃内斯托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医学本身。朋友告诉他，危地马拉的左派革命正在挑战美国势力，其结果可能决定拉美的未来。这立刻燃起了他的兴趣。埃内斯托把职业前途抛诸脑后，辗转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当他穿越萨尔多瓦的火山，在1953年12月24日抵达危地马拉城时，兜里只剩下3块钱。

在危地马拉，埃内斯托结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30岁的伊尔达·加德亚。她是秘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青年团的流亡领袖，在危地马拉阿本斯

政府任职。通过伊尔达，埃内斯托进入左翼流亡者的圈子。他每天都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流亡者一起探讨和辩论，他读了更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书。在给姑妈的信里，他以慷慨激昂的姿态宣告自己的信仰：“我在斯大林同志的画像前宣誓，在看见这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消失之前，我不会停歇。”署名是：“您钢铁铸就的、肚子空空的、充满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的侄子。”在那儿，埃内斯托还注意到几名古巴流亡者的与众不同——他们并不是手无寸铁的书生，而是武装起义反抗独裁的老手。他们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由于埃内斯托习惯用“切”这个词来打招呼，被古巴人俏皮地起了外号：“说切的阿根廷人。”

在危地马拉，政治局势急速发酵。美国跨国垄断巨头“联合果品公司”掌控着危地马拉的经济命脉，总统阿本斯推动通过了以农业改革为内容的“900号法案”，宣布收回被“联合果品公司”闲置的近40万英亩土地，以近乎无偿的方式再分配给贫困农民。1953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制定了推翻阿本斯政权的绝密计划——“成功行动”。1954年6月16日，埃内斯托26岁生日两天后，美国雇佣军轰炸危地马拉。埃内斯托亲眼看到人们在炮火中发狂地奔跑。军队叛变，阿本斯总统躲进墨西哥大使馆，美国人所扶植的“解放军”首脑阿马斯成为新的总统。

格瓦拉后来回忆，在危地马拉，他成为一名医生的想法随着阿本斯政府一道被颠覆了：“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根本现实……首先必须要有革命，一个人独自努力，不论理想有多纯粹，都是没有价值的。要想有作为，必须开展革命。”几个月后，他在和家人的通信中明确宣布自己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他谈到理由：“在危地马拉陷落后的大屠杀中，我看到每个人都只想着如何救自己的命，（可是）共产



1967年在玻利维亚遇害的切·格瓦拉的遗体最终于1997年10月17日运回古巴，安葬在圣克拉拉市的纪念馆中

党人仍坚持他们的信念，坚持紧密的同志情谊，他们是唯一继续工作的队伍。……我相信他们值得尊重。”

也就是在1954年，追随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收到在墨西哥城聚集的命令。埃内斯托随着他的古巴朋友一起逃亡到墨西哥。很快他和劳尔·卡斯特罗在一个小公寓里见了面，两人立刻一面如故，之后，他们几乎天天碰头。1955年7月，出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抵达墨西哥。在倾谈了几个小时后，埃内斯托觉得菲德尔“年轻、睿智、非常自信、勇气非凡。我觉得我们意气相投……我只会全力支持像他那样的人……（是时候）停止

喊口号，开始战斗了”。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卡斯特罗让他加入游击队的邀请。在登记名册上，他在第一页第一行签下自己的名字。从那时起，埃内斯托变成了“切”。

热血与冷血

1958年，340名游击战士拿下了5000名政府军驻守的圣克拉拉。切的“敢死队”占领火车站，截下了22节装满高射炮、机枪和弹药的车厢。“敢死队是革命队伍的楷模。”切后来写道：“只有精心挑选过来的志愿者才能加入这支队伍。不过，无论何时一名队员

牺牲——这是几乎每场战斗都会发生的事情，都会提名新的候选人，没有被选中的人会很伤心，甚至痛哭出声……因为他们无法拥有到战斗前线甚至在 frontline 战死的荣誉。”

许多熟悉切的人都说，切的身体里有种传教士的气质，与之相伴的则是赴死殉道的决心。作为严重哮喘病患者，切从幼年起就不断地重复经历那种窒息时濒临死亡的感觉。在与疾病的对抗中，他习惯用意志将自己逼迫到极点，完全超越对死亡的恐惧。他是怀着同样的决心走向游击战场的。

1956年，在墨西哥，切带着自己的哮喘吸入器接受了游击战训练。为

了减轻体重，他完全改掉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他笑话战友们每天训练结束后都要洗澡换衣服：“那很好，不过在山里他们怎么办？”他不完全信任的人，一概不接触。除了古巴人，他很少再见其他人。他甚至已经为革命胜利后的工作做准备，开始阅读亚当·斯密、凯恩斯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毛泽东和苏联文献。

在两年的游击战斗中，切对残酷习以为常。1956年11月25日凌晨2时，队伍在古巴科罗拉达斯海滩登陆时就遭到了政府军的袭击，一枚炮弹爆炸击中了切的颈部，他一度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在82个登陆的战士里，只有22人还最终抵达目的地马埃斯特腊山。

马埃斯特腊山脉位于古巴的最东段，是加勒比海岸和内陆的天然屏障，靠近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20世纪50年代，这里尚是一片蛮荒之地。火药和鲜血的味道，连同艰苦的生活都让切感到兴奋。在给伊尔达的信中，他写道：“我还活着，渴望浴血奋战，写下这些洋溢着马蒂（古巴独立英雄）精神的文字。我就像真正的战士一样（至少我的衣服又脏又破），在一块马口铁上写这封信，枪就放在身边。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嘴里还叼着一支雪茄。”

切总是战斗中最不畏惧死亡的那一个。有一次，在敌人的轰炸中，包括卡斯特罗，所有人都逃了，但切留在后面，集中掉队的队员，找回被扔掉的装备、武器和卡斯特罗的司令帽。哮喘病发作时，切整夜无法睡觉，但他总是能在马拉松式的行军中奋力坚持下来。只有一次，敌军正爬上来占领山脊，切差点撑不下去，战友路易斯·克雷斯波陪在他身边，对他使用激将法，威胁并用步枪托打他，骂他是“阿根廷婊子养的”。

安德森在《切·格瓦拉传》里评价切：“他认为自己的信仰有无限的边

界。他相信正在做的事情从历史上看是势在必行的。因此他总是一个评判者。其他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对于武装革命，切交出了自己的一切，“每天早上他都做好了为这个事业杀戮和牺牲的心理准备”，他同时也要求其他人和他有同样的付出。

在他眼中的朋友面前，切表现得极为亲切。在起义军里，他充当了三重角色：战斗指挥官、政治委员和医生。他教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游击队员读书写字，为受过教育的人组织学习小组活动。作为指挥官，他知道在发起进攻前先撤退平民，在战场上避免增加新的伤亡的风险。他还竭力用他的医术，让伤员重返健康。

同时，切出了名的苛刻严格。士兵们常常受罚。每次进行惩罚，切会做出解释，讲述自我牺牲、个人榜样和社会觉悟的重要性。一次，几个年轻人拒绝吃质量很差的伙食，切威胁要枪毙他们，在卡斯特罗的干预下，他最终罚他们5天不许吃饭。“这样他们就能知道真正的饥饿是什么滋味。”他说。而其他指挥官根本不会留心这些事情。但士兵们知道，切对自己有着同样的要求。他拒绝他的职务应该享受的额外待遇，也在战斗中和他们一同承担风险。很多无法承受艰苦条件和严格要求的人半途退出切的队伍，但对那些坚持下来的人来说，“跟着切”本身就是一种骄傲。切就是他们的导师。到马埃斯特腊山区采访的乌拉圭记者古蒂埃雷斯写道：“这里没有命令，没有许可，没有军队礼节，拉梅萨的游击队表现出一种更为亲密的纪律性，这种纪律性是从他们对领袖的信任中生发出来的。……格瓦拉无须抛弃他的阿根廷式粗鲁来显示他对手下战士的热爱，战士们以同样的男性沉默回报他，带着一种比简单的服从更为深厚的忠诚。”

从哈瓦那穿越海底隧道，卡瓦尼亚要塞与老城隔海相望。这里的防御

工事已经有四五百年历史，最初是为抵御加勒比海盗修建的。今天，一座格瓦拉纪念馆位于要塞的边缘位置，外墙上手写体的暗红色“Che”来自切的亲笔签名。

1959年1月，卡斯特罗的部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后，这是切在哈瓦那的第一个工作地点。那个时候，切的声望登峰造极，甚至超过了卡斯特罗。古巴诗人、共产党人尼古拉斯·纪连为切写了首诗，把他和民族英雄何塞·德·圣马丁相提并论，在古巴民众中得到了广泛共鸣。糖业专家博罗托回忆：“切已经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亲眼见到他对很多古巴人来说简直就像在做梦。你得揉揉自己的眼睛。他身体结实，皮肤很白，长着栗色的头发，很有魅力。”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切浪漫的英雄形象背后是一个冷血残酷的刽子手。切在卡瓦尼亚的办公室和卧室现在对公众开放。办公室正中横着一张银灰色办公桌，桌上一角摆着一台黑色拨盘电话，桌子后面插着一面古巴国旗。卧室中的陈设也同样简单，一张单人床，一个五斗橱，橱柜上摆着镜子、台灯和他专用的马黛茶杯。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需要肃清政府军，对叛徒、密探和战争犯实施革命裁决，巩固起义军的胜利果实。这项必须进行的工作交到了切手里。

被切委任负责“清洗委员会”工作的埃斯特拉达回忆，审判从晚上八九点开始，通常凌晨两三点进行裁决。埃斯特拉达的工作是收集证据、采集证词以及为审判做准备工作。最高检察官切坐在他的旁边，对这些人的生死做最终判决。一并在300多份判决书上写下“Che”的签名，随后这些战犯都被押赴刑场。

对于这些判决的性质，人们从来没有达成共识。在国外，美国公开指责古巴是在搞屠杀。但法院院长伯格坚持，切的判决非常谨慎。审判时，

目击者、死者、被虐者的家属或被虐者本人都会到场。《切·格瓦拉传》的作者、美国作家乔恩·李·安德森也 为他辩护道：“我还未找到任何一个可靠的原始资料表明切曾处死‘无辜者’的案例。由格瓦拉下令处死的人所犯罪行都是应在战争或战后处死的重罪，如临阵脱逃、卖国求荣或者强奸、拷打或谋杀。我必须补充一句，此研究历时5年，包括在迈阿密和其他地方的美籍古巴流亡社区中的反卡斯特罗主义古巴人在内。”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古巴人被一种革命后的热忱裹挟着，伯雷格的压力反而是法庭上的群众苛责他的裁决太仁慈。1959年1月底，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体育馆主持了公开审判来回应美国的指责：“前来看审判的外国记者被大声辱骂的人群和要求采取死刑判决的歇斯底里的呼声赶跑了。”

切没有对这些争论做出直接回应，他似乎一直秉持着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他认为，危地马拉的阿本斯之所以被颠覆，就是因为他没有清除军队里的不忠分子，让美国中情局的人渗透进来。古巴绝不能重复这个错误。对于切来说，革命是最高的宗旨，包括他自己在内，任何个别人的牺牲都是理所应当的。换句话说，对敌人的残酷无情也同样理所应当。

1958年2月17日，在马埃斯特腊山，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第一次处死了队伍中的叛徒欧蒂米奥·盖拉。所有目击者都从未公开谈论这场处决。但切在日记里坦率地写道：“这种情况对我们、对欧蒂米奥都不好受，所以我决定解决这个困境，我用一支点32手枪冲他的头部打了一枪，子弹从大脑前颞叶穿出。他喘息了一会儿后，死了。”这段描述的精准和冷静显示了切的超然态度，为革命“解决困境”的行为并不会让他背负任何心理负担。从那以后，他就以对背叛革命者的冷血闻名了。

1959年，格瓦拉·林奇到哈瓦那来看望儿子。他看到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切跳下吉普车，质问一个正在执勤的年轻人，缴了他的枪，用一种坚决的冷冰冰的语气下令逮捕他。“我看到那个孩子脸上绝望的表情。”林奇回忆，“我问（切）为什么要逮捕他。他回答说：老爸，在这儿不许有人在执勤的时候睡觉，因为这会让整个兵营陷入危险之中。”林奇写道，在那一刻之前，他都还以为眼前的年轻人就是“195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跟他们告别的那个孩子”，现在 he 知道自己错了。

堂吉珂德的失败

在后世对切·格瓦拉的膜拜中，他激进的革命热情被解构成为反叛、理想主义、永不妥协。切戴着缀着红星的贝雷帽，永远是那个勇敢奔波的游击战士。而1959到1966年赴刚果前的切，似乎从来不是那个文化图腾中的一部分。阿莱伊达说，切至少读过6遍《堂吉珂德》。在治理国家的6年多时光里，切遇到了那个他永远无法打败的风车。

革命胜利之初的古巴，好像加勒比海上的一叶扁舟。卡斯特罗虽然已经夺权，但革命并不是完全依赖军事胜利完成的。他在山区的帐篷里和两个反对派别临时结盟。在国内，他仍有许多尖锐的反对者。以蔗糖为生的古巴的经济命脉依然牢牢掌握在大地主和美国资本家手里。华盛顿关于古巴共产主义化的论调随时可能招致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颠覆。

古巴应该走怎样一条路？卡斯特罗和切的想法有本质区别。他们是性格上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卡斯特罗富有领袖魅力，擅长政治手腕，对于他来说，生存是新政权的首要目标，为此，和以往一样，他随时准备根据政治结盟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立场。他清醒地意识到古巴的命运尚掌握在美国手里，

他一面怀着十二分的戒备，让切整顿军队，预备美国人的武装颠覆，一面否认古巴革命的共产主义性质，小心翼翼地试探华盛顿的态度。1960年4月，卡斯特罗飞往华盛顿。他放低姿态，重申外国人在古巴投资的承诺，坚持土改法案只会影响无人照管或者未被使用的土地。他劝说更多的美国人到古巴旅游，希望美国这个古巴最大的蔗糖买家能够提高从古巴进口蔗糖的配额。他还说会尊重两国间的双边防卫协定，允许美国海军使用关塔那摩海湾，反对共产主义。

切不像卡斯特罗那样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不擅长、也不欣赏政治妥协，更不会摆政治姿态，说政治谎言。在国际政治面前，切显得既天真又冒失。1960年，切第一次以国家领袖的身份出访。在印度，尼赫鲁为他设宴。在印度总理喋喋不休地介绍了两个多小时的菜肴后，切憋不住问：“总理先生，你怎么看共产主义中国？”尼赫鲁脸上显出漫不经心的表情，答道：“司令先生，你尝过这些美味的苹果了吗？”切追问：“总理先生，你读过毛泽东的作品吗？”“啊，司令先生，你喜欢这些苹果，我真是太高兴了。”尼赫鲁的态度是切不能理解的。

在雅加达，见苏加诺之前，阿根廷驻雅加达大使给切讲了许多八卦，包括赫鲁晓夫送给苏加诺一位俄罗斯女人。切到苏加诺的宫殿与他见面，苏加诺坚持带切参观自己的油画收藏。切开始不耐烦起来，他打破沉默：“苏加诺先生，我们一直参观，可是还没见到那个可爱的俄罗斯姑娘，他们说这是您最好的收藏。”作为翻译随访的阿根廷大使差点吓晕，赶紧用一个经济问题偷梁换柱。事后，切还大笑了一番。

革命是切的一切理想。古巴只是一个起点，一个拉美全面革命的据点。就像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一样，他也不惮直言他的打算。



1962年，在美洲国家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各国代表以19：1的表决结果同意美国对古巴采取禁运措施

1960年1月，切就在哈瓦那发表了《起义军的社会计划》的演讲，他宣布：“我们的美洲兄弟和我们有着同样的地理条件，这样就可以进行土地革命，在田野、山区进行斗争，然后再发展到城市。……这次革命不仅是古巴人民的革命，因为它已经触动了整个美洲的正义良知……这次革命给拉美的专制统治者们和实行垄断政策的外国公司敲响警钟，因为他们是人民政权的敌人。”切已经着手向尼加拉瓜人提供帮助，帮他们组建游击队，并组建一个革命党派领导这支队伍。他在卡瓦尼亚和来自其他国家的革命者见面，这并不是一个被严密保守的秘密。

卡斯特罗在华盛顿遭遇了滑铁卢。根据切的演讲和表现，美国认为“古巴成为对抗其他拉美政府革命活动的

基地”，切是最大的危险人物。

但是那个时候，危险的切对于古巴来说意味着一种机遇。1960年切的出访有一个隐藏的目的。卡斯特罗希望能绕过美国，把古巴的蔗糖卖给苏联人。共产主义的切是与苏联接触的最合适人选，他的表现早就得到苏联人的特别关注。1959年1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决定派遣阿列克谢耶夫秘密赴哈瓦那。切在访问时在开罗和苏联人秘密接触了两次。10月在回到古巴三周后，“塔斯社记者”阿列克谢耶夫拜访了他。他们谈得很投机，从深夜两点一直聊到几乎天亮。快结束的时候，切对他说：“如果没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帮助，我们无法获得革命胜利，也无法维持革命。”说完，他强调这是他的个人观点。阿列克谢

耶夫说，他很希望了解其他革命领袖的想法，问切能否帮助他安排与卡斯特罗见面。“问题是卡斯特罗不喜欢和记者说话。”切说。阿列克谢耶夫看着他：“我的目的不是要采访他，不是为了做新闻。”切明白了。1960年2月，苏联副总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访了哈瓦那。

用阿列克谢耶夫的话说：“切实际上是我们和古巴关系的设计师。”但满怀革命浪漫主义的切对苏联也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1961年10月，阿列克谢耶夫根据赫鲁晓夫的要求，向古巴政府提出了在古巴设置核火箭的提议。出乎他的意料。古巴人同意了。切热切支持了这个想法，因为“任何能够阻挡美国人的东西都有价值”。

1962年10月，一颗苏联地对空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古巴圣克拉拉市切·格瓦拉的墓前点燃长明火（摄于1997年）

导弹击中了一架美国侦察机，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在时局最紧张的时刻，卡斯特罗给赫鲁晓夫发电报，希望莫斯科能在美国进行地面进攻的时候率先发射导弹，他向赫鲁晓夫保证他和古巴人民准备誓死战斗。但仅仅一天后，卡斯特罗得知，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完全背着古巴达成了一项协议——苏联人撤出导弹，美国人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丘比特导弹。据说，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卡斯特罗勃然大怒，一拳打碎了一面镜子。而切在危机发生几周后，还忍不住让英国《工人日报》的记者萨姆·罗素发表他对苏联人背叛的愤怒。

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收缩了在拉美的活动，莫斯科宣布要与华盛顿“和平共处”。卡斯特罗接受了现实——1963年春，他在访苏时发表了联合声明。他重申古巴支持“社会主义联盟”，支持莫斯科的“和平共处”政策。他和苏联达成了完全一致，古巴“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建立与美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对于卡斯特罗来说，这不过是一笔公平的交易，他换回一份合同，未来6年，苏联将向古巴购买2400万吨的糖。

对切来说，“和平共处”与推进拉美武装革命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对于苏联来说，切在政治上变成了一个

大麻烦。在克里姆林宫的保守人士看来，古巴是想爬进社会主义阵营的野心家，他们担心切会削弱莫斯科在拉美共产党中的领导权，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切更青睐北京而不是莫斯科。从1962年底，苏联就在切身边安置了一个克格勃特工，他的公开身份是苏联大使馆文化专员，切的新任俄语翻译。

在古巴国内，切从1959年开始就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他被任命为国家工业部部长，兼任国家银行行长。在卡斯特的核心领导圈里，并没有对经济在行的人选。切的优势是在游击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进行过经

济基础设施建设。

在切的头脑中，经济并不关乎经济，而在于革命。在1959年的蔗糖收获季节，他考虑将每天的工作时间从8小时变成6小时。顾问告诉他，这么做虽然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但很可能在全古巴的劳动力市场掀起类似的减少工作量的浪潮，这样会提高蔗糖生产的成本，影响古巴在国际市场上的收益。“也许你是对的。”切回答，“不过你看，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古巴的失业问题。”是卡斯特罗最终打消了他的想法，因为他还无法承担与古巴和美国资本家为敌的后果。

切接管国家银行时，建筑师尼古拉斯·奎因塔纳正在负责为银行修建32层的大楼，那是前任银行行长帕索斯遗留的项目，新银行大楼的地基已经铺好。他去银行见切，建议购买美国公司的电梯。切说，他认为楼梯就行了，如果他这样有哮喘的人都能爬上楼，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切提出，要把大楼厕所的数量削减一半。奎因塔纳回答：“在革命时期，人们上卫生间的次数和从前是一样的。”切反驳道：“新人不一样，他们可以牺牲。”奎因塔纳突然明白，切根本不想建这座大楼。几年后，原来计划修建大楼的地方变成了阿梅贺拉斯医院。不久，切在新发行的10比索和20比索钞票上签了自己的名。人们很快发现，新行长认为钞票是根本不当存在的东西，也无须去探究它的使用规律。1959年在古巴市场上有5.1亿比索在流通，而次年，流通比索的总量就达到了10亿，几个月后更是飙升到11.8亿，而此时还有约4.7亿面值的比索即将投放。

切曾对奎因塔纳说：“革命让人不舒服，不过这是必需的，革命进程中的一部分是服务于未来的公正的。”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切认为革命的内核是要消除个人主义。他极端排斥物质，也否认人普遍的物质追求。他说：

“在古巴，个人主义必须消失。明天，所有个人应该适当地应用个人主义为社会的绝对利益服务。”他提炼出一个词——“新人”，作为新古巴人的代表，而这个“新人”和他自己画上了等号。他拒绝给家人提供旅费来古巴看他，林奇夫妇不得不自己攒钱，他们必须为在古巴的一切消费自掏腰包。

切欣赏他访问中国时的义务劳动，想把这个概念完全复制到古巴。他每个周六都到工厂的总装线上帮忙，去砍甘蔗或者在建筑工地搬砖。不久后，他身边每个想让切保持对自己好感的人都开始放弃自己周六在家的休息时光，和切一起劳动。切的计划后来被称为“模拟社会主义”，其原则是个人通过不计报酬地为社会工作，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觉悟。

切拒绝领取国家银行行长的工资，在工业部他同样压低自己的薪水。副部长奥兰多·伯雷格为此不得不把多出来的钱捐给土地改革基金。有一次伯雷格收了一辆古巴富人流亡后留下的捷豹跑车。一周后的一天，他在车库里遇到切，切走过去冲他喊：“你就像个拉皮条的！”后来他在办公室对伯雷格说，他应该开一辆便宜的车，就像他自己那辆旧的绿色雪佛兰“羚羊”。不久后，伯雷格得到了一辆和老板几乎一样的车，他开了12年。“切超级严格。”伯雷格说，“……就像上帝。”

“上帝”切认为所有古巴人都应该怀有超脱物质的情怀。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勒内·杜蒙在走访古巴全国后认为，新建立的农业合作社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工人不认为自己是主人，他劝说切考虑一个方案，工人在淡季进行额外工作可以得到报酬。切激烈地反对了这个想法。他说：古巴工人需要的不是做主的感觉，而是责任感。他向杜蒙解释了一种社会主义成员的理想形象，他们对商业利益不感兴趣，为社会工作，而不是为利润工作。他

直接批判了苏联在工业上的成功。他认为，苏联的每个人都在工作、奋斗，但那不过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不认为苏联人真的是“新人”，因为他没发现他们和美国人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杜蒙评价说：“切的想法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阶段。”

作为工业部部长，切设想建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古巴将能制造大型船舶、机械，还能利用榨糖的废渣造纸，为工业提供原料。最初，他认为只要依靠苏联，一切就都不是问题。在切的工业部里，捷克和苏联的顾问和南美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并肩工作。圣诞老人、英语学习都消失了，俄语成了新的第二语言。切每周要进行两次俄语学习。但是革命领袖们没有完全预料到经济建设的困难程度，旧体制破碎后，新体制还无法满足古巴当前的需求。美国采取的全面封锁紧紧扼住了古巴的喉咙。苏联石油的硫含量很高，腐蚀了美国炼油厂的管道，而东方阵营来的技术人员也无法操纵美国人留在古巴的先进机器。很多从苏联阵营购买的工业设备质量并不过关，或者已经过时。切需要生产建筑材料，但两个大型砖窑竟然都因为没有耐火砖而限制了生产。从前的纺织厂也关门了，因为生产的棉线质量“不太稳定”。

在内忧和外患的夹击下，1962年，在切担任工业部部长一年后，古巴经济开始滑坡，蔗糖产量甚至低于50年代中期500万吨的最低数；大米、玉米产量也大幅下滑，导致卡斯特罗不得不在3月12日宣布，从1962年3月19日起实行食品配给制。1964年，针对前两年甘蔗歉收的情况，切定出1964年的蔗糖产量应达到550万吨、1965年700万吨、1970年1000万吨的目标。这意味着，切承认了工业化道路的失败。古巴由美国的“糖罐”变成了苏联的“糖罐”。



古巴圣克拉拉市革命广场边屹立着切·格瓦拉的铜像

在国内和国外，切的敌人都变得越来越多。伯雷格承认，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切的革命道德洁癖和个性。他怀疑任何主动给他提供好处的人，认为这表现出唯唯诺诺的迎合，甚至是道德腐败。一次，一名新来的保镖把切的靴子擦得亮亮的，切从后面踢了他一脚，叫他马屁精。在古巴，很多结了婚的男人会同时拥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妻子”，同时和几个女人生下孩子。总有很多女人像追星族一样围在切身边，但切一直履行一夫一妻制。他年轻时从来都喜欢漂亮女人，但他学会了克制。

甚至，他与古巴文化的格格不入也变得愈发明显。“古巴人喜欢聚会，但切不喜欢，很少邀请人去他家里，也不去别人家里。他最好的朋友伯雷格住在与他家距离两个街区的地方，可切只去过他家一次。在古巴，人人都爱跳舞，可切喜欢听探戈舞曲，他是音乐盲，从不跳舞。所有古巴人都喜欢去海滩，但切从不游泳。古巴人爱和朋友一起喝朗姆酒，但切从来不

喝。有红酒的时候，他会喝上一点。古巴人爱喝咖啡，他爱马黛茶。古巴人爱吃烤猪肉，他爱烤牛排。古巴人喜欢直白地开玩笑，但切喜欢刻薄地冷嘲热讽……他常说自己是一个拉美人，他想象把所有拉美国家统一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但他仍然是个阿根廷人，他最好的朋友、可以和他最无所顾忌谈话的人，都是阿根廷人。”

朋友艾尔伯托·格拉纳多注意到，作为国家领袖的切并不快乐，他身上笼罩着一股阴郁的气息。他剪掉了长发，还是戴着贝雷帽，一成不变地穿着橄榄绿的军装，不过已经发福了。伊尔达也发现他极度疲惫。他的工作从周一排到周六，包括晚上。星期天上午他又会去参加义务劳动，下午，他会坐在客厅地板上，跟孩子和宠物狗一起玩，看拳击赛和足球赛。更多时候，他会把自己关在放满了书的顶层办公室里。那里的装饰品只有一个列宁的铜像、一个玻利瓦尔的铜像和一幅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照片。

1962到1965年的古巴，政界和

理论界爆发了一场理论论争，其焦点是两种经济体制的矛盾：非中央集权的独立核算制和中央集权的预算制。前者强调其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企业的成功视其效益而定，个人的收入直接与劳动量挂钩。这种体制最先由农业部门提出并试行，后来外贸部门也随之实行。后一种体制与它相反，每个企业都是国家计划下的生产单位，产品在企业之间的交换不具有商品性质，劳动者的报酬与劳动量并没有直接联系。这种体制主要在工业部门实行。身为工业部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的切是中央集权预算制

派的主将，在他看来这实际上是一场“物质动力”和“道德动力”的斗争。1965年，在卡斯特罗的干预下，这场论战戛然而止。切的理论并没有占据上风。这或许让切更为失望：和平年代塑造“新人”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对人性中本能的克服乃至根除，只有在战争条件下才能实现。

很多和他关系密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切实际上一直期待着美国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入侵。那个时候，革命的热忱才能再次燃烧古巴，进而席卷整个拉美大陆。但在1965年，这种可能性已经很小。在去刚果之前，切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的脚跟又一次感觉到了罗西南德（堂吉珂德的坐骑）的肋骨，我手持盾牌，重新上路。”

（参考文献：《切·格瓦拉传》，乔恩·李·安德森著，马昕译，长江文艺出版社；《格瓦拉为什么出走》，程映虹著，原载《读书》；《切·格瓦拉——未公开的档案》，尤里·加夫里科夫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金秋十月

时间：2015年10月17日-18日

地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南园（西门）

奥森汽车主题公园



限量免费门票火热领取中……



BICITY官方微博账号：@BICITY城市骑行



第二届无动力自造车比赛
这是一次狂欢节，有奇思妙想、脑洞大开的参赛作品，各种影视动漫游戏COSPLAY。



多款热门新车型展示
零距离亲密接触，可以看，可以摸，可以乘坐，360°全方位了解它们的性能。



趣味亲子活动
培养孩子的创造精神，激发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同时让亲子关系更加融洽。



BICITY自行车主题展
带您重温自行车文化，感受骑行的魅力。

不要错过这个了解汽车知识汽车文化的机会，关注我们，参与活动，赢得神秘礼物。现场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原生态美食免费放送，先到先得！一起来参与吧！



从革命到“解冻”的古巴

革命、“冷战”与领袖已然成为古巴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固有印象。但在表面的沉静之下，各种变化要素正在积聚，并将深刻改变这个国家的未来。

文 / 刘怡



2014年12月17日，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向古巴人民和国际媒体发表关于古美关系的讲话。图为哈瓦那市民聚在一起观看劳尔·卡斯特罗演讲的电视直播

时隔54年，星条旗终于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楼前重新升起。

退役海军陆战队员吉姆·特雷西、拉里·莫里斯和弗朗西斯·伊斯特将折叠好的旗帜交给一名中士，随后目送国旗缓缓上升。1961年1月，正是他们三人承担了那项极为难堪的任务：在古巴民众的注视下降下星条旗，封闭馆舍准备撤离。他们当然不曾料到，自己要过半个多世纪才能把同一面旗帜带回哈瓦那。

那是古巴革命胜利的第三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不过35岁，切·格瓦拉31岁，领导美苏两国的还是约翰·肯尼迪和尼基塔·赫鲁晓夫，贝拉克·奥巴马要在好几个月之后才会出生。所有的主角都坚信自己正在跨过的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卡斯特罗相信他能建成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强国，格瓦拉相信他能将革命的火种散播到整个美洲，赫鲁晓夫相信他在加勒比海获得了挫败美国的利器，肯尼迪相信他很快就能遏制“赤潮”。

他们最终都失败了。

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种令人窒息的官僚气味不同，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他曾通过广场演讲、当面指示等方式，绕过政府实行直接民主。为了抨击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老人政治，他宣称不会允许超过60岁的人继续待在领导岗位上。到1976年为止，古巴依然保留着总统一职，1991年之后还允许党员信仰宗教。而惠及全国的免费医疗和教育网络，在覆盖范围和公平性上甚至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古巴的人均寿命达到了与美国相当的77岁，识字率超过99%，鼎盛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达7.5%。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古巴，与真正的繁荣依旧相去甚远。由于在经互会体制内获得了大量的廉价石油和蔗糖销售收入，古巴几乎将自己的经济结

构弱化成了单一的蔗糖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大下降。出售蔗糖的收入被随意地花费在输出革命和各种无节制的计划当中，日用品和农产品生产却日益萎缩，导致普遍的短缺。数以万计的古巴人开始尝试偷渡佛罗里达海峡，奔赴对岸的美国。这样的离境者累计高达100多万人，相当于古巴总人口的1/10。美国海岸警卫队甚至不得不建立一套标准来制止汹涌流入的古巴移民：在被发现前已经踏上美国领土的称为“干脚”，可以获得庇护；还在海水中挣扎的称为“湿脚”，需要被遣返。在这些“干脚”中，也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亲生子女阿丽娜·费尔南德斯。

满脸络腮胡子、雪茄不离手的卡斯特罗终究没能兑现在60岁以前退休的承诺。在他65岁这一年，苏联解体，古巴丧失了53%的进口贸易额和70%的出口市场，能源进口量缩水50%。三年之内，35%的国内生产总值和39%的人均收入快速“蒸发”，农业、交通和工业陷入全面停滞。祸不单行，1998到2008年之间的16次飓风使国家遭受了206.64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严重旱灾造成13.5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对古巴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封锁，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已经处在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2006年，自革命胜利以来一直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因为健康原因暂停履行职权；两年后，这位82岁的老人正式退休，由同样年近八旬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继任。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六大”通过《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确定将以解决经济问题为中心，开启全面改革进程。国家补贴被大幅削减，私营企业和土地承包制开始缓慢出现，海滩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因为革命爆发而宣告中止的新兴产业——石油开采、通信和采矿，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



劳尔·卡斯特罗



8月15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中）访问古巴，出席美国驻古巴大使馆重新开馆仪式

得到恢复。

对缺乏资本积累、人均月收入不足20美元的古巴来说，佛罗里达海峡对面那个曾经的敌国，几乎是他们就近获取复兴资本的最可取来源。2009年恢复在美洲国家组织（OAS）的会籍之后，古巴即借助国际力量，重启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在出生于古巴革命之后的奥巴马总统的努力下，双方终于在2014年底达成协议。

2015年7月20日，古美两国正式宣布恢复外交关系。8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随同三位陆战队员抵达哈瓦那，主持重启美国大使馆的升旗仪式。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和卡斯特罗主席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这就是不再做历史的囚犯，而将重点放在今天和明天的机会上。”

古巴的这种变化何以产生？我们采访了程映虹与崔守军两位专家。

三联生活周刊：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等人领导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取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从那时起至今，古巴社会主

义政权已经存在了56年之久，不仅在风云际会的“冷战”年代异常活跃，也是极少数未因苏东剧变而“变色”的国家之一。你是如何评价这场革命及其遗产的？

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菲德尔·卡斯特罗：20世纪最后的革命家》）：古巴革命爆发之前，巴蒂斯塔政权大体奉行军事独裁路线，通过操纵选举和压制议会实施个人独裁。卡斯特罗等人推翻了这个政权，并赢得了大部分民众的拥护。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古巴建立起了全世界少有的全民教育（义务教育）和全民医疗覆盖机制，这一成绩获得了许多国家的认可。

不仅如此，古巴革命开创的若干新模式，其意义不仅限于一国，而是深刻影响到了一系列后发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在拉丁美洲范围内，古巴一直是反美态度最坚决，影响也最大的一个国家，对拉美左派运动的兴起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到了“后冷战”时代，在国际性的、反对新自由主义

的讨论当中，古巴依然能发出很强的声音，受到各国左派的推崇。

但应该看到，古巴建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制度，没能从根本上改善古巴的经济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古巴经济虽然已经呈现出依赖单一经济作物（蔗糖）、受国际市场影响严重的基本面貌，但炼油、通信等新兴产业也有了蓬勃发展。卡斯特罗等革命者试图以激进手段克服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改变过去的殖民地经济特征，结果只是使古巴由依赖资本主义市场变为依赖苏联的经互会体制，原有的技术优势反而基本丧失。到今天，古巴经济依赖单一作物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牛奶、鸡蛋、面粉等农产品和日用品的供应反而面临长期困难，其全民医疗体制也为缺医少药的状况所困扰。今天的古巴差不多是靠外资和旅游业的收入来维持日常经济运转，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现象，也不是单用“美国制裁影响”就能解释的。

三联生活周刊：进入20世纪以

来，美国逐步将“门罗主义”的目标转化为现实的政策运作，从安全、政治、经济各领域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渗透和控制，包括成功地颠覆过智利、格林纳达等国。但与佛罗里达州仅一水之隔的古巴却避免了类似的命运，并在“后冷战”时代大体维持了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你认为个中原因何在？

程映虹：有必要修正一种偏见，即认为革命后的古巴始终处在彻底的孤立和封锁之下。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只有美国长期对哈瓦那保持强硬态度。英国、日本、西班牙等国一直都和古巴保持着贸易乃至外交关系，尽管这种交往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对哈瓦那的处境依然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作用。另外，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整个苏联—东欧阵营，加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一些新兴的民族主义政权，它们或者是古巴的盟友，或者与其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往来。换言之，古美关系的对立反而为哈瓦那赢得了来自东方阵营的“输血”。其中的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至今仍是古巴重要的经贸伙伴和政治上的支持者。在拉丁美洲，古巴在60年代一度鼓吹输出革命，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但当卡斯特罗在70年代初宣布放弃这一政策之后，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和古巴恢复了关系，重新建立起贸易往来。委内瑞拉等国一度视古巴为反对美国的地区领袖，给予其大力支持，这都是支撑古巴政权维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崔守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卡斯特罗逐步靠拢社会主义阵营，这令美国感到威胁已近在咫尺。因此在1961年，中央情报局扶植反卡斯特的流亡者武装在猪湾（Bay of Pigs）登陆，企图以武力颠覆革命政权，但

被击败。这个事件直接引发了第二年著名的导弹危机：哈瓦那担心美国会再度发动入侵，因此与莫斯科急剧接近，甚至允许苏联将带有核弹头的中程导弹部署到古巴。尽管这次危机最终没有引发核战争，但让美国意识到了古巴维护自身独立的决心的确非同一般，加上有苏联的庇护，随后20多年间，美国虽然也对古巴实施过小规模暗杀、渗透之类行动，但全面入侵的想法基本不再有了。

至于苏东剧变之后的情况，应该看到，这一事件和随后的全球化进程刚好是接续发生的。对美国尤其是90年代的美国来说，它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很重要原因是世界各国对全球化进程的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再去对古巴实施暗杀、颠覆之类“冷战”色彩浓郁的行动，已经和时代精神不合。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时，在外交领域推出了“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即相信从长期来看，市场和民主化可以改变古巴；今天的奥巴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一路线。所以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和政治施压可以说明显地减少了。

另一个特殊情况是，美国一度认为古巴与经互会体制下的东欧国家并无本质差异，一旦失去了苏联的经济“输血”和政治庇护，崩溃将是顺理成章的。但事实证明，卡斯特罗开创的“古巴模式”有它独特的顽强性。例如它在“公正、公平”的口号下，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免费医疗和教育制度；虽然带有“大锅饭”的特征，效率不高，但还是维系了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忠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有行业职工平均月工资还不到20美元、位列世界倒数的情况下，古巴政权依然能保持相对稳定，而没有迅速崩塌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不再担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

主席（政府首脑），由其弟劳尔·卡斯特罗继任。在那之后，古巴开启了一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你是如何看待这场改革的？劳尔·卡斯特罗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个人作用？

程映虹：与兄长菲德尔相比，劳尔的政治态度相对要灵活一些，甚至被认为是古巴共产党领导层中主张改革的人士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和倡导激进路线的切·格瓦拉在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物质刺激和市场调节等问题上存在分歧。90年代后半期，劳尔曾在自己领导的军队后勤部门中发起经济改革，鼓励军队发展商品生产。当时他手下有一位叫邵黄的华裔将军，是跟随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时的老战士，自60年代起负责后备役部队和军事后勤。在劳尔的授意下，邵黄开始在蔬菜生产中实行与中国类似的承包制度和按劳分配模式，使菜农有了积极性。一些人的收入甚至高于政府部长的工资，结果被当时的报纸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劳尔出面说：这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

1997年第一次访华时，劳尔认真阅读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件，据说把中共“十五大”报告读了6遍。他到访了许多经济改革比较有成效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和深圳，每天晚上都在驻地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总结白天参观的心得。结束这次中国之行后，劳尔曾邀请中国经济智囊前往古巴，介绍经济改革经验，尤其是如何吸取海外侨民的资本和技术，古巴领导人基本上都出席了讲座和讨论。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对此不完全赞同，但没有他的默许，改革措施不可能推进下去。

崔守军：对古巴来说，变革可以说是大势所趋。这个国家在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它西临墨西哥湾，南傍加勒比海，北面是北大西洋，离巴拿马运河这个两

洋枢纽也很近。往返墨西哥湾和东太平洋的国际贸易航线，可以把古巴当成一个很好的中转站。它的自然资源也比较丰富，矿业和石油开采前景都不错，供养 1100 万左右的人口（不过是北京的一半）可以说绰绰有余。最近几年兴起的旅游业，也是一个重要的收入增长点。应该说，在经济政策得当的情况下，90 年代古巴面临的那种经济困窘局面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对自身优势和过往政策的再检讨，是劳尔·卡斯特罗改革的重要原因。

放眼整个美洲，90 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形势较好的几乎都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这些国家有一些共性特征：人口不多，自然资源丰富，旅游业发达。这些经验是古巴完全可以效仿的。与周边国家的反差日益明显，使得古巴从上到下人心思变，成为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之一。

劳尔的上台，则为全面开启改革提供了契机：尽管他也是领导革命的那个老一代阶层的成员之一，但思想比较开明，对既有体制的弊端看得也比较清楚。另外，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的兄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换作是其他人，推行比较激进的市场化政策可能会遭到菲德尔的反对，但主政者是劳尔，菲德尔的抵触情绪可能就会少得多。

三联生活周刊：迄今为止，古巴版的“改革开放”大致有哪些重要目标和举措？如何评价其实际成效？

崔守军：劳尔·卡斯特罗关于古巴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件，是 2011 年 4 月古巴共产党“六大”上通过的《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这次大会的意义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纲要》提出了几项重要的政策调整。一是以市场取向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推进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包括承认和鼓励合资企业、小农、土地承包与租赁、个体劳动等形式，也会为其提供贷款。

再就是吸引外资，从外部寻求资金来源。

当然，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这些调整到目前为止还局限在经济领域，并且受到严格的束缚，比如依然有“以计划经济为主”、“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之类紧箍咒。古巴本身严重缺乏资本积累，菲德尔·卡斯特罗等老一辈领导人对市场的作用也持怀疑态度，这些都决定了改革的成效不会那么立竿见影。

实际上自 2012 年以来，古巴的 GDP 增长率一直徘徊在 3% 以下，并没有取得很惊人的成果，这些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和引进外资来改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开放已经给古巴社会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世时，曾出资为古巴修建了一条海底光缆，于 2013 年投入使用，这使得古巴可以稳定地接入国际互联网。尽管现在上网费用还比较贵，每小时收费在 4~5 美元，



崔守军



程映虹

相当于大多数古巴人一星期的收入，但没有挡住当地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热情。这方面，在美国的100多万古巴裔移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平均收入比古巴国内高得多，可以把一部分收入汇回到古巴，使留在当地的亲朋好友有经济条件去接触互联网。

信息化革命的确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即使是古巴这样在政治和经济上相对封闭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拒斥互联网的力量。而通过网路进入古巴的各种信息，将在更深的层面改变古巴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意识，使改革和开放成为一股无法逆转的潮流。

三联生活周刊：与经济领域的变革相伴，2008年以来，古巴也开始寻求与欧盟各国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2015年7月1日，华盛顿和哈瓦那正式宣布恢复断绝已有54年之久的外交关系，美古关系“解冻”的主要原因何在？

程映虹：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制裁和封锁，基本出发点是希望卡斯特罗政权因不堪重负而崩溃。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非但没能达成所欲的效果，反而使卡斯特罗获得了强化社会控制、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外部理由。在“冷战”已然结束的大背景下，古巴作为苏联在加勒比海军事前哨的功能不复存在，它在安全方面对美国已不再构成重大威胁，调整对古外交也就成为大势所趋。

另外，劳尔·卡斯特罗全面主政也成为美古两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契机。与其兄菲德尔相比，劳尔身上的改革色彩更为鲜明；在对内加速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的政策背景下，他本人迫切希望在美国的上百万古巴裔移民能够回国投资，以拉动国内经济。因此，哈瓦那本身也乐见对美关系的松动。这样一来，双方在大方向上就形成了一致，剩下的只是枝节问题。

崔守军：1961年“猪湾事件”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对古巴始终奉行政治上打压、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但美国总统已经换了10任，卡斯特罗却依然屹立不倒，足见“大棒”未必总能达到所欲的效果。在美国的百万古巴裔移民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卡斯特罗的反对者，但也有人认为两国关系“解冻”能提供可观的贸易机会，并组织游说集团推动美国对古政策的转变。另外，奥巴马政府大体延续了克林顿时代的“接触政策”，认为推动古巴的市场化转型和民主化进程比一味地打压更有助于美国利益的实现，所以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持积极态度。

站在古巴的角度，经济陷入困境已有较长一个阶段，在领导层决意启动改革的背景下，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实现关系缓和可谓大势所趋。在谈判过程中，哈瓦那方面十分重视战术策略，最终既没有做出重大的政治让步，也没有被美国所要挟，这让领导层感到复交不是一种“丧权辱国”的行为，从而有助于其实现。

除去古美两国各自的利益考量外，也不应忽视美洲国家组织等区域共同体的居间斡旋作用。1962年，该组织曾在美国的影响下中止了古巴的会籍。但进入“后冷战”时代，左翼思潮在拉丁美洲出现复苏，委内瑞拉等国认为将古巴重新纳入美洲一体化进程意义重大。2009年，美洲国家组织以实施改革为条件、同意古巴重新入会，2014年又在哈瓦那举行了第三届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领导人峰会。近年来，美洲国家组织对华盛顿施加了很大压力，希望美国政府能从“美洲一致”的角度出发，解除对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封锁，使哈瓦那重新融入整个美洲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和安全合作。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的政治接班人和现任古巴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今年

也已是84岁高龄。他在2013年宣布：到2018年第二任期届满后，不会寻求继续连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你看来，后卡斯特罗兄弟时代的古巴可能往何处去？

程映虹：从“政治强人”菲德尔到“改革先锋”劳尔，这种变化本身就反映了古巴迈向市场化和对国际开放的总体趋势。很快，新一代古巴领导人将会接管政权，他们很难阻挡已经兴起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潮流。另外，在美国的上百万古巴裔移民基本上是倾向于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的，在卡斯特罗兄弟告别政治舞台之后，他们对古巴国内形势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这是其他转型国家所不具备的要素。

几年前我启程前往古巴访问时，曾在迈阿密机场看到回国探亲的美籍古巴裔移民排着长长的队伍，背着大包小包，装满从糖果到家电的大小商品准备重归故里。他们为托运这些商品支付的手续费远远超过了机票的价格。而在哈瓦那国际机场简陋的接机口，又能看到黑压压的古巴人翘首期待亲友的归来，几乎把出口完全堵住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古巴开放了，恐怕谁也挡不住这个巨大的潮流。

崔守军：新一代领导人全面接手古巴党、政、军领导层之后，他们的历史负担较轻，观念更加开放，改革的力度和速度都会有更长足的提升。另外，古巴一些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在后卡斯特罗时代将会发挥更显著的作用。例如，1991年取消宗教禁令之后，古巴成了唯一一个允许共产党员信教的社会主义国家，天主教在其社会生活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98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就曾访问古巴，最近教皇方济各也前往古巴访问，并和卡斯特罗兄弟会面。通过宗教纽带，古巴与西方世界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认同关系，这种关系的意义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扩大。■



哈瓦那西边的乡村小镇维纳利斯是古巴两大雪茄生产地之一。图为一位农民在田里收雪茄烟叶

古巴三宝

古巴除了甘蔗、阳光和沙滩之外，还有三样宝贝举世闻名，古巴的未来全都寄托在这三宝身上。

文 / 袁越



哈瓦那“乌普曼”雪茄工厂的员工在忙碌



(蔡越摄)

烟草种植者在为游客演示如何卷雪茄

古巴雪茄

雪茄，在其他国家只是烟草的一种消费形式，但古巴雪茄代表了个国家的精神内核，是全体古巴人民的形象代言人。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产雪茄，古巴

雪茄是公认质量最好的。雪茄在古巴人心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不仅因为雪茄是古巴最重要的出口创汇商品之一，而且因为雪茄的原产地就在古巴，它远比蔗糖更能体现古巴人的气质。

据考证，烟草的原产地就是加勒比地区，当年哥伦布的水手们从这一

地区的原住民泰诺人（Tainos）那里学会了抽烟，并把这一习惯带到了欧洲，最终成为人类的一大公害。

古巴岛最主要烟草产区在岛的西端，尤其是比那尔德里奥省（Pinar del Rio）出产的烟草占整个古巴烟草产量的80%以上。正好哈瓦那的旅行

社在卖比那尔德里奥一日游，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雪茄的原产地看一看。

第二天一早，一辆中国产的宇通大巴车准时出现在宾馆门口，车里坐满了外国游客，绝大部分来自西班牙和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没有一人来自美国。美古之间虽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美国公民仍然不能以旅游者的身份随便来古巴玩，先得给自己找个借口才行，比如文化交流或者扶贫什么的。不过，美国政府对于古巴雪茄的禁令松动了不少，原来任何人都不准带古巴雪茄进入美国，现在允许每位旅客携带价值100美元以下的古巴雪茄入关。虽然杯水车薪，但总算开了个口子。

美古交恶之前，古巴雪茄最大的市场就在美国，包括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内的很多名人都是古巴雪茄的忠实拥趸。根据肯尼迪的新闻官后来撰写的回忆录，肯尼迪在签署古巴贸易禁令之前事先委托助手采购了一箱（1200支）乌普曼牌（H. Upmann）古巴雪茄，这批雪茄到货后的第二天他才在禁令上签了字。贸易禁令生效后，大批古巴雪茄师搬到了多米尼加或者洪都拉斯等周边国家，把古巴独有的手卷雪茄技艺传了过去。但美国人仍然只认古巴雪茄，于是美国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假货。据说那段时间美国人抽的古巴雪茄有95%以上都是假的，但谁让肯尼迪签署了禁令呢？他本人倒是不用发愁，可惜第二年就被一位亲古巴的左派人士暗杀了，那1200支雪茄肯定还没抽完呢。

我们乘坐的大巴车一出哈瓦那，道路立刻就变得通畅起来。古巴的高速公路质量不错，但车速快的根本原因在于古巴的车少。我注意到沿途有不少搭车者，还在一座大桥下面看到警察在拦车检查。导游告诉

我，因为缺乏汽油，古巴政府号召大家共享资源，任何跑长途的私人车辆都必须接上沿途的搭车者，否则就算违法，那些警察查的就是这个。不过这个法律只适用于本国车辆，像我们坐的这辆载有外国人的车不必遵守。

古巴地广人稀，田野上根本见不到人，只有牛群在吃草。据我观察，古巴的农业水平远不如中国，很多田地都荒芜着，看来古巴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高。导游告诉我，古巴政府正打算进一步扩大私有化的范围，希望能刺激古巴农民的积极性。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位于比那尔德里奥省中心区的维纳利斯（Vinales）山谷，这是古巴最有名的烟草产地，绝大部分高档雪茄烟叶都出自这里。导游介绍说，这块地方是烟草的发源地，气候和土壤条件最适合这种植物的生长。可惜8月份烟草都已收割完毕，我们只能去参观烟民晒烟叶的作坊。烟叶收下来后先要在小木屋里阴干几十天，去掉烟叶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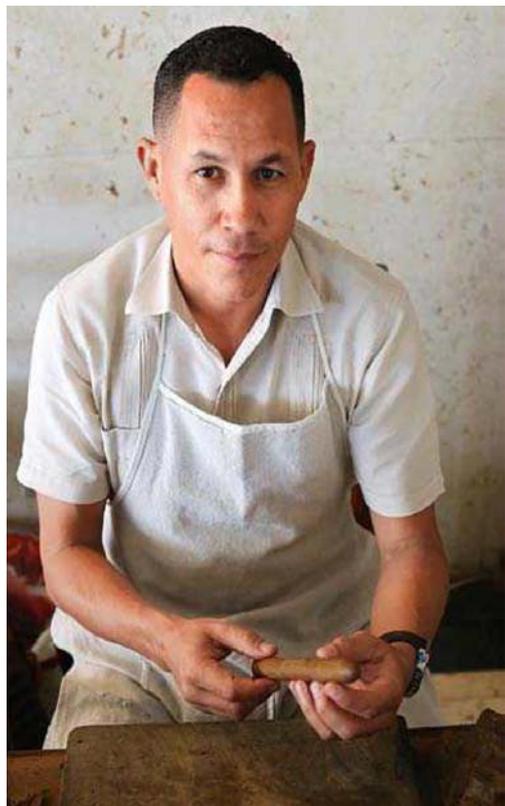
水分和糖分，然后再进行发酵，将烟叶处理成不同的厚度和干湿度，这样才能被用于制作雪茄。

一位当地烟农接待了我们，还为我们演示了如何卷雪茄，看上去似乎很容易，不到一分钟就卷好了一根，贴上商标就可以卖了。他点上一支烟让大家试抽，小木屋里顿时烟香四溢，我虽然不抽烟，但也忍不住去试了几口。雪茄烟和香烟不一样，吸烟者通常不把烟吸进肺里，而是吸到嘴里立刻呼出来，体会那独特的香气。

这位烟农当场叫卖自家产的雪茄烟，每根只要3元人民币，比免税店里卖的便宜多了，而且保证不是赝品。但整车游客只有一个人掏钱，因为对于不抽烟的普通消费者来说，古巴雪茄虽然是送礼佳品，但只有贴上商标才值钱。

雪茄是古巴为数不多的出口商品，当然要全力保护。古巴政府把雪茄的经营权垄断了，所有的品牌其实都属于国家。由于美国的贸易禁运，古巴雪茄的价格直线上升，变成了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参观雪茄工厂是哈瓦那旅行社的保留节目，所有涉外宾馆也都会附设一间雪茄店。我专程去自由哈瓦那宾馆下设的雪茄店参观，商店内部装潢高贵典雅，冷气开得十足，部分较为昂贵的雪茄品种还专门有一间恒温恒湿的储藏室，条件比葡萄酒窖还严格。店里出售的雪茄自然也都相当昂贵，但同样的品种在欧美的商店里价格至少翻一番。

这家店聘请的雪茄师厄内斯托·托拉诺（Hernesto Torano）现场为顾客答疑解惑，他告诉我，卷一根雪茄要用到三种不同的叶子：最外面的湿叶子决定了一根雪茄的最终长度，对味道的贡献很小；中间的干叶子决定了雪茄的硬度，对味道的贡献中等；最中心的薄叶子对味道的贡献最大，一根雪茄的味道基本上由薄叶子决定。好的雪茄都是用一整片叶子卷成的，而且要把叶梗切掉，赝品雪茄往往外



雪茄师厄内斯托·托拉诺



古巴至今仍实行免费医疗制度，计划投资 5000 万比索来升级全国的 900 家医疗健康机构。图为古巴拉丁美洲医学院的课堂

表看着不错，但里面用的都是碎叶子，有经验的雪茄师只要用手揉一揉就能分辨得出来。

之所以要用一整片叶子，是为了保证雪茄燃烧得缓慢而又均匀，不吸的时候就会自然熄火。这种对细节的极度追求正是奢侈品的特点，但说实在的我没有看出这里面有多少技术含量。美国的贸易禁运把古巴雪茄从一种普通农产品变成了奢侈品，这恐怕不是美国人想要达到的效果吧。

古巴医生

哈瓦那中心区靠近海滨的地方耸立着一幢约有 25 层楼高的灰色建筑，和周围那些老式的殖民地小洋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幢高楼原本属于一家私人银行，但古巴革命后卡斯特罗政府将其改建成了一所综合性医院，

取名为艾美杰拉斯(Ameijeiras)医院。我这次专程前去拜访了这家医院的眼科主任米盖尔·莫基·卡斯特拉诺斯(Miguel Mokey Castellanos)博士，我想通过采访弄清楚一件事：古巴的医生到底好在哪里？

“古巴现有 8 万多名医生，平均不到 150 人就有一位。”卡斯特拉诺斯医生开门见山地说道，“另外古巴还有超过 4 万名医生在世界各地为穷人看病，仅在委内瑞拉就有 2 万人，巴西也有 1.15 万，其余的大都分布在非洲。”

确实，医生很可能是仅次于蔗糖的古巴第二大出口“商品”，而且是先进的“服务业”出口。他们除了帮助古巴政府实现某些政治目的外，还真的能换回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古巴现在的石油大都是用医生从委内瑞拉换来的，古巴的粮食和其他一些稀缺物资也是用医生从巴西换来的。古巴

和中国之间也有类似的互惠互利模式，至今还有几百名中国学生在哈瓦那的医学院学医，卡斯特拉诺斯手下就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研究生。

“中国医学院里学外科的医生很难有机会自己做手术，中国的医科研究生大都在给老板打下手，可古巴不一样，我现在就有很多机会亲自动手术，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这位博士研究生对我说，“学医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光读书有什么用？古巴的医院为我提供了很多实践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每年花 1.7 万美元学费在这里学习的主要原因。”

“那你不怕病人知道了跟你急吗？”我问。

“古巴医患关系比中国好太多了！因为古巴看病是免费的，绝大部分药物也都是免费的，所以病人很难去告医院，病人和医生之间没有相互仇恨

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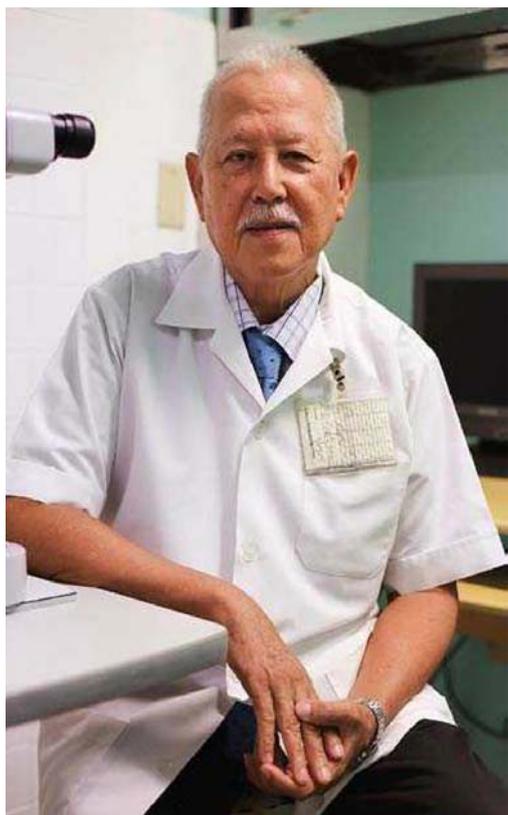
全世界实行免费医疗制度的国家不止古巴一个，但古巴至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相对很弱，这样一个穷国依然坚定地实行免费医疗制度，而且水平还不低，这就显得十分突出了。

“古巴的建国宗旨就是人人平等，力争让所有的古巴人都能享受到同等质量的医疗和教育。”卡斯特拉诺斯医生对我说，“所以古巴的医疗和教育全部免费，而且不但自己这么做，还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医生。”

问题是，古巴哪来那么多医生呢？据卡斯特拉诺斯医生介绍，古巴革命刚刚获得成功的时候有大约4000名医生逃到了美国，国内医生奇缺。卡斯特罗从全国各地招募了一大批年龄在14~16岁的年轻人来哈瓦那学医，他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哈瓦那医学院学习了10年，从一个半文盲变成了一名眼科大夫。国家又出钱让他去西班牙、布达佩斯和莫斯科进修，学习先进国家的医疗技术。之后他又被派往非洲小国几内亚比绍，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技艺，直到1982年艾美杰拉斯医院建院时他才应邀回国，担任了这家医院的眼科大夫，最终当上了眼科主任。

“古巴的医院一共分为三个级别，一般小病都去初级医院，治不好再到二级医院，如果还治不好才会转到我们这种三级医院。”卡斯特拉诺斯医生对我说，“我们的医生和国际医学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古巴的医疗水平一点也不比美国差。”

但是，这么做的代价就是：古巴拿出了国家财政的1/3用于补贴免费医疗，另有1/3被用于免费教育，其他领域就只能从剩下的1/3里拿钱。要知道，因为卡斯特罗特别喜欢体育



艾美杰拉斯医院的眼科主任卡斯特拉诺斯博士

（他从小就是个优秀的运动员），古巴政府花了很多钱在竞技体育上面，多枚奥运会奖牌就是明证。另外古巴还必须养活一支拿得出手的军队，用于防止各种敌对势力的进攻，这也需要很多钱。如此算下来，其余领域能分到的钱就不多了。

这样的免费医疗，还能持续多久呢？

古巴音乐

大概只有一样东西比雪茄更能体现古巴人的精神内核，那就是音乐。古巴音乐之所以风格独特，主要原因在于古巴黑奴所受的待遇比北美好很多，黑奴们从非洲带来的家乡音乐在这个小岛保存得相当完好，其结果就是来自非洲、南美洲和欧洲的传统音乐在古巴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诞生了古巴音乐这朵奇葩。

我第一次知道古巴音乐是因为一部名叫《好景俱乐部》(Buena Vista

Social Club) 的音乐纪录片，记录了一群古巴老音乐家的传奇历史。这个好景俱乐部其实就是哈瓦那一家专门为有钱人服务的音乐酒吧，卡斯特罗革命胜利后被取缔了，音乐家们被迫改行，远离音乐很多年，直到一位美国音乐家把他们重新聚在一起，录制了一张怀旧专辑，这才重新被世人知道。这部纪录片和这张专辑是1999年世界流行文化圈最热门的事件，很多人因此而知道了古巴音乐。

片中的主要角色都是上世纪初出生的老人，如今大部分都已去世，只剩下少数几个边缘人物还活着。他们招募了几位年轻乐手，组成了新的好景俱乐部，每周六晚上在哈瓦那老广场(Plaza Vieja)附近的塔博纳咖啡馆(Cafe Taberna)演出。我抱着朝圣的心情专门去听了一场，结果大失所望。糟糕的舞美和音响效果就不说了，关键是音乐完全没有了当年那张专辑里的灵气，以及一种时隐时现的淡淡的忧伤，而是彻底变成了刻意取悦观众的口水歌，和如今遍布北京三里屯的那些造作的酒吧歌曲没有任何区别。

失望之余，我决定去古巴的东部走走，那里是古巴音乐的发源地，也许在乡下才能找到好听的古巴音乐。于是我加入了一个散客拼成的旅行团，花了一天时间来到了古巴最有名的旅游城市特立尼达(Trinidad)，终于如愿以偿。

特立尼达有一座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城，被公认为是全古巴，乃至整个南美洲保存得最完好的殖民地老城。蜿蜒的石子路和漂亮的老房子构成了古城的核心，偶尔穿城而过的老爷车为这座古城增添了一种很特别的气氛。有几幢老房子被改成了餐馆，音乐声不时从墙内传出来，让沉睡了几百年的古城一下子活了起来。

我们挑了一家高档餐馆吃午饭，为我们表演的是一支七重奏小乐队，这是古巴乐队的标准配置，包括两把木吉他，一把低音贝司(Double Bass)，两个鼓手，一个主唱兼沙锤手



非洲、南美洲和欧洲的传统音乐在古巴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诞生了古巴音乐这朵奇葩

和一把小号。从这个配置就可以看出，古巴音乐是一种融合了欧洲弦乐和非洲打击乐的混合音乐，综合了两种音乐的长处。这支乐队是清一色的小伙子，那个小号手特别出色，经常会玩点即兴，很像是曾经盛行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拉丁爵士乐。

他们演奏了将近一个小时，全都是快乐的曲子，没有一点忧伤。吃完午饭我上街瞎逛，顺着音乐的声音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了几个老人，他们每人头上都戴着一顶礼帽，坐在自带的板凳上弹琴唱歌，虽然节奏舒缓，但仍然听不出任何忧伤的味道，而是带有一种看破红尘的释然。

古巴音乐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这也是这个岛国民众普遍的精神状态。无论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这个地方永远不缺食物和阳光，也就没什么可愁的了。

第二天晚上我回到哈瓦那，正好遇到一年一度的哈瓦那狂欢节。原本车水马龙的滨海大道被栏杆隔开，一群身穿艳丽戏服的舞者站在花车上扭动身躯。只有少数有票的观众才被允许进场观摩，大部分民众只能站在围栏外面往里张望。人群中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武警，密切地注视着大家的一举一动。一位古巴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古巴政府组织的狂欢节，相当于为老百姓提供的免费福利。

我站在街边看了一会儿，觉得实在是无聊，便离开人群向我住的地方走去。沿途路过好几个迪厅，从里面传出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声，那是古巴年轻人最喜欢的雷击顿(Reggaeton)，这是一种结合了牙买加雷击乐和加勒比流行音乐元素的新音乐形式，歌词里经常会带有一些色情意味。古巴政府嫌这种音乐太粗俗，曾经下过禁令，

但还是没能阻挡住古巴年轻人对这种新形式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宋(Son)还是索萨(Salsa)都过时了，雷击顿才是属于他们的音乐。

哈瓦那的白天太热，只有深夜才能让人感到一丝凉意。我拐到一条小巷子里，迎面走过来一个头戴棒球帽的年轻人，他怀里抱着一台体积巨大的蓝牙音箱，一边走一边随着音箱里传出的强烈节奏摇头晃脑。恍惚间我想起了中国的80年代，北京的大街上也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头戴麦克太阳镜，上身一件紧身花衬衫，下身是一条夸张的喇叭裤，肩膀上扛着一台四喇叭录音机，里面传出邓丽君的歌声。

然后，仿佛就是一瞬间，这些年轻人突然就从北京的大街上消失了，就像这位刚刚从我身前走过的古巴小伙子一样，转眼间便消失在哈瓦那的夜色之中。☑

央企违约破产的示范效应

从债券违约到申请破产，央企天威集团持续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浪潮下，天威集团的破产将展示出巨大的示范效应。

主笔 / 谢九

以新能源为主业的天威集团近日发布公告，天威集团及三家子公司已具备破产重整的条件，经上级批准，拟申请破产重整，天威集团将积极配合主承销商召开持有人会议，商讨破产重整后续相关事项。

早在此次宣布破产之前，天威集团就已经发生过债券违约，由此创下了首家央企债券违约的纪录。天威集团曾经发行两笔中期票据，分别是发行额 10 亿元、期限 5 年的“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11 天威 MTN1，以及发行额 15 亿元、期限 5 年的“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11 天威 MTN2。今年 4 月份，天威集团发布公告称，因发生巨额亏损，公司未能按期支付“11 天威 MTN2”的利息，应付利息总额 8550 万元，“11 天威 MTN2”成为首只银行间利息违约的中期票据。如果此次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天威集团还将创下央企债券本金违约的纪录。

天威集团陷入现在的困境，主要在于过去几年误判形势，对新能源的过度投入导致公司陷入巨额亏损以至于资不抵债。自 2011 年以来，天威集团已连续 4 年亏损，截至 2014 年末，天威集团总资产 129 亿元，总负债 209 亿元，技术上已经破产。公司原本是国内领先的变压器企业，前身是保定变压器厂，2008 年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成为其大股东，在新能源热潮时公司大举进军光伏和风电等产业，结

果导致今日的败局。按照公司的公告，“自 2011 年起，受全球经济放缓、整个新能源产能严重过剩、价格持续低迷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天威集团及部分下属新能源企业逐渐陷入经营危机和财务危机且日趋严重。目前，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和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资金已枯竭，已严重资不抵债，无力偿还到期债务；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停产已超过两年，资金已枯竭，对到期的债务已无偿还能力”。不过，对于天威集团而言，破产也并非意味着坏事，公司将可以在法律保护下有序清理债务，债务清理完毕之后还有望再次获得重生。

天威集团陷入今日的困境并不让人意外，真正意外的是作为一家央企背景的公司，能够以市场化的方式发生债券违约，并且进入破产重整的程序。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市场一直维持刚性兑付的怪圈，尤其是债券和信托市场爆发过很多处于违约边缘的风险事件，但是最终都由政府资金出面维护了刚性兑付，虽然从表面上看保护了投资人的利益，避免了社会动荡，但实际上这种违背市场原则的刚性兑付，对中国金融体系乃至中国经济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刚性兑付的怪圈干扰了金融市场的正常定价。在刚性兑付的保护伞之下，一些原本不应该获得资金支持的行业，都可以很轻松地以债券、信托等融资方式获得资金，而对于投资者

而言，由于金融市场从未发生过真正的违约事件，投资者也完全不关心金融产品的安全问题而随意购买，因为即使发生违约事件，最终也会有政府资金出面担保。

按照正常的资源优化配置原理，原本应该是有合理回报的项目更能够在市场上融到资金，但是由于缺乏正常的风险定价，真正能够融到资金的反而是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即使没有合理的回报前景，也会因为其政府背景而顺利募集资金，这就导致一方面是大量的僵尸国企挤占了有限的资源，一方面则是民营企业长期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难题。而大量国有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仅极大浪费了社会资源，扭曲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也导致我国很多行业陷入严重的产能过剩，多年来难以缓解，产能过剩的矛盾由此成为中国经济难以治愈的顽疾之一。

去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刚性兑付的怪圈开始被逐渐打破。去年 3 月份，超日太阳能公司宣布无法按期足额支付债券利息，我国债券市场终于爆发了第一起真正意义的违约事件。今年 4 月份，更名为中科云网的湘鄂情公司发生本金违约，在公司 4 亿元债券即将到期之日，公司公告称“公司通过大股东财务资助、处置资产、回收应收账款等方式已收到偿债资金 1.614 亿元，但尚有 2.406 亿元资金缺口，无法在 4 月 7 日之前筹集到足额资金用于支付利息及回售款项”。而

这次有央企背景的天威集团从违约到破产，则更具有象征意义，显示出管理层对于金融市场的违约事件有了更高的容忍度，不再以政府信用为金融市场的违约事件背书。

央企背景的天威集团从违约到破产，同时也预示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将会进入到新的阶段，对于大量的僵尸企业，天威集团的破产将起到极大的示范效应。

今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其中提及商业类国有企业，要“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依法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优胜劣汰、有序进退”。优胜劣汰，有序进退，这就表明了国有企业将要引入必要的淘汰机制。

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李克强指出：“国企改革要以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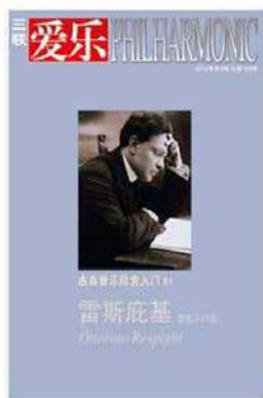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最终成效也要体现在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要做好增量、盘活存量、主动减量，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抓紧处置‘僵尸’企业、长期亏损企业和低效无效资产，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加快技术改造和内部挖潜，减少亏损、扩大盈利，增强企业活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促进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改善。”

出于保住GDP增长以及就业、税收等原因，地方政府近年来扶持了大量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自身没有造血能力，仅仅依靠银行信贷或者政府补贴等维持经营，这些原本应该倒闭而又苟延残喘的僵尸企业，不仅挤占了宝贵的资金资源，同时也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

国务院总理明确提及抓紧处置“僵尸”企业，在近年来也并不多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威集团违约并且进入破产程序也就不难理解，预计在天威集团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僵尸”国企步其后尘，该违约的违约，该破产的破产。同为央企的中国二重（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也陷入了违约和破产的边缘。二重集团发行的“12二重集MTN1”将于今年9月28日偿付利息5650万元，二重重装发行的“08二重债”于今年10月14日到期，届时需偿付本金3.10亿元及利息0.21亿元。由于公司违约风险较大，债权人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及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四川德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和天威集团主动申请破产重整不同的是，中国二重是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重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国企破产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对于身处困境的中国经济，摆脱更多“僵尸”企业的包袱，才能够获得更多继续前行的动力。☑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5年第九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81

- 聚集精华，传统与现代的糅合——雷斯庇基的管弦乐作品
- 詹颖春、田彬华、贾梦梦、张泽亮对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格里高利协奏曲》和《琉特琴古风舞曲与咏叹调》的精彩解读

逝者 纪念捷克钢琴家伊万·莫拉维茨

专访 德国钢琴家巴克豪斯早期访谈

话题 谈谈“弦乐三重奏”的前世今生

早期音乐 高卢圣咏（上）

作曲家档案 卡尔·玛丽亚·韦伯

演奏家档案 记俄罗斯钢琴家彼得罗夫

作品 听埃尔加两首交响曲有感

听片购片与收藏 科曾在 Decca 最后的五首莫扎特协奏曲录音

专题 加拿大男高音乔·维克斯（上）

《爱乐》2015年订阅须知

2015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5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凉山彝族百姓渴望改变命运，公益组织认识到做教育才最有效

近访凉山：慈善的理想与现实

解决凉山的问题，做教育似乎是最有效的，但修好一座学校，绝非砌墙铺瓦那么简单。如何拿捏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点，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

记者 / 刘敏 摄影 / 于楚众



四川越西县大营盘村小学的孩子们在校园里玩耍



彝族传统建筑多为土坯房，窗子小，做教室采光不好

去西昌市四合乡的路极其泥泞，摩托车是唯一自如的交通工具。所谓的路，有时候称为泥淖更合适，老乡的摩托车半个轮子陷在前人的车辙里，褐红色的烂泥巴甩得到处都是。我们眼见一辆 SUV 在泥地上打滑，四个轮子在山路上横着走，看得胆战心惊，

感觉分分钟要滑下山去。一辆大卡车干脆陷住了，司机无助地站在路边，只有一名农民正杯水车薪地用锄头挖开一条通路。

四合乡离凉山首府西昌市并不远，山路的前半截还能回望到远处州府现代化的楼群。但是车行半小时，就遇到

拦路的一群黑白的山羊，放羊的男孩已经十几岁了，完全听不懂汉语，打招呼时一片茫然，默默跟着母亲把一群山羊赶上山坡。从泥地里第二次把摩托车拔出来后，我们终于到了四合乡永定村火普组，这里是典型彝族山村的样貌：土坯房外挂成串的玉米，



大营盘村与外界隔绝，台湾人张平宜和她创办的“希望之翼”已在这里耕耘 15 年

仙人掌遍布墙头，一些学龄前的彝族孩子在房前自己打滚玩耍，个个拖着清鼻涕，因为不会汉语而无法沟通。

在一片土坯房中，雪白水泥墙的索玛花爱心小学是全村最显眼的建筑。4年前，索玛慈善基金会在这里建了一座板房小学，今年正在重新修建成钢筋混凝土建筑，工程已经完成了90%，因为“最悲伤作文”引发的风波，正在无限期停工。

为什么要修学校

索玛花爱心小学是索玛慈善基金会修建的第四所小学，在这所小学建立前，村里有100多名失学儿童。

户口是首要原因。索玛慈善基金会理事王跃介绍，因为四合乡离西昌市区很近，近些年很多附近高寒地区

的农民自行迁到了这里。“但他们生了孩子都不知道回原户籍地上户口，有的是超生，更不敢上报，到最后孩子长到七八岁了还是黑户，想上学根本报不了名。”

另一个原因是上学路途远，这也是凉山很多偏远地区的缩影：从火普组到山下的四合乡中心小学，摩托车尚且要走一个多小时，小学生往返至少要四五个小时，每天上学完全不现实。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住校，但一是孩子太小，二来没有户口，要额外交一笔借读费，让本身就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家长支付这个费用，显然是不现实的。

索玛慈善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跟很多慈善组织一样，都是先从送物资开始，这个办法最直接，但很快就被证明效用也是最短浅的。

“我们给彝族的孩子送文具、送衣服，刚开始去他们都很感谢你，但后来再去，他们就主动问：‘哥哥，这次怎么没给我拿东西来？’发现我们只是想走访一下，立刻就不高兴了。”到最后，村民们连旧衣服也不要了。王跃现在已经理解彝族老乡的心态了。“他们生活在赤贫线以下，只会考虑吃什么、穿什么、有没有钱，眼界就只有这么大。直接给东西就算给一百年，最后村里还是这样，甚至还助长了他们不劳而获的心态。”

解决的办法就是修学校。在凉山，小学有乡镇中心校、完全小学、教学点三种，像火普组此前有的就是教学点，只有一、二年级，之后再转学到中心校读书。索玛慈善基金会之前修的三所小学，都是把摇摇欲坠的土坯教学点扒掉再新建。彝族传统房屋因为是土坯结构，



大营盘村小学的孩子们拥有条件良好的教室

很难安装窗子，校舍里的光线都很差，新修的水泥房子则结实敞亮。

索玛慈善基金会把前三所小学都赠送给了当地政府，由政府派公办教师教学，基金会额外再雇用厨师，购买日常食材，给学生们提供免费的阳光午餐。

这在当地是一种常见的合作模式，成都义工网的创始人老黑也这样修过学校。

凉山昭觉县永乐乡冲洛村的村小原来是一处危房，几十名学生冬天也要在寒冷的露天上课。四川大学支教团最先发现这个小学，找到老黑一起合作，由学生们打报告，拿到教委的正式批文，老黑去筹钱，找义工做地勘和设计规划。最后由义工网找了村里一处荒地，又买了老乡十几平方米的农田，建起了一所标准的村级小学。

建校过程中，公益组织一般只负责建设，具体买地、规划设计、房屋验收等往往都没有健全的手续，看起来跟盖一所农民房没有太大区别，首要矛盾是解决迫在眉睫的失学问题。像老黑的福源小学，建造过程中也有当地党委、工商局、政法委、教育局等部门的人参与。“我们也必须有政府同意，有人出钱给盖学校，政府也觉得是好事。”凉山当地的媒体纷纷刊登了学校建成的消息。

索玛慈善基金会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给学校派支教老师。在2014年下半年，索玛花一共有19个支教点，每个老师最少持续教学一个学期以上，跟学校的公办教师一起授课。

山区里因为偏僻、条件差，很多地方都留不住教师，教学质量也堪忧。“你看孩子读课文看起来是会的，你单

独指着一个自然段让他读，就读不了——他们都是背的，就是跟老师咿呀地学舌。”王跃发现，一些学校教加减乘除、认时间的方式都是错的，支教志愿者能大大改善这种情况：“我们的老师要求是大专以上文化，大学生年轻人为主，也有退休的老教师，各行各业的都有。他们上去后，本地老师就不上课了，因为确实教得更好。”

老黑的成都义工网没有支教项目，他修建的福源小学，距离中心校有8公里的距离，一下大雨，整个路就都冲毁了，让孩子们走读上学完全不现实。福源小学过去只有一个初中水平的代课老师，“教学质量就别说了”。在工资之外，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总裁班每个月给老师额外补贴1500块钱，就是想把这位老师稳住：“我们已经把要求放到最底线，只要他能把这

几十个孩子管起来，哪怕一天、一个星期认识一个字儿都是好事。”

尴尬的“一步跨千年”

老黑第一次来到凉山是2008年，学到的第一节课是：鸡汤只能喝中间。

此前也去过很多贫困地区的老黑，第一次踏进布拖县乡下的彝族民居时，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因为大凉山冬季寒冷，牲畜常常跟人混居在房子里，一进门右边往往是牛圈或马圈，用木栅栏隔开，中间是火塘，左边是睡觉的地方，整个房间都是通的，牲口的气味儿满屋都是。鸡和猪是散养，屋里屋外地跑，老房子的地面都没有硬化，动物的粪便和泥巴混在一起。“没法下脚，一片稀里哗啦！”

彝族人非常好客，一来客人总要杀鸡宰羊招待，家里再穷，借也要借一头回来。但是第一锅鸡汤捧上来，老黑就被村长提醒要小心：“当地人卫生习惯不好，杀鸡根本没有清干净，下面不能喝，鸡肠子里的渣子全沉在锅底了；上面也不能喝，漂了厚厚一层油，那些油泡更是不干净，就中间的汤能吃。”老黑看着鸡汤真感动，也真不敢喝，从没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介绍凉山彝族自治州历史时，现在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一步跨千年”：凉山一直实行着奴隶制度，直到1956年民主改革，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当封闭的西南边陲突然开放，尤其是近20年来，一下子接入到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和全球化。自称为“诺苏”的凉山彝族人社群，始终是被动接受社会变迁，人与时代，落差巨大。

“很多学生身体都不好，家长也不会带他们去看病。第一，缺钱；第二，他没这个意识，说找个毕摩（巫师）来做一做法事就好了。”王跃听支教老师说过，学生生病了，老师给了药，孩子藏在舌头底下，转身偷偷就吐了——吃了回家会被爸爸打，毕摩

说了不能吃药。“你不能怪他们，千百年来在封闭的环境里生活，养成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掉的。”

老黑曾经问过一位彝族村长，对自己的老乡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村长给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答案：第一是死了人不要杀猪；第二是结婚不要收彩礼——这两个习俗足以让一个富裕的中等家庭直接进入贫困。老黑去凉山的第一天就见到了一场葬礼：“当地有人去世，家里要杀几十头猪、牛，互相之间还要攀比，举债也要杀猪。我眼见着学校操场上在分肉，死者十里八乡的整个大家族全来了，直接在操场上架起五六个大锅炖，每三斤肉放一堆，一堆一堆地大家分走。”

四川大学维吾尔族学生木拉提3年前在昭觉县支教，头一天他刚刚在微信上号召大家帮助贫困失学儿童，第二天参加婚礼，就发现彩礼高达10万元，而新郎家的房子破得连星星都看得见，之后只能靠出去打苦工还债。回到课堂上，木拉提想教育自己初一的学生们不要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没想到孩子们哄堂大笑：“老师，才10万元！太少了！”

这些习俗，若无深入认识，偏见自然容易产生——“民族劣根性？”老黑不同意这些说法，“如果说真正改变生存形态，他们能拿到的工作和机遇都太少了，地理条件有限制，个人能力也不足。”老黑发现，文化水平低下，让凉山的彝族人即便走出去，也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要么做最底层的活儿计，要么就是铤而走险。老黑曾经帮助过布拖县一间被撤并的村小，一位本地小伙子在他的支持下代了半年课，终因条件过于艰苦而作罢，走出到成都打工。

几年后老黑在成都再次遇见小伙子时，惊讶地发现，小伙子居然是带了村里的女人出来，在最低档的卡拉OK、按摩发廊里从事性服务。前一任老代课教师拉牛，是村里受人尊重的



文化人，可拉牛老师的儿子和儿媳妇外出打工第二个月，就在西昌火车站因贩毒被抓获，判了十几年徒刑和无期徒刑。

“如果孩子们不读书，将来容易成为社会的一个隐患。”王跃感慨，现在想教化成年人，跟他们讲道理，讲外面的社会和远大的抱负是不现实的。现在让孩子们会写自己的名字，读得



越西县普雄镇宝石小学的学生。“最悲伤作文”的小作者来自这所学校

懂合同，以后打工就不会被欺负。“等到他们有了下一代，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外部力量介入到凉山，改变现状，教育是关键，遂成共识。

样板小学

“两间盖在水塘地的‘小危屋’，占地十来平方米，全部的校产就是教

室内几扇只有铁条不见玻璃的木窗，两块嵌在墙上的黑板，两张讲桌和17套破旧的桌椅。”

“从创校至今，每年高达七八十名学生入学，却没有一个正式的老师，也没出现过一个正式的毕业生。”

——如果按照这个描述来寻找越西县大营盘村小学，现在真的会彻底迷路。台湾女记者张平宜和她创办的

“希望之翼”已经在这里耕作15年。大营盘村是越西县的麻风村，过去的麻风病人都在这里隔离，也被外界孤立。麻风村有大约1000名村民，近百名麻风病患者。

车子沿着水泥路一路盘旋，最后到达村子的最高点，面前是一座整洁的校园，三层的教学楼、宿舍次第排开，张平宜在楼上跟我们招手，一进门，

先招待了两杯手冲的蓝山咖啡。

“很多记者来我们这都会失望，以为会破破烂烂，没想到这么现代。”妆容精致的张平宜自带一种巨大的亲和力，预想到我们的吃惊，她的台湾口音有种得意。“之前有个义工过来，带了全套的野外设备，还拿了一口锅，真的是把我给气死！我就要满足他，让他在宿舍里搭帐篷睡。”

教工楼里有抽水马桶、太阳能淋浴、还有速度流畅的Wi-fi，一时间确实让人不知身在何处。学生们已经放学了，穿着校服在操场上玩耍，有些孩子正在帮助清扫杂草，把昨夜下雨的积水推到水沟里去。

在头一天，学校刚刚收了大营盘村山上的一个孩子，因为路远偏僻，这个孩子已经11岁了，从来没读过书，不懂汉语，也不会与外人交往，在校长和张平宜面前只会睁大眼睛，无助地左顾右盼。

学校收下了这个孩子。“否则还能怎么办呢？再不读书，今后出去打工都没人要。”张平宜已经很少遇到这样的学生了，罗桂平校长介绍，当地学生在入学前没有家庭教育可言，一年级孩子听不懂老师说什么，头两年全在教汉语。但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到了三年级，孩子的汉语就都很流利了，大孩子的卫生意识更好，宿舍楼外的水池一直站满了孩子，住校的小学生自己把袜子洗得干干净净。

前十几年，张平宜帮助学校扩展校园，修建教学楼、水渠、宿舍等基础硬件。她现在的工作是弥补政府的不足，学校22名政府发工资的公办教师，“希望之翼”额外雇了3名管理老师、5个厨房阿姨，今年新装修了

一个幼儿园，马上还会有3位幼师。

政府已经免去了学生的学费和午饭费用，“希望之翼”给住校的孩子提供生活费、早晚餐费，还有奖学金：初中前5名学生每个月补助150元，5~10名每月100元。“这个奖学金我们只发一半，过去也一次性发，结果发现有孩子头一天拿了钱，第二天家里就买了一台电视，那可不行！现在留一半我们帮忙攒着，学习好的孩子能攒2000块钱，毕业了正好上高中用。”

更多的变化是看不见的。凉山彝族结婚早，索玛慈善基金会教过15岁上学的女孩，刚上完一年级，学会写名字认字儿，第二年就辍学当新娘去了。张平宜性格泼辣，跟村民们约法三章，禁止在校内结婚，否则必须退回所有生活费。当地孩子小学毕业就

要出去打工，张平宜跟家长们吵过很多架，劝孩子继续读中学。有些毕业生被张平宜带到青岛，她的弟弟在那里有一家健身器材厂，孩子们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学习做焊接、车床、管理总务，不用再出去做苦力活儿。

大营盘已经有两届初中毕业生了，每届一个班，平均分已经连续两年在全县9所中学中位列第二。“我们人少嘛，也占了不少便宜。”去年的27名学生，有11个继续升入高中，余下的读职业中学，或者出去打工了。而在15年前，大营盘村的孩子连小学都一个也读不下来。

“教育帮扶见效特别慢，要先教好一代人，等到下一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好在罗校长已经发现，十几年前，大营盘村毕业的头几届学生，有的已经当家长了，这些学生的

孩子刚三四岁，就着急送到学校来。“读过书的学生已经认识到了教育的意义。”

大营盘村的学校，也许是慈善组织在凉山助学中最具样板色彩的。

刚过去的半年，张平宜花了10万块钱装修了操场角落的麻风病治疗室，翻修打通成幼儿园，给学前班的小孩子上课用。这个幼儿园跟此前我们见过的教学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墙壁刷成了粉红、奶黄、嫩绿，铺上迪斯尼童话形象的软地垫，给孩子做游戏用。以前的毕业生回校看张阿姨，被她带着一起给教室做装饰。张平宜指导当地工人，把碎瓷砖拼成了花坛，称赞他们“简直是素人艺术家！”——听到这种城市里才用得着的称呼，难免



成都义工网创始人老黑在凉山推行“脸盆计划”，培养学生的卫生习惯



孩子们搬进州政府建造的教学楼后，张平宜把在大营盘村最早援建的平房教室改造成了办公室和会客厅

跟凉山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明明我们上山时，还看见村里的幼童浑身赤裸，当众在马路上排便，可眼前的绿瓦粉墙与彬彬有礼的小朋友，又让人确定，那些贫困、文化上的鸿沟，至少在眼前这所校园里被克服掉了。

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张平宜的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一些当地官员对麻风村有偏见，难得来办事，都是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张平宜想把村里的孩子送到附近村小去读书，结果女校长告诉她，那只能会“来一个跑一百个”。

跟很多慈善组织一样，与基层打交道需要民间智慧。此前，张平宜想在普格县盖初中部，招收全凉山州麻风村的孩子，明明已经与政府选好了地址，也回台湾募到了善款，结果再

回凉山，领导换人了，冒出来“洪水泛滥区”、“泥石流潜在危险区”的理由彻底拒绝了她。

“如果我不是台湾人，不是个女人，早就被折腾死了。”一直被当作外宾，张平宜最后直接利用起这个身份。四川省台办、凉山州台办、凉山州对外友好协会变成了她的法宝，解决类似教师要不要开小灶、学校建输水管道等争端时，这些官员都被张平宜搬出来帮忙，这时候如果事情再发酵，“那可就是政治矛盾了”。

选择帮扶公办学校，也是智慧之一。“我是台湾身份，对当地没有置喙的余地。如果10年前是我自己办私立学校，我一走，这个学校就倒了，所以一定要跟公办学校合作。”现在张平宜还留在大营盘村，主要是有大量外县麻风村的孩子过来上学，如果她一走，很难保证越西县还愿意接受这些

外县的孩子。

罗桂平校长作为公办学校的校长，一直要维护张平宜和政府之间的平衡，不能偏袒任何一方。罗校长跟张平宜的关系很好，完全看不出来两人曾经因为学校教工厨房的事，有整整一年不说话。“大家最后意识到要各退一步，才能把事情办好。”外来的慈善组织，需要学会在当地的运作法则，当然也会给对方带来变化。罗校长举例，乡里面电力检修，总是不打招呼突然断电：“张小姐发现学校停电，外面路灯还在亮，就特别生气，觉得有电为什么不供学校。但是乡上的人可能觉得，我检修嘛，给你发什么通知，唯一的电当然要保路灯。”

多次争执之后，现在再检修停电，电力公司都会给罗校长打电话，让提前做个准备。“这都是张小姐斗争的结果，对我们本地也是一种进步。”

张平宜因为是台湾人，无法以她自己的身份在大陆组建非政府组织，2014年才刚刚在中国华侨基金会下挂靠了项目，可以合法地通过公募账号在大陆筹款。“希望之翼”的善款，之前主要来自台湾企业界。

“希望之翼”近些年在媒体上的露面不多，在台湾，张平宜动不动就会被戴上“红帽子”，如果宣传太多就会被政客利用。在大陆也没有主动宣传的必要：此前因为没有募款资格，大众和企业也没法给“希望之翼”捐款。

但是对索玛慈善基金会和老黑的成都义工网而言，宣传是必需的，这是他们募集善款最主要的途径。但必须注意的是，宣传到什么程度必须拿捏得当，一旦越界，好事的性质立刻就变了。

悲情的临界点

今年8月，一篇“最悲伤作文”在网上热传，索玛慈善基金会也由此被全国所知。

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网名老邪哥哥），7月做例行的支教检查时，在越西县宝石小学的墙上看到了一组优秀作文，其中就有这篇写着“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的作文——《泪》。

小作者木苦依伍木家共有姐弟5人，16岁的大姐、15岁的二哥都在外打工，木苦依伍木领着两个弟弟在家。他们的父母在几年前相继去世，孩子们每个月有678元的孤儿生活补贴，在宝石小学免费就读，12岁的木苦依伍木放学后要独力照顾两个弟弟的饮食起居。根据2012年的数字，凉山有7000人左右的双亲死亡孤儿，失去父母抚养的孩子达到了2.5万人，木苦依伍木的情况并非个例。

文章贴在“老邪哥哥”的微信朋友圈里，最初只有三十几个赞，没有太大反响，没想到被转发后，8月份

开始在网上传热。

木苦依伍木的童年超出了外界的想象，人们意识到，在这个时代，还有孩子过着这样的生活。木苦依伍木本人和索玛慈善基金会很快收到了92万元捐款，在网上同时发酵的，还有对当地政府的批评、问责。王跃看到文章走红时就意识到，事情要坏了，“我们给政府抹黑了”。

当政府的眼光落在索玛慈善基金会时，当初盖学校时忽略的手续，变成了基金会最大的问题。9月初，在从四合乡下山的路上，“老邪哥哥”被拘传，四合乡的学校因因涉嫌违法买卖、占用国有（飞播）林地，违法建设、非法办学、建设场地施工造成地质灾害隐患等原因，被勒令在8月末前自行拆除。因为舆论的声浪，“老邪哥哥”在24小时后被释放，爱心小学尚未拆除，目前无限期停工，马上要修好的新学校，现在一个学生都没有了。

索玛爱心小学缺少手续的情况，在当地的公益组织中并不鲜见，因此当地公益圈里大多报以同情式理解。也因为事情的悬而未决，让同侪们不知道自己如何应对是好。

老黑本来接了香港一家基金会的援助，打算9月下旬在美姑县开展自己的“脸盆计划”，把干净的洗漱用品送下乡，但在“这种风口浪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开展，如果要持续一天的卫生公开课上不了，物资也就白送了。

这不是老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2012年，《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跟着成都义工网的志愿者到布拖县下乡，报道了86个孩子因撤点并校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文章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老黑再次去做活动，第一次遇到了当地政府的全程监管，最后不欢而散。

张平宜不赞成用孩子个体讲故事。像木苦依伍木这样的情况，大营盘小学里其实也有，“但只说一个人的故事，很多人就会定向给这一个孩子捐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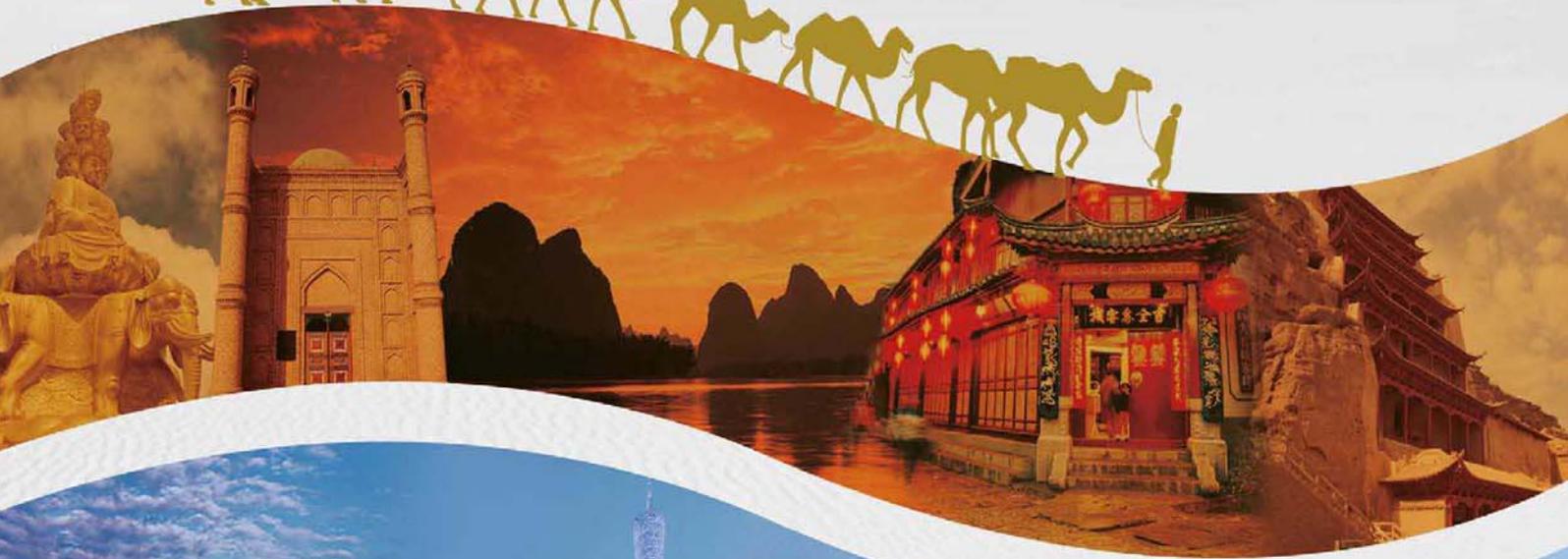
一下子涌过来几十万元，这对他和其他的孩子都不公平”。但是由于筹款途径的不同，张平宜的标准，对国内的基层基金会来说，是另一种难以达到的平衡。

老黑举例：壹基金2007年成立，头一年一共筹到了1067万元，2008年汶川地震一来，当年地震一项就筹到了1.2亿元。到了2011年、2012年，整个数字又掉到了三四千万元，到了芦山地震，15天又筹到了2.4亿元。“国内的公益捐赠，就是需要用灾难来刺激，甚至很多公益组织会暗暗期待灾难。公众只有受到巨大的震动，才想到捐钱，平时有多少人能意识到公益是一件长期的工程？”——这是中国目前慈善的特别状况。但是，当“灾难一捐赠”模式使用不当，不同的利益方之间曾有的平衡，便极易宣告破裂。

在凉山，据州政府部门最新数据，当地有180多家当地的公益组织，全国及境外有超过1000家公益组织在这里有项目，凉山的贫困、封闭，让这里也成为做公益的热点。国家社工培训基地主任郭虹做过多年非政府组织（NGO）研究，她告诉我们：因为凉山支教的特殊性，使凉山的慈善公益组织与当地不同层级的政府，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甚至各级大大小小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平时各自我行我素，维系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局面；若得到某位领导的首肯，还会受到特殊照顾；若是触动了某些部门或某位领导的“忌讳”，就会备受“检查、审查、考察、视察”的待遇。“一些地方官员也承认，社会组织来凉山，做了很多政府做不到的事情，对老百姓是好事。但是‘不按规矩办事’‘惹麻烦’，也是地方官员对社会组织最大的不满。然而，究竟什么是‘规矩’，在凉山支教有哪些规矩，绝大多数社会组织既不知道有没有，也不知道该问谁。”

（感谢实习生王紫祎对本文的帮助）

SILK
ROAD
丝绸之路



**BEAUTIFUL
CHINA**

2015

YEAR OF SILK ROAD TOURISM

美丽中国—2015丝绸之路旅游年





(邢咏摄)

须一瓜

须一瓜，她的小说与别人的电影

在记者与作家两种角色之间，她有尾条与头条之外，现在的参考系，多了电影一项。

记者 / 邱杨

最“苛刻”的观众

“这种感觉很奇怪，像你的，又不像你的。”看电影时，须一瓜的内心一直在做着斗争。作为原小说作者，她或许是《烈日灼心》这部电影最特殊的观众：太清楚小说本来是怎么回事儿，以至于电影中任何细微的差异，她都能敏锐地捕捉到，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

“看着伊谷夏在电影里走马灯似的露了几场脸，不要说周围观众觉得仓促，我都替她揪心，怎么能这样混几下就算走完了？”每当有这样的念头冒出，须一瓜就攥紧拳头调整呼吸，不断告诉自己：“这是电影，它在独立地完成一个艺术生命。”

5年前，当孙庆找上门来，代表蓝色星空影业提出购买《太阳黑子》小说版权时，须一瓜是极度犹豫的：隔行如隔山，自己对影视圈完全外行，看过的电影电视也极其有限，这家公司是否有能力把我的小说拍好？

但孙庆却志在必得。“小说一开场就像一场戏，杨自道开着出租车路遇三名劫匪，字里行间浓郁的镜头感一下子就吸引我了。”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太阳黑子》，所有积蓄的情感在结尾爆发出来，这个纤弱的江南女子瞬间泪崩了。身为公司文学策划部副主任，这个难得的好故事让她如获至宝。

孙庆的第一直觉就想到了曹保平导演。“小说的气质和《李米的猜想》有点类似，人性压抑而阴郁，感情浓厚又饱满。”很快，孙庆就收到了曹保平的反馈。“他特别喜欢这部小说，甚至说，如果我们不买他就自己买下来。”

导演人选的确定也让一直举棋不定的须一瓜渐渐安下心来。虽然只看过《李米的猜想》，她对曹保平导演的了解并不深，“但一直亲自当编剧的导演，一定是对自己的文字有自信的，要不然他不敢”。这让须一瓜有莫名好感。

剧本打磨和电影拍摄期间，须一瓜谨慎地保持着距离。可能外人很难想象，剧组在厦门拍摄期间，同样生活在厦门的须一瓜只探过一次班，放在桌面上许久的剧本也刻意不去看。不是不牵挂，只是她很清楚，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作品，《太阳黑子》接下来的命运已经不由自己掌控，成败皆是造化。

甚至在电影剧组欢天喜地领奖期间，须一瓜内心里更急切的愿望，是迅速找到有效的治螨药——高温天里海边潮湿的空气引发了居家螨虫爆发。“虽然心里由衷地为这个团队高兴，但你还是旁观者，转过身来你还是会会被生活琐事困扰。”这种距离感谈不上矫情，因为这确实是别人的荣誉，在须一瓜脑海里，这个意识太强了。

直到今年8月，电影正式上映前的媒体点映场，须一瓜才真正看到这部《烈日灼心》。实事求是地说，电影拍出了令人震撼的效果。曹保平导演的多项得分，赢得了多路行内人士的多角度钦佩和赞叹。几位主演的眼神，也打消了须一瓜对中国演员的眼神缺乏表现力的印象，“基本是小说人物的灵魂附体”。

看到自己的小说，在一个优秀团队的打造下，以一个新的生命形式诞生，而且如此口碑卓越。作为小说原著人，须一瓜感到自豪，但夹缠的遗憾始终存在。刚刚看完电影，这位原

著人就与导演兼编剧的曹保平导演在桌边坦率交流了。

救赎之惑

曹保平此时心里有些忐忑。请须一瓜看《烈日灼心》这部电影，对他来说有点儿像接受考试一样。

毋庸置疑，从小说到电影，最关键的变化也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设定：一家五口的灭门案到底是不是三位逃亡者干的？小说的前提，灭门案就是这三个人干的，接下来的14年逃亡是他们良心自我折磨和赎罪的开始。但电影却把这个前提彻底颠覆了，真凶另有其人。这也是须一瓜看完电影后最大的疑惑，为什么这样改？

曹保平有导演的无奈。“在今天的意识形态下，如果三个逃亡者是一家五口灭门案的凶手，这个故事90%的时间都在展现他们的自我救赎，而这个救赎所呈现出的状态甚至比我们普通意义上的道德标准和人性标准都要高、都要好，这样一部电影几乎没办法通过片审。”

还有一个原因，是担心观众的接受心理。因为，他自己也很难接受这样的结局。在他看来，这违背生活逻辑。“你很难想象，三个年轻的大学生、三个自我约束和标准这么高的人，竟然做出一家五口灭门大案。杀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个改动，其实在曹保平读完原小说后就有考虑。“这样一个恶性大案，必须是作案者心底有足够的黑暗，有那种冷酷，才能下得去手。”

听曹保平这样说，须一瓜理解了他。这是一个导演在审查制度下的妥

协，也是一个善良人的顾忌。“人总是不小心用自己的尺子去丈量世界，但不能因为自己善良，就说他们不可能。”在须一瓜看来，人性的原野广袤，而人性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魔鬼地带。

“一些人在负罪逃亡中，那种求生、求善的精神内核非常强大。对他们来说，余生就是灵魂减负和洗濯之旅。”须一瓜有朋友在讨论小说主题时说，中国人没有悔过赎罪之心，只要没人发现，罪过就不存在。须一瓜不同意。她认为罪错感、愧疚补偿之心，是人都会有的。这个心理和宗教无关，也许这种心理效应和基督教“原罪”意蕴有殊途同归之处。

作为小说作者，须一瓜清楚地知道，这三个少年，就是这么干的。因为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一个真实的老案子：三个铁路少年，犯下灭门大案后，在逃亡的十几年里，郁郁寡欢，勤勉老实，不敢娶妻生子，害怕没有明天拖累妻儿。其中的老大，迫于家庭压力，结了婚，但怀抱儿子，经常悲从中来。

多年后，在写了几十个中短篇小说之后，须一瓜仍然念念不忘这个赎罪故事。故事里三个少年由衷的悔过和救赎的努力，总让她看到天堂之光。于是，须一瓜在第一篇长篇小说《太阳黑子》中，就描述了这个带着神性光彩的赎罪故事。“这个人性的片段，它可能会过去，但其间的光芒，照耀过人间。”

当《太阳黑子》在《收获》杂志发表时，有读者也做出过和曹保平类似的反应：结尾能不能改，能不能不要处理得这么狠？

但须一瓜执意坚持，在她看来，这涉及小说的大动脉，是人物行动的逻辑力量。“灭门案必须是不可更改的严酷事实，因为这种恶不仅永远地毁灭了别人，也永远地毁灭了他们自己。事实有多残酷，噬咬内心的利齿，就有多么尖锐，引发内心的愧疚就多么难以撼动。换句话说，恶果在天平那头越重，求善的砝码才需要越多。否则，



电影《烈日灼心》剧照

他们怎么才能维持心的平衡舒坦？”

电影的筐子

《太阳黑子》的整体架构很吸引曹保平。“诸多人物构成了一个特别开阔的格局：辛小丰、杨自道、陈比觉这三个人物在原小说中的量足够，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弥漫开来，呈现出细致入微的、恨不得流动在血液里的艰难、焦躁的生存状态。”

但小说与电影是两回事，电影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呈现出小说所有的东西。这让曹保平感到特别痛苦：“用

一部电影根本装载不了小说里这样开阔的格局，你最后无法完成的，也恰恰是你一开始最感兴趣的东西，但你的野心却又想要去做。”

让须一瓜没想到的是，在曹保平最早的改编构思中，竟然是以房东卓生发的视角来结构全片。这让须一瓜惊喜：“这个想法太牛了，他很懂这个角色。”要知道，文学界对《太阳黑子》评价最高的就是卓生发这个“阴暗的好人”的塑造。

在小说中，房东卓生发眼见自己的妻儿、岳父岳母葬身火海而不救。虽然也有愧疚，但他并没有触犯法律，

与三个逃亡者比起来，他仍然是“好人”。但却是个阴暗的好人，他的自我救赎是不断窥探别人的恶，来证明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比他更恶。他将窃听器装置放到了杨自道和“尾巴”的房间，并最终告发了他们。

在三个逃亡者心中，罪恶感从未消失，反而越来越确凿。陈比觉有一次醉后痛哭，说：“我的头上发凉啊，那柄剑，那柄从天而来的达摩克利斯悬剑，就在我头上，越来越近了，我感到它的剑锋了，我头皮凉飕飕，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你们就没有感到吗？”

而卓生发在窥探的同时却一直祈望神的宽宥。但在伊谷夏看来，神已经看透了卓生发。“你从来就没有光明磊落过，你没有责任感、不敢担当，没有牺牲精神、没有勇气也没有人心美好的真情！除了挑剔别人，热衷发现别人的恶，你什么都没有！你是好人，阴暗的好人，到处都有你这样阴暗的好人，而我——讨厌你！”

同样是赎罪，三个逃亡者用爱的方式，而阴暗的好人却用恨的方式。对比之下，张力涌现。“但从房东的视角出发，完成起来很难。相当于要放弃原小说几乎90%的东西，然后重新建立，这样对于原小说损失得太多了。”与此同时，曹保平也认可身边人的意见：“这个视角太小众，太压抑，很难保证作品的开阔。”

最终，电影选取了警长伊谷春和协警逃犯辛小丰这条主线，大大压缩甚至舍弃了其他线索。须一瓜能感觉到导演对辛小丰这个人物的爱。“把所有的焦虑、所有的精神压力都给了辛小丰。”而邓超的表现也确实没辜负这个角色。

但对于须一瓜来说，每一个角色她都舍不得。在下笔前，她会花很长时间思考人物，直到人物能自主呼吸，有自主力量，这个人物就活了。在用墨时，她有足够的耐心、时间和创作力关照到每一个角色。也正是这部小说，让她真正体悟到什么是长篇系统工程：任何一个枝丫和分叉，都有用心，

最终都彼此勾连呼应。

作为作者和导演之间的桥梁，孙庆完全能理解一个原著者看到自己的故事在电影中完全被变掉，甚至很多珍爱的人物和环节都被舍弃的那种感受。从小说到电影的过程中，有很多外人不了解的微妙存在，比如宣传团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影导演和演员身上，无意地就忽略了原作者。“但须一瓜从来没说过什么，她总是通情达理，非常尊重电影团队的努力。”

须一瓜确实很能理解导演的痛苦，在她看来，电影的筐子没有小说那么大。“论出生，电影比小说更痛。”在聊天的最后，须一瓜和曹保平互致感谢，为了彼此的包容和幸运。或许，这已是最好的结局。恰如须一瓜朋友调侃的那样：本以为电影会在小说的基础上再盖一层楼，但电影居然在小说旁边又盖了一栋小楼。

小说的密码

相对于小说的安静，电影的动静太大了，这让须一瓜有些不知所措。“小说写作是一个人的工程，你默默规划，独自开工，寂寞打桩，孤独添砖。”经过两年的打磨，《太阳黑子》通过了《收获》杂志的“质检”，随后又被《长篇小说选刊》等几家报刊杂志转载连载，慢慢地也就归于平静。

须一瓜是她的笔名，开始只是随意起的，须是她母亲的姓。去四川开笔会时，四川朋友都坏笑说：你知不知“瓜娃子”是什么意思呀？她笑着说，就是傻呀，怎么不知道。须一瓜喜欢笔名和自己的生活距离带来的舒适感，过去，单位人不在二者之间画等号，这让她自在。

有一次，邻居在须一瓜转发的一篇带有照片的文章下，评论说：你长得很像须一瓜呀。须一瓜便顺着说：真的吗？邻居说：真的真的！“作为我的邻居，她没有必要去想象，一个成天穿着旧T恤、破拖鞋和她谈狗的

女人，有什么和她不一样的生活。”须一瓜喜欢这样的舒适现状，这也是笔名带来的宽松与安静。

但现在，这个舒适的距离，基本失去了。当电影把小说的大门再次打开，须一瓜和她的小说也被推到了聚光灯之下。“小说还是五年前的那个小说，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而今天，它忽然获得了那么多有耐心的目光。”

记性不太好的须一瓜甚至不得不重新阅读一遍，以准确回答读者们的问题。重温旧作，字里行间里隐匿的密码重新显露出来，回忆如同一杯冲杯还原的茶，在升腾而起的氤氲香气中扑面而来。

彼时的须一瓜刚刚来到厦门，凭着一腔拼劲成为《厦门晚报》的资深政法记者。须一瓜似乎有一种魔力，总能迅速拉近与人的距离。哪怕面对的是城市里的边缘人群，也总能敲开对方的心门。她的眼睛不大，却透亮亮的，笑眼弯弯间的赤诚娇憨，传递出恳切的倾听的善意，让一切都沾染上暖意。

她也重新拾起笔，写起近十年未动笔的小说。自第一部长篇《太阳黑子》起，《淡绿色的月亮》、《地瓜一样的大海》、《尾条记者》、《蛇宫》等小说都登在文学杂志的头条。意外的惊喜让须一瓜有种错觉，她打趣道：“可能是多年来我在尾条新闻的位置上待惯了。”

因为做过六七年政法记者，写过一些涉案小说，直到现在，须一瓜身上仍然贴着“政法记者”的标签，即便她已经淡出十几年。“人们总以为我是不是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得多。”记者的职业，与其说给了须一瓜直接的写作灵感，不如说让她对人性有了零距离的最好观察。

“这个职业，应该是给了我最新阔的人心视野。我需要这样的观察和认识。”在须一瓜看来，现实生活中其实布满了小说的密码，但上帝赋予每个人的解码锁不一样。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小说密码。按对了，人性的世界就向你敞开，所有的储备奔涌而来。■

欧米茄与女性

一个关于时间与时尚同行的故事

今年，欧米茄（OMEGA）以“腕表与女性”为主题歌颂其非凡传承。这一故事不单关乎時計本身，更将世界女性的种种态度、风格及个性——呈现；它亦讲述了欧米茄与全球女性时刻紧密相系的光辉历程。

女性权利与平等在 20 世纪被重新定义。在这个时代，女性不仅找寻到自我价值，更能够发出群体的呼声。而女性腕表的变革也在 20 世纪伊始悄然发生——一枚银色表壳上刻有精致花朵图案的腕表翩然问世，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款欧米茄女士腕表。在此之前，虽然欧米茄不乏雕刻精美的怀表，但自 1902 年，欧米茄开始赋予女士腕表独特的风格和特质。

然而人们需要时间来习惯女士腕表这种创新，这也不难理解。那时的某些圈子里，女性俯首看表依旧被认为是一个并不优雅的举动，它被视为女性在表达其无聊或者无趣的情绪。因此，欧米茄开始创作“隐蔽式珠宝腕表”，它外观看似一件珠宝，却内有乾坤地将一枚小小的時計隐藏其中。这些臻品時計与欧米茄其他低调而经典的款式一样，日渐受到欢迎。

时代在发展，欧米茄也不断变换着风格。随着历史进入“咆哮的 20 年代”（Roaring Twenties），短裙和短发在新潮女性中风靡一时；装饰艺术（Art Deco）运动向世界展示着丰富的色彩和大



胆的形状。欧米茄以装饰艺术珠宝腕表回应这些新式自由和态度。欧米茄深谙对审美有独特见解的女性对腕表内外兼修的追求，每一枚欧米茄女士腕表都拥有其享誉业界的精准品质。

事实上，从 1894 至 1935 年，欧米茄将 35% 以上的先进机芯用于女士腕表，这一比重令人惊讶。这一事实已清晰展现出欧米茄对女士腕表市场的潜力和重要性有着准确鉴别。

欧米茄在 1937 年推出的 Medicus 腕表即是对这一观点的完美例证。这款腕表操作简单且易于读时，专门为工作繁忙的护士所设计；它也是欧米茄历史上首款女士大三针腕表。Medicus 腕表的



出现不仅满足了医疗行业女性从业者的工作需求，也兼具了雅致与优美的外观。

在这一时期，欧米茄的广告也出现了摩登和中性元素，从工作、家庭和娱乐等方面展现出世界各地的女性缤纷多彩的生活方式。

20世纪50年代，广告随着公众态度开始逐步发生转变。就在许多品牌都在广告中迎合当时社会而刻板地塑造女性“主妇”形象之时，欧米茄却别具一格地演绎出令每位女性都与众不同的独立个性与时尚品味。如同大荧幕上的玛丽莲·梦露 (Marilyn Monroe) 和奥黛丽·赫本 (Audrey Hepburn)，欧米茄广告彰显与捍卫着优雅与个性兼备的女性形象。欧米茄1951年的广告中写道：“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性与男性一样，她们活跃，她们热爱运动，她们拥有忙碌的生活；她们与男性一样，对计时精准的腕表充满渴求。”

在这十年间，欧米茄对其女性客户的承诺得以完美兑现。1955年推出的 Ladymatic 系列腕表搭载着当时世界上超小的自动陀机芯。这款腕表将先进技术与典雅设计相融合，使其笑傲群芳，在市场上立即风靡起来。

自此，欧米茄明星時計开始络绎不绝。欧米茄“Flower”华贵珠宝神秘腕表是有史以来第一款以淡紫色金材质打造的腕表，诞生于1955年的此系列第一款腕表则镶嵌有华美钻石。事实上，许多款神秘腕表都是欧米茄与知名设计师联合创作设计。这一趋势持续到60以及70年代，那时，世界充满着各种大胆的尝试，丰富的色彩以及无穷的创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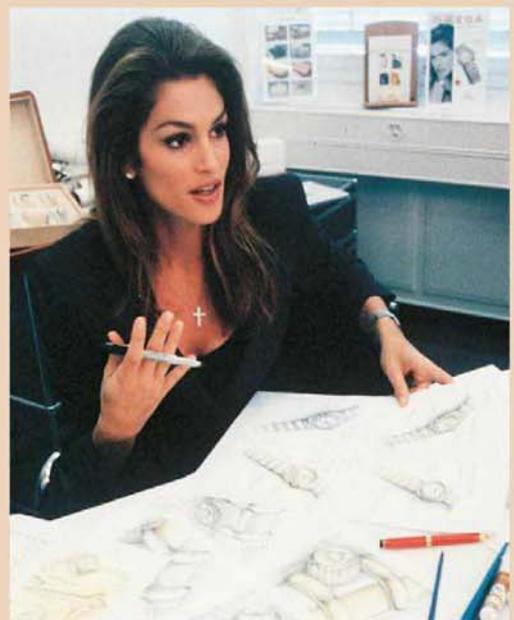
珠宝设计大师 Gilbert Albert 和先锋派艺术家 Andrew Grima 都在此期间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腕表作品，他们将贵金属和宝石娴熟运用于腕表设计之中，Albert 设计的“Moldavita”腕表中还采用了一块真正的陨石。

当1995年辛迪·克劳馥 (Cindy Crawford) 成为欧米茄首位名人大使时，欧米茄的品牌形象也与成功且自信的女性群体紧密相连，欧米茄迎来全新

的时代。妮可·基德曼 (Nicole Kidman)，高尔夫球星史黛西·路易斯 (Stacy Lewis)、田径明星选手杰西卡·恩尼斯-希尔 (Jessica Ennis-Hill) 等电影界、体育界和模特界的精英人物开始成为欧米茄名人大使，时至今日，她们仍然是欧米茄名人大使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纵然时光流转，欧米茄始终与女性不断蜕变的态度和风向同行。20世纪已然成为历史，在女性对世界有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的今天，欧米茄无比骄傲于成为女士腕表制作领域的业界领航者。每一枚欧米茄的腕表，都兼备优质机芯和至美外观，完美实现“内外兼修”。而事实上，若干款式女士腕表所需要的工艺精细度和细腻程度犹胜男士腕表。

毋庸置疑，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欧米茄都致力于将其标志性的精准品质和唯美风格赋予每一枚女士腕表，并将一如既往地选择欧米茄腕表的卓越女性中汲取灵感，与之同行。





野生救援
WILDAID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WHEN THE BUYING STOPS, THE KILLING CAN TOO.

IVORY ~~X~~ FREE
拒绝
象牙





(蔡小川 摄)

姜文

姜文电影，寻找一种观影关系

作为导演的姜文，已经有了20年的经历了。纪念活动，虽是对历史的回顾与梳理，但绕不开的仍然是《一步之遥》。喧嚣之后，我们可以说点啥？

记者 石鸣

2015年4月13日，杭州西湖湖畔的一座山庄内，“姜文导演生涯二十年艺术周”的庆祝活动正在举行。媒体照例对姜文抛出了在这样的场合下最应景的一个问题：20年来，5部作品，您感到最满意的是哪一部？姜文的回答和4个月前没有区别：《一步之遥》。

两个月后，在姜文北京的工作室里，我们再次向姜文求证：您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有没有赌气的成分？姜文的态度让人很难怀疑他的诚恳：真的是这样想的，确实没有赌气。之前他解释他这么认为的理由是，《一步之遥》拍出来了他想要的样子，他希望实现的，电影中都实现了。这一次，他多说了几句：“第一，我也不会拿我的几部片子互相去比较。第二，我一般都隔几年才拍一部片子，前面的片子因为我也不看，我都给它归零了。刚拍完的，当然是最新鲜的啦，就喜欢这个呗。”

“姜文一出来，就是一个有相当成熟度的创作者了。”台湾著名电影制片人、学者焦雄屏说，“在相当的程度上，他每一部作品都有变化，二十几年，就这么几部作品，可以说每一部都是传世经典。”

或许可以佐证她的这一说法的一个事实是，五部电影中，除了最近的《一步之遥》，前四部都已经出了书（《诞生：一部电影的诞生》、《长天过大云：太阳照常升起》、《骑驴找马：让子弹飞》、《鬼子来了》则是台湾版的《姜文的“前世今生”：鬼子来了》）。一个导演，拍的每一部电影都出专著，即便是在世

界范围内，恐怕也很难找到先例。

当演员的时候，姜文是“影帝”，等当了导演，他和他的作品一起变成了20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种现象。人们对姜文的期待，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导演”的范畴。《一步之遥》在中国上映后，掀起“差评”波澜，局外的焦雄屏感觉非常奇怪：“坊间那么多烂片，没人花时间骂，因为不屑一顾，宁可花很多力气去骂一个花了很多力气去拍电影、想好好拍电影的人。”仔细一想，她又明白了：“这足见社会是在乎姜文的，所以才会特别关注。他还是中国社会的宠儿啦，是大家非常珍惜的一个宝贝，也是大家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指标。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很高，但是只讲期待值是不对的，期待值只是一个面，应该说，这个社会特别在乎他给大家的精神食粮。”

在姜文的作品中，《一步之遥》并不是第一次引起争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确给人们带来了最多的困惑。这些困惑迫使我们反思：20年来，姜文的创作脉络是什么？《一步之遥》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是什么？今后，我们应该怎样去期待姜文？

同一个米兰，同一个马小军

毫无疑问，姜文的电影是一种“作者电影”。然而，姜文创作的个体性比一般的“作者导演”贯彻得更加彻底，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他电影中的人物。“今天的绝大多数导演，是看电影

来拍电影，他们从电影中产生自己的电影感、电影故事、电影语言，可是姜文不是。推动他去拍电影的东西，不是电影，是他个人的生命经验。他原创的那个动机、内核，是从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出来的表达。”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说。

因此，拿库斯图里卡、费里尼、昆汀·塔伦蒂诺等等来比附姜文，都没有那么恰当。“和他更相像的是侯孝贤，两人的影像风格当然迥异，但是创作的原动力相同。”拿侯孝贤和杨德昌比一下就更明确了：杨德昌不是牯岭街少年，但侯孝贤一定是《童年往事》中的阿清。姜文，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马小军，也是《一步之遥》的马走日。

焦雄屏的感触是：“他的每一部电影都在变化，因为跟他的心境有关。看他的电影，就知道他在每一个时期心里都在想什么。”

《一步之遥》的特殊之处，也许在于姜文在电影中以一种令人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袒露与表白。“在《一步之遥》中，姜文所有的隐私都在。他把自己生命中最疼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人看了。你可以在里面看到他成长的经验、自己的情感、生活的经验、他的婚姻状态，所有的都在里面。即使在世界范围之内，也很少有导演肯这样，我有把握这么说。”戴锦华说。

她和姜文基本没有私交，她的判断依据完全来自姜文的前四部电影。

还有别的人也看出来马小军和马

走日之间的联系：16岁的马小军，长到40岁，大概就是马走日的样子。法国电影制片人让·路易·皮埃尔斩钉截铁地断言：“姜文的第一部电影，和他目前为止最后一部电影，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这种比较包括爱情关系建立的方式、镜头运动的模式、展现出来的情绪类型。

值得说一句的是，让·路易就是当年将《阳光灿烂的日子》从濒临崩溃的边缘发掘并挽救回来的人。他当年看这部电影的样片看了45分钟，就断定姜文是个天才。“我知道天才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只和天才合作——贝特鲁齐、费里尼、伯格曼、法斯宾德、科波拉、科恩兄弟……年轻的时候我就和法国最优秀的哲学家们来往——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我的电影老师是罗伯特·布列松。我非常熟悉电影史，我知道，在电影中、艺术中发现一个天才是多么稀缺的事情。”

当年，他拿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粗剪样片，在观影过程中就着黑暗匆匆写下了一份影片镜头的分析笔记。这份笔记后来被翻译后寄给姜文，如今我们还能在记叙《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片诞生过程的那本书里读到它。他对这部片子镜头语言的评点，有些成为经典判断，有些则成为后来人们争论的焦点。

“我可以写上整整一本书，来解释《一步之遥》的每一个镜头，而读者将会惊叹于我看到了什么。和他的第一部电影一样，我确切地知道他这部最新的电影每个镜头是怎么拍出来的，以及置于电影史的语境时，有什么含义。”

不幸的是，姜文过早地成为一个“神”。长期以来，他导演的电影总是给人们一种充满男性荷尔蒙、阳刚四溢的印象，观众常常不由自主地把姜文等同于他电影中的角色。“别人看上去，姜文就是被女人包围着，是想要什么女人都可以得到的一个男人，他还会有什么精神的、心理的不满足吗？”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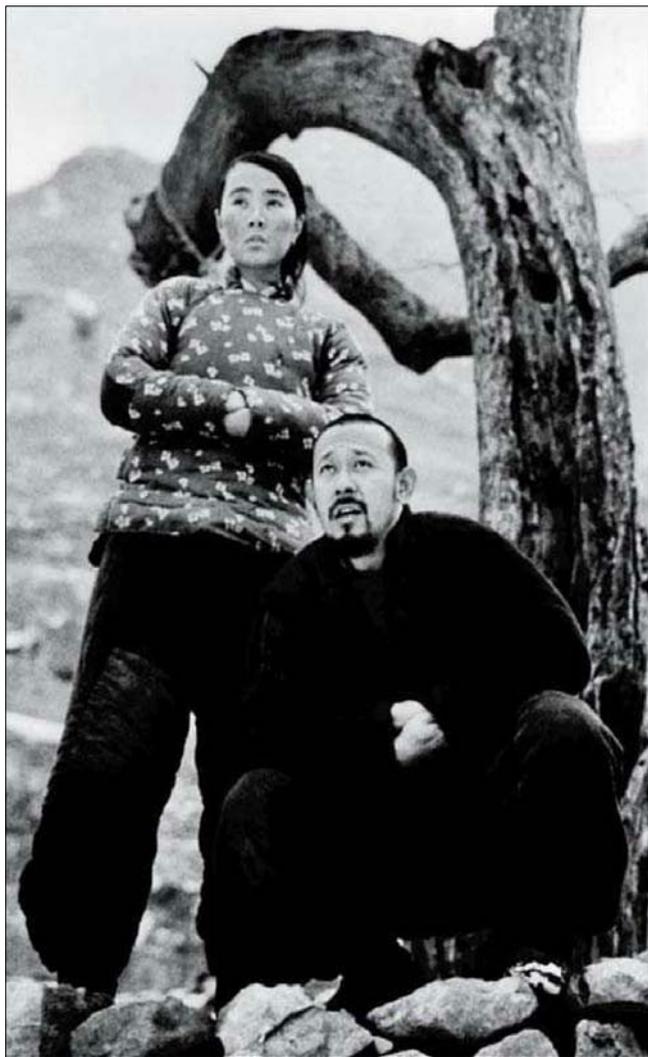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导演姜文和主演宁静、夏雨

只有那些把姜文还原为“人”的人，看出来姜文的情感世界，以及他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周遭世界的体认，如何成为破解他电影之谜的一道窄门。

姜文曾经描述自己的体验：“我也许很早就发现，人和人很不一样。表面上我们同处在一个空间、一个环境里，但实际上脑子里都在形成极其不同的世界。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其实本身对生、死、时间、真实的理解非常不同。”

人和人真正的交流、个体之间相互理解的困难、不断发生的误读——

姜文对这些东西一直是痴迷式的追问。在现实中，在面对直白的、赤裸的情感时，他似乎总是具有某种耻感、障碍，总是不由自主地受阻。而在他的电影中，萦绕着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创伤、迷惘，一直存在着某种记忆的力量。米兰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分身，在各式各样的马小军身边出现。“你在他所有的电影中，反复看到这种米兰式的白日梦、米兰式的伤害，一直在出现这样的主题。”戴锦华说。等到了《一步之遥》，姜文简直是把自已的情感秘密和盘托出：马走日对待完颜英和武



电影《鬼子来了》剧照

六的状态，和马小军喜欢米兰的方式是多么相近啊。“你当然就可以知道，这是他生命中最真的东西。”

姜文常常受到一种批评，女性在他的电影中往往只是简化为一种符号性的存在。拍完《一步之遥》，他问焦雄屏，这次电影中的女性的存在是不是更加具体丰满了。焦雄屏很实在地回答说：两个女性角色的刻画的确内在了不少，然而，对她而言，仍旧是一种客体性的存在。姜文很无奈：那就只能这样了，这就是从我的眼睛里看出去的她。

让·路易回忆起《一步之遥》中姜文镜头下的周韵时，不禁泫然：“他把她拍得多么美啊！”他谈的是大帅婚礼上《祝酒歌》那场一分多钟的戏。

“茶花女在《祝酒歌》中唱的是什么？是女人的自由。周韵的形象如此强大、如此解放，我在以前的中国电影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性形象。当然巩俐在《菊豆》等片子中的形象也很强悍，可是她在镜头中的位置并没有像周韵这样——直面艺术，态度毫不退缩，即便是西方艺术也不例外。周韵的这段戏，说明了她可以表演任何艺术，并且她的表演能够让人感受到这种艺术的内在本质。”最后，他提醒人们注意姜文的一往情深。“不要忘了，是谁拍的这个镜头？姜文。这是一个艺术家献给妻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礼物。他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的爱。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真正地爱着他的妻子。”

个人、历史与市场

另一方面，姜文的电影当然绝不止于和个人有关。“他（的电影）高度个人化，但是又通过个人写历史，个人化后面透露出来的中国历史图像，非常独特。”戴锦华说。

焦雄屏把姜文20年来的五部作品重新排列了一遍，看出了一部中国百年史：“按顺序来讲，首先是《让子弹飞》，晚清、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前后，然后是《一步之遥》，20年代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华洋杂处，然后是抗战时期的《鬼子来了》，然后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太阳照常升起》，最后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他自己。这是一个中国近现代百年史，每一个断

代他都联结到了，每一个段落他都思考过。”

还可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观察姜文的电影与中国电影历史的关系。“《阳光灿烂的日子》诞生前后，中国电影处于未死方生的转轨期，一边是既有的电影业已跌落谷底，另一边则是多种形态、多种资金来源的制片方式已暗流汹涌。”戴锦华说。1993年，《霸王别姬》在戛纳电影节获金棕榈奖，1994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威尼斯电影节获最佳男演员银狮奖，这两部影片都是国内制作班底使用境外资本制作。1995年，好莱坞来了，中国观众热情拥抱了“十部大片”，然而同一年公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仍旧取得了票房辉煌。“姜文的确特立独行，但他作品序列的某种后现代底色，令他从未采取无视市场的态度。”戴锦华说。

“姜文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则撞在另一个转折期的角力点上。2000年，是延续十年之久的、针对中国的、全球‘后冷战的冷战情境’临近蜕变的时刻。国际舞台上，以电影为主场，持续的欧洲国际电影节和中国国家电影局之间的博弈和缠斗正在淡弱，但未终结。类似博弈带有浓重的‘冷战’意识形态性，但在国内的语境中，其内容物又并非意识形态性所能完全概括，它联系着制片和管理体制转轨，联系着冲突却并行的体制间的多重尴尬和纠结。”《鬼子来了》获得2000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却至今未能在中国电影市场公映，“因此也就无从界说影片与中国市场的契合与否”。

“毫无疑问，是《太阳照常升起》的票房败绩造成了（人们对）姜文‘反市场’、至少是‘非市场’的定见。”影片投资1000万美元，票房仅仅2000万元人民币，为了宣传电影，姜文在全国上下到处奔走，然而，“一句‘看不懂’几乎囊括了全部市场反馈”。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姜文的电影已经有整整12年没有进过电影院，这是



电影《一步之遥》剧照

他的作品第一次与市场需求之间产生严重错位。

“其实，这部电影有明星，画面有视觉冲击力，故事也具有相当的原创性。唯一的障碍，是《暴雨将至》这样的电影风行以来，人们建立了对四段（或三段）式的故事的惯例性预期：看似互不相关的故事在影片终结的时刻必将完整闭合。”然而，《太阳照常升起》没有满足观众的这一预期，它的循环时空设置表面上是在玩一个推

理游戏，实际上却拒绝落入一个完整闭合的理性逻辑。很大程度上，它的美和诗意也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拒绝。之后，电影进入了另一个层面的讨论：生、死、爱和被爱、时间、因果、永恒、背叛和伤害。“似乎都是真实生活经验，但又和真实生活经验有一点错开。”

一个共识是，《太阳照常升起》的票房失败，催生了《让子弹飞》。不止一个人认为，《让子弹飞》在姜文的电影序列中是一个例外，因为这部作品

不再具有“姜氏”的精神品质，不如说，这是一个首先定位于市场的产品。此前，尽管姜文并未“反市场”，但他也从未“为市场”，而一直是“为艺术”。在戴锦华看来，姜文这一次妥协了，但是他仍旧拒绝屈服，后来的《一步之遥》即是明证。

《一步之遥》也许降落在中国电影史的又一个关键点上。2010年，《让子弹飞》票房火爆，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100亿元人民币，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大地上影院的建设、银幕数的增长呈火箭上升的态势，票房总数以国内国外资本都感觉不可思议的速度年年攀升，转眼之间，电影的票房单位全都变成以“亿”计。2014年12月，《一步之遥》即将上映时，中国电影的全年票房接近300亿元人民币，人们已经把突破300亿元的希望寄托在这部电影上。

《一步之遥》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这也并没有影响中国电影票房数字的大踏步前进。“2015年的总票房，估计要到400亿元，5年时间，增长4倍，我觉得这个（速度）任何人也没办法想象。”香港英皇影业行政总裁利雅博说，“整个发展，快得有点跟不上了。”

《一步之遥》拍的是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那是一个镀金时代。而当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电影市场，却是一个金钱正在极度涌流、人们欲望极大膨胀的“真金时代”。尽管姜文始终拒绝正面承认，但是《一步之遥》在他的电影中对当代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指涉性，这种指涉不仅宽泛、庞杂，而且显得空前的有意识——大众文化、媒体话语、电影伦理、娱乐消费等等——多种议题被打包在内，许多地方的社会批判甚至已经不是隐喻，而是赤裸直白的明喻了。

从某种角度上说，对《一步之遥》中的历史情境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看穿这部电影与当下的关联。影片中的故事原型“阎瑞生案”，涉及到中国电影诞生的前前后后。“每个国家的电

影诞生时的面貌，其实都反映了这个文化的一种特性。对过去的展现，同时也喻示了未来。阎瑞生就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隐喻。”姜文说。

阎瑞生的时代，其实离流行话语塑造的“高大上”的“民国范儿”相去甚远，真实的历史充满“荒谬、混乱、痴狂、甚至超现实”的情境，“整个社会到处都是荒谬至极、甚至骇人听闻的事情”。“现代人可能都有点儿不太清楚那种情况，那个时候中国人刚刚逃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生活方式，突然变成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整个社会，在一个几千年不变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不知道往哪儿变的情况，在阎瑞生的时代，视野是无限开阔的，于是有很多很多的非分之想，其实那时候中国好多东西都没有了，都是凭非分之想创造出来的。”姜文说，“这种非分之想，也是触动我拍这部电影的源头。”

不得不承认，姜文对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和历史地点——租界和军阀并存的上海——的选取是非常敏锐的：一个旧的社会完全崩塌，新的社会尚待建立起来，这种时刻，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史上是少有的。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未来会变得怎么样，但是所有人不约而同地觉得未来会变得更好。面对空白，人们所感受到的不是迷茫，而是盲目乐观——这个社会一切的边界都已经消失，成为一个奇怪的完全开放的状态，这种开放并不是指政治自由，而是指个体感到自己的生活世界就是整个世界，因此，世界出现了无数的可能性，人们在心理层面上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恋物”（fetish）状态，而且是对未来本身的迷恋。一大群人一起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用姜文的话说：“爱穿西装穿西装，爱穿旗袍穿旗袍。”这并不单单指涉个体行为，而且指个体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期许：穿上西装的，会认为自己真的变成了一个西方人——无论自己的肤色、长相、讲什么语言，只要穿上

西装，其他人就应当把我当作西方人，因为一个新社会来了，不再是社会决定个人，而是个人决定社会。

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之下，马走日变成了典型时代的典型人物。他的原型阎瑞生其实也已经充分具有这样的特质：出身卑微，头脑聪明，好赌，好投机，善于察言观色，像变色龙，在上层社会混得如鱼得水。姜文强调马走日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不自知”：“那个时候，整个大时代都是那样，个体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冒险。”事实上，他觉得“《一步之遥》拍得还远远不够，不够非分”。

“一步之遥”的多重错位

然而，《一步之遥》遇到的第一个困境或许就是，不是所有人，或者说大部分人其实都并不关注这部电影和真实历史的互文关系。“一方面，《枪毙阎瑞生》这部电影早就没了，没人看过这部电影，姜文没看过，我也没看过。”戴锦华说，“另一方面，这你没办法跟好莱坞比，好莱坞的电影史是连续的，好莱坞电影人的观影经验一代代也是连续的，我们是破碎的。说得更残酷一点，《小时代》的那些观众，恐怕连姜文是谁都不知道，更别说阎瑞生了。在中国电影史内部，这个互文关系只能被告知，不能被体会。”

很多人认为，《一步之遥》的失败主要应当归结为艺术与商业的错位。换句话说，既然拍的是艺术片，就不该一味地以商业手段进行包装，“忽悠”观众进影院，而从另一个角度，既然已经进入商业体制运作，从投资方和观众的双重角度，人们都“有权利”要求姜文按照商业的游戏规则，好好讲故事。对这一点逻辑的认同，就连一贯以来最支持姜文的那些人也不例外。戴锦华一再强调，她对姜文的这部电影的支持是“审慎的”、“有保留的”，她的保留之处就在于：“它采取了大资本运作，采取了媒体炒作，采



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剧照

取了它在叙事和美学层面上拒绝的那些力量，想寻找这种力量的支持。这个首先表现了姜文的天真，你不可能用媒体和广告的方式就让观众去接受那些冒犯、骚扰他们的东西，让他们从《小时代》的怡然自得中惊醒，但是这部影片的运作过程好像希望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东西。”

然而，这个逻辑无法解释：为何一部分对艺术电影原本应该没有障碍的观众，在调整了观影期待以后再面对这部电影时，依旧感到一种无法释然的困惑？事实上，相当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影片上映之后，观众坐在影

院里努力看电影，却始终“视而不见”，姜文和他的团队在之后的宣传中口干舌燥地反复阐释这部电影的意图、构思、意义等等，人们似乎也“充耳不闻”。这些人除了极少部分是“王天王式”的拥趸之外，大部分其实还是不抱有任何先设的政治或消费立场、只想走进电影院好好看一场电影的普通人。然而，在这些人 and 创作者之间，仿佛还是存在一堵隐形的铜墙铁壁，这边过不去，那边也过不来。

姜文也察觉到这一次的观众反应和《太阳照常升起》时的差别：“上一次是两极化，这一次全都是骂，一刀

切。”戴锦华说：“上一次观众说看不懂是真的看不懂，但是在这个电影当中，人们说看不懂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感受到的情绪，是比看不懂强烈得多的。重要的不是看不懂，而是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不是故事怎么回事儿，而是说，怎么会？好像我都懂，可是我又都不懂，最后我只好说，我不懂。”

事实上，仅就影片的内容及其意义而言，姜文讲得很清楚，甚至有过于直白之嫌：《一步之遥》就是三个故事，马走日如何犯案，武六如何拍关于他犯案的电影，王天王如何演关于



电影《让子弹飞》剧照

他犯案的戏，“其实是同一个故事讲了三遍”。

为了怕观众看不明白，姜文还采用了顺叙的方式，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揭示这一案件的真相，接下来再叙述后续引发的事件。从剧本的第一稿开始，这个叙事构思就没有改变过。“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唯一的、最好的、最合适的方式。”姜文说，“因为它从一个真相开始，像一个爆炸一样，我必须让大家先看见这个（真相），否则大家会忽视这个。我愿意这么做，其实是为了让大家看得容易，先让大家看见真相是什么，然后看见他怎么

有效地被扭曲成王天王这样，看见不自知的带有真相素材的人不断地在逃跑或者躲闪，或者为了生命而逃命，为了荣誉而入狱。而一个本来希望跟他们保持距离的人却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最终去找真相的人，甚至不惜把自己陷入一个不利的境地。我通过这三头，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然而，在事实的观影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把“真相之后”和“真相”连在一起看，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反应过来，被我们抛在脑后的“过场戏”，原来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我们一直等待所谓的真正的故

事开场，最后却发现整部电影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似乎只是围在外面看了看西洋景而已。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导演认为的“真正的讲述”，被观众忽略成为可有可无的桥段？

不止一个人意识到问题大概不是出在影片内容上，而是出在叙事结构上。正如姜文所说的，三个故事，其实只是一个故事，而真相的“爆炸”，衍生了后面所有的内容，与此同时，这些内容所指涉的意义，必须通过回到真相本身才能完成。整部电影不再是对“故事的讲述”，而是对“讲述的讲述”，时间上的“顺置”，实际上是意义上的“倒置”。于是，叙事变成一种套层映射的自相关进程，形成了一个蛇头咬住蛇尾的闭锁圆环，所有的道理、意义都只在这个圆环内部进行循环。电影成为一个封闭的空间，给观众留下了进入的困难。

换句话说，观众不是“看不懂”，而是“进不去”。戴锦华发现，姜文原创了一种结构性的“观看”与“被看”自我完满的“反缝合体系”，使得“整个影片从叙事结构，到镜头语言结构，到每个场景的结构，都是在‘反缝合’”。

“其实，电影的不同机位、不同角度、摄影机的运作变化，都是在给观众产生一种我在主导、我在观看的这种感知，这是一般电影叙事的秘密。在这个电影中，姜文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观众一直被封闭在外面，你以为你能进去了，结果下一秒又被推出来了。这个故事营造了一个非常光滑的表面，你一次次踩在上面，却一次次滑走。你始终停留在其表面上，不能进入故事，不能在故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些敏感的观众已经察觉到自己在这部电影中的“多余人”处境。事实上，一个人类学者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常常遇到这样的处境：自己进入一个陌生的社区，除了自己之外，所有人都是彼此熟识的，而自己一个人都不认识，和别人无法发生互动，

这个时候，这个人会觉得好像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自己，会感到紧张、手足无措，然而其实根本没有人关心他，他只是一个旁观者，然而这个旁观者的位置好像成了所有人都在看的位置。直至他找到一个主体位置，才能解除这种“所有人都在看着自己”的不适感。

然而，《一步之遥》自始至终不断地阻止观众找到一个这样的位置。它不仅一次次地拒绝观众的观看，而且通过这种拒绝，反过来实现了对观众的观看。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一个我们的视线无法穿透的东西，会让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反过来是在盯着我们自己。走进影院前，我们以为自己将是主动发起并随心所欲控制“观看”行为的那一方，结果却发现，我们不断地从主体的位置上掉落，尽管一次次尝试挣脱，却还是徒劳地陷于一个不得不“被看”的客体境地。

此时，电影本身变成了一个有着巨大实体的“他者”，而我们面对电影的不适，其实是我们的“自我”遭遇“他者”时的不适——陌生、无力、莫名、困惑、挫败、焦虑、乃至愤怒。因此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对《一步之遥》带有一种反抗的情绪，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侵犯，不知不觉成了“受害者”：我进电影院来看你，可是我不仅没有看到你，而且你还看透了我作为一个观者想怎么看你，最后的结果是，我从头到脚被暴露在你的目光之下。观众与电影之间传统“观看”与“被看”的关系被彻底扭转了。在那一刻，《一步之遥》成了电影院里最有力量的观众，从上到下地俯视着我们，而我们无可选择、不能动弹地仰视着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变成射灯之下唯一存在的电影。

一个导演的雄心

了解姜文的人都说，《一步之遥》呈现为现在的结果，是姜文有意的选

择。“他选择了这样的手法，应该要预料到观众的反应。”焦雄屏说。

她问过姜文，为什么他现在的影像越走越繁复了，连像她这样的专业电影人，“抄笔记的，都追不上”。姜文以前的电影密集的主要是台词，然而，《一步之遥》中影像已经华丽到冗余，声音丰富到聒噪，这种“信息过载”给人的感官带来的超负荷刺激，已经远远不是“给大家端出来的都是干货”这样的说辞可以轻描淡写而过的了。然而，“你看他从前的片子，他不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作画面与台词的关系，什么叫作留白”。戴锦华说。

“我看到的中国，不是小津式的影像。”姜文说，“我拍出来的荒谬，还远远不及现实世界。”

“一个导演，一辈子永远在拍一个题材的电影。”他又说，“希区柯克，永远拍一个电影，就是惊吓，黑泽明永远是一帮武士的事儿。”

“那您呢？”

姜文反应很快，马上拒绝回答：“我不知道，这个是让别人说。”然后他又想了想，补充道，“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说，怎么都想找一个接近真相的东西。”

寻找真相——或者我们换一个词，真实——并不稀奇，有意思的是，姜文是一个导演，他用以讨论的手段是电影。而电影和真实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自从电影诞生以来就不断被讨论的问题，它涉及电影的本质：电影到底是什么？

再进一步问：作为一种图像和声音的集合，电影就是摆在那里任人观看的吗？我们通过这种任意的观看，就能够经由电影抵达真实吗？

再换一个角度：到底什么是真实？你的真实是不是我的真实？

“姜文从来不是一个写实的导演，你从他的第一部电影看，他的电影，或多或少都是夸张的，一种魔幻写实，而且他对现实是质疑的。”焦雄屏说。

对于姜文而言，真实，绝不是一

个起承转合的故事。

《一步之遥》中，马走日旁白的腔调，特别像石挥的《我这一辈子》。这一次，姜文大方地承认了这层关联，还提供了另一个灵感来源：启功老先生的说话腔调，“特别具有一种老北京的味儿”。“我是学戏剧出身的，对旁白、独白都非常熟悉，《一步之遥》里面的旁白，是直接向观众讲述的。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声音和语调，并不一定能够忠实还原这件事情的本来面貌。因此叙述并不总是可靠的。因此，马走日的旁白，特别采用了一种更加老成、更加忠厚诚恳的腔调，我用这种方式提醒观众，不要相信这个说话的人，不要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或者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我们很难找到真实，但是至少可以警醒，哪些是不真实的。”

“对我来说，（电影的）情绪是第一位的，节奏是第一位的。”姜文这样解释他对每一处镜头的运用和选择，“我喜欢主观的真实。”

马走日回忆被武六踢断两条腿之后，“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上泰山拍日出去了”。按照我们的习惯思维，对应的画面应该是马走日留在原地，去拍日出的武六离开，然而，影片的处理却恰好相反：不能动弹的马走日随火车呼啸而去，本该高高兴兴整装待发的武六却定在原地留恋地目送。姜文的解释是：“他们到了泰山下车了，留下马走日在火车上继续赶路。”这在逻辑上当然是说得通的，可是“动”和“不动”的主体这样一颠倒，一下子造成了一种奇妙的恍惚感，似乎一贯确凿的参考系不再可靠了，我们必须在失重感中努力找回平衡。导演对“主观的真实”的追求，客观上给观众造成的效果是“主观的漂移”。

对于没有心理准备的人而言，这种“漂移”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因为它带来了观众对“自我”认知的困惑：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

么？我的“观看”，意味着什么？这种挑战甚至甚过冲击我们的“三观”——“三观”被颠覆了，“自我”可以依旧固若金汤，可是如果连“自我”也被撼动了呢？这个人就必须回到事物的本质层面去反思。

于是，我们在“进入”《一步之遥》之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不再一味地向这部电影“索取”，而是尝试与之“相处”，如同我们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中与他人交往一样。《一步之遥》的影像，不再像传统的影像那样，可以任由观者“取用”，面对观者的肆意目光，它按照自己的步调，时而开放，时而关闭，时而逼近，时而远去，因此具有了某种“自由意志”。与这样一部电影对话，观者要调动的也是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观影过程中，观者需要保持的心态不是不断尝试投入、代入，而是首先确认“我”与“他”是不同的，并且始终保留清醒而理性的自我意识。

事实上，欣赏《一步之遥》的某一种乐趣也正在于此：去体验一个不断变迁的视点，一个始终在閃转腾挪的观看位置。这很像是悖论：当你接受被拒斥的现实之后，你反而开始从容参与了。当你知道并且接受自己会有一些“看不见”之后，你反而能够更好地“看见”了。

“我拍的电影，好像都比较适合成人观看，不适合小孩子。”姜文说。因此，为了让他的孩子能看他的作品，他应邀去给《宝莲灯》、《超人总动员》等动画片配音。

从这个角度说，《一步之遥》对观众的“成人性”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姜文打破了我们传统上与电影之间默认的契约关系——当我们坐在大银幕下时，其实是放任自己回归到孩子的心态，电影成为一个承诺，让我们片刻逃离成人世界，享受心想事成的童年。然而，在《一步之遥》中，姜文不再扮演传统的父母哄孩子的角色了，而是努力拉着我们站起来，试图让我

们明白，我们可以也应当与他平起平坐，并且接受平等的代价。也许，这就是他反复强调的“尊重观众”。或许为了表示他的诚意，在他的电影发起审视观众的目光之前，他先尽其所能地进行了自我审查。“在他的其他电影里，姜文总是会把他自己的那个角色放大、或者美化一点、浪漫化一点，但是《一步之遥》里面，马走日始终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不如说，姜文用各种方式展示了这个角色的“小”。“他把自己生命中最不能给人看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人看了，而且把这个当成角色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戴锦华说。一些人指责导演“自恋”，然而，“自恋”的到底是姜文本人，还是没有能够在电影中实现自我想象和预期并因此而发怒的观者呢？

在厘清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去讨论《一步之遥》“在制作层面领先中国电影工业5到10年”的成就，可能就具有了一种切题性：姜文在电影中的确实实现了他的艺术追求与构想。而他的每一格画面、每一个场景、每一处情节，拍得都是那么丰沛动人、摇曳多姿、可圈可点。也许只有技术专家才能确切了解将想象一一兑现会有哪些操作细节上的困难。专业评论家们则捕捉到了姜文作品的艺术性，还是举《祝酒歌》那场戏为例，让·路易说：“那些跳舞的人们看起来非常荒谬，他们跳的不是正宗的华尔兹，因为拍华尔兹有拍华尔兹的方式，你的镜头要怎么运动、怎么取景，让人们跳出怎样的舞步，但是姜文没有这样做，他把他们拍得像盛装的农民，看起来非常滑稽。这让我想起了奥托·迪克斯，他是上世纪30年代柏林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我不知道姜文不知道这个人，但是当你把他的画和姜文的这个镜头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意识到，姜文拍电影的方式和画家画画的方式如出一辙，都活灵活现地表现了所谓的新贵阶层。”

“反讽不是我的目的。”姜文说。

后半句他不愿意讲下去了，但是他的真实目的已经呼之欲出：唤起观众的反思。影片结尾是非常有趣的：原本完全对立的两方——观众和马走日，在马走日是否该死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结论：马走日死有余辜。然而，双方的理由却截然不同，甚至是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这提醒我们，我们当然可以满足于在事物的表面上生存，但也可以尝试着向内里探究，而后者往往是一个更加艰难和痛苦的过程。

“我不愿意总是拍那么容易的电影。”姜文指的是他上一部电影《让子弹飞》。我们可以说《一步之遥》是他在冒失地透支观众的信任，也可以说他在艰难地开启一场对话，给予我们一个契机，在中国电影票房如此火热、一路高歌猛进的时代，能够坐下来讨论一下“电影是什么”、“观众是什么”等等看起来很落伍的话题。从这个角度上说，《一步之遥》的5亿元票房是一个奇迹，让那么多人，无论情愿与否，不得不先接住姜文提出的问题，并且做出自己的反应。

下一部电影，姜文还会说些什么呢？也许，这取决于我们将回应什么。

2004年，姜文作为导演处于一个“被禁”的低潮期，那个时候他接受访谈，谈到对未来的设想时说：“一辈子能够导5部电影就满足了。”《一步之遥》是他的第五部电影，目前他的第六部电影正在筹拍中。

“你现在觉得，你这一辈子一共能拍几部电影？”

“5部左右吧。6部也是5部左右，10部也是5部左右。看你怎么想了。其实一个导演，就算拍100部，可能也就5部还不错吧，干脆就拍5部得了。”

“如果你这辈子没有干拍电影这行儿，你觉得你会做什么？”

“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觉得我干什么干不好。拍电影，没有一个我特想拍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拍电影我也干不好。”



英国女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

阿加莎作品中的爱情与人性

中年失婚，也许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中遭遇的最大的背叛和伤痛。这一切导致了这段婚姻完结以后，她看世界的角度也开始改变。从此以后，她的作品开始充斥一种更深沉、更内敛的东西，而这一切，更多体现在她 1967 年的作品《无尽长夜》里。

文 / 张月寒

有人生来温馨甜蜜，有人生来长夜漫漫。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无尽长夜》(Endless Night) 的序诗里这样写。

2015 年 9 月 15 日是阿加莎·克里斯蒂 125 岁的诞辰。在这个世界上，作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生前成功的；一种是死后才出名。阿加莎很幸运地位列第一种，她活着的时候就充分享受了自己成功带来的胜利果实：买车，买房，授爵，旅行，聚会，演讲，美食……

在 ITV 的纪录片《Perspectives: The Mystery of Agatha Christie with David Suchet》中，披露了阿加莎晚年的一卷家庭录影带。身穿天蓝色泳衣的她幸福地被女儿、丈夫环绕，欢快地扑向水中游泳，像一个孩子。这位迄今为止作品在全球出版 20 亿册、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上百个国家发售、有近 60 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成功女作家，晚年的人生结局也达到了一种张爱玲一直没有得到的“大团圆”。

人生颇温暖、阳光、幸福、快乐，导致阿加莎的作品虽然处处有关谋杀，却没有那么压抑困厄。但这一切并不代表她从未受过伤害。她的第一次婚姻遭到了一种所有女人都能想到的最俗套的背叛：丈夫爱上了比自己年轻漂亮的女子并要求离婚。这给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导致她 1926 年冬天的那次“失踪”。自去年《消失的爱人》上映并大受欢迎以来，很多人就开始

议论说阿加莎是不是早在 1926 年就导演了自己的“Gone Girl”？

中年失婚，这也许是她一生中遭遇的最大的背叛和伤痛。这一切导致了这段婚姻完结以后，她看世界的角度也开始改变。从此以后，她的作品开始充斥一种更深沉、更内敛的东西，而这一切，更多体现在她 1967 年的作品《无尽长夜》里。

当一个人愈想离开你的时候，你攥得愈紧，他（她）则会离开得愈快。

在她的所有作品中，《无尽长夜》没有其他作品那么普遍被提及，但其实这部作品所蕴含的内涵张力以及她对人性的看法，我认为所有作品中最深刻的一部。

俊美无产的年轻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清晰知道自己心中蕴藏着一股冲动。他认为自己远不止于此、远不止眼下这个命运。飘荡寻觅多年，始终试图参透自己的人生。徜徉于伦敦最贵的街道；仗着自己年轻貌美敢于走进任何一间最贵的画廊，让看惯了有钱阶层的工作人员为他拿下自己欣赏的那幅画。对方也并没有看不起他。或许那一刻连他们也看出了他的潜力。他觉得自己天生具有美的欣赏力。如果他拥有财富他能够将它们花得很好。但偏偏他没有。

这是一部将阿加莎的金钱观和爱情观凸显得比较明显的作品。阿加莎在自传和多次采访中毫不避讳自己重视金钱的看法。在她超过半数的作品

中，钱都是谋杀的主要动机。她 11 岁之前的物质生活是充盈的，11 岁那年父亲去世，于是阿加莎开始经历物质匮乏所带来的生活压力。

《无尽长夜》中塑造的“反英雄”男性角色，是和现代价值观惊人契合的一部。小说中的男子，出身底层社会，但年轻、俊美、充满野心。他处在一种自认为与自己完全不符的现实条件中，并试图想要突破。他谁也不爱，只爱自己。

随着故事铺叙直下，阿加莎让读者认为这个浪子似乎终于找到真爱，对这个他在自述中百般珍视的女子，也能够像一个最普通的坠入爱河的人，对她好，真正欣赏她并看到她的美好。

但是最后的结局是心痛的，并且它的结局可以有多种解读。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男主角究竟有没有爱上那个他杀死的女孩，Ellie。真正的答案，或许只有这个虚构的主角，或创造他的阿加莎才知道。又或许对于这一点，阿加莎本人也是没有任何答案的。

很多人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部推理小说，不如说是一部爱情小说，只是借着推理的外衣来诉说一种爱情和人性的关系。这一点我深以为然。女人，似乎总是特别在乎一个男人究竟有没有爱过自己，但现实生活中这件事情也许永远没有答案，除非……

除非他亲手结束了你的性命。在历史上，亨利八世和安·博林的爱情结局如此，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和易

先生也是如此，在阿加莎这里，则是《无尽长夜》最后的真相。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你，那么他（她）当然不会亲手杀了你。如果他（她）甚至能够结束你的生命，那么一切应该不是爱。

然而，《无尽长夜》最感人、心酸、矛盾的地方就是男主角在自述中始终透露出星星点点的爱意。无限接近于爱情，但并不是爱情。“如今我回想起来，那或许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他在书中这样说。所以这本书是看第二遍方才有意思的，只有当我们知道了结局以后再重新回看，才能看到这些看似是爱情的自述所凸显的最终悲剧性。

在中国作家中，有人说张爱玲是够“狠”的，把爱情和人性撕扯得体的无完肤。对于异常鲜明地经受了丈夫背叛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婚变后的作品则也开始绝望和直击人性。不过，也由于阿加莎在世的时候获得一种世俗的成功，所以她的“绝望”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深刻和没有退路。阿加莎的绝望是圆融、积极的，因为毕竟她的一生还是完满。

为什么阿加莎纵使受到伤痛，她的作品仍没有绝望到彻底，反而保留着一种阳光、轻快、积极？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一切可追溯到童年。我们可以通过阿加莎的自传得知她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而张爱玲则相反，她自童年开始似乎就有种脱离不了的阴郁。童年时发生的事影响人今后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和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或许是这两个作家取得截然不同人生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部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也是阿加莎作品中少有的阴暗的一部。《无尽长夜》从头至尾，我们咀嚼出的是一个异常孤独的灵魂，在这世间的任何人身上他都找不到任何共鸣。最后一晚他在冷杉树下看见被自己杀害的妻子，他第一次看见她的地方。直到最后他仍认为自己某种程度上是爱



据阿加莎小说改编的电影：《无尽长夜》剧照



《尼罗河上的惨案》(1978) 剧照

她的。

Endless Night, 无尽的长夜, 无尽的灵魂, 无尽的人生。阿加莎作品中罕有的枯寒绝望, 在这里, 被我们找到了。写《无尽长夜》的时候阿加莎 75 岁, 已属于洞悉一切的年龄。她写作这本小说只用了六周时间, 更可见其一气呵成之感, 也正是书中年轻人的自述能让这部作品如此令人感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无尽长夜》的开头引用了布莱克的诗“Agurries of Innocence”。这部小说和这首诗说

明的都是人性格中一些本来的成分是难以避免的, 有些人生来温馨甜蜜, 有些人生来长夜漫漫。他们一旦遇到,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悲剧。

威廉·布莱克是一个很有名的神秘主义诗人, 他晚期的诗歌有些阴暗, 但也正因如此很受一部分群体的迷恋。西方甚至形成了某种“布莱克邪教”, 嬉皮士们更称有时读他的诗能达到一种 LSD 般的迷幻。他早年诗歌并不出彩, 但晚年过于追寻一些玄幻的东西, 却反而很受欢迎。在美剧《超感警

探》中阴暗到不可抑制的连环杀人犯 Red John 就很喜欢引用布莱克的那首“Tiger Tiger”。

《无尽长夜》的转变不是一夕造就的，早从阿加莎创造“马普尔小姐”这个乡间老处女侦探形象就开始了。1930年马普尔小姐首次出现于《寓所谜案》，那时的阿加莎40岁，已和第一任丈夫阿奇（Archie Christie）离婚。她开始透过一个老妇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从此以后更加沧桑也更加老辣。

“大多数人其实不好也不坏，只是很傻罢了。”马普尔小姐在《周二晚间俱乐部》甫一登场就洞察世事。

“你只是人生阅历不如我多罢了。你不了解琼斯那种吊儿郎当的粗汉。我一听到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在他家里，就相信他是不会放过她的。”这段话，几乎反射出阿加莎本身就被一个小她10岁的女子夺去丈夫的自身现实。此后，在她的多部作品里都出现了这种因美貌而背叛的爱情。

在《柏棺》里，她说：“想不到，一个人的美貌，居然造就了另一个人生活的全部颠覆和毁灭。”

她在自传中也写：“当一件事开始出错，那么所有事都开始出错。”

我们有时可以从一对情侣的外表判断出他们之间关系的高下，好看的、更有魅力的一方不可避免地处于优势。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段婚姻的结婚照，公允地说，我们看出了阿加莎当时为什么不顾母亲的反对非要嫁给阿奇——阿奇年轻时确实很英俊，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很易招女性喜爱。这不得不为阿加莎今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自己外表尚好、并且重视外表的人，也会要求另一半的外貌。

在《柏棺》里，阿加莎是这么阐释爱情的。“您认为爱情始终是幸福的吗？”侄女埃莉诺问姑妈。“当你的爱情极其热烈的时候，往往是给你

带来的痛苦胜于欢乐。”饱经风霜的姑妈这样说。这也是阿加莎自己的人生体验。经历了丈夫的出轨与背叛，她突然失踪，车子在一处荒野中被发现。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后来她终于在一处温泉旅馆被人爆料发现。当时她失踪的事震惊了英伦三岛，也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

到目前为止，阿加莎的失踪仍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她当时为什么在车里留下类似自己被杀的线索，她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以及这一切究竟是否是她对于丈夫背叛的报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和丈夫向她提出离婚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在那一瞬间，她日后在自传中也写道，她确实没有了生的希望。

当你爱一个人胜于那个人爱你时，那么，你是痛苦的。《柏棺》诉说了这样一个道理。

其实，人生中最痛苦的并不是没有爱情，而是看似得到了爱情，然后，再让你失去。阿加莎的很多作品，《柏棺》、《尼罗河惨案》、《阳光下的罪恶》……都诉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人们自以为对自己的爱情胸有成竹，就像阿加莎当年幸福地处于第一段婚姻，然后突然阴影一掠，你自以为拥有的一切，就全部失去了。

与所有畅销作家一样，阿加莎当年也受到不少酸溜溜的文艺圈的指责，说其作品太浅薄、过于迎合大众口味云云，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她的作品长盛不衰的畅销以及越来越广范围的传播。她写的剧本《捕鼠器》自1952年在伦敦西区上演，如今仍没有停止，是世界上上演时间最长的剧目。2011年，英国《卫报》发布一条消息称，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007”系列的作者）和阿加莎·克里斯蒂是英国最富有的两个罪案小说作家（Crime Writer）。这项调查由推理剧数字电视频道Alibi推出，是根

据记录在案的销量、票房收入、公司收入等各种数据总结出来的。阿加莎截至2011年的身价就已经是1亿英镑。

而阿加莎在世时，面对越来越多、各种各样、或坏或好的文艺圈批评时，她所做的只是稳住自己、坚持自我。就算所有批评家都不屑她，但还有读者喜欢，这才是一个写作者的最高境界。尽可能广地传播、尽可能多地被喜欢。至今，她创造的波罗形象受到如此广泛的喜爱，已然成为一个独立个体；提起英国乡间侦探就想起她创造的马普尔小姐，生动得让人恨不得去这个虚构人物的村舍讨一杯茶，听一听她讲村里的谋杀故事。

在写作世界里，通俗并非坏事。三毛当年的散文也屡次被人批浅薄；《红楼梦》刚出时也被当时所谓的高雅之士看不上。但到最后，却是通俗为王。一种东西受欢迎的背后必有其道理，不能一味孤高自赏拒不接受新鲜事物。

马原曾说：“世界上绝大多数读者不是从作家或者理论家的那种要求去解读所有小说，不是为了探求小说中的思想哲学的价值意义；绝大多数人拿出一两个小时来读小说，是希望在这一两个小时里过得愉快。”

一直以来，英国人都把阿加莎·克里斯蒂当宝。在阿加莎今年的诞辰日之前，英国的哪怕只和阿加莎有一点点关系的小酒馆（Pub）、旅馆、宾馆都纷纷推出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主题套餐。各旅行社也应景推出“阿加莎·克里斯蒂踪迹之旅”。在影视领域，这么多年来，从北约克郡到中东、加勒比海……首先是她的波罗，然后是马普尔小姐，当波罗最终季结束，马普尔小姐也宣布不再续拍后，全体英国人以为他们的阿加莎狂热终于该停止了，但BBC又偏把阿加莎作品中的另一侦探形象——汤米和塔彭丝夫妇作为主角，推出了一部新剧。不列颠民族对于阿加莎的狂热，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或许永远不会停止。■



许巍



5月16日，许巍“此时此刻”巡回演唱会在北京万事达中心收官

许巍，用音乐记录自己

许巍喜欢那种自然的创作，音乐记录了他的情感与转变。

记者 / 黑麦

许巍坐在影院的后台，台前正在上演着《此时此刻》，那是一部关于许巍巡演的纪录片，从2013年5月一直到2015年5月，许巍和他的乐手们经历了中国的16个城市，17场演出。后台依稀传来乐迷的合唱声，许巍觉得这部片子里仍有些遗憾，对于他来说，那17次意犹未尽的夜晚，记录了自己两年中的体会和状态。

20年前，我曾经在东单的天星音像唱片店看到过第一次参加签售的许巍，他穿一袭黑衣，留着过肩的长发，那时他很瘦小，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戴着耳机，偶尔张望一下排队的

人群，他很少讲话，却总是用微笑来打破那个气氛。今天的许巍似乎还是那个面带笑容的年轻人，他变得健谈，敢于讲自己的故事，他觉得这20年中，一切都变得太快，生活环境、方式，以及自己的状态。他觉得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不可预知，当年那个穿着皮衣的长发摇滚青年并不曾想到自己之后会写出今天这样的音乐，也很难回忆起在严重抑郁症的那段日子中，是如何写出《那一年》这样的快乐音乐。他觉得生活无常，却也不在别处，无论是《漫步》还是《爱》，都是自己情感中最真切的表达。

许巍仍旧弹琴，他的手指尖布满了茧子，他觉得这是他出道以来最疯狂练琴的一段时间，其实许巍的现场并不需要亲自演奏，但是他觉得吉他仍旧是自己创作的伙伴。他现在听电子乐，也尝试在约翰·科川（John Coltrane）和比尔·埃文斯（Bill Evans）这样的爵士声中找到有关复合节拍的灵感，许巍说他刚刚买了几把手工吉他，每天早上跑步回来就开始弹琴，一天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有一段时间，许巍很喜欢读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那是一本关于隐士的书，书中提到的终南山就

在许巍的家乡，他觉得自己的某些状态和这本书有共鸣。很长一段时间，许巍似乎消失在媒体的视野中，有些人认为他过着“仙儿”一般的生活。2011年的9月，许巍和家人上终南山游玩，落日余晖，山色暮霭，眼底的景观已经不会再给许巍在第一张专辑时的奔放情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和禅意。他触景生情，似乎还想到了李叔同的临终偈，那本堆满字迹的笔记本终于写到最后几页，许巍最终在几个月后发表了一首名为《空谷幽兰》的歌曲。其中唱道：纵有红颜，百生千劫，难消君心，万古情愁，青峰之巅，山外之山，晚霞寂照，星夜无眠。”这是许巍在佛教自然修行中创作的一批作品，与《心愿》、《喜悦》、《家》一样，成为一种静谧氛围，这似乎也表现了他的某种自在、自然。

许巍觉得自己根本算不上“仙儿”，如今他住在北京的西边，他只是习惯看到山和绿色，他觉得那是一种缓慢的过日子方法，东边亦有活力，让人兴奋。他觉得很多人都是有城市属性的，只是愿意回到自然中了解自己。在许巍的第一张专辑《别处中》中，有一首名为《树》的作品，那是他在90年代从长城回到市区时，在沿途看到的景象，或许那也是许巍当年心底的景观。他写好歌词，谱上曲子，拿起吉他，为当年共同住在“红星生产唱片宿舍”的朋友们唱了一遍，尽管他极力掩饰着内心的羞涩，他觉得这歌词有些直白。歌毕，人人赞许，不久他便录制了这首歌。那时候，他偶尔住在唐朝乐队的张炬家里，张炬说他喜欢嬉皮的生活，尽管自己听朋克，也听别的音乐，但是这一辈音乐人向往的是自由。张炬去世后，许巍用一首《光明之门》作为挽歌发表在一张纪念专辑中，他在歌中提问自己，我经过着生活，还是生活经过我。多年后，那种长尾的空灵感似乎仍旧贯穿于他的音乐作品中。

2014年7月，许巍带着团队到英国拍摄“摇滚故乡英伦之行”纪录片，35天的行程走过了伦敦、利物浦等摇滚乐发起的地方。他在伦敦见到了滚石乐队的制作人，参观了他的奥林匹克工作室，之后，他在披头士曾经的录音棚艾比路（Abbey Roads Studio）录制了两首单曲，几天后，他来到利物浦的洞窟酒吧，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表演。他坦言自己对音乐的喜爱，英国的流行摇滚乐曾经伴随了他的音乐成长期。绿洲乐队的某张现场专辑封面与许巍最新的现场专辑封面有些相似，主唱背着手站在舞台上，面向台下上万的听众。这一次许巍参与了一点设计，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打在封面的明显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一朵小小的蓝莲花。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你最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练琴阶段？

许巍：是的，爵士乐给我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我发现爵士乐最迷人的不是调子，是节奏，是Groove。我年轻的时候，组飞乐队的时候，那个时候听的都是噪的音乐。我记得北京的朋友拿破头士给我听，我当时觉得就是流行歌，后来站在利物浦的披头士纪念馆，站在列侬的白色钢琴面前，想起后来爱上披头士的日子，他们的音乐陪着我真正在音乐上成长起来。

我刚刚听了一段古琴，有点沉进去，我觉得很多音乐给我的感受都反映了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尝试思考人生和自然的方式。很多音乐和爵士乐是相通的，对我来说表达的是触感。这使我现在听摇滚乐的时候会回想它最初的那种节拍。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打算和其他音乐人合作？

许巍：想啊，但不想为了合作而合作。我觉得合作不是找一种表演的形式，我听爵士和古典，感觉就是要积累自己的音乐，才能知道以后怎么

玩。我觉得我对很多音乐和艺术形式都保持着一种比较谦虚的态度，我觉得谦虚是好事，你不了解的时候，就只能学习。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形容自己这两年的状态？

许巍：我觉得自己的状态在每一张音乐专辑都有表达，它展现了我的不同时期。其实在1997年之后，我刚刚发行第一张专辑后，我同时在看《高僧传》，还有郝郝推荐给我的《垮掉的一代》，我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以及寒山诗对那一代美国人的某些影响，我觉得儒释道或许可以成为一种生活状态，因为音乐也可以是一种修行。

后来我看到吴冠中、徐悲鸿的作品，可以感到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人想去推动的表达，虽然带有争议，但那是一种文化探源。在音乐上，英国人取得了成功，我们目前的文化推动还不够高级。我总说自己是半吊子，我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要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仍有工夫可下。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没有关注中国的选秀节目？

许巍：我看了一些，觉得“中国好歌曲”还不错，在这个节目里，我看到了中国原创音乐的力量，它给我带来惊喜。我总觉得现代的年轻人很厉害，想法很多，没有什么包袱，会接纳，很多年轻人的音乐都会震撼我，这同时也给自己一个力量，推动自己努力，要向前。我在英国看到当地“好声音”的评委在周末的时候找了一帮音乐人到酒吧玩音乐，我很喜欢那种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英国的音乐节怎么样？

许巍：我觉得它是一种全民式的，你可以看到各式的观众组成，音乐是这些人的生活重心，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希望中国未来出现伟大的音乐节，如果自己可以唱到老，也是个幸福的事。☑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荣获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中国“百强报刊”
中国期刊协会颁发——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官方商城



微商城



淘宝店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老年痴呆症：老龄化社会的瘟疫

英国首相卡梅伦曾在 G8 老年痴呆症峰会的开幕式上宣布：老年痴呆症是 21 世纪的瘟疫。为此，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表示“老年痴呆症这个主题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政治优先权”。在一个老龄化日益严重的社会，如何看待老年痴呆症，就是如何对待即将老去的自己。

记者 / 曹玲



全球老年痴呆症患者人数逐年攀升，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照顾

真是健忘吗？

去年开始，一直说普通话的母亲忽然开始讲四川话了，这让张京感到奇怪，她从来没有听过母亲这样说话。母亲今年84岁，小时候曾经在四川生活过几年，她和父亲都不清楚那时母亲是否说四川话。

9月12日上午，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记忆障碍诊疗与研究中心举办的阿尔茨海默病医惠家属联谊会上，张京母亲握着我的手，用四川话问：“你冷不冷啊，你的手有点凉。”“妈，你说四川话人家听不懂，你要说普通话。”“哪里会听不懂，四川话很好懂嘛。”

六院的患者联谊会已经举办了十几年，每月第二个星期六上午9点至11点如期举行。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所以这次的活动更隆重一些，邀请了很多小学生来表演节目。大屏幕上打出了“爱·记忆”几个大字，呼应了今年世界阿尔茨海默月的主题“Remember Me”。

老太太头发灰白，面容白净，收拾得利利索索。张京递给她一根香蕉，她剥开咬了一口，冲我一笑。“好吃吗？”“好吃，软软的、甜甜的。”她答。

初次见面，乍一看她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唯一让人感到异常的地方在于我们聊起她的时候，她头也不抬专心吃着香蕉，对我们的谈话毫无觉察。

退休前，老太太是儿科医生，干净整洁、有条不紊。大约在10年前，她忽然开始忘事，家里人觉得有点不对劲。在北京几个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症，不管是问卷测试还是影像学检查显示病情都处于早期，大脑的海马部位有些萎缩。

谈起母亲的病情，张京使用的是“阿尔茨海默”这个词。阿尔茨海默病让很多患者家属感到绕口，从她嘴里说出来却非常自然，俨然一位业内人士。一般而言，老年痴呆症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俗称，但实际上阿尔茨海默

病是老年痴呆症大家族的一部分。老年痴呆症这个医学术语指逐渐丧失记忆和某些影响日常活动的智力、能力，在已知的病例中约有三分之二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有一些疾病也伴有记忆力减退、思维混乱等症状，通常也属于老年痴呆，比如血管性痴呆，特征是大脑中血流中断；混合型痴呆，综合了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的特征；路易体痴呆，与注意力缺陷以及幻觉有关。

像诸多癌症患者的家属不肯说出“癌”这个字一样，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属也在回避“痴呆”的说法。除了少数称其为“阿尔茨海默”的人之外，大多数人用“这个病”、“脑子不清楚”、“记性不好”来代替。一位患者的家属说：“不能说出那个名字，说出来就像会变成真的。”“难道不已经是真的了吗？”我问。“但你还是希望世界上不要存在这么一种东西。”家属答。

知道的人感到羞耻，不知道的人不以为然，这便是阿尔茨海默病面临的尴尬局面。一些人带有无法言说的病耻感，即便觉察出老人有问题也不肯就医，对“精神科”讳莫如深；还有一些人觉得人老了就老糊涂了，怎么能是病呢？2014年，美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公布的一项跨国调查显示，59%的人认为阿尔茨海默病是衰老的正常现象。

究竟如何区分自然衰老引起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呢？“在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记忆障碍与正常衰老最大的不同在于遗忘近事，且即使经过提醒也无法唤回记忆。并且，患者的行为、性格也会慢慢变得古怪。”患者联谊会的发起人、北医六院记忆中心主任王华丽教授说，“患者和家属应该在发现任何有关的症状时就前往神经内科、精神科、老年科的记忆门诊进行专业筛查，以尽早确诊和治疗。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来说，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日本宫城县的一些老人学习打非洲鼓舒缓心情。日本是应对阿尔茨海默病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误解

为了了解日本社会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识，9月初，我在日本采访了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基层医生、收治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养老院管理人员、支援中心的管理人员、制药业的研究人员以及患者教育人员，深深感到公众对此误解之深，以至于在大力进行十几年的宣传教育之后，虽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但依然存在很深的误解，有很大一部分患者没有去医院就诊。

无论在诊断、治疗、医保，还有社会支持体制方面，日本是全球应对阿尔茨海默病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这和日本社会的高度老龄化有关。目前，日本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老龄化甚至被称为“国难”。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5%，75岁以上接近

13%。女性平均寿命87岁，世界居首；男性平均寿命80岁，居世界第四。

日本厚生劳动省估算，2012年，日本65岁以上认知症（日本把老年痴呆症称为认知症）患者有462万，约每7名老人中有1名患认知症；到2025年，65岁以上认知症患者人数将达700万，每5名老人中就有1名认知症患者。

据日本卫材制药株式会社负责过医生和患者教育的高山千弘部长介绍，以往人们对老年痴呆有很多误解，一些人认为是遗传性疾病，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不适合结婚，出于这样的偏见把疾病隐瞒起来不去看医生的情况很多；还有一些人认为认知症没有治疗方法，认为患者是傻瓜，甚至是精神病，一部分患者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为了消除偏见，让公众正确认

识这种疾病，2004年日本正式将老年痴呆症改名为认知症。出于类似的原因，台湾地区称其为失智症，香港官方称其为老年痴呆症，但媒体和社会组织称其为认知障碍。

2000年左右，日本能诊断认知症的医生全国只有100人左右，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能够诊断认知症的医生增加到约1万人，这其中包括很多非专业医生。

东京葛饰区的家庭医生稻叶医生就是从4年前才开始研究认知症的，之前一直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内科疾病。据稻叶敏介绍，葛饰区是东京的一个行政区，有42万人口，能够治疗认知症的专业医生只有4位，像他这样能治疗认知症的家庭医生有20位，属于区内的认知症支持医生，和专业医生联手合作诊断、治疗认知症。



2010年4月，在法国一家专门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机构里，工作人员为患者做音乐治疗

他觉得这个数量在未来远远不够，于是在区医师会建立了一个网络，致力于让普通医生了解什么是认知症，并提高诊断技能。

最初学习认知症，也是因为他的一些病人得了病却不肯去专科医院治疗，他们更习惯于找熟悉的医生看病。稻叶医生对此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意识到像他这样的基层医生有必要学习关于认知症的知识 and 诊断技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这样做的时代。”

通过学习，稻叶医生认识到认知症没有有效的治愈药物，尽量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最重要的课题。为了发现早期患者，2014年他联合另外一个诊所对900名6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记忆体检，最终发现60多人患有认知症。之后，他向区长提议在全区普及记忆体检，促成了今年葛饰区2.6

万70~74岁老人的记忆体检，费用由区政府承担。“虽然政府出了这部分钱，但如能早期发现的话会减轻日后的负担。”稻叶医生说。

在中国，基层医生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识远不如日本，医务人员本身也对疾病有很多误解。“至今依然有不少医生觉得治与不治没有区别，反正也治不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老年精神病学教授于欣说。2000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会议，一位非常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和他说，老年痴呆症患者到了一定程度就变成精神病了。

临床上，部分患者除了记忆力下降，的确会出现一些精神症状，比如昼夜睡眠颠倒、攻击行为、大喊大叫等等。“大脑是人体司令部，指挥着全身的行动。大脑出现病变，引起的绝不只是一个器官的问题，所以在痴呆

的过程中出现精神行为问题是容易理解的，包括精神分裂也是痴呆的一个表现。病情进展到最后，病人大脑的一些高级功能已经丧失，只留存较低级的基本功能，所以病人会刻板重复某一行为，比如撕床单、拍打、喊叫等等。”这样的病人也是医生和家属最头疼的，需要到精神科进行治疗，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本身就是精神病人。

于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老年精神科领域的研究，最初接触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并没有多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的平均寿命不到70岁，很多人还没有活到发病年龄就去世了。当时大部分痴呆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比如煤气中毒、外伤（车祸）、职业（拳击）。当一个国家的平均寿命逐渐延长之后，老年痴呆症才会日益显现。”

“痴呆真正变成临床医生重视的问题是在 2000 年，开始正式把它作为一个病症，建立评估系统和随访机制。当时我们做了论证，不叫痴呆论证，叫记忆论证。”

正是在 1999 年，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存在鲜明的特征，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位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如今，我国已是老年痴呆症大国，人口老龄化是患者激增的关键。”

一颗“定时炸弹”

今年 8 月，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发布的《2015 年全球阿尔茨海默病报告》显示，到 2050 年，全球各地老年痴呆症患者的人数，将从当前的 4600 万增加两倍多，达到 1.315 亿人。仅 2015 年一年，就有约 1000 万老年痴呆症新增病例。目前，全球因为老年痴呆症的花费是 8180 亿美元，到 2018 年，花费将达到 1 兆美元。

最早在中国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协和医院张振馨教授介绍说：“2013 年中美合作进行的认知障碍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 65 岁以上老人中，3100 万人患有轻度认知损害，900 万人患有老年痴呆症，600 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上世纪 80 年代，张振馨在美国研究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病，1993 年回国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国内基本没有关于发病率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1996 年，她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流调，得出的结论是：65 岁以上人群每 100 人中有 4.8 人患阿尔茨海默病。“原来人们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率很低，中国哪有那么多老年痴呆症，我的数据做出来以后，大家都很惊讶，和国际上差不多的发病率。到目前来看，发病率没有变化，但是因为 65 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增加了，所以病人实



美国马里兰州的老人查克为降低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每天坚持在健身房锻炼

际数量增加了。”

随着全球老龄化日益严重，2012 年，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将老年痴呆症列为全球重点公众健康问题，称老年痴呆症，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一枚“定时炸弹”。在此之前，全球公众健康专家、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执行董事彼得·波伊特（Peter Piot）表示，今天的老年痴呆症与上世纪 80 年代的艾滋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世界需要警示的话，那么要警示的就是这个全球性的危机。除了至少像对待艾滋病一样重视阿尔茨海默病之

外，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目前，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 8 个国家已经制订了国家性的阿尔茨海默病计划。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11 年 1 月签署并通过了国家阿尔茨海默病计划草案，希望从国家层面在保险、医疗机构、国家福利上进行全面的资源整合，希望在 2025 年前开发出预防措施和有效的治疗方法。2013 年 G8 峰会期间，英国首相卡梅伦倡议召开八国集团范围内的首次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会议，英国将通过加倍的资金投入和更先进的诊疗手段防治阿尔茨海默病。2015 年 1 月，日本政府出台了“推进实施认知症

对策五年计划”，拟定到2017年末，将目前600万支援者人数上升至800万。

“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才会更关心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于中国的现状，于欣坦言无奈，很多人连一个月几百块的药钱都没有，更别提专业的照顾了。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中，有22.9%处于贫困状态，农村贫困率为28.9%，高于城镇9.8%，而且近年来患慢性病的老年人持续增多，老年人照顾成了很大的问题。“有多少老人是没有能力为自己养老的，更何况还有一个患病的老伴。”

“在西方国家，年纪越大占据的财富越多，老年选民投票热情也更高，因此可以呼吁政治家在这方面做出决策。但最根本的还是老龄化，发达国家患者的生存期更长，无形中增加了患者的绝对数量。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于欣说。

这一切，也正是中国所面临的。

吃药还是不吃？

“我想不出她为什么得病。一个可能是我一辈子脾气坏，她受了刺激；还有一个可能是遗传，我岳父去世时也有点头脑不清楚。分析来分析去，我也想不出还会有什么别的原因。”每谈起老伴的病，张京的父亲依然会感慨命运的不公平。

“这病治不好，只能看她一步步坏下去。她现在已经需要别人协助才能穿衣服了，如果没有人帮忙，有时候从裤腿开始穿裤子，有时候两只脚伸到一个裤筒里去。”

张京也明白这病治不好，对疾病的认识随着母亲病情的进展一步步加深。“最初看了很多资料，10年前来参加六院的患者联谊会，有医护人员讲解照料知识，也和患者家属交流，学到了很多。事实上，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很吵闹，有精神症状，很难护理；有的人像我妈

妈这样，一直都比较安静。具体病人会变成什么样，还是要到那个阶段才知道。”母亲从最初确诊就一直在服用一种叫作多奈哌齐（安理申）的药物，她的进展很慢，这两年变化才益发明显，如今已经无法把兄弟姐妹的名字和人对上号，因为不在一起生活，偶尔也认不出自己的女儿。

在美国十大死亡原因中，阿尔茨海默病是唯一一种既不可治愈，也不能阻止的疾病。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只批准了5种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分别是多奈哌齐、利斯的明、加兰他敏、他克林和美金刚。这些药并非神药，只能起到改善、延缓病情的作用。“一旦行为出现问题，病人的大脑就已经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目前药物无法修复受损的大脑。”于欣说。

人类的大脑被称为宇宙中最复杂、最完善、最有效的资讯处理系统，这是人类的一大幸事，但又带来了无尽的不幸，因为这样一台高度精密复杂的仪器，一旦损毁，就意味着无法修补。

“其他东西我们可以打开看，但大脑不能。肿瘤我们可以取出组织做标本，看看药物能否作用到细胞里，影响细胞活性，但大脑不能。神经药物的研发实在是太难了。”

不管怎么说，吃药仍然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如果问病人家属，吃药管用吗？他们通常会认为没有用。如果你换个角度，问吃了药病人哪些地方有改善？他可能会想一想，然后讲出一些变好的方面。”王华丽说，“药物能延缓疾病进展、显著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症状，还能减轻照料者的负担。比如有研究表明，多奈哌齐可显著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平均每天为家属减少约一小时的照料时间。可不要小看这一小时，如果照料者能有这一小时时间散步、刷刷微信，可以缓解很多情绪问题。”

但是老百姓不看论文看疗效，很

多患者依然不肯坚持吃药。“比如你高血压不舒服，你吃了药就能看到血压降低，就舒服了；糖尿病，吃了药血糖就下降了；关节炎，吃了药就不疼了。这都是疗效，但是在老年痴呆症早期，你并没有服药的紧迫感，服了药也没有特别好转的感觉。种种因素，使得很多患者没有坚持服用药物。”张振馨说，“将来一定会出现能改善症状的药物。”

养老院

因为自己就是医生，所以张京的母亲从未抗拒过服药。或许是因为药物的保护，她的病情进展缓慢，直到两年前自理能力才开始明显变差，这让今年已经87岁的老伴力不从心。再三考虑之后，他们决定去住养老院。他不喜欢雇人在家里照顾，他说：“保姆专业吗？能全心全意护理吗？家里一直是我们的老两口，不希望有外人在。”

找到一家肯收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养老院着实不易，张京一共考察过十几家养老院，住过其中三家。前两家都住得不久，第一家因为离家远探望不方便，第二家离家近，但是年初母亲摔了一跤导致骨折，养老院只护理能自理的老人，这让他们又动了换地方的念头。后来，他们搬到了2013年刚成立的椿萱茂老年公寓，有一层专门用来护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

两个老人住同一间房，张京母亲的费用每月1.2万元，加上父亲一共1.6万元。“1.2万元里有很多是房间的费用，这样算下来，我父亲的价格就没那么贵了。”虽然如此，但这个价格也是一般家庭难以承受的。两位老人的退休金刚刚够付养老院的费用。“还有吃药和其他开支，经济上也有压力。”张京父亲说。

在日本采访时，我们了解到日本1982年开始实施的《老年人保健法》制定了75岁以上老人（或65~75岁老年人中有身体残疾者）实行自费10%

的诊疗制度，为老年人减轻了很大压力。日本的公共保险分为医疗保险和照护保险，在我们采访的东京文京区千稻木养老院，据院长田代拓人介绍，入住的100来位老人平均年龄88岁，他们在养老院的基本费用个人承担10%，照护保险承担90%。除此之外，照护保险也包括了上门服务和日间服务。

日本卫材株式会社的高山部长说：“日本对人的生命非常尊重，会在延长寿命方面进行各种治疗，这方面的费用非常庞大。现在日本政府医保费用80%都用于65岁以上老人，医疗费用越来越高，对政府来说已经到了极限。政府希望重新评估这一部分内容，如果按照现有体制发展下去，还有10年医保就要入不敷出了。”这种状况该如何应对、建立怎样的社会保障模型是日本最大的课题，将来对于同样老龄化的世界各国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护理费用完全由个人承担，在很多省份，哪怕纳入医保的医药费也常常要自费。“门诊开药是不给报销的，除非你去住院，老年痴呆症患者又有几个会去住院的呢？”张振馨反问道。

事实上，就算住院也不一定能住上。于欣介绍，现在全国精神科床位加起来有25万张，一般老年精神科床位占不到5%，最高不超过10%，这样算精神科床位只有不到2万张。“精神科床位可能会收治很少一部分老年痴呆患者，但这样的患者一旦住进去就出不来了，那张床位就变成了死床位。”

告别

在老年公寓，张京的父亲总算从繁忙的照护和家务中解放出来了。“你知道吗，在家的時候每天吃什么都能愁死人。不光买菜做饭，还要讲究有营养对她好。”

老年公寓24小时有人服务，起夜也不用他照顾了。“最关键的是，公寓

里每天都安排了很多活动，唱歌、做手工等等。她最喜欢唱歌，唱的都是‘东方红、太阳升’之类的老歌，还有一些苏联歌曲。每到这时，她就跟着节奏唱起来。”公寓里有一个老太太，一天到晚坐着不说话，只有唱歌的时候，才会跟着节奏轻轻打拍子。

音乐是一个良好的治疗手段，很多养老院都采用这种方法护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日本参观养老院时，一位志愿者老师正在和一群患者唱古老的日本演歌。

据美国巴里·瑞斯伯格（Barry Reisberg）医生所设计的阿尔茨海默病进展列表中，把疾病进程分为1~7个阶段，病人语言能力的丧失要到该体系的第七阶段才能出现，与其他能力相比，患者的音乐能力保持时间最长。他描述道：“到了第七阶段，病人每天只能说出1~5个单词，之后再也无法说出令人理解的词语，不再能走路，不能独立坐着，再后来微笑的能力消失，再然后无法抬头，最终患者将以胎儿的姿势蜷缩在床上。如果有人将一根手指放到他嘴里，会出现吮吸反射。到那时，病人已经完全倒退回新生儿状态。”

对张京的父亲来说，除了陪老伴唱歌，十年来最美好的时光是得病的头几年。那时老伴基本和正常人无异，他们携手走过大江南北，每到一处都很快活。再后来，老伴不能再出门旅游，他便成了全天候保姆，一刻不能离身。最害怕的是老伴走丢，一共丢过三次，每次都是自己回来的。“根本不知道她去哪了，又是怎么回来的。你问她，她什么也不记得。”这让他倍感无力，时常濒临崩溃的边缘。“工作了几十年，退休了，该享福了，得了这病，一家人都跟着受罪。”

据美国国家衰老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病人其照顾者首要的是配偶，这群人往往本身年纪也已经很大，很多都有自己的健康问题。

第二大照顾群体是女儿，第三大群体是女儿和女婿。

中国和日本情况类似，绝大多数患者在家庭进行护理。家庭护理造成的负担中多数掺杂着家庭内部的事情，这些矛盾每一家都不同。大体来说，共同点就是护理的重担往往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尤其是每一家的主妇身上。中国的情况更加特殊，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让很多老人不得不独自照顾老伴，或者一对夫妻照顾四个老人。24小时的照料使得很多孤军奋战的照料者身心俱疲，出现抑郁、焦虑等各种精神问题。

面对一个多年来已经无法正常交流的老伴，即便是从照料的烦琐中解脱出来，张京的父亲依然感到压抑，经常从心底泛起一股无名怒火，和公寓管理人员发生了好几次冲突。“倒也不是因为公寓不好，而是因为无处交流。”有一次听说公寓来了个东北人，因为他以前也在东北生活过，就过去寒暄。“你是东北来的？”那人说：“是啊。”“你东北哪的？”“我东北的。”“我知道。你东北哪里的啊？”“我东北的啊！”“东北那么大，你哪个省的啊？”“我东北的啊！”这可把他气坏了。“你说说，这叫人怎么交流！时间长了，我这里也要坏掉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他们不疯，我也要疯了。”

父亲说话的时候，张京看着他笑。针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养老机构建设在中国刚刚起步，还存在很多问题。不仅在于如何照顾病人，对那些一同入住养老院的患者家属，如何能保证他们的精神需求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强求他们什么都好，事情要一步步来。”张京对此表示了很大的理解。

对于母亲，她已经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她将来是否会卧床，是否会大小便无法自理，是否会离开这个世界……她心里明白，总有一天，母亲会彻底叫不出她的名字，认不出她这张和她非常相似的脸。在这漫长的时光里，她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和母亲告别。☑



在北京大兴泰富春老年公寓的一位老人在儿子的陪伴下散步

消失的记忆

是什么导致老年人失去记忆？

记者 曹玲

很多人都会受到记忆问题的困扰。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对 4000 多人进行了调查，发现 65 岁以上的受访者中有一半人说自己健忘。这一结果可能并不让人惊讶，但研究人员还发现，25 ~ 35 岁的被访者中也有 1/3 的人报告自己有记忆问题。老年人喜欢把记忆问题归咎为衰老，年轻人将其归咎于压力。

并非所有记忆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衰退。有关个人经历的某些记忆

就不会褪色，情绪记忆也不会。对于一些思维敏捷的老人来说，他们脑内似乎还存在着一种补偿机制，也就是说，他们的大脑能够调用年轻时不太实用的一些区域以维持正常的功能。

要想记性好，有什么好办法呢？浇一圈橄榄油，吞下鱼油胶囊，还是服用银杏制品？这些都无法阻挡阿尔茨海默病的脚步，在出现症状前很多年，也许是 10 年 20 年甚至更久，它就已经开始在你的大脑里生根、发芽，

像藤蔓一样悄无声息地遍布大脑。

“我们所说的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疾病，病人的大脑有一系列生物学基础。首先脑部会产生一些异常的蛋白，引起神经网络的改变，再导致脑结构的改变，最终引起个人的认知功能、行为障碍，这和正常的衰老是不同的。”协和医院神经科张振馨教授说，“老年痴呆症的一般症状包括记忆、注意力和方向感紊乱，人格变化，语言障碍以及肢体动作障碍。”

我们的大脑从侧面看就像一只拳击手套，标注额叶、颞叶、顶叶和枕叶等陌生名词之后，看起来又像是一张陌生的城市旅游图，需要一位认真的导游带着你一探究竟。

颞叶在大脑的深部，掌控听觉、视觉、情绪以及短期记忆，颞叶的深处有个长得像海马尾部、卷曲并呈现出齿状背脊的小结构叫作海马，正是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结构对记忆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损毁的部位就是海马，使老人的记忆力出现问题。当疾病侵蚀了海马末端的杏仁核，老人会失去控制情绪的能力，不时感到恐惧、愤怒，出现莫名的哭泣、尖叫等情绪爆发。

疾病进而会影响顶叶和额叶。额叶皮层位于眉毛后方的脑部，是大脑的检索系统，对记忆、组织、抽象思维很重要。我们之所以能够做计划，讲礼貌，集中注意力，都要靠这个脑区。被疾病侵蚀之后，老人无法复制他的记忆，甚至无法搜索过去。

顶叶位于脑的顶部，掌控着感觉和空间感知。位于后脑勺的枕叶也是个重要区域，人的视觉就是在那里加工的。

我们不仅靠记忆来记住过去，还要靠它走路、说话、辨识气味、制定计划、爱、学习、思考，甚至做梦。我们靠记忆来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判断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

两种假说

为了弄清阿尔茨海默病的成因，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假说。

一些人主张乙酰胆碱假说，认为疾病是由一种叫作乙酰胆碱的神经递质合成减少引起的。还有人认为单纯疱疹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有人正在研究空气污染是否会引发疾病。之前研究过的内容，比如补牙用的银、流感疫苗、阿巴斯甜、铝制炊具……都曾

被列入怀疑名单中，又被一一排除。

现有的老年痴呆症药物是通过增强神经递质而起作用的。大脑内的神经突触两端通过叫作神经递质的化学物质进行通信，神经递质有很多种，比如血清素，也就是像左洛复和百忧解这样的抗抑郁药物所增强的化学物质就是一种神经递质，抗老年痴呆药物所增强的乙酰胆碱也是神经递质，对记忆的形成有很大作用。

后来，越来越多的证据使得 β -淀粉样蛋白级联假说和Tau蛋白假说占据了主导地位。

1910年，德国病理学家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Alois Alzheimer）在一位死去的女病人脑部组织中发现，她的小血管里布满了脂肪沉积物，坏死的脑细胞和异常的沉积物充满了四周，尤其是大脑皮层部分。后来，研究人员确定大脑中的老年斑块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病理特征。

之后，研究人员知道大脑里的斑块是聚集的蛋白质片段，被称为 β -淀粉样蛋白。它们在神经细胞外聚集，破坏神经元之间的通信系统，阻止它们传播信息。这些通信故障解释了为什么老年痴呆患者有进行性的记忆丧失、行为混乱，完成日常任务时感到困难。

相反的是，Tau蛋白在神经细胞内肆虐，缠结在一起阻塞神经元，破坏了神经细胞之间电信号的传导，最终导致神经细胞衰竭、死亡。缠结的Tau蛋白沉积物同样也摧毁了周围的神经细胞，使得周边的大脑结构逐渐衰退。一个神经元可以有数十个、成百上千个突触链接，让大脑成为宇宙中最复杂的结构。这个如此复杂的神经网络被Tau蛋白纠缠打乱，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损伤大脑的记忆和认知环路，加速认知退化。

显微镜下看起来，斑块就像一团团口香糖，而神经纤维缠结就像一缕

缕的发丝，二者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聚合缠绕在一起。

事实上，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都是天然存在的蛋白。人体制造淀粉样蛋白，然后在正常的衰退和再生的过程中消除它们。在一些情况下，淀粉样蛋白可能会提供某些保护功能，最新的研究表明，它们能够作为分子卫士让人体的免疫反应沉默，还能清除受伤后炎症反应中的异常细胞。但是随着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因为尚未知道的原因，淀粉样蛋白异常分裂，形成 β -淀粉样蛋白的结构，这种蛋白对大脑中的神经元有毒性作用。

而Tau蛋白是组成神经元骨架至关重要的一种物质，就像大梁一样。在某些时候，Tau蛋白也会误入歧途，神经元失去它们的支撑结构，导致细胞坍塌和死亡。有研究人员认为，Tau蛋白纠缠可能是记忆丧失的罪魁祸首，因为它们直接和认知缺陷有关。研究人员发现，有些人即便存在 β -淀粉样蛋白，却依然功能正常，但是他们一旦有了Tau蛋白纠缠，老年痴呆症就会显现。

既然 β -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是造成阿尔茨海默病的罪魁祸首，那把它们消除不就能治疗疾病了吗？

研究表明，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出现症状之前25年，大脑内就已经出现 β -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相关病理损害了。“如果你中枪了，还想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是不可能的，你所做的只能是提前躲开子弹。如果你已经出现认知症状，大脑是不可能复原的。所以，我们希望能从源头解决问题，开发出在出现症状前就可以消除 β -淀粉样蛋白的药物。现在争论的地方是把时间提前到哪个点最合适，我认为在没有沉积之前就进行预防会更有效。”日本卫材制药株式会社的研究人员小仓博雄说，上世纪80年代，他参与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多奈哌齐（安理申）的研发。

但是，问题在于 β -淀粉样蛋白沉积之前，研究人员怎么能知道哪些人在将来会有沉积呢？这样的工作目前只针对有家族史的患者，在他们的大脑出现损伤之前预防疾病的发生，这样的患者只占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总人数的5%。研究人员需要找到能够早期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诊断方法，以尽早进行干预。

窥视大脑

以往，只有当患者去世，我们才能通过实体解剖看到蛋白斑块和神经纤维缠结。医生需要将患者的头颅打开，对大脑切片、染色，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个挑战可以和查看汽车残骸，并试图解释事故的原因差不多。

科学家想知道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传统的核磁共振成像（MRI）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PET）技术是行不通的，它们能提供小到1毫米的大脑快照，告诉我们脑的活动，但是无法捕捉到大脑斑块和缠结的形成。大脑斑块和纠缠只有100微米左右，即1/10毫米，大约是胡须直径的两倍。在过去几年，新出现的可视化工具加上新的示踪化合物，可以照亮非常小的脑部组织，给了科学家了解大脑内部工作的机会。

2012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Amyvid注射剂，这是一种可以附着于淀粉样蛋白的放射性染料，在对患者的大脑进行PET扫描时可以高亮度显示。除了Amyvid之外，类似的放射性示踪剂也已经投

入运作。使用这些化合物再加上新的成像技术，比如多光子共聚焦显微镜，科研人员能够探索神经元的微小世界，更精确地观察脑细胞的反应。这种显微镜能够探测小到1微米，即千分之一毫米那么大的物质，淀粉样斑块大约有10微米大。

新的技术让你可以看到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并且观看斑块形成的实时图像。

除这种检测之外，脑脊液也能检测到 β -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但是脑脊液要腰椎穿刺才能取出，很多人很难接受这一点。

总有一天，研究人员能找出最合适的尽早发现疾病的方法，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这是医学界的老话：早预测，早发现，早干预。☑

踏寻旅人心目中的心灵圣地
深入绝美与隐秘之境
呈现与众不同的行走记忆

生活周刊
最美的滇与藏

内含周刊：
《最美的滇藏线》
《去墨脱》
《腾冲》
《西双版纳》

可在以下电商购买本产品

亚马逊 amazon.cn
JD 京东 JD.COM
当当网 dangdang.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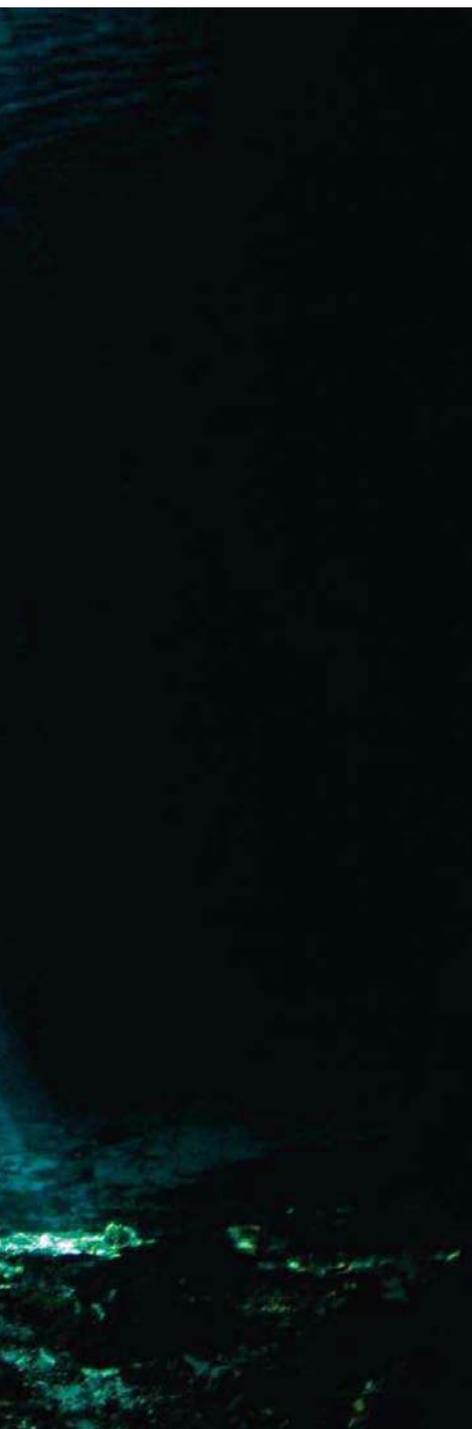


"心系海洋" 主题展摄影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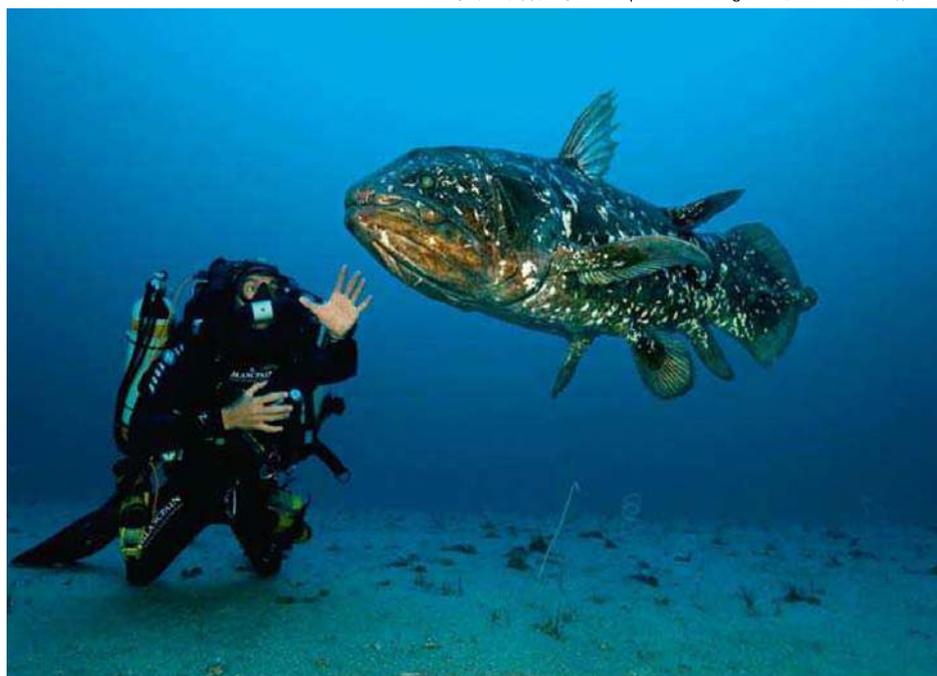
对海洋的两种态度

人与海的关系是基础的，同时又是矛盾的。人类是所有问题的制造者，也是解决者。

文 / 杨聃



詹姆斯·卡梅隆驾驶 Deepsea Challenger 潜艇潜入马里亚纳海沟



海洋生物学家劳伦·巴列斯塔潜入海底研究腔棘鱼

法国环保纪录片导演雅安·阿瑟斯·伯特兰曾说过：“海明威笔下的老人是一个早已成为过去的画面。老人与鱼之间那种难以言表的如同兄弟般的情谊，在现代捕捞船上被冷酷无情地计算着。然而，现代人仍然与海洋有着深切的联系，人与海的关系既是

基础的，又是矛盾的。”

19世纪以来海底变得重要了，电信的发展需要在海底安装线路，可要选择安装地点首先要测绘海底的地形，虽然困难，第一条连接法国和英国的海底电缆还是在1850年完成了。除了铺设电缆，海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

知的。直到雅克·伊夫·库斯托上校参与设计的现代水肺发明后，探索海底世界才成为可能。库斯托的纪录片《寂静的世界》吸引了大量观众想要去了解这个新世界。军事和石油催生了潜水艇，人们能潜得更深了。1960年，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成功到达



中国国家博物馆“保护鲨鱼——艺术巡回展”展品：《被向下的向上体》（王鲁炎作）

了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52年后，那片寂静又被电影制作人詹姆斯·卡梅隆打破。他驾驶 Deepsea Challenger 潜艇创下单人深潜马里亚纳海沟的纪录，潜艇的机械臂上缠绕了一款特制的防水深度达到 1.2 万米的实验型蚝式恒动腕表。过程中当然有像软压舱袋展开这种不可预计的意外发生，然而在卡梅隆勘探三小时搜集的样本中至少发现了 68 个新品类。科学家估计 95% 的海洋仍未被探索，那里隐藏着地球生命的线索。

工业捕捞的兴起让海洋中的大型商业物种的数量减少了近 90%。据温哥华大学鱼类资源研究专家丹尼尔·保利所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专家发现一些特定鱼类开始灭亡，渐渐地人们发现这些并不是特例，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2001 年的一项研究

表明鱼群的减少不是最近发生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2014 年 9 月在纽约举办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上，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宣布将进一步扩大原始海洋保育活动，助力保护地球上物种最丰富的海域，并说服政府新增 20 处海洋保护区，覆盖全球超过 2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宝珀是首个与国家地理协会携手合作、支持“原始海洋考察计划”项目的重要合作伙伴。目前，“原始海洋考察计划”项目正在着力推进三大全新海洋保护区的建成。第一个海洋保护区位于美国，建成后可显著扩大太平洋偏远岛屿海洋国家保护区的面积，使之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海洋生物保护区。另外两大海洋保护区则位于南太平洋地区，靠近皮特凯恩群岛（Pitcairn Islands，英国的海外领地）和帕劳群岛。同时，

为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而划出了特定区域，全面禁止商业捕鱼和采矿。

相比于海洋食物链中下端的鱼类，鲨鱼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据统计，每年有 5000 万到 1 亿条鲨鱼被杀死，通常情况渔民捕获鲨鱼后切下鱼鳍，再将其活着扔回大海。鲨鱼就这样在海里慢慢死去。近几十年，世界各地的鲨鱼数量已经下降了 70% 到 80%。然而作为顶级掠食者，鲨鱼在生态系统中调节着海洋食物链上不同物种之间的平衡。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大白鲨》没能使大多数人对鲨鱼遭到的捕杀产生同情，事实上，在 490 种鲨鱼中，只有 5 种被认为是对人有危险的。为此，中国国家博物馆“保护鲨鱼——艺术巡回展”用艺术的方式介入了保护鲨鱼的主题。

“它既讽喻和警醒了人类的贪欲，



《畅游》(邹亮作)

又倡导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性。”策展人黄笃对本刊记者说，“这有助于公众更深入了解‘神秘’鲨鱼与人类的关系，克服人类未知的恐惧，并让观众不得不面对一个真实而常被漠视的现实。”展览先是以抽象严肃的作品开始，汇集了绘画、雕塑、装置、摄影、诗歌和纪录片等多种方式。“我希望它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不仅有严肃的也有轻松鲜活的部分，展厅中间波浪形的回廊集中展示了野生救援的文献。”

小孩子们一定会被这件艺术装置吸引：一条等比体积的镂空不锈钢鲨鱼被一束强光投射着，影子打在墙壁上，被放大的镂空图案是一条条形态各异的小鱼，配上蓝色的投影墙模拟了鱼儿水中游的场景。作者希望用充满童趣的作品呼唤出人们对鲨鱼的善意。在过去10年，平均每年遭鲨鱼攻击而死亡的人数只有4.3人，相比于人类的头号敌人蚊子（每年造成全球200万人死于疟疾和登革热的疾病）实在是不值一提。即便是那些因鲨鱼丧生的人也是死于被袭击后的失血过多，并没有被鲨鱼活活吞噬。相反，

被人类吞噬的是餐桌上的鲨鱼。

在一幅名为《丰收》的摄影作品中，集市老板夹着一根烟，满意地对着镜头，他身后躺着一长排捕回的黑鲨。其作者在艺术品解读里感叹道，过去三年间，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摄遍布亚洲的数十亿美元规模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真相，他造访了10个不同的国家：在河内拍摄过黑熊取胆，在苏门答腊拍摄过蟒蛇剥皮，在桂林拍摄过老虎养殖场，在印尼婆罗洲拍摄过失去双亲的孤儿小猩猩。然而，在拍摄工作中他看到的所有动物里，有一种很特殊的消费品——鲨鱼。在法国，消费者一般不知道他们在吃鲨鱼，上菜时名称也不相同，就像 siki、rock salmon 或者 dogfish。可今天最大的危险来自亚洲对鱼翅汤的狂热，这道价格不菲的菜肴让仅香港地区市场就进口了全球50%到85%的鱼翅。“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于所有生物物种来说都是最根本的生命保障。

虽然展览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有鲨鱼的形象，但却有着不同的意义。

《平衡》这幅画作中，一头真实比例的虎鲨被置于一艘年久失修的旧渔船上——那种最常见的捕捞和切鱼鳍的渔船。两大宿敌拥有极度相似的外形，这不是一种讽刺吗？两者都以流线造型达成水动力学最快的捕食速度和效率，两者都面临着相同的宿命，设备老化的渔船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世界里被逐步淘汰，鲨鱼显然面临过度捕捞和割鱼翅而濒临灭绝。在《它不是食物，更不是点心》的画作里，手握鲨鱼形状棒棒糖的少女正要将其大口吞下。细看之下，正在融化的鲨鱼形糖果色彩明艳，流淌下的糖汁像化学染料一般浸染着少女的皮肤。污染、盲目消费，即将自食恶果同时表现出来了。这可以很快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因为贫困，一些被禁止的、对海洋生态存在威胁的技术仍然被使用着。“muro - ami”是一种用于清空珊瑚礁中全部鱼类的水下击打方式，1986年在菲律宾被禁止后依然存在。除了过度捕鱼、污染以及植被砍伐的沉积之外，它已经导致了东南亚88%的珊瑚正在受到威胁。

还有一些看似和主题联系不强的作品夹杂在展览中调整节奏。一大幅半开的门和旁边一小幅海浪的澎湃共同组成了艺术品《卡夫卡的早晨》，难道它想表达是：“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孩子，迷失在森林里。当你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时，你知道我心里的悲伤吗，你知道你自己心里的悲伤吗？”（卡夫卡语）用黄笃的话来说，这个展览不仅具有艺术性，同样具有社会性：“我觉得视觉艺术尤其是美术，更多的是给人以提醒。它通过视觉折射出生死、痛苦、欲望……这里有隐含的东西，比如人与动物世界的对立和矛盾，或者消费社会给我们带来的膨胀等等，所以它比政治口号要来得深刻。视觉艺术所传达的必然和说教性的言论不同，它更需要你去体验，在视觉语言和形式中去感受那些批判和象征。”

（本文数据参考了《人与海》）

向《领导》学习

文 / 张斌



曼联前主帅爵爷弗格森

弗格森爵士也真算是著述不断了，基本保持着每两年必有一书面世的节奏。新书《领导》(Leading)早就造势，“一部关于伟大领导力的激动人心且带有灵感的指南”，无敌宝典的架势。此番与爵爷合著的不再是记者或作家，而是威尔士风险投资家迈克尔·莫里茨，显然希望爵爷的足球智慧光芒可以照耀更多领域，但《独立报》在其书评中显得有些灰心丧气：“你也许会发现将弗格森爵士冷酷和家长制作风成功转化至并不血腥的公司成功理论还有着很远的距离。”

一本好端端的成功学宝典被残酷的现实生吞活剥为平庸的最新版《弗格森老特拉福德回忆录》，大家忙不迭地从书中找寻秘闻与答案，这是最解渴的，鸡汤或者灵丹妙药暂且先放放吧。英国人推介新书的劲头铺天盖地，瞅准机会就把众人拖入历史深处。

以爵爷的傲然之气，他得讲讲如何降伏世界巨星的，企业管理者可以

从中悟出调教明星员工的手法。爵爷鄙视报纸上或是电视评论员嘴上不值钱的“世界巨星”，在曼联26载，仅有四位麾下有资格领受此衔——坎通纳、斯科尔斯、C罗和吉格斯，“而C罗则是圣诞树顶端最美的装饰”，其他球星也只能自认倒霉。球迷似乎早有准备，针对四巨星说调侃道，正解应该是韦伯、克拉滕伯格、阿特金森和多德，这可都是爵爷曾经在场边较劲的裁判，大伙儿一笑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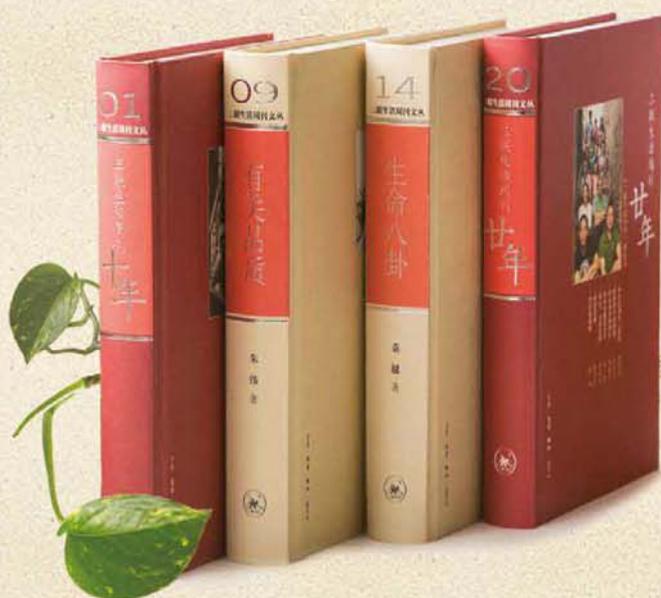
买卖球员有得有失，考察干部选择接班人则不容有失，但恰恰爵爷在这一点上不完美。妻子痛失姐妹，爵爷深感人生无常，此生来日无多，何不归隐与老伴终老呢？莫耶斯，苏格兰小老乡，六年合同不足一年便宣告失败。钦定接班人的爵爷被指选人不当，爵爷自然不会认。他的逻辑挺较劲，找过瓜迪奥拉，可是西班牙人游移不定；找过穆里尼奥，可是葡萄牙人答应了阿布；找过安切洛蒂，意大利人

不愿意离开皇马；想过克洛普，无奈德国人正在多特蒙德嗨翻天。你说什么？苏格兰小老乡埃弗顿兢兢业业11载，实事求是，不选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薪金是件多敏感的事情啊，可《领导》中大大方方地披露了2010年格拉泽与总经理吉尔与爵爷商谈鲁尼薪金，爵爷忍不住提出，鲁尼的薪金没有理由是他的两倍，格拉泽反应算快，回答：“我同意，您说怎么办？”“在曼联，没有球员应该比我挣得多。”那好吧，格拉泽家族迅速用新合同取悦了爵爷。适时提出你的需求，你不说，老板很难主动作为的。其实，直到临近退休，爵爷也才学会了如何向上做最有效的沟通，以往他只坚信，用自己的态度来改变世界，不需要其他人的支持。

爵爷素有“吹风机”之名，更衣室里凶神恶煞。迈克尔·莫里茨在书中为爵爷辩解，他有着神奇的鼓动力，不仅是成功的典范，也能给出面对失败的法则。26年间，爵爷努力给予球员信任，告诫自己不要求取回报，他希望球员能够明白，只要跟随自己，就有可能成就最完美的职业生涯。当然，还有最实在的一句话，帮你挣到最多的钱。爵爷常对球员们说，没有人会登门给你送钱，你要走出家门，走上足球场，赢得你想要的荣誉，拿到你希望得到的钱。职业足球就是如此现实，唤醒欲望是教练的职责，爵爷做到极致。

在《领导》中，爵爷骄傲地写道——“我的工作就是让人们知道哪些不可能可以变成可能，这也许就是领导力和管理之间的差别。”这厚厚一本书还可以归纳为另外一句，那是巴斯比、香克利等苏格兰名帅都曾说过的：“言归正传吧，让我们投身这项血腥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盛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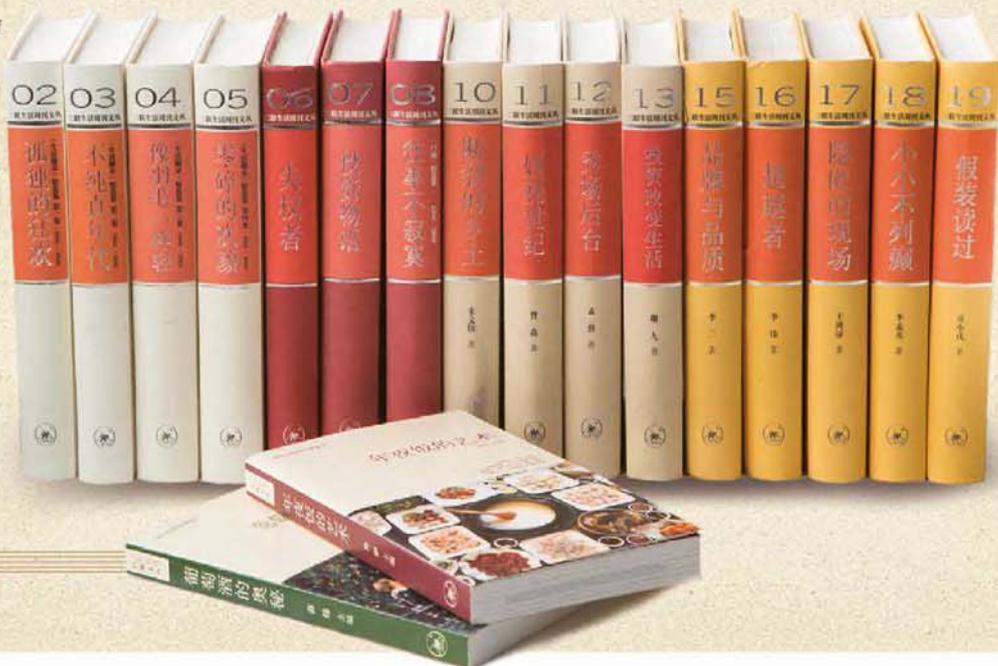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丛，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丛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十年	孤独的狂欢	不纯真年代	像羽毛一样轻	零碎的欢颜	失权者 / 李鸿谷	投资物语 / 邢海洋	往事不寂寞 / 李青	有关品质 / 朱伟	断裂的乡土 / 朱文珺	妖娆世纪 / 曹霖	秀场后台 / 孟静	投资改变生活 / 谢九	生命八卦 / 袁越	品牌与品质 / 李二	超越者 / 李伟	隐匿的现场 / 王鸿禧	小小不列颠 / 李孟苏	假装读过 / 贝小戎	十年「精装版」	廿年「平装版」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丛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美国空军的一家之言

文 / 宋晓军

9月20日，国内一家媒体终于借俄罗斯《观点报》之笔，将9月14日兰德公司发布的一份长达430页的报告的核心内容转译刊出了。鉴于“报告”刚发布后我曾在微博上将其与当年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做了对比，于是有媒体朋友在私信里问我，这是否意味着美国针对中国会出笼新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我回答说：这只是空军的一家之言。

兰德公司这份题为《美中军事记分卡：武力、地理和力量平衡的变迁——1997～2017》的报告虽然很长，但核心内容的脉络却很清晰，即设定了在台海和南沙两个假想战场，用了10个作战攻防指标以打分的方式展示了美中双方从1996至2017这20年来作战能力的此消彼长，其结果是在台海假设战场变化最大。比如1996年时台海假设战场美国有7项指标占绝对优势，一项占相对优势，一项呈均势，一项相对劣势。但报告预测到2017年，美国占绝对优势指标已消失，而中国有两项占相对优势：1. 中国袭击美空军基地能力；2. 中国反水面舰艇能力（突破对方防御）。四项指标中国与美国呈均势：1. 空战能力；2. 美渗透中国领空能力；3. 中国太空战能力和美国太空战能力。四项指标美国占相对优势：1. 美国袭击中国空军基地能力；2. 美国反水面舰艇能力；3. 美网络战能力；4. 美国核打击能力。按照这个“打分”结果，就台海假设战场的常规作战而言，中国军力确实对美国军力呈现出了挑战趋势。

接下来就是关键部分，即“报告”最后为抵消中国军力“挑战趋势”提出的建议。其中有关调整武器装备采

购的建议大意是：应优先发展隐身及生存能力强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改善潜艇战和反潜作战能力；增强太空战能力；尽快削减老旧战斗机；降低对大型航空母舰的作战依赖。看到这儿，很多熟悉美国海、空军装备发展之争的军事迷，一定会想到这份“报告”与美国空军有关。事实上，在“报告”前言的最后部分明确说明了“报告”是由美国空军资助、并由兰德空军项目（RPAF）完成的。这也是我在微博中提到“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缘故。

在上世纪50年代初，面对苏联的兵力数量优势和地理优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取了包括兰德公司在内的智库建议，于1953年制定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其内涵是依托空军的战略轰炸机携带数量超过苏联的核武器对苏联及华约国家实施威慑，从而使美军得以减少人力成本和控制国防开支。尽管这一战略只实行了8年（后被“灵活反应战略”取代），但在2015年1月却被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克（Robert

Work）将其称为是第一次成功的“抵消战略”，他还表示国防部正在准备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以确保未来数十年内美国的全球兵力投送能力具备竞争优势。从这一背景上看，在国防开支不断紧缩的趋势下，美国空军资助兰德公司发布这样一份报告就不足为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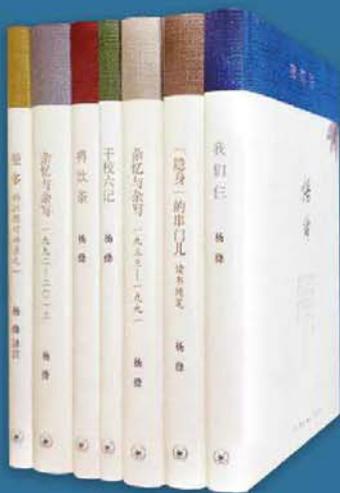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报告”只是美国空军的一家之言，但“报告”的真正含义已被俄罗斯《观点报》评述“报告”文章的标题“点睛”了——美国开始认真看待中国军队。值得注意的是，在“报告”第48页“中国战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列表”中，中国在“9·3国庆大阅兵”上亮相、具有打击大中型水面舰艇能力的DF-21D和DF-26两型弹道导弹并没有列在其中。而这两款导弹的首次亮相，刚好印证了9月22日中国台办主任在第十二届“武汉—台湾周”开幕仪式上说的一句话：绝不能让两岸关系走回头路，不能再让“台独”分裂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DF-21D 反舰弹道导弹亮相“9·3”大阅兵



三聯書情



杨绛著译 七种

干校六记

将饮茶

杂忆与杂写：1933—1991

杂忆与杂写：1992—2013

“隐身”的串门儿：读书随笔

我们仨

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共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及随笔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译作《堂吉珂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写作的人是孤独的。写作与孤独，形影不离，影子或许成为主人。

写作在召唤，有时沉默，有时叫喊，往往没有回声。

远行与回归，而回归的路更长。

——北岛

北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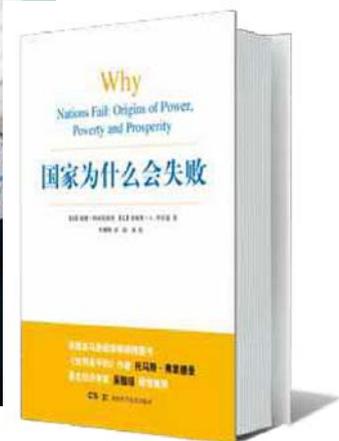
履历 诗选1972—1988
 在天涯 诗选1989—2008
 波动
 时间的玫瑰
 城门开
 蓝房子（即刊）
 午夜之门（即刊）
 青灯（即刊）
 古老的敌意（即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西莫格鲁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说：“国家在经济上失败是因为采取了榨取式制度。这类制度基本上是由一个精英阶层设计一套经济制度，以广大的社会群众为刍狗，达到自肥且永久掌权的目的。”

主笔 / 薛巍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西莫格鲁及他们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广纳式与榨取式经济制度

9月16日，扎克伯格在他的主页上说，在读了《穷人的投资组合：穷人如何每天靠2美元度日》之后，他接下来要读的书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他说：“这本书考察了各国在鼓励繁荣和经济发展、消除贫困时，它们实施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刺激手段。它是《穷人的投资组合》很好的补充，前面一本关注的是人们如何在贫困中生活，这本书讨论了为何会存在贫困，以及如何减少贫困。”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西莫格鲁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2012年合著的一本书。书中说，目前世界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大，“许多人非法越过格兰德河或地中海，以便体验富国的生活水准和机会”。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挪威的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布隆迪人均收入的496倍（两国的人均收入分别是8.429万美元和170美元）。

对于为何有些国家贫穷、有些国家却富裕，以前有过三种解释，分别是以贾雷德·戴蒙德为代表的地理决

定论、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以及源自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济学理论的“无知假说”。而两位作者认为这些理论都解释不了当今世界的贫富差距。对于地理决定论，书中说：“历史显示，气候或地理与经济成功没有单纯或持久的关联。例如热带并非总是比温带贫穷。”宗教与经济成功也没有多大关系。

无知假说认为，世界不平等的存在是因为统治者不知道如何让穷国变富裕。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持有的看法。穷国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们有许多市场失灵，而经济学家和政策

制定者不知如何解决它们。无知假说能解释世界不平等吗？非洲国家比世界其他地方贫穷，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们领导人在治理国家时持有错误的观念，导致国家陷于贫穷，而西欧领导人则知识较充足且获得较佳的建议？二位作者认为：“虽然有一些著名例子是由于领导人误判政策的结果，但无知假说最多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的世界不平等。穷国做错大部分不是因为无知或文化，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做出制造贫穷的选择。他们做错不是出于犯错或无知，而是有意做错。”相应地，当国家打破带给它们贫穷的制度模式，努力踏上经济成长的道路时，那不是因为他们无知的领导人突然变得更有知识或比较不顾私利，也不是因为他们获得更高明的经济学家的建议。过去半个世纪让人民变穷的非洲国家，它们的领导人之所以采取那样的政策，是因为他们可以牺牲他人，自己图利并逃过制裁，或者因为他们认为那些政策是好的政治策略，可以收买重要精英阶层的支持而维系自己的权力。

书中明确提出：“国家在经济成功上的差异是因为制度不同，也就是影响经济运作的规则，以及激励人的诱因不同。”他们区分了两种制度，一种是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它是中央集权加上多元化，政府足够强大，能够约束私有力量，但本身也会受到约束。这种制度能带来经济繁荣。在这种制度下，安全的私有财产权是核心，因为只有拥有这种权利的人愿意投资和增进生产力。企业家如果预期他的生产会被窃取、征收或因为课税而荡然无存，就会失去工作的诱因。广纳的经济制度不只是给精英，也开放给大众，鼓励大众参与经济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

与广纳的经济制度相反的是榨取性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向社会的一部分人榨取收入和财富，

以便使另一部分人获利。“国家在经济上失败是因为采取了榨取式制度。非洲有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南美洲有哥伦比亚及阿根廷，亚洲有乌兹别克，中东则有埃及之类的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有显著的差异，有的位于热带，有的地处中纬度；有的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有的则曾是日本、西班牙、俄罗斯的殖民地。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榨取式制度。所有这类制度，基本上就是由一个精英阶层设计一套经济制度，以广大的社会群众为刍狗，达到自肥且永久掌权的目的。”奴隶制和封建制都是榨取式的，受法律管制的市场经济是广纳式的。

书中进一步提出，榨取式制度下也会发生经济增长，但无法持久，首先是因为持久的经济成长需要创新，创新又与破坏性创造不可分。精英阶层害怕创造性破坏。其次，宰制榨取式制度的人无不是牺牲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图利自己，因此在榨取式制度下，政治权力成为垂涎的目标，团体与个人争相夺取，其结果是政治动荡。

为什么会有人反对经济增长？

如果说榨取式经济制度不能持久，这些国家为何不主动选择转变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呢？难道不是剥削人民的独裁者也希望让自己的国家尽可能富裕吗？二位作者解释了榨取式制度为何会努力保住自己。1965至1997年之间担任刚果总统的蒙博托和他身边的精英极其富有，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建了一座宫殿，有一个机场大到足以降落超音速协和客机，他向法国航空公司租来这架飞机，供他去欧洲旅游用。在欧洲他购买城堡，并拥有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大片地产。如果他建立能增加刚果人的财富、而不是让他们更贫穷的经济制度，那不是更好吗？如果他增进全国人的财富，他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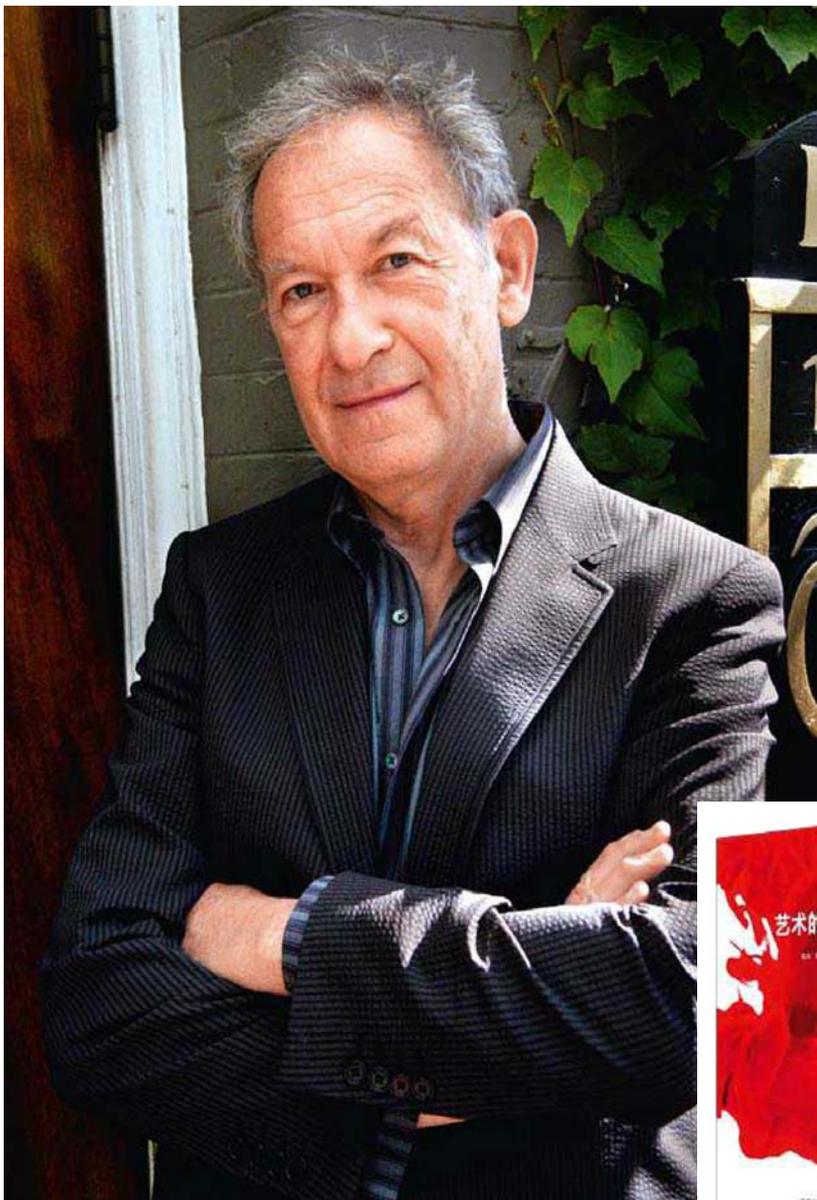
是可以有更充裕的经费买下一架飞机而不只是租用，他还可以买更多城堡和豪宅吗？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很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能够带来富裕的经济制度可能同时造成所得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独裁者和其他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受到威胁。“反对经济成长本身有一套很不幸的前后一致的逻辑。”

经济成长和科技改变伴随着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它们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新产业从旧产业吸走资源，新公司抢走旧公司的生意，新科技让老旧的技术和技巧过时。欧洲历史为创造性破坏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由贵族和传统精英控制，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拥有的土地，或因为君主赐予的独占权。工业化后，工业、工厂与城镇的扩散把资源从土地吸走，降低了地租，并提高了地主必须支付给佃农的工资。贵族不是工业化唯一的输家，许多工匠组织起来反对工业化，破坏他们认为抢走了他们生计的机器。他们是卢德派。1733年英国发明家凯伊发明了飞梭，他的房子在1753年被卢德派人士纵火烧毁。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哈格里维斯也遭到类似待遇。

戴蒙德说，二位作者提出的广纳的经济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也许提供了对国家在繁荣方面的差异50%的解释。他仍然认为地理因素也很重要，热带的农业生产效率就是低于温带。首先，温带作物储存的能量更多，热带的害虫更多样且常年都能存活，热带的害虫更多样且常年都能存活，在热带落到地上的叶子和其他有机机会迅速被分解，导致营养物质流失、土地不够肥沃。另一个地理因素是一个地区是否有出海口，每吨货物陆运的成本是海运的7倍，所以玻利维亚、巴拉圭等内陆国家是南美最穷的国家，非洲15个内陆国家是非洲最穷的国家。☑

西蒙·沙马的力量

文 / 马凌



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马及其著作《艺术的力量》



屏幕上的西蒙·沙马 (Simon Schama), 高而瘦, 穿着随意, 步态羞涩, 白衬衣的领口敞着, 头发在风中凌乱, 很有辨识度。不过, 最吸引人的还是他说话的方式: 脖子略梗, 半边身体跟着起伏, 像是用生命在发音。2013年《犹太人》首映时, 沙马不无幽默

地解释自己何以不用麦克风: “我父亲习惯于站在房间的后部说, ‘大声点儿, 西蒙, 大声点儿!’ 这就解释了我的一生。”《卫报》在对沙马的采访中强调, “大声、热情、野心勃勃, 最重要的是, 看得见”, 这不仅是沙马的个性, 也是他著作的品格。

时至今日, 西蒙·沙马的大名在大西洋两岸象牙塔中招致的嫉恨一定是“罄竹难书”。他21岁在剑桥大学以优等生身份毕业, 随后在剑桥和牛津教书, 32岁出版第一部专著, 35岁在哈佛谋得一个教席, 48岁“转会”到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 他陆续出版了《财富的窘境: 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1987)、《公民们: 法国大革命编年史》(1989)和《死亡的确切性》(1991), 这三部历史著作获得了一些奖项和大批读者。若是沿此路径发展, 学院之路也还中规中矩, 尽管有批评者表示, 《财富的窘境》“太艺术”, 《公民们》“太大胆”, 《死亡的确切性》“太前卫”。

转折发生在1995年, 这一年, 50岁的大学教授成了媒体新星, 《纽约客》邀请他写作艺术史专栏, BBC以他的著作《风景与记忆》为底本拍摄了5集电视系列片。看中了他的叙事功底和画面意识, BBC不遗余力地邀请他为大型纪录片《英国史》撰稿, 这部15集的电视片于2000年开播, DVD和书籍的销量都创下纪录。由于沙马对英国历史的

特殊贡献, 女王封他为二等勋爵。自此后, 沙马笔力愈加雄健, 他自嘲说除了不能写DIY、板球和汽车修理, 别的都不在话下。他的媒体稿结集为《涂抹、涂抹、涂抹: 有关冰激凌、奥巴马、丘吉尔和我妈妈》, 笔底世界之变化多端, 于此可见一斑。多年以

前，他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第一篇书评时，稿费是25英镑。到2008年，为了《美国的未来》系列，BBC签下他的价格是300万英镑。若论风头之健、稿酬之巨，沙马唯一的“劲敌”可能是另一位“跨界”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

2006年，沙马的《艺术的力量》在BBC二台播出，迅即风靡波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希腊、伊朗、意大利等国家，迄今有“经典之作”的美誉。正如BBC的介绍：“它无关挂在墙上的事物，它无关装饰与美丽，它只关注力度、需求、激情，一句话，艺术的力量。”这个系列聚焦于八件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讲述了八位艺术家——卡拉瓦乔、贝尼尼、伦勃朗、大卫、透纳、凡·高、毕加索以及罗斯科——如何在困境中张扬自我、创作出惊世杰作、并一举改变了艺术发展的方向。电视片着力展示这些“创造性躁动”的时刻，“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他们自我最直接的证明，也是在宣告世人：艺术可以凌驾于令人愉悦的原则之上，这些作品，希望改变世界”。

作为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西蒙·沙马曾在各处做学术讲座或举办工作坊，呈现一个“通俗历史叙述者”的“学究”一面。据说他在哈佛做了一个关于画家大卫与雅各宾派的讲座，内容复杂而高深，以致讲座结束后，一个预科生走上来抱怨说：“我的父母将不会替我付每年2万美元的学费——如果我在讲座之后比在讲座之前更加迷惑的话。”沙马马上回答说：“那恰是你的父母应该付费的所在。我们把那叫作‘教育’。”同理，这本译成中文有71万字篇幅的大书，充满了细节、知识与观点，并不简单。

曾经有评论者形容沙马的“犹太式”写作风格：“充满了令人回味的细节，像座水果蛋糕，堆满了葡萄干、加仑子、坚果、糖霜樱桃，并且全浸

在白兰地酱汁里。”对于艺术史爱好者来说，《艺术的力量》确如八块巨大而甜腻的蛋糕。比如《大卫：弄潮革命的画家》一章，作为蛋糕基底的是17至18世纪绘画领域的争议：热爱“精神正义”的尼古拉斯·普桑和热爱“肉体温暖”的保罗·鲁本斯，谁更能代表绘画的本质？法国旧体制下的宫廷趣味以布歇为代表，他继承鲁本斯，营造的画面闲适慵懒。物极必反，到路易十五执政末期，连著名的蓬皮杜夫人都觉得艺术应该不仅仅是布歇一般的牛奶巧克力，时代呼唤着一种更暗黑、更强悍、更阳刚的艺术。本来，布歇是雅克·大卫的远房表哥，他却拒绝收大卫为徒，而把大卫推荐给有古典主义遗风的画家维恩。路易十六时代，掌管艺术的安吉维勒侯爵渴望将艺术重新引导到教育、而非愉悦之路上，他领导下的皇家美术学院开始成为“公共道德的培训场所”，维恩时任学院院长，大卫作为他的学生，习得了全套古典主义风格技法。

沙马将大卫所引发的绘画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复杂纠葛作为蛋糕的主体，这也是一章中最富于营养的部分。大卫在大革命之前已经功成名就，他画出了《荷拉提的誓约》、《苏格拉底之死》等名画，得到富有且有教养的贵族阶层的厚爱，比如皇室包税公司的成员、著名化学家拉瓦锡就给过他一笔高达7000里弗的资金。大革命爆发后，追逐权力的大卫迅即成为“共和国画家”，而共和国也继承了原先宫廷所欣赏的罗马式肃穆风格。在革命进程中，大卫的责任是给民众制造华丽的幻象，激发他们效忠于新的政体。无论是伸出路臂的宣誓姿态、短寸平头的发型、街头公共庆典、立法者的服装、铺天盖地的海报，都有大卫的贡献。不仅如此，拉瓦锡被推上断头台，大卫是签署执行死刑的委员会成员之一，他甚至与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妻子离了婚。可是，当雅各宾政权倒台后，

大卫也被宣布为“暴君艺术家”和“叛国者”，两次遭囚禁、两次被释放。拿破仑当政后，大卫一而再再而三地服务于皇帝，最终在滑铁卢之后隐居乡间，客死布鲁塞尔，成为基本被时代所遗忘的“政治宣传员”。

作为这个庞大蛋糕的华彩部分，是《马拉之死》的创作过程。时值炎夏，马拉的遗体泛绿，大卫的当务之急是为遗体化妆，剪断耷拉在外面的舌头、漂白皮肤，甚至从另一具尸体上砍断一只胳膊嫁接在马拉的遗体上。大卫整理好的马拉遗体以戏剧化的场面在激进派的俱乐部里公开陈列了三天。然后大卫用三个月的时间创作了这幅纪念碑式的画作，一切都被呈现得庄严肃穆，马拉似乎是用大理石打造的，俨然一幅共和圣子图。沙马指出：“自古以来有两种关于艺术功能的观点针锋相对，而大卫正在试图弥合这种分立：展现真实，同时植入理念。他认为，最好的艺术革命、最好的政治革命，都应该如此。”吊诡的是，尽管《马拉之死》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谎言，它始终具有的是震撼的、致命的美，并以此吹响了现代视觉艺术的号角，这才是艺术的力量，它难以抵挡。

正统的艺术史学者可能会挑剔《艺术的力量》缺乏刷子、凿子、颜料、图式、笔触和构图。的确，沙马更多的是从历史而及艺术史，他的研究与叙述路径，是艺术社会史与艺术家传记的结合，他纵向剖开一个时代的精神史，再从中描述伟大艺术家如何成长于时代又超越于时代，因此本书的关键词是斗争、冒险、冲动、挑战、理想和灵感，充满疾风暴雨式的戏剧张力和浪漫英雄式的性格魅力，跌宕起伏、振奋人心。正如沙马的诤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沙马著作的缺点是过于关注历史中的个人，沙马著作的优点则是学识渊博、风格独具、雄辩滔滔。诚哉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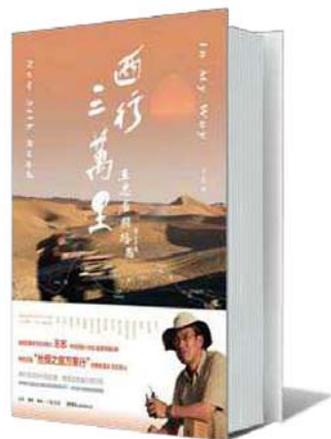
王志和他的《西行三万里》

用2014年里的56天,王志从西安走到了罗马。一路西行的奇异风景中,他最关注“人”。在他的概念里,一切元素都是和人发生了联络,才生成了丝绸之路的概念。

记者 孙若茜



王志和他的新作《西行三万里》



计划写作,看起来也没有时间写作。回来时,他却带了三十几万字,厚厚一本《西行三万里》,一共90篇。“这是一条含金量太高的路,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忍不住地写。”触目可及的景致、扑面而来的异域风情和藏在背后的

历史事件占据王志的视域和思考,又经由他的视角重生,是书中最常出现的内容。

比如,对于绝大部分人都知之甚少的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王志的笔下首先是其民族的古老,葡萄酒酿造就有着八千年的历史,转而是其作为国家的年轻——不仅仅是因为它在1991年才独立,官员

大都是青年,更是因为其政府核心的处事理念。

他用了一整个篇章来讲述格鲁吉亚法务部的办公模式——每个法律服务中心的外立面都是用玻璃制成,通体透明。“犹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摆放在交通要道出入极其方便的位置。据说每个地区都有,遍布全国。看起来造价不菲,这对于格鲁吉亚目前的经济实力而言属大大超前。”它所强化的理念是,在格鲁吉亚所有的权力都应该像这栋建筑一样透明。在透明建筑中,有人为你送上咖啡,提供托儿、寄存、急救等服务,还以你意想不到的速度办好证件送到你手里,

“出发前,我陪王志去理发,一改原本三七分文质彬彬的样子,理得很短挺时髦。我放心去上班,谁想回家时他把自己剃成了光头:‘重出江湖,还是改头换面好。’”妻子朱迅形容剃了光头的王志,有一股子“匪气”,那种“匪气”带着湖南人骨子里不服输的霸道。“我知道这次他是下了狠心的,50岁的王志又出发了。”

2014年7月,王志担当了陕西卫视“丝绸之路万里行”的总主持人。从西安到罗马,沿古丝绸之路一路向西的56天自驾,走了1.5万公里的路,穿越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格鲁吉亚、土耳其、希腊、

意大利8个国家。15辆车,一步步走完全程的大概50人,他是其中一个。

让人艳羡的神奇之旅,一路马不停蹄。几乎每天都在向前赶路的行程使每个人都要轮流成为司机,最夸张时一天前行21个小时。最疲惫时,王志开车在路上撞了一头牛。在总主持人的位置上,王志要做的还有配合每天的播报、直播,各地活动的主持以及一档形式和“面对面”非常相似的节目“丝路长安的对话”,采访那些在丝绸之路上的关键人物。

持续两个月的旅程,对于在路上的人来说,都是身体和心理的巨大考验。因此,出发时,王志并没有

以印证它的两句广告词：“Everything in one space”，“Just coffee and justice”（“所有的事情都在一个地方搞定”，“实现公平就像喝杯咖啡一样简单”）。

当然，他也写下一路上所经历的艰险和日常心情。离开北京一个月时，车队遭遇了一次油荒。420公里的克孜勒库姆，红色沙漠，常规5~6小时穿越。中午过后，随着第一辆车没油，接二连三，最终几乎全车队都发出了警报。周围300公里范围内6个城市，只能筹集不保证品质的400升汽油。王志用平实的语言记录着：“队伍出现前所未有的骚动和慌乱，有人骂娘，有人张罗请客，有人‘失踪’，大批不明身份者围观……”

这大概是整个团队在途中所遭遇过的最大现实困境。而时时发生着的，是人的疲惫和涣散的情绪。自驾出行，身体上的累，加上精神上的兴奋，会让人10天左右就迎来第一个疲劳期，接着是半个月、一个月。庞大的团队所面临的问题是，每个人出现疲劳期的时间点和冲破疲劳期的临界点不可能相同，但消极的情绪却会传染。王志也在心里打过退堂鼓，但职责所在，要充当精神领袖，至少有三次，在整个队伍弥漫着不安和疲劳时，他拿着对讲机持续一个多小时地对着所有人谈经历、谈感受、谈新闻业务、谈此行的意义，等等。

“一路上他的头发一点点长长，有了文人的气质，更添了肌肤的阳光。”当行进终点，提前等候在那儿的朱迅看着王志开车进了罗马，说：“我真的骄傲，当年的王志回来了！”我没有问朱迅所说的当年是何时，反正对于观众来说，又何尝不是“王志回来了！”

2008年10月，受中组部、团中央“博士服务团”委派，王志开始了在丽江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出任丽江副市长。那时，他并没有离开中央电视台，也常因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时

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对于通过“东方之子”、“新闻调查”以及“面对面”认识他的电视观众来说，那似乎是王志的离开。

2010年7月，王志正式从央视调职，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担任书记、常务副理事长。和他当初说要把“面对面”一直做到自己不能说话为止的豪情如出一辙，他当时有着把自己下半辈子交给红十字会的决心。他说这些在我们看来有着极大不同的职位、轨迹，被说成跨界的行为，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和媒体一样，都是服务。”

2011年，“郭美美事件”，红会被诟病。2012年，王志离开，他回到曾读博的中国传媒大学任教，带研究生、开讲座，第一节课就向学生们发问：新闻审判一切，谁来审新闻？

2014年走丝绸之路，对王志自己来说可能只是“暑假作业”，对观众来说他又一次正式地回到了电视。问这一路上最吸引他的是什么？王志说，是人。这一点，从他书里穿插的100多张照片就能印证——人物居多，细节居多。他告诉我，同行者大都爱拍开阔壮美的远景，建筑、夕阳、大漠，但他钟爱拍丝路上的面孔。“毛孔摄影师”，他说大家这样形容他。

拍静物同样，他希望找到角度与人产生关联。比如在西安拍博物馆里的陶俑和马，仰起的马头和前蹄是照片中虚化的前景，焦点在马看向的前方，那个将手抬到胸口的陶俑身上。照片呈现的角度，陶俑显然是反身牵着马的人，但照片外有各种各样的观看视角，虽然陶俑和马在同一地方出土，但通常被视为独立于彼此的文物。王志说，他企图弄清出土时这两件文物的原始位置，但没有得到解答，于是就在照片里以自己的角度构建了它们之间的关联。在他的概念里，一切都是和人发生了联络，才生成了丝绸之路。

写作的时候，他在乎的还是“人”，强调的依然是“面对面”。“我在写作时，是和眼前的很多面孔说话，而不是孤芳自赏地说给自己听，也不是在为沿途做广告。我希望有交流感、对象感，面对面。就像我在和你说话，每说一句我都会去想，你爱听么？听得进去么？”王志说，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传播方式的变革，黑格尔所讲螺旋式的上升，最高级的新闻形态就是面对面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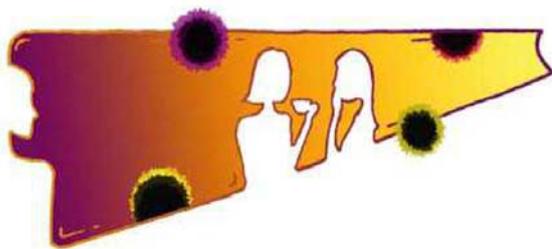
他解释说，当面对面交流实现时，得到的是立体全面的信息，虽然当我们需要突破时间的界限，利用了文字，突破空间的界限，利用了电话、电台、电视。在单向传播之后又出现多向传播的网络，但是这种种进化的同时也都是一种退化，依然不能替代面对面的交流。接下来，我们去实现实时的对讲、视频，又朝着最低级也是最高级的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前进。为什么大家都在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这是一种悲哀？是距离感。因为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倚赖更多外在的形式辅助。

在他的概念中，书是一种很高级的形态，是内心独白通过公众的方式传达，凝练成文字后不可更改，而对于文字本身，他心存敬畏。王志说，《西行三万里》是他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本书。此前虽然署名一本关于“面对面”的书，但那更多是大家合作的结果，是在讲节目，他称为“公务”。“那里面可能有我，但是没有我；这本书里没有我，但是真的有我。”没有，是没有王志对自己的讲述；有，则是一切都来自王志的视角。

他以这样一段话作为书的自序：“甲乙俩信徒都爱吸烟。甲问神父：‘祈祷的时候可不可以吸烟？’神父说：‘那怎么行？’乙问神父：‘我吸烟时想上帝，可不可以呢？’神父说：‘当然可以！’我很喜欢这段话，它符合我目前的情形。”

出人意料的阳光

文 / 太阳同学(乐山) 图 / 陈曦



小城不再是细雨绵绵，也好不容易如天气预报所说的那样有着连续的几个晴天。R小姐想到，可以约几位大学同学，三天后到附近的M山去郊游。R小姐是前年毕业的，毕业这几年，同学们也常有来往，只是话题不再是哪个老师怎样怎样、哪场考试如何如何，而是变成了你在大街上随处可听的那些话，可是这些在大家心里都觉得正常，也没有人提出什么东西。

R小姐拨通了L小姐的电话，很不巧L小姐正在一场美妙的巴厘岛旅游中，但是凑巧的是L小姐正打算两天后结束行程，于是L小姐自告奋勇帮忙邀请几位其他的同学，当然其中一位就是N同学。N小姐是一位职场精英，在公司里钩心斗角获得胜利之后都会在朋友圈里展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但大家都漠不关心点了赞，于是乎N小姐就越发趾高气扬了起来，可谁也不在乎，因为她的芬迪和巴宝莉都是A货。N小姐很是平易近人地没有接电话，直到第二天，R小姐拨通第三次时才接通了电话，R小姐话还没说完一句，N就神气地说：“你们的活动我就不去了，公司派我去英国跟客户签字。”说完直接挂断了，R毫不介意，因为R正想象着，她穿着假的巴宝莉去英国会是怎样的尴尬。

好容易的，在第二天，R小姐终于凑齐了七位同学，可是R小姐对他们的住宿和交通工具毫无规划。所有人没有提醒，R小姐也知道，这场郊游从一开始就是无法出发的。然而大家依然假装对郊游抱有热情，时而打个电话与R小姐寒暄一下，内容都是些“我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事”、“我应该是空着的吧”、“我不知道老板同不同意我休息，应该可以吧”……R小姐也没有仔细听，只是在他们讲完故事之后说一声“好的”，然后等着对方挂掉电话。

临行前一天，R小姐电话成了热线，短信蜂拥而至，仿佛这天所有飞机都晚点了，所有公司都不能休息了，所有人的家人都病了般的焦头烂额。但是只有L小姐没有发短信或者打电话，R并没有感到奇怪，因为L小姐一直跟她关系不错，不会让自己太难堪。

傍晚在一个私房小菜的餐馆里，R在享受晚餐，

殊不知这竟然有一个享受太阳的活动。就是说，在早上太阳刚升起、中午阳光灿烂、傍晚夕阳西下时，在此餐厅就餐时，餐厅会拍摄就餐者与太阳的画面，并且连同一张电子优惠券，发送到这个餐厅的微信公众号上。R觉得好玩，于是关注了公众号，翻到了刚刚自己的照片，这时突然发现“夕阳西下几时回”就在眼前，只是自己紧皱的眉头，不是为了归家而皱，但竟也不知道为什么而皱。苦笑一下，突然想起，所有人都不去郊游了，可L小姐还以为要去呀，于是准备通知并感谢一下L小姐。R开始移开桌上的小灯和咖啡壶，寻找自己的手机。找了几分钟依然无果，准备喝口“南山”再继续，突然熟悉的铃声响了，R这才发现手机掉在两片沙发的缝隙之间，急忙拿出来，心里暗暗感谢着这个打电话的人，想着过几天请她到这里来吃饭。R想着想着，接通了电话，原来是L，电话里L说自己在游泳时手受伤了，打了石膏，缠着绷带，出行不便，R没听她说完，便说了声“好吧”，冷冷地挂断了。

R突然觉得很恶心，可是又觉得很无助，但这也不能怪别人。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啊，既然大家都是这样的，那么就该这样啊。R又喝了口咖啡，觉得咖啡味道恶心，但这是这个餐厅最好的咖啡了，R心里说：“这真是个破餐厅啊，只有傻子才会到这里来。”并暗暗下决心，以后再也不要来了。于是匆匆起身，一不小心打翻了咖啡，然后抬头挺胸地草草结账。

在原约定去郊游的这天，R窝在空调房里刷着朋友圈，正是中午，外面阳光刺眼极了，看到一条说的是，N被取消去英国了，不知道是为了什么。R扑哧一笑，应该是假的吧，N那么恶心，哦不对，强势的一个人，怎么会舍得机会溜走呢？这时一条新的消息来自那个餐厅，刚想取消关注，可一看，这张图里的两个人怎么那么熟悉。一看，一个是略有点晒黑的L，另外一个穿着假巴宝莉的N，背后的是刺眼得出人意料阳光。

R小姐心里很不是滋味，然后恶狠狠地点了个赞，拉黑了两个联系人。☑